

三联
耳关

生活周刊

® 2017.3.13
2017年第11期
www.lifeweek.com.cn

破除抗生素崇拜
与细菌君相爱相杀



927



9 771005 360000



生活·读者·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5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元



精品丝路 绚丽甘肃

Exquisite Silk Road Tours in Glamorous Gansu





甘肃省旅游局 www.gsta.gov.cn



《财富》(美国) 2017.3

特朗普经济的希望与风险

到目前为止，特朗普还没有制定解决长期债务问题的任何计划。在他看来，首要任务是大力促进经济增长，至于财政赤字，尚且不必提上日程。这种缺乏远见的态度令人担忧。即便是看好特朗普经济的霍尼韦尔·科特，也表现出对总统不关注赤字的担忧。美国白宫从未出现过如此矛盾的自由市场和反增长政策并存的组合，或者说从来没有一位总统以如此不寻常和难以预测的方式执政。



1 / 《新科学家》(英国) 2017.3.4 宇宙的不确定性

如果光速是无限的，如果量子力学比想象中更神奇，如果时间是双向的，如果世界并非不是三维的，如果存在反物质世界，我们的生活会是怎样？日前，科学家探索了五个关于宇宙的不可能，而这些，也许是真的。可变光速的概念自提出以来，仅有预测数据可参考，而去年滑铁卢大学教授发现了测定星系中可变光速的方法，将用实验来验证数值预测。如果这一推论是真的，意味着宇宙知识的标准模型将被推翻。

3 / 《经济学人》(英国) 2017.3.4 下一场“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选初选将于4月23日举行，民调显示，极右的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和鼓吹自由贸易竞争与移民的前经济部长伊曼纽尔·马克龙是两位大热人选。马克龙如获胜利，意味着自由主义对欧洲人仍有吸引力；勒庞的胜利则会让法国变得更穷、更孤立也更不友好。无论结果如何，这场对决都将给停滞多年的法国和整个欧盟带来巨大变革。

2 / 《展望》(英国) 2017.3 “自由”之举

英国上下对美国新总统的感情有些复杂，政府的态度较为友善，但强烈的抵制也无处不在，英国下议院议长不久前就强硬表示反对特朗普来英访问时在议会发表演说。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都极富争议性，退出TPP、签署“禁穆令”、恢复反堕胎禁令等新政的社会影响势必波及全球。脱欧以后的英国已需重新定位自己，而如何把握与美关系的走向极为重要。

4 / 《纽约客》(美国) 2017.3.6 特朗普与普京的新“冷战”

近20年来，美俄关系一直处于紧绷和恶化之间。虽然在贸易和军备控制等问题上，两国达成诸多协议，但总体形势不容乐观。许多俄罗斯和美国的政策专家将现在的两国局势定义为“冷战2.0”。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正在努力找出特朗普的漏洞，在很多国家安全官员看来，俄罗斯黑客对电子邮箱的攻击就是一场令人不安的宣战。普京试图摧毁美国人的信心，破坏西方在外交、金融和军事方面的盟约关系。

家具应是一种家当，用来传承，可以叙说很多故事

王澍老师说：“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
建造一个世界首先取决于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老吴，这个与社会有些“脱节”的男人，
毕业于中国美院建筑设计系专业，
正是王老师的学生。

设计师？画家？木匠？

在他的眼里，无论是建筑设计、画笔还是
凿子，表达的都是生活方式，彼此相通。

几年前，老吴开始了老木料的研究与家具设计，
开创了如今的中房。

“在家中老人手里，总会有一两物件值得让后
辈留下，也许是一只玉镯，也许是一张案几，
它们被视作“家当”，代代相传，是一种精神
传承。

对于家具，在老吴心里就像房子一样。房子的
居住者是人，而家具的居住者是器。他更喜欢
将家具称作“器居”，器的不同产生了家具的
不同形式与功能。家具也可以是独立的，它也
是器的一种形式，器与家具相辅存在着。

对于中房来说，造一件家具，就是制作一件美的
容器，**做一件会讲故事且美的家当。**



广告



杭州中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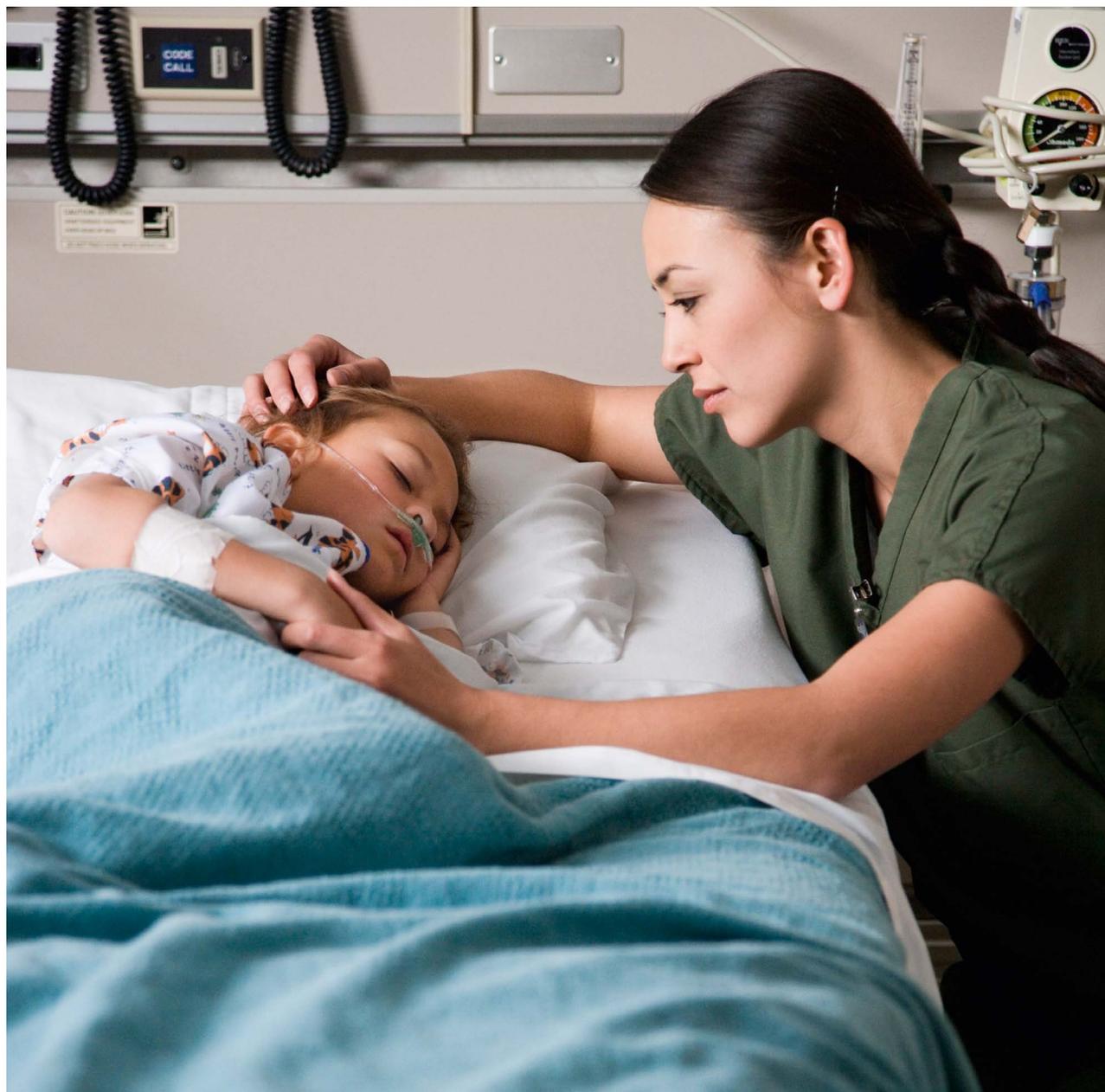
线下体验店：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贤家路

电 话：13456852656（袁小姐）；

13588014351（吴先生）；



中房微信号



P30 封面故事

破除抗生素崇拜

与细菌君相爱相杀

- 32 亦敌亦友：被误解的细菌
- 48 “神奇子弹”：抗菌药物改变的医疗史
- 56 孩子生病，迷信还是拒绝抗生素？
- 62 0～3岁育儿：“适度清洁，吃了不生病”
的科学依据
- 70 微生物决定你的未来

P88
浙江富阳造村记



P110
重新“发现”巧克力，时髦新标签



社会	
时事：财阀的冬天：少主被捕之外的“三星”危局	80
生态：浙江富阳造村记	88
调查：拒绝“降级”的大熊猫	102
新消费：重新“发现”巧克力，时髦新标签	110
经济	
商业：“最年轻宝马”：锁定中国年轻人	120
文化	
文化：普利兹克建筑奖：回到本源	122
电视：《航拍中国》：想做航拍界的“舌尖上的中国”	130
话题：《小镇滋味》：反常规的美式中产图像	134
音乐：情绪渲染师梅林茂	136
设计：一百年的德意志制造联盟	138
时尚：为什么总是 20 年代？	144
科技：寻找生命最初的痕迹	148

思想：怨恨之源	154
书评：争论不休	156
专栏	
邢海洋：美国的海外征税	16
袁越：近视的原因	151
张斌：道不尽杯酒人生	152
宋晓军：国防预算的“后真相”与真相	153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59

(本期封面绘画：张曦)

环球要刊速览	2	声音	21
读者来信	8	生活圆桌	22
天下	10	好东西	26
理财与消费	18	个人问题	160
好消息·坏消息	20		

2017年第11期，总第927期，2017年3月13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谢先凯 Xie Xiankai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蒲实 Pu Shi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曹玲 Cao Ling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石鸣 Shi Ming 丘谦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张雷 Zhang Lei 苗千 Miao Qian

记者 Reporter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丹 Yang Dan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鲁伊 Lu Yi 赵潇 Zhao Xiao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非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雍江 Yong Ji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发行服务 Circulation Service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乔龙宁 Qiao Longning

王霄 Wang Xiao 王荻 Wang Di 金宇迪 Jin Yudi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狄征 Qin Zheng 傅东方 Fu Dongfang

电子阅读 Electronic Reading

刘国强 Liu Guoqiang 辛军 Xin Jun 连子君 Lian Zijun 张莉 Zhang Li

微博微信 Micro-blog WeChat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薛芃 Xue Peng

内容编辑 Editor

刘彭媛 Liu Pengyuan 徐睿洽 Xu Ruihan 刘凌 Liu Ling

视频 Video

吴冰川 Wu Bingchuan 李倩 Li Qian 孙明楷 Sun Mingkai

活动 Even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傅东方 Fu Dongf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连华伟 Lian Huawei

运营 Operational Manager

罗启宏 Luo Qihong 周宇飞 Zhou Yufei 邢宇 Xing Yu

节气刊 Solar Term Department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王晶 Wang Jing

设计 Design

袁媛 Yuan Yuan

衍生品创意 Derivatives Creativity

总监 Director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熊猫茶园事业部 Panda tea garden Department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程磊 Cheng Lei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常晓红 Chang Xiaohong 白玥 Bai Yue

孙名梓 Sun Mingzi 王瑶 Wang Yao 李晓光 Li Xiaoguang

设计 Design

杨雨然 Yang Yuran

松果生活事业部 Songguo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宋洋 Song Yang 李骁楠 Li Xiaonan 赵夫宏 Zhao Fuhong

孙正之 Sun Zhengzhi 张倩娜 Zhang Qianna 陆汉夫 Lu Hanfu

牛家欢 Niu Jiahuan 陈璐 Chen Lu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蔡华 Cai Hua 夏青 Xia Qing 李璐 Li Lu 尤帆 You Fan

奚牧凉 Xi Muliang 李加贝 Li Jiabei 陈陌陌 Chen Moyang 韩蕾 Han Lei

行政 Administration

叶秋菊 Ye Qiujie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78

联系人：罗启宏

E-mail：jingying@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063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海：上海汇敦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1) 63769858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934765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 封二~扉1 · 甘肃旅游
- 3 · 中房
- 17 · 天风证券
- 47 · WWF
- 55 · 野生救援
- 87 · 周刊征订
- 101 · 周刊松果广告
- 119 · 淮舍软文
- 143 · 书店广告
- 封三 · 力度形象
- 封底 · 素语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 新浪微博 凤凰网 腾讯网 优酷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独家代理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7-5-13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5466

传真：+86 10 85324800

电邮：vtpower@vtpower.com.cn

网址：www.vtpower.com.cn





一切皆游戏

前两天听朋友抱怨，她上初中的儿子沉溺游戏，无心向学，谁劝都油盐不进。她还感叹真不知那个世界怎么好法，让孩子那么难以抗拒。我推荐她看看这一期内容，试着认识游戏，试着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结果她告诉我，很受益，有点能理解孩子了，也准备与他和解。她分析说，一定是在这个世界里他感受到成功，有被人说牛的时候，借此弥补他在学校里的“低能”印象。当然，我也认为，事情还得两面看，理解孩子不等于没有要求，不要底线，忽视正常人格养成。十几年前我曾经到北大采访，偶尔得知那时的理科系每年都有学生被劝退，原因就是把控不住自己，眼中没有学业，只有电子游戏。若是今天，一些院校开设了电子游戏专业，那些沉迷其中又确有天赋的学生还能有其他选择。但一般而言，训练或者培养自控能力，仍然是每个人最基本的修炼。

北京 汪潮涌

轮不上“社会募捐”

晚上，堂哥端着一碗菜汤，就着一个馒头吃，突然一头栽倒在地。本家人赶紧往秦安县城的医院送，不接收，又往天水市的医院送，说是脑溢血，紧急抢救，无济于事。2017 新年前一周，堂哥离开人世，年仅 48 岁。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前两天还在乡上干活呢，看着身子好好的，现在突然撒手西去，留下五个孩子，两个大的刚上大学，三个小的上中学……

当时我在北京，第一时间接到甘肃老家的电话，说是怎么想办法看能在社会上募捐不，五个孩子上学需要钱。我说还轮不上社会募捐。多年来，我坚守一个慈善理念：乡村某一家庭需要救助，第一轮该伸手的是本家人，若力量不够，再开展第二轮援助，动员全村人捐款。还不够，再开展第三轮援助，呼吁社会上的陌生人献爱心。现在前两道程序没走怎么就直接跳到“社会募捐”上？绝对说不通！

我给村里的几个本家人发短信，建议自家人捐款，结果没一人回复，我预感自己的慈善理念遇挫。过两天，我才收到短信回复，说村里的本家人捐款呢，并说忙着料理堂哥的后事，没顾得上看手机短信。本家人还有一部分在外地，我打电话动员捐款，当晚我用微信转了 1000 元捐款。在西北农林科大当教授的大叔从陕西直接开车到甘肃的家里，他不只捐款，还面对面劝说五个孩子要坚强面对现实。短短几天，本家人就捐款 7350 元。

我以为募捐就此截止，一方面堂哥家卖花椒有些收入，本家人现添补些，春季开学孩子的花费缺口不是太多了；另一方面我想象中的“第二轮捐款”是村里人，这需外姓人动员，我们李家人不好张口。腊月二十八晚上，村里的微信群里贴出给堂哥家捐款的倡议，倡议人叫杨军军。我们硬湾村只有 70 户人家，微信群也就七八十人吧，

大家纷纷在群里发红包，让倡议人接收捐款，有些村民不会用微信，第二天直接把钱拿到倡议人家家里。到正月初一中午，村里人捐了 7460 元，村民杨文斌还在同学群募集来 470 元。

随后，倡议人在微信群公布了捐款明细。这时，不少本家人有异议，说是第一次捐了款就没参加村里的二次捐款，村里的明细表上没自己的姓名怕别人误解，以为本家人没有捐款而让庄里人捐款。我赶紧将本家人的捐款明细发到村里的微信群，这才挽回“李家人的声誉”。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本家人明细表不是按捐款多少排序，而是按辈分和年龄排序，这恐怕是乡村慈善应有的伦理吧。

对一个偏僻小山村来说，一次募捐到 1.5 万多元善款，令人欣慰。我之所以强力倡导“慈善程序”，为的是激活乡村的公益活力。反观有些村庄出了特困户，本家人村里人不救助而是直接呼吁社会救助，既显唐突，又让本村的爱心持续沙化。你可能会说，本家人捐款了，村里人捐款了，现在该轮到社会募捐了吧。没有的，我们及时刹车了。捐款只能是应急，而不能为他们长远地攒钱。堂哥的大女儿也有分寸，春节后她以恳求的语气给我发来微信：“已经够麻烦亲房(本家人)和庄里人了，到此为止吧，千万不要再麻烦社会上的人了。”她的话一锤定音，堂哥的后事终究没轮上社会募捐。

北京 李成义

补课之“疯”

最近旁听了家有考生的同事聊天，着实被震惊了。

一位同事的老公在重点高校上班，夫妻俩为儿子是操碎了心，但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对父母请补课老师补习不热衷，还说这样补课影响自己的作息规律。我们单位作为普通的事业单位，每年报考人数都是创新高。看到就业形势

如此严峻，同事眼瞅着日益临近的高考，心急如焚，就请在省属院校工作的表弟来开导儿子。表弟一听就责备同事怎么现在才行动，离高考就剩几个月了，还说现在高考前一对一补课是标配，但是老师要根据孩子的水平来配备。如果从他这个超级重点高校请高材生作为补课老师，出发点虽好但级别太高，无论是从解题思路还是补课方式上跟孩子都是不对等的，孩子接受度不高，还容易产生挫败心理。表弟在一所普通高校工作，人脉较广，讲到这儿立马跟在外面开培训班的朋友联系补课老师，电话那头的朋友也是对表弟一顿数落，怎么到现在才想起来请老师的事？后来几通电话，据说是从别的学生那里“抠”出来的老师，安排了英语、化学、数学三门课，只能如此了。

同事说现在竞争压力非常大，听孩子同学家长说考前几个月，6门课，至少5万元。就这样，好老师还找不到呢。还有一个同事家有艺术类考生，上一个本地著名的补习班，考前的文化课和艺术课的冲刺班，光3个月的文化课就1.5万元，还不包括以后的其他班。就这小班教学的模式，你不找人的话，提前报名都上不了呢。旁听的我，真是不知如何是好了。我的孩子在上幼儿园中班，我真是顶着压力，有的孩子竟然报了六七个班，什么溜冰、小主持人、普通话、画画、跆拳道、舞蹈、英语，最少的也报了英语、

画画、舞蹈。上学期末有个家长请假竟然是为了孩子要参加英语考试，天啊，只有4岁多的孩子参加什么英语考试啊！现在的兴趣班每一种每年少说也得5000元以上，掰掰我的手指头算算我的收入，这得北上广的收入才行啊，真是无言以对。

我家就是让孩子散玩，这也是我和老公要孩子前约定的，要给孩子轻松的环境。有时我忍不住跟老公说有的孩子报班了，老公就白我一眼，说你这么这么不淡定呢？别把你的焦虑映射到孩子身上，你天天看的有关孩子心灵发展的书都白看了？现在到你应用实践的时候了，你怎么没有主心骨了？有时候去幼儿园接孩子，别的家长问我报啥班没，我都笑笑说孩子还小，不想给孩子压力。但是对方虽然没说什么，那个眼神啊，完全是在告诉我，对孩子的教育我太不尽心了。

合肥 张伟丽

难在哪儿？

我们居住的小区，多年来门卫一直是形同虚设，所有车辆、人员都能任意通行，以至于丢失电动车、地下室被撬这样的案件屡见不鲜。近几年，随着周边其他新建高层小区入住率的提高，车位紧张的现状使得不少车主将车停进了我们的小区，于是小区除了原有固定车位外，空地、便道、绿地都见缝插针地停满了车，其情形可想而知。

前年，物业公司下发通知，为了加强门卫管理，保障小区安全，本小区业主凭房产证可为自家车辆办理出入IC卡，非本小区车辆不予办理，费用为每年120元。听闻此举，绝大部分业主表示支持，积极响应，主动办理了IC卡。但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大家发现实际情况并不是只有本小区车辆凭房产证才可办理，而是只要交费就可以顺利办理，物业根本不加审查，所以周边其他小区的车主交了费之后竟然正大光明地把这里当成了停车场。另外，“一卡一车，无卡禁入”的管理制度执行得也不到位，只要无卡车辆鸣笛示意，门卫就放行，根本不问什么来路，以致有卡的车主也懒得摇开车窗刷卡，干脆直接按响了喇叭。

去年，物业针对车辆出入管理再次改革创新，将车辆出入IC卡升级为蓝牙装置。物业大力宣传，此装置直接装在车上，更加方便快捷，避免了车主在恶劣天气开窗刷卡的麻烦，并承诺将更加严格管理车辆出入，希望广大有车的业主予以配合，并给予办过IC卡的车辆免收蓝牙装置费的优惠，仍执行每年120元的收费。在物业苦口婆心的劝说下，不少车主又装上了蓝牙。但过了集中办理收费期，物业便再无人过问此事，出入情况与以往没有什么区别。说句真心话，蓝牙的确方便了

出行，但是当你看到其他车辆没有蓝牙，依然可以跟车进入或是由门卫操控出入的时候，心里总有些说不出的滋味。

一转眼到了今年春节前夕，当大家都在为过新年做准备的时候，物业在小区大门口显著位置张贴出了大幅白底黑字的“蓝牙续费通知”，很是扎眼，与喜庆的节日气氛极不相称。该通知称，蓝牙费用已到期，春节期间，物业公司坚守岗位，可随时为车主续费，没有续费或没有蓝牙的车辆，将在2月13日后收取车辆过夜费，每车5元。通知一出，小区的很多车主议论纷纷，从前两年的情况看，物业在车辆出入管理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办不办卡一个样，装不装蓝牙都能出入。这一次，任由物业软磨硬泡、好言好语，大多数车主对此事还是持观望态度。

时至今日，没有蓝牙的和没有续费的车依然可以自由出入小区，大家也没发现物业采取了什么措施。那天，小区大门围栏上的标语横幅被风吹得哗哗作响，上面写着：树立正确的物业消费理念，克服恶意拖欠的不良行为！正当我一头雾水的时候，一位老者路过，他说这是物业公司在催缴物业费呢，据说本小区这几年物业费的收取也陷入了两难境地。

河北邯郸 郭爱华

本期截稿时间：3月6日19时

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约旦 | 难民

3月2日，生活在约旦的伊拉克基督徒难民。目前生活在约旦的伊拉克难民高达50万人，其中大多数人利用旅游签证进入约旦并非法滞留。面积不到9万平方公里的约旦地处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以及沙特阿拉伯之间，政局最为稳定，因此成了该地区内最理想的难民避风港。







英国 | 煎饼节赛跑

(右图) 2月28日是英国传统的煎饼节。英国议会在当天举办一年一度的煎饼节赛跑活动，为慈善筹款。



澳大利亚 | 航天展

(左页上图) 2017 澳大利亚国际航空航天和国防博览会于3月3日在墨尔本西南部的阿瓦隆机场对公众开放。图为博览会当天，特技飞行员尤吉斯·凯利斯和队友驾驶飞机穿越烟火。

西班牙 | 战争重演

(左页下图) 今年是哈拉马战役爆发80周年。3月4日，历史爱好者身着西班牙军服，聚集在马德里自治区莫拉塔德塔胡尼亚镇重演哈拉马战役。哈拉马战役发生于1937年2月，是西班牙内战中的一场战役。





美国 | 芭蕾

(左图) 2月28日, 在纽约乔伊斯剧院, 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的演员在开演前进行带妆彩排。

英国 | 汽车回收站

(下图) 3月2日, 英国萨默塞特郡的一处废旧车辆处理厂的空地上, 停放着等待被处理的汽车。在英国, 每年约有160万~200万辆汽车达到报废标准。



美国的海外征税

文 / 邢海洋

娱乐圈名人英达因在美国涉嫌逃避现金申报而吃了官司，这对很多移民或准备移民的人有镜鉴意义。移民潮汹涌，很多中国人移民海外却“身份离乡、人不回国”，在中国挣钱成为别国的海外纳税居民。同时在两地报税，很多细节是不容忽视的。

世界上主要国家执行的都是全球征税的理念，对自己的公民和永久居民来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收入都征税。只有一些地区或小国家，比如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一些小岛国，希望靠税收优惠来吸引投资才只针对本地区或国家内的收入征税。中国人的主要移民目的地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采取的都是全球征税制度，只不过在全球征税，执行起来不容易，于是留了后门，如加拿大可申请为非税务居民以避税，澳大利亚政府对于连续在澳大利亚境内居住满 183 天以上的，才会要求纳税，故而面临海外收入纳税的主要是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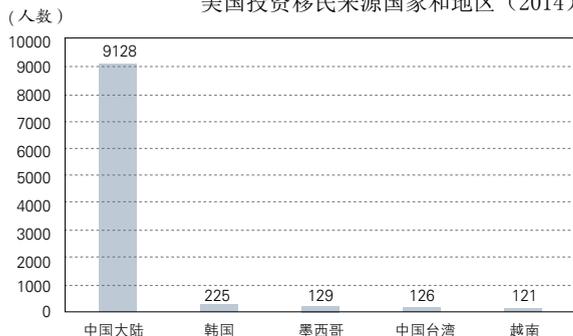
如果英达不是美国公民或持有绿卡的永久居民，或连续在美国居住，他是没有义务向美国税务部门报税的。而美国的大额存款申报制度，背后的潜台词是“哪儿获得的这些收入，是否缴了税？”英达在中国获得的收入，即使缴纳了相关税费，实际上还牵扯到两国税率问题，中国的税种以间接税为主，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即包含在商品的价格中，可美国的税收以收入税为主，是需要自行报税的。当两国税率不一致的

时候，美国税务部门会要求纳税人补足差价。除此之外，中国没有遗产税，也没有资本增值税，很多可能令个人财富暴增的机会，可国家都未从中征税。可对于一个从中国移民美国的居民，此时获得的大笔收入都是应税收入，是应该向政府缴税的。

据美国国税局（IRS）估计，每年应收税款与实收税款之间有 3000 亿到 5000 亿美元的差距，其中利用海外金融账户逃税占相当大的比例。美国制定了严格的纳税居民海外财产申报制度，这些居民如果有海外账户，只要在一年里的任何一个时间，全部海外账户的金额加起来超过 1 万美元，即便这些账户没有带来收益也要填表申报。海外征税，少了海外银行的配合 IRS 也就无能为力，好在美国政府强势，2010 年 3 月，美国国会通过《外国账户税收遵从法案》（FATCA），也就是“肥咖法案”，要求所有的美国税务居民和外国金融机构，都必须向美国国税局报告美国客户的账户信息，若金融机构不配合，将会被征收其美国收入 30% 的预缴所得税。FATCA 于 2014 年正式生效，当年，中国也与美国签署了 FATCA 政府间协议，这意味着中国金融机构必须按照 FATCA 的要求提供特定美国账户持有人的金融账户信息。居住在中国的海外美国居民的资产透明化了。正因为此，近年来随着 FATCA 的影响力显效，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美国国籍或绿卡。

中国的超级富豪已经很少以美国为移民目的地，主动放弃绿卡的也屡见不鲜。并且，大量中概股在美国上市，因为非纳税美国居民投资美股不用缴纳资本增值税，中国股票收入也没有资本增值税税种，故而富人们反而因此能获得更多的资本收益。可为教育、为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机会的中产们还是以美国为移民首选，获得绿卡前规划好家庭财产，就成为移民们财务规划的重中之重。这其中，包括以收入低的一方申请、收入高的不申请绿卡，财产转移规避遗产税以及利用免税额度等。好在 IRS 规定的海外收入免税额度足够多，每年最高 9.14 万美元。对于普通中产，基本不必纳税了。☑

美国投资移民来源国家和地区（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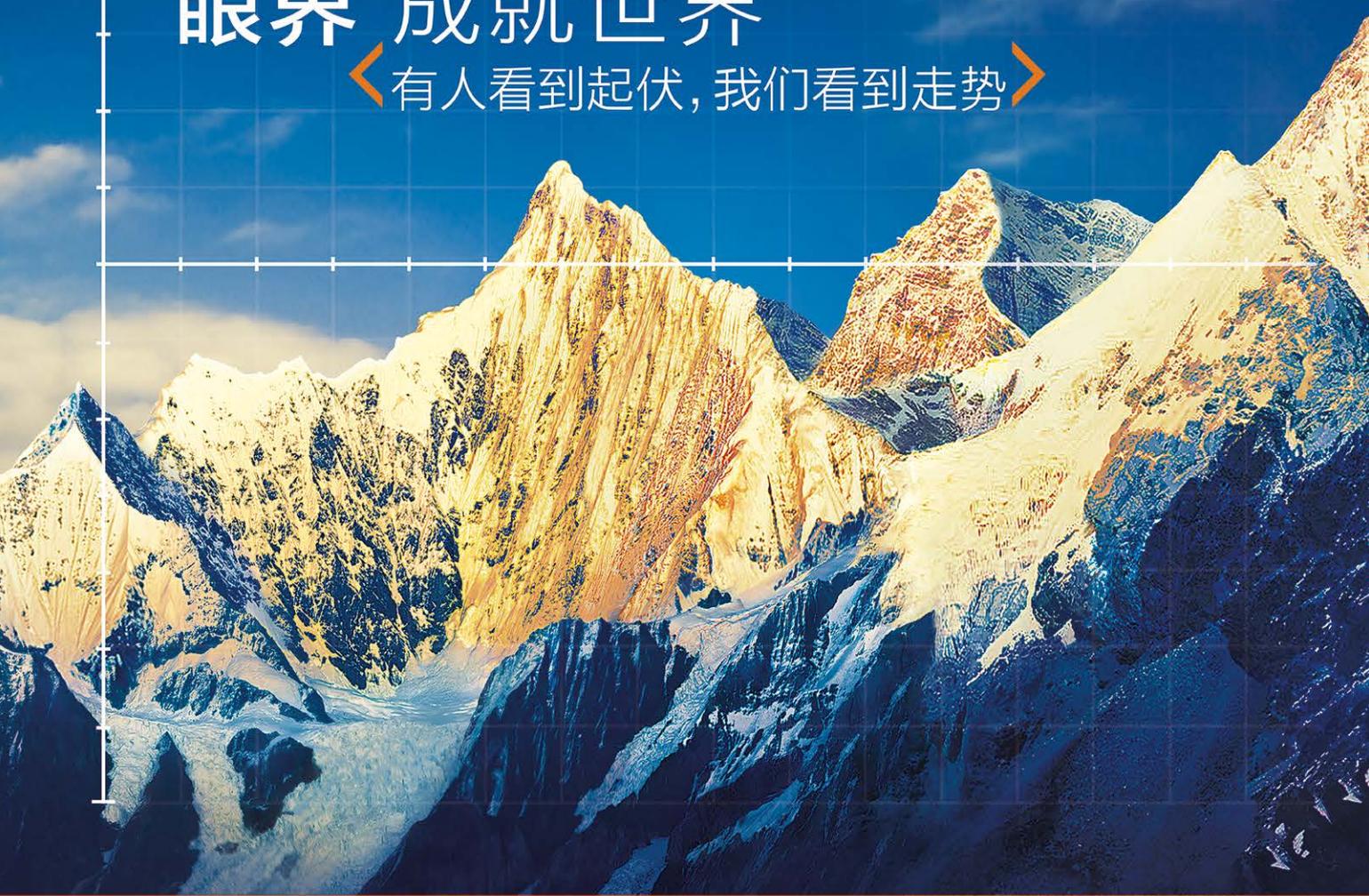




天风证券
TF SECURITIES

眼界 成就世界

有人看到起伏，我们看到走势



不同的眼睛，看见的世界皆有不同，
眼界的高低，决定着世界的宽与窄。
天风证券，聚焦客户利益，聚焦金融使命，聚焦社会责任，
绘就立体化价值图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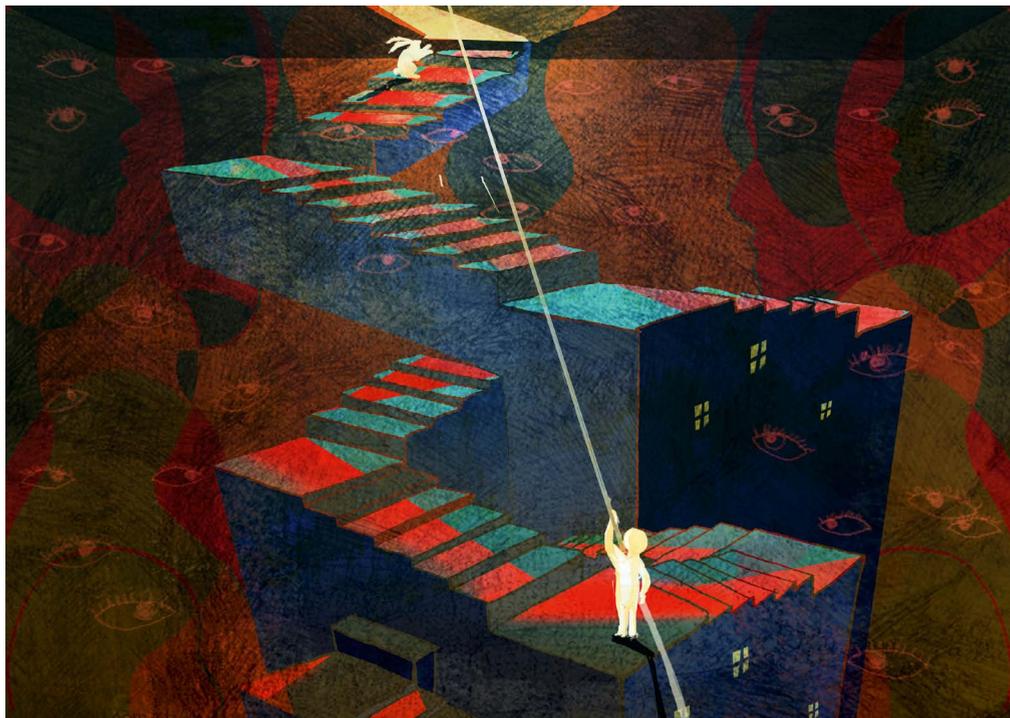
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关注天风侃财

95391

WWW.TFZQ.COM



栏目插图 | 范薇

3月加息

2月28日，美联储三号人物、纽约联储主席杜德利预计美联储将在“相对而言不久的将来”加息一次。一天内，三位联储官员释放加息信号，无论是鸽派还是鹰派，这次都站在同一战线。市场预期的美联储3月加息概率已攀升至62%，而一周前概率仅30%左右。美国正接近充分就业，通胀逐步向美联储目标靠近，海外经济增长更稳健。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迅速撤出额外宽松的可行性增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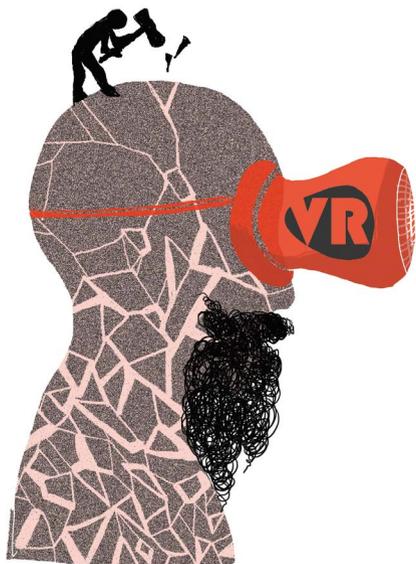
现金贷

10秒申请、1分钟评估、3小时放款，这是现金贷宣传的口号之一。2016年8月网贷的监管规则出台，平台转向现金贷，小额、便利、无抵押等优势使得现金贷随之爆发。可小额现金贷的利率，“借1000元，一周后还1100元，只多了100元”，看似不多，换算成年化利率早超出受法律保护的36%。市面78家比较知名的现金贷平台，平均利率158%，其中最高的“发薪贷”年化利率可达598%。

进口葡萄酒压境

通天酒业发布年报，成为2016年第一家报亏的葡萄酒企业。2016年，中国进口葡萄酒总额高达23.6亿美元，增长16%。进口瓶装葡萄酒已占国内市场份额的三成，提高近4个百分点。自2013年，进口葡萄酒的闯关夺地让国内酒厂份额不断被蚕食，国产葡萄酒已经连续4年产量下滑。由于种植成本高、模式落后、效率低等先天不足，国产葡萄酒产业在和进口葡萄酒的竞争中落了下风。





VR 熄火

继关闭 200 个体验站后，Facebook 将其 VR 设备降价促销，降价幅度高达 25%。Rift 头盔去年仅销售了 35 万台，远低于 Facebook CEO 扎克伯格“10 年内销售 5000 万至 1 亿台”的目标。据市场咨询公司 Canalys 估计，全球去年 VR 头盔销量仅 200 多万台。业界曾称 2016 年是 VR 元年，可预期中的爆发并没有发生，市场培育还需时日。

市值与身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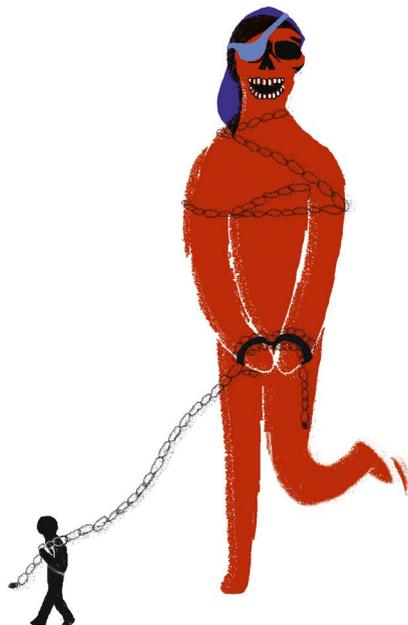
5 个涨停之后，顺丰控股总市值一度突破 3000 亿元。不过，这只是当年海普瑞、蓝思科技等次新股炒作的重演。A 股向来炒新不炒旧，原因是新股中大量股份处于限售状态，流通盘甚小。上市后的海普瑞的净资产 13 亿元，市值却被炒到 701 亿元。蓝思科技的上市则是造就了中国“女首富”周群飞，市值最高达 943 亿元。顺丰股权高度集中在创始人王卫的手中，是事实上的小盘流通股。

6000 吨钴

被期货圈称为“东邪”，绰号“葛老大”的葛卫东，被传联手国际对冲基金囤积了 6000 吨钴，不过被否认。锂电池行业是钴的最大应用领域，尤其在国家公布新版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后，为了获得高档补贴，电池的能量密度要求提高，三元锂电池地位巩固，短期内导致电池商加大了对镍、钴等三元材料中基本小金属的需求。长期看，小金属钴的供给并不短缺，是强劲的需求助长了囤货和炒作。

34.7 亿天价罚单

证监会拟对“1001 奇葩议案”等 8 宗案件做出处罚，总计罚没款近 35 亿元。其中，仅鲜言在 2015 年牛市期间操纵“多伦股份”（“匹凸匹”）股价一案，罚没款就达 34.7 亿元。鲜言操纵匹凸匹股价发生在 2015 年牛市期间，实际控制人鲜言授意公司改名，利用信息优势、资金优势、持股优势连续交易。彼时上证所就曾多次发出问询函，但是目前法律环境下，威慑力相对有限。





大象之梦

自然界中有一个规律：个头越大的动物，需要的睡眠时间往往就越少。南非金山大学的研究小组日前使用运动记录仪对两个象群中为首的母象进行跟踪后发现，野生大象平均每天只在黎明拂晓前睡上两个小时，而真正躺下来、有机会做个梦的快波睡眠，则平均每三四天才会发生一次，持续时间也仅为一个小时。更重要的是，当被偷猎者或发情期的狂暴公象骚扰时，母象首领甚至可以两天两夜不睡，一直走到30公里之外躲避风头。与之相对应，动物园里的大象就要慵懒得多，平均每天可以睡上4个小时。

好消息



朋友的朋友是朋友

对1965到2000年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严重武力冲突进行分析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小组在《科学进展》上发表论文指出，相邻两国就算本身没什么交情从来井水不犯河水，但只要存在一个间接盟友，那么就算一时出现矛盾龃龉，通常也不会事态恶化到诉诸武力的地步。



与鸟为邻

选择安家之处时，别忘了把周围的鸟儿也考虑在内。发表于《生物科学》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调查了270余名志愿者的精神健康状况后发现，一个人每天下午在窗外、花园和小区里能看到的鸟儿越多，抑郁、焦虑和压力指数就会越低。鸽子、乌鸦、大家雀都无所谓，关键是越多越好。

坏消息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窝

树洞虽然没有人造鸟巢看起来整齐漂亮，但对雏鸟来说，却是更安全舒适的家。发表于《森林生态与管理》杂志上的论文指出，与树洞相比，人造鸟巢内部更潮湿，绝缘保温性不好，更容易吸引昆虫或寄生虫，而且在炎热的天气里会因温度过高而增加雏鸟脱水死亡的风险。



猛犸的末日

遗世孤立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小组对一只古猛犸的基因组进行分析后发现，与300余只同伴生活在北极小岛上固然让这群猛犸躲过了人类的猎杀，但近亲繁殖导致的遗传变异也令它们逐渐失去嗅觉，社交和求偶功能均严重受损。

他（修昔底德）在书中分析过的一切，被驱逐的文明教化，形成习惯的痛感，管理不善和悲苦：我们都得再受一遍。

——奥登，《1939年9月1日》（“二战”爆发的日子）

一个国家最首要的是它的文化，文化是所有居住在这个国度的人民的价值观与奋斗、梦想与期望的总和。要了解一个国家，必须了解这个国家的梦想以及那些怀抱梦想的人。

——扬·马特尔，《斯蒂芬·哈珀在读什么》

真实新闻通常会以某种形式被数十家媒体报道，这会削弱任何一种版本的热门度。然而，每一则虚假新闻都是独家。难怪最热门的虚假新闻的风头总会胜过最热门的真实新闻。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蒂姆·哈福德说，虚假新闻似乎无所不在，但其实影响力有限

想要实现创新，获得创造力，就应该把手弄脏。然而，当你使用科技产品或电子设备时却无法获得这种感觉。有创造力的企业接近80%都会在办公室里使用白板。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生产数字化硬件和软件的高科技公司，都会将白板作为刺激创造力和加强合作的主要方式。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阿文德·马尔霍特拉说，触觉感知往往可以刺激大脑中与创造力有关的部分

+/-
数字



(插图 山羊明)



旅行者们至少能有一个选择。那些航行在外的人明白外面的事物不会和在家时完全一致。探险家们总是严阵以待。而我们，这群在城市的血管里穿行的人，这群偶然进入城中城的人，毫无准备。我们发现熟悉的生活换上了一副陌生的面孔。在沼泽和高山之间游荡，在恐惧和性爱之间徘徊，在上帝和魔鬼之间摇摆。这就是激情。

——珍妮特·温特森，《激情》

240

亿美元

3月2日，美国“阅后即焚”照片分享应用的母公司Snap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始正式挂牌交易，开盘价每股24美元，公司市值约为240亿美元，跟松下公司相当。

6000

万个

BBC报道说，全世界共有约6000万个宜家的毕利书架，几乎每100人就有1个。毕利无所不在，以至于彭博用它比较各国的购买力。根据彭博的“毕利书架指数”，该书架在埃及售价最高，达100美元，在斯洛伐克还不到40美元。

6000

万美元

奥巴马和夫人米歇尔已经与企鹅兰登书屋达成协议，将以6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12亿元）的天价出版他们的回忆录。前总统比尔·克林顿2004出版的回忆录《我的生活》只获得了1500万美元。前总统小布什2010年出版的《抉择时刻》的收入是1000万美元。

平凡之路

文 卡尔
图 谢驭飞



阿志自认为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觉得他的骨子里流淌着动荡不安的成分，他喜欢那种逍遥自在的感觉。就因为看了一部关于外国歌手的影片，阿志就决定从大学退学去当民谣歌手。所有人都说他在瞎折腾，阿志说了一段电影台词：“有些人能听从内心的声音活着，这样的人不是成了疯子，就是成为传奇。”阿志说他会成为传奇，尽管周围的人都说他疯得不可救药。

20岁那年，阿志抱着一把吉他开始了他的流浪人生。他在马路边和地下通道唱着自己写的歌。起初他天真地以为能靠卖唱养活自己，但现实远比他想象的坚硬和残酷，有时一天的收入还不够买一碗热汤面。阿志这时就会很沮丧，不免质疑和否定自己，太自以为是，任性妄为。如果自己像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一样，循规蹈矩地过一生，情况大概会比现在好很多。但阿志又不甘心就那么庸庸碌碌地活着，他觉得他会窒息。阿志想起尼采的一句话：“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他继续咬牙坚持着，不管别人如何冷嘲热讽，也不愿抛弃内心的信念。

5年后，阿志的音乐才华终于被发现。他在一次歌唱比赛中一举成名，鲜花和掌声迅速涌向他，身边的人都夸他是天才。他迅速推出第一张唱片并且销量不错，阿志知道从此他再也不必为

温饱问题发愁，他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梦想的一切。他不再是那个没房没车没存款被人嘲笑的穷小子，而是摇身一变成了众人追捧的当红歌手。但好景不长，一年后，当阿志推出第二张唱片时，市场反应很冷淡，歌迷都说歌词太深奥，听不懂，还说阿志江郎才尽，比阿志年轻的歌手很快取代了他的地位，阿志渐渐被人遗忘。

经历过大起大落之后，阿志见识了人情冷暖，不免有些心灰意冷，决定以后再也不唱歌了。他回到家乡的小镇做起了小生意，每天起早贪黑，为生存奔波劳碌。他剪掉曾让他迷恋的长发，穿着廉价的T恤衫和短裤，吃着3块钱一碗的面。他不再是那个令万千少女们倾心的民谣歌手，而是成了一个走下神坛不得不为温饱发愁的普通男人。“似水流年才是一个人的一切，其余的全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阿志渐渐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如今的阿志早已从原来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满脸沧桑的中年大叔，承担起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不再奢望复出，明星梦已与他无关。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安于现状，追求随遇而安。也许在别人看来，阿志是个失败者，颓废堕落，阿志却觉得自己活得很充实，没有了那么多功利心，有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感觉。阿志告诉自己：纵然余生平淡无奇，也要努力拒绝无趣，保持本真，毕竟“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影子

文 王笑猫

图 谢馥飞



天气晴朗的时候，影子的心情通常也很好，它会端坐在广场上，看往来的人群，看他们当中有没有人注意到它，注意到它修长的身材。早上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影子的身材总是过分修长，长得几乎有些变形，但是它觉得那个样子很美，就像人们总是喜欢高个子的人，因为一个居高临下的人是会给别人压迫感的。影子也是如此，因而等到正午的时候，它就会感到有些沮丧，因为那时候它变得很矮很矮，还有点儿胖。它喜欢苗条的模样，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喜欢胖起来的样子，他们管胖叫发福，似乎这样一来，胖的就是福，可是仍然没人喜欢胖。据说古代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朝代，以胖为美，不过时间很短暂。好在正午的时间不长，整个漫长的下午，影子都在阳光下欣赏自个儿的模样，在万千影子里，它的模样算得上是出挑的，作为一个影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兴奋的呢。它仔细观察自个儿身上的每一个线条，走动的时候和静止的时候，当然这事儿不能由它来决定，要是它的主人知道当阳光撒下来时，影子愿意静静待那么一小会儿的话，也许他肯停下来——可是这也不由他说了算，很多时候他都不想走动，不过他是一名销售员，不走动怎么推销呢。

天气不会总是那么晴朗，所以影子的心情也时好时坏。阴天里它几乎看不到自己，只能看到一团淡淡的模糊的灰东西，那么难看。这时候它

想起来所有令它感到悲哀的事情，第一件事就是它不自由。它清楚地知道，它不过是它主人的附属品，它不能够离开它的主人单独存在，它不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它的行动由不得它自己。当它想看沙滩的时候，它的主人也许正把它带向草原，比这个更为可怕的是，它的主人连草原都不去，就在城市里来来回回地走，上班下班，再上班再下班。据它所知，有为数不少的这样一群人，住在城市里，终日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第二件让影子感到悲伤的事儿是它没有颜色，哦，或者说，它只有黑色和灰色。当春天来临，面对着争奇斗艳五彩缤纷的百花，影子时常会自卑起来，当然影子的自卑也很短暂。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所有的影子都是色彩单一的，它们之间就这件事情没法相互比较，假如影子当中有谁变成了彩色的——哦，我敢说，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让影子难过的事儿，那是单独属于它这个影子的，比如它的主人对于衣着不那么讲究，冷天里总是穿着臃肿的冬装，那种时候，碰到不穿冬装的影子，它就会浑身不舒服。当然每个影子的自尊心都有差别，这种事儿在别的影子看来也许稀松平常，可是它却不能忍受。不过，不能忍受又能怎样呢？这是改变不了的呀！它想起来谁说过，不要为那些不能改变的事儿烦恼。眼下，它的主人正舒舒服服靠在沙发里看手机，影子被灯光照在地板上，黑黑的，轮廓清晰。☑

我的梦

文 八佰伴

图 谢驭飞



几年前，我刚毕业，青春随着一张学士帽被抛向天空的照片戛然而止。随着火车前往厦门，在一家软件公司上班。公司不大，居民房改建，整个公司就只有一个女的，男士全爱抽烟，在狭窄的办公室里吞云吐雾。我时常憋气，憋不住就逃往外面，站在走廊靠窗边大口吸气、呼气。

一个星期后，公司来了个新人，是个女的，跟我一样刚毕业。我叫她梦，人生如梦的梦。那段日子，我常思考人生，工作的出路，未来的前景，青春的流失，职场的残酷。

梦与我被一同作为新人对待，老人们对我们呼来唤去，领导对我们并无好感，言辞尖酸刻薄，表示并不想要我俩，只因总公司安排，没办法。我与梦忍气吞声，过得异常压抑，俩人相互安慰，或许这是刚毕业进入职场必经的经历吧。

梦老家在河南，农村出身，在武汉读的大学，是“211”“985”的名校，衣着打扮混合农村与都市风。她对人极客气，没有都市女孩子的那种娇气与脾气，与她一起吃饭她老爱抢着付钱，爱抢着给你收拾碗筷，长久以往，让人觉得她就应该是这样的，她的客气与牺牲让她变得很卑微。

一个周五，我与她一起下班，走在路上，路过星巴克，我说：“走，请你。”我们各自点了一杯咖啡，闲聊了起来。“你为啥会选择做销售啊，一个女孩子家，怪辛苦的！”我抿了一口咖啡问。“做销售可以赚钱，我想多赚点钱。”她笑了一下对我说。我没想到她这么直接，直接到让我有了一股凄凉。

我了解梦的背景，这是我听同事说起的。梦的

家庭，在村里属于那种情况不太好的。家庭供她上完大学实属不易，父亲早就丧失了劳动能力，常年瘫痪在家；母亲凭一己之力支撑着，却也力不从心，欠债累累。家庭困苦，导致梦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总是有点自卑，生怕得罪别人。毕业后，母亲就把希望全寄托在她身上，迫于家庭压力，她需要赚钱，需要一下子赚很多钱。

三个月后，我辞职了，因为没有发展，也赚不到钱，离开了。离开的那天，梦陪我一起去逛了商场，我对她说：“走吧，这公司没发展，赚钱是不可能的。”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通红地看着我。我走了，留下她一个人。

我去了深圳，重新找了份工作。在那段日子里，梦不断地打电话给我，跟我诉苦，说领导要她喝酒，领导骂她，同事排挤她……我说来深圳吧，早点离开，那地方就不是人待的。

半年后，梦辞职了，来了深圳，我见到她时，她还是一样，衣着打扮属于城乡接合部。但她很快找到了工作，也开始慢慢上手。之后的日子里，我们每月会聚那么几次，每次她的精神状态都会比上一次好。她学会了打扮，穿着变得时尚，会画着淡妆出来见我，公司领导也很器重她，愿意培养她，在人群中，她不再表现出那种卑微的姿态。那些日子我也很卖力地工作，经过努力升了职加了薪。

我与梦都在开始慢慢变好。有时我想，或许我们刚毕业步入职场的那段经历是很多人都会经历的，因为这样我们才对这个社会有了新的认知。但有时我又想，或许我们更应该早点离开。☑

精神贵族的玻璃心

文 阿之

图 谢驭飞



胡兰成说过，贵族都有排他性。李沧东的电影《诗》里，年迈而清贫的杨美子为了抵抗生活的黑暗并维护心中美的秩序，她用心地学诗写诗，并在故事的结尾，在诗歌与美景中永恒地失忆了。此刻的她幸福的，因为她的精神进入了天堂。角色的风烛残年为她的失忆赋予合理性，但对于依然在人生道路上且吟且行的壮年精神贵族，维护内心的秩序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程。

作为一名资深玻璃心文青，对于排他性我还是有些发言权的。和从小因为美貌而万千宠爱在一身的杨美子一样，把我滋养成玻璃心精神贵族的，也有一片特有的土壤。我父母的学历比他们的同龄人普遍要高，而我从小的阅读量也比同龄人大，这让我从学龄前到接近成年这段时间，尽管成绩偏科，却总觉得自己有知识上的特权。

让排他心理变本加厉的，则是刚上高中那会儿。重点高中的学生多少都带点优越感，而英语老师的格外关照，则让我膨胀到极点。不但被选作英语课代表，更重要的是，她的脱俗美貌很能满足我幼稚的虚荣心——她长得很像《流星花园》里的藤堂静，自带女神光环，喜欢在课堂上介绍雪莱的诗、凡高的画、费里尼的电影，还会在圣诞节专门发手机短信给我，上面是用各国语言说的“圣诞快乐”。她是我通向另一个美好世界的窗口。

她只教了我一个学期，文理分科后新换的英语老师是截然不同的画风。那是个矮小瘦弱的中年男人，东北人，尽管从外形来看并不符合南方人心目中对东北汉子的刻板印象，但却掩不住他

骨子里令人发指的直爽与彪悍。他剖析语法题用的是数学课上那套抽丝剥茧的方法，针砭时事则直指人性的黑暗。我再也听不到关于雪莱与凡高的种种，把对他的不满都用倦怠与不屑表现出来。尽管在全班同学眼里，他是条真性情的汉子，但我不喜欢他——在他的课上我失去了做梦的理由。我的英语成绩依然彪悍，却从此在同学口中落下了“傲慢”的微词。

留学时所遇到的“精神贵族”多数是教徒，其专横的表现是对于世间的任何事物都能用“神的旨意”加以解释，久了便觉得上纲上线。一次和一位教徒中国留学生一起逛礼品店时，她开始滔滔不绝地感慨：“每次看到这些印有‘中国制造’的木制品，我都觉得好心痛，破坏的是中国的环境，赚钱的却都是外国人……”我不否认在生活上曾经受到她的照顾，但是和她逛街真的是一种折磨，面对她的种种“心痛”，我总是束手无策。她为了强调新教的包容多次大力批判其他宗教的禁欲主义，我主张多元价值，对于无法和我一样主张多元价值的人，我也会格外不包容。这听起来有点悖论，但生活中的精神贵族不但玻璃心还常常双重标准，也难怪教会成为精神鸦片，对于把信仰作为救命稻草的人来说，这根救命稻草将他们的排他性合理化了。☑

本栏目投稿邮箱：mensula@sina.com



初学者自行车

Jyrobike 自行车是一款“永不会倒”的自行车，它通过放在自行车前轮中的陀螺仪来自动调整角度，即便车身倾斜到一定角度，它也能主动校正，让车身始终保持平衡，非常适合初学者使用。



多功能除湿器

Braun 出品的 A-Fresh 除湿器外观小巧，形同一个挂在墙壁上的按钮。它不仅具有除湿功能，还有净化空气和杀菌的功能，用以还原干燥、清新的环境。



风帆涡轮发电机

这款由尼尔斯·费伯（Nils Ferber）设计的可折叠风力发电机相当于一款可携带的大号移动电源，只要将其打开并固定在地面上，当风力达到 5 米 / 秒（3 ~ 4 级风力）时就可以有恒定 5 瓦的电力输出。这时候，只要迎面吹着风，就可以为电子设备充电。这款风帆涡轮发电设备同时内置电池组，在开启状态下会首先将其电力储存在电池组内，不浪费每一秒的风。



模块化概念

这款模块化概念创意手机，由每个大小为2平方厘米的小方块组成，通过概念的微锁系统，每一个模块都有自己的供电及处理器计算能力，将它们集合在一起之后便成为一部电脑与手机集合体。可拆分拼装的模块化创意概念手机，在设计上有两个专门的SIM卡与手机内存，并配以特制的用于麦克风和存储的特定卡槽。



无线高保真耳机

Sennheiser NoiseGard 主动降噪技术让 HD 4.50BTNC 耳机用户可以不受干扰地享受音乐。蓝牙 4.0 和 aptX 的无线技术和音频编解码器保证了无线高保真声音。耳罩上直观的控制面板可以更换曲目，并通过集成话筒接打电话。其电池最长能够无线聆听 25 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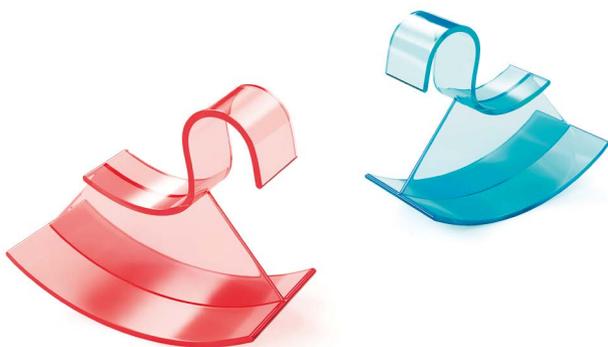
花蕾马桶刷

这款马桶刷采用了张合翻转的方式工作，如同一朵含苞的花蕾。桶刷的内侧布满刷毛，可以压在平坦的表面和杯状表面翻转外刷，杯状厕所刷还可以当厕所吸盘用。这个马桶刷的设计灵感来自花朵从花苞到绽放的转变。



西装面料表身

宇舶表与意大利男装定制老牌 Rubinacci 合作推出的“独立意大利”腕表，采用了千鸟格纹、粗花呢等羊毛织物面料装饰表盘和表带。略带运动风的设计与传统的西装元素融合出了现代感。



塑料摇马

Nendo 为意大利品牌 Kartell 设计的玩具摇马 H-Horse，从侧面看具有传统摇马的弧形轮廓，实际上只由三个弯曲的透明塑料片构成，结构原理参考了建筑施工中的工字梁。



仲夏·艾美丽

稀奇艺术与艾美酒店合作的“仲夏·艾美丽”艺术品系列，每个“艾美丽”女孩的服饰灵感来源于酒店所在的不同城市，如上海的霓虹色彩、青岛的三角风帆等。



怀旧手机

曾经的诺基亚 3310 畅销手机最近重回市场，以 S30+ 操作系统、彩色屏幕和 200 万像素的相机被定为功能手机，拥有 22 小时的通话时长以及一个月的待机时间。



巴黎 1889

Baccarat “巴黎 1889” 吹制水晶透明水杯表面砂刻精美的图案，一侧是埃菲尔铁塔，另一侧是 Trocadéro 宫殿，以此向巴黎的旧时光致意。



蕨叶耳坠

铂金及 18K 黄金镶嵌狭长形及圆形切割钻石蕨叶耳坠，手工雕琢的 18K 黄金蕨叶随风摆动，30 颗色彩深浅不一的黄钻与白钻构成浓郁的渐变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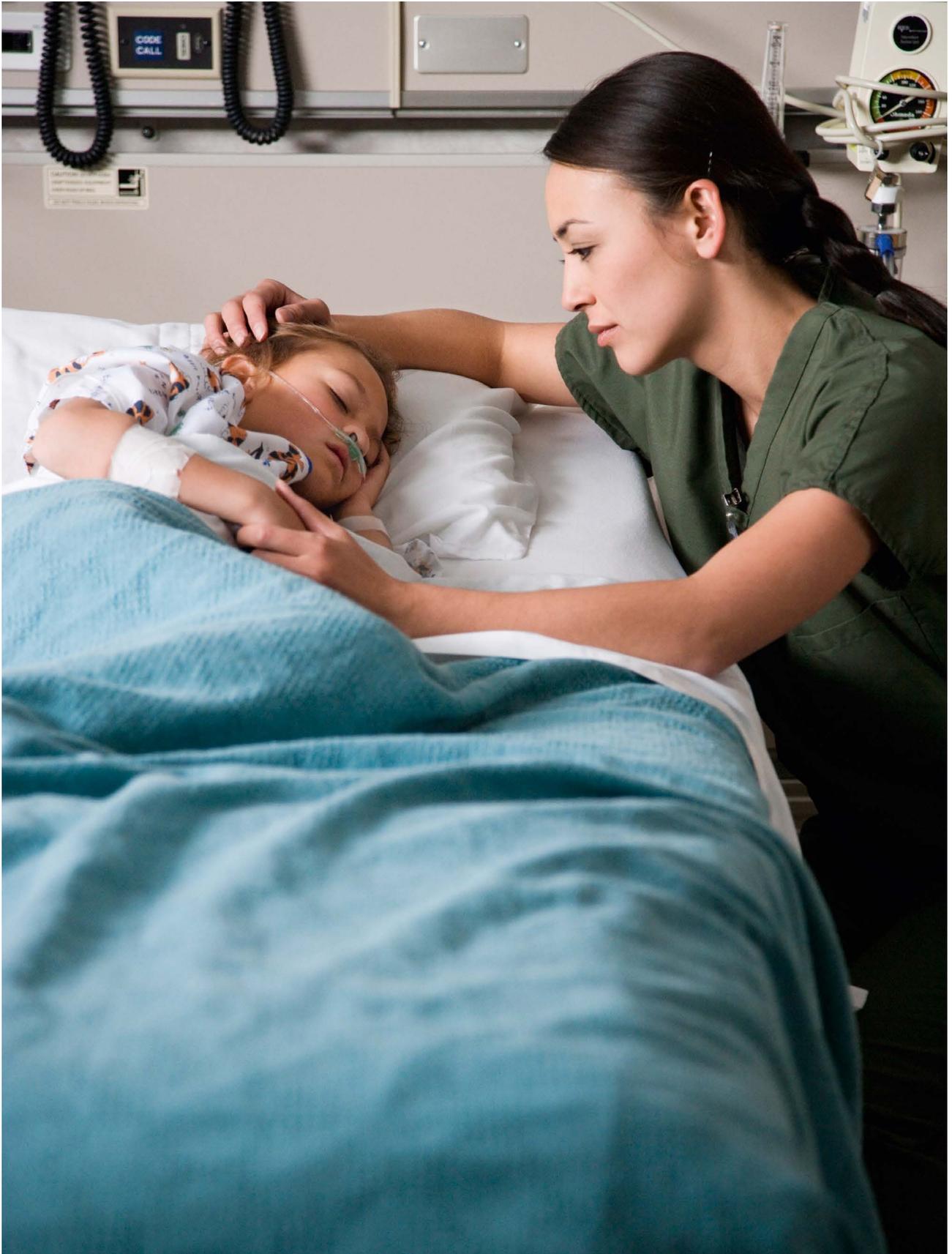
孔雀羽毛

宝诗龙“孔雀羽毛”腕表灵感来自印度著名的蓝色城市乔德普尔（Jodhpur），蓝色砂金石表盘上用钻石镶嵌出白色羽毛，表壳背面刻有宝诗龙的名句——“我只记录快乐的时光。”

坐标轴吊灯

黎巴嫩设计师查尔斯·卡帕坎设计的“3tubes”吊灯重现数学中的 X、Y 和 Z 坐标轴，三根镀铬白色或铜色灯管以不同角度相互交叉，形成独特的轴线形状。





直到青霉素被发现前，细菌都是人类历史上制造肺炎、伤寒、痢疾、肺结核等疾病的最强大杀手。图为一位妈妈在陪护生病的女儿

破除抗生素崇拜 与细菌君相爱相杀

主笔 ✍ 徐菁菁

每次带孩子去医院看发烧，我的同事 W 都会对医生的谨慎留下深刻印象。作为非专业人士，她不是特别理解，为什么孩子反复发烧每次上医院都要抽血检查，为什么医生要叮嘱她孩子用药三天不好转，一定要换药；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家里明明还有头孢，医生为什么不让吃。所有这些都是她过去经验里所没有的观念。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记忆里，发烧吃抗生素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曾几何时，被唤作“消炎药”的抗生素是家家户户抽屉里的必备品。然而即便如此，当谨慎的医生终于将孩子的抗生素处方放到她手上的时候，她又退却了。她看过一些报道，说中国人滥用抗生素，对身体不好。一个执着的观念留在了她的脑海里：“我的孩子不吃抗生素。”不过有几次，“轻度炎症拖厉害了，还是得用抗生素”。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简称“北医三院”）儿科大夫韩彤妍几乎每周门诊总能遇上两三位像 W 这样的家长。与此同时，另一种极端也让她煞费苦心。家长“一进门就风风火火，说孩子病了得赶紧输液。我们孩子平时抵抗力差，每次得病都要挂水挂个十天半个月才能好”。但实际上，韩彤妍一检查，发现孩子得的是病毒型感染。许多家长并不知道，面对同一种症状“发烧”，医生们必须先区分它是由感染性疾病造成的，还是由其他疾病造成的。而在感染性疾病中，也只有细菌性感染使用抗生素才会有效。

抗生素崇拜和抗生素恐惧，两个极端的共同所指，是对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微观细菌世界的有限认识。而偏偏，我们又生活在一个无法回避细菌信息的环境里：超级细菌、益生菌；好消息、坏消息，所有片段式的信息进一步强化着我们对细菌的偏见。

细菌偏见的根源深植在人与病痛抗争的医学史里。细菌，一种原始的单细胞生物，有细胞壁，有 DNA，有细胞器，可以自行生产合成需要的酶并且代谢，可以自行分裂繁殖。直到 89 年前青霉素被发现，它都是人类历史上制造的肺炎、伤寒、痢疾、肺结核等疾病的最强大杀手。55 年前，人类身体内部拥有包括细菌在内的巨大的微生物群落的概念才开始流传，人们开始逐渐尝试认识，我们体内的这些定居者们究竟如何与我们互动，在敌人之外，我们是否还存在另一种亲密关系？

现在，学术界流行的是“我们只有 10% 是人类”的说法，指每 10 个构成人体的细胞中，就有 9 个是搭便车的细菌。人体微生物已经成为热门话题，占据了顶尖学术期刊《科学》《自然》《细胞》等杂志的无数版面。科学家们发现，这些小小的寄生者不仅是我们的好伙伴，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也和它们息息相关。科学家们认为，肠道细菌能影响健康，导致肥胖、糖尿病、过敏等疾病，还会影响你的情绪和行为，就连自闭症、阿尔茨海默症也可能和细菌有关系。

科学界和医学界对人与细菌关系的认识不断被颠覆、修正和拓展，一个时代的常识很快被另一个时代抛弃。在一轮又一轮的知识更新中，公众被科学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科学界和医学界的共识和行动并不足以让人类在与细菌的互动中获得福祉。你服下还是扔掉手中的抗生素药片？作为一个准妈妈，你将采取何种分娩方式？在超市货架前，你是否要选择一瓶杀菌的清洁剂？我们每一个人的许多选择都是这场宏大的互动的一部分。✎

亦敌亦友：被误解的细菌

主笔 徐菁菁

在细菌的世界里求生，其法则并不是简单的与之为敌，而是学会如何与之共生。

“消炎药”不是万能的

最初，我选择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刘正印作为采访对象，是出于一个写作者最直接的诉求：如果我们要去了解细菌，那么自然应当寻找一位直接与细菌交锋的大夫。而资料显示，“感染”是指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等病原体侵入人体所引起的局部组织和全身性炎症反应。感染内科大夫所做的，正是消灭包括细菌在内的各种微生物病原体。然而，从个人求医的经历来看，感染内科似乎显得相当陌生和遥远。什么样的病人才会去寻求这个科室大夫的帮助呢？

刘正印从一开始就纠正了我这个褊狭的想法。“你看过发烧吗？”他问我，“所有的发烧几乎都是先看感染科。只不过2003年‘非典’以后，为了防范突发的呼吸道传染，国家明令医院设立专门的部门来进行筛查，所以才有了发热门诊这一称呼。”

刘正印的诊室会出现各种病人：胳膊因感染而肿胀的癌症病人、因腰椎被感染而曾经不得不拄上双拐的病人、肺结核病人……然而正像他事前提醒我的一样，如果在人体中寻找和击毙病原体是一场缉凶，那么绝大多数时候，他所面对的“凶案”现场是单调而模糊的——发热待查。如果你的“发烧”持续不退，且发热门诊无法找到原因，那么你就会出现在这个诊室里。

当每个人因最熟悉的疾病“发烧”而与感染内科大夫相遇时，我惊讶地发现，诊疗的过程首先发生的很可能是一条公众“常识”和医学知识的交锋：发烧到底要不要吃“消炎药”？

一位高中生模样的男生是由父亲和母亲一起带来的。他长期出现早晨37.2摄氏度的发热，但并无其他不适。刘正印看了一家人带来的化验单，很快做出了判断：“都是正常的。”

他对疑惑的一家人解释说：“一般我们认为，体温37.4摄氏度以上才是发烧，同时我们还需要化验结果的支持，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基础体温的个体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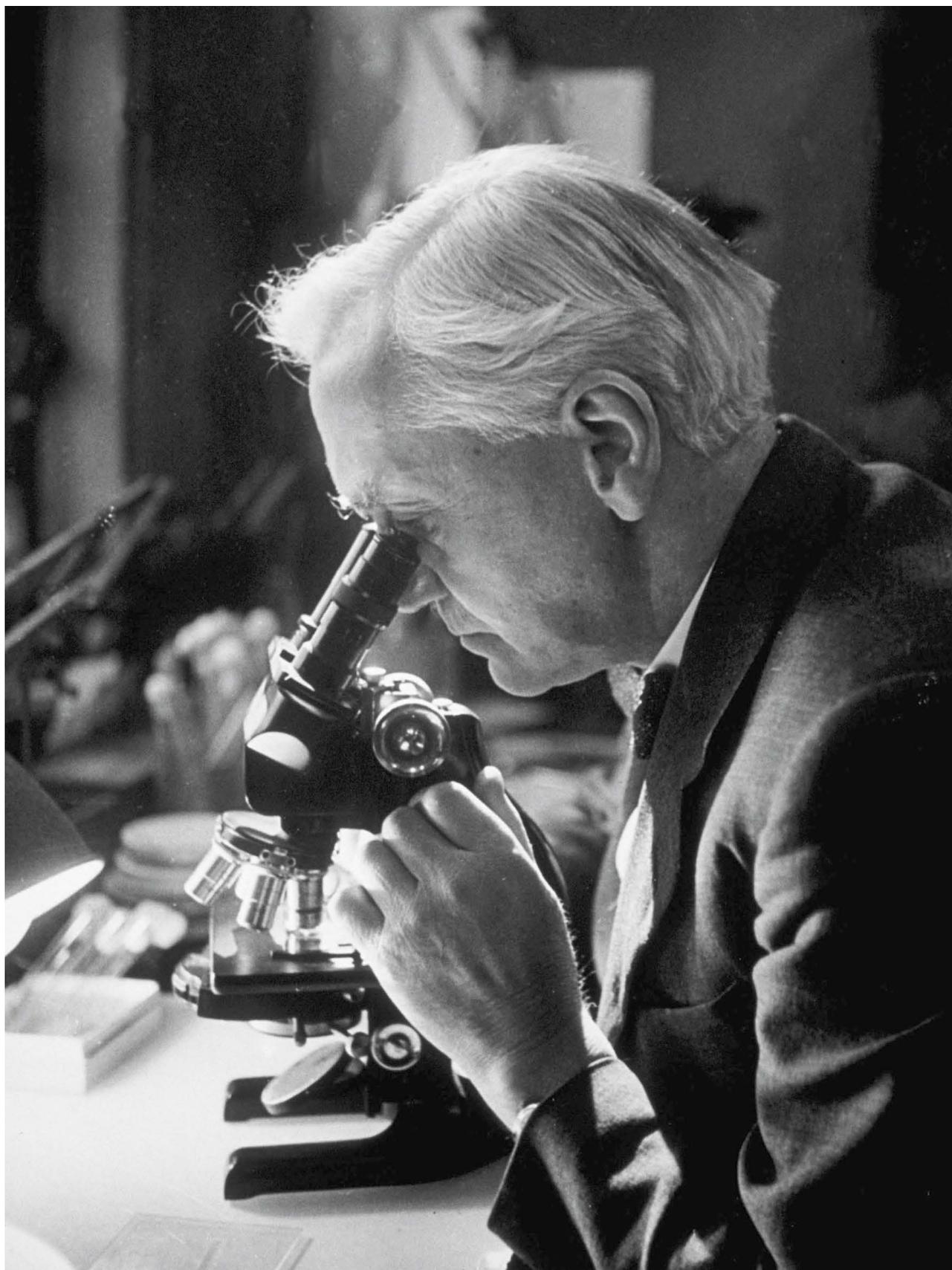
他指着化验单进一步解释说：“从化验结果来看，我们主要看几个重要指标：一个是血沉（ESR，将抗凝血放入血沉管中垂直静置，红细胞由于密度较大而下沉。红细胞在第一小时未下沉的距离表示红细胞的沉降速度，称为红细胞沉降率，即血沉），它是反映体内是否有疾病的最简单的指标。但血沉对诊断感染性疾病的意义不大，所以还要看血常规。如果你有细菌性的感染，那么血液里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数量会超标。此外，我们还有一项C-反应蛋白指标，当身体被细菌感染，或者受到损伤有炎症的时候，这个蛋白的浓度也会提高。而你的所有这些指标都是正常的。”

持续低热又作何解释？病史显示，患者出现低热之前曾患有鼻窦炎和咽喉炎。刘正印告诉一家人，现在的发热是“感染后低热状态”，或者叫“功能性低热”。“我们人脑中有一个下丘脑体温调节中枢，在你生病的时候，它会把你的体温调上去，但当你病好以后，它恢复到正常水平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这是一种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现象，是可以自愈的，不需要进行任何治疗。我们曾经有同样的病人，持续五年低热，突然有一天就彻底恢复正常了。”

听到医生这么说，男孩忧心忡忡的父母显得既欣慰又满怀疑惑。刘正印反复强调，男生所能做的就是照常生活、加强体育锻炼，等待自愈，但做母亲的最终还是忍不住发出了那个诊室里最熟悉的请求：“大夫，能不能给开点消炎药？”

“是药三分毒。”这个上午，刘正印无数次用这句俗语来回绝病人对“消炎药”的渴求。

当形形色色的发热患者执着于“发烧—消炎药”这简单直接的线性逻辑时，刘正印脑海里则在构建一个复杂“菱形”思维：从发热这一个要点出发，延伸到病史和化验检查两个点，再回归到结论，解释发热待查的原因。事实上，临床上感染性疾病造成的发热约占40%~55%，肿瘤、结缔组织和血



1951年，最早发现青霉素的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在他的实验室里工作



(教学照)

左图：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刘正印

右图：北医三院病房内，妈妈们在做着育儿交流

管性疾病同样可以造成发热，另外有多达 8%~10% 的发热原因是始终不明的。在这其中，“感染性发热可以由各种各样的病原体引起：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等等。老百姓俗称的‘消炎药’一般是指抗生素，而能够使用抗生素治疗的只有细菌感染”。

对抗菌药物的过度崇拜

对专业人士而言，公众口中的“抗生素”也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的青霉素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是由青霉菌分泌的物质，因此从准确意义上，抗生素是那些微生物（细菌、真菌和放线菌属）的代谢产物，它们具有杀灭或抑制其他病原微生物的效果。但事实上，在青霉素还未能量产之前，另一种药物已经走上了人类抗菌的前线。“二战”中，每

个美军士兵都配发了挂在腰带上的急救包，其中便装有一包磺胺粉。在伤口撒上磺胺粉以防感染，是每个士兵都被教导的基础战场急救知识。和青霉素不同，磺胺是 30 年代由德国细菌学家和药学家格哈德·多马克（Gerhard Domagk）在一种叫作百浪多息（Prontosil）的橙红色染料中提取的，是一种化学合成药物。今天，医生们在治疗细菌感染时，既会使用微生物制造的“抗生素”，也会使用化学半合成或全合成的药物，它们更准确的统称是“抗菌药物”。

很显然，在诊室里，病人对“消炎药”的崇拜非常顽固。造访诊室的发热病人大多曾经辗转过数家医院，他们一面深刻期待专家的“药到病除”，一面怀有信条：既然身体不舒服，吃点“消炎药”总不会是坏事。有的时候，“消炎药”是“定心丸”。

一位大姐发现自己的颈部淋巴结肿大，在其他医院诊断为“淋巴炎”，开了“消炎药”，没有见效。刘正印告诉她，综合化验结果看，她并没有异常。“很多人淋巴变大都是因为周边组织的各种炎症导致了反应性增生，不需要治疗。”

刘正印向她解释：“就好像手上有个疤，我们需不需要治，要看流不流血，痛不痛。”

“真的没事？那是不是可以再吃点药？”她还是不甘心。

在一些更极端的病例里，抗菌药物甚至扮演着“安慰剂”的作用。一位初中女孩是由母亲领来的。根据母亲的说法，孩子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经常性发烧，除一次确诊为病毒性感冒外，均不明原因。春节后，女孩陷入新一轮发热，症状是“脑子晕，浑身没劲”。刘正印问女孩的母亲：“体温计测出发热的时候，你摸她的身体发烫吗？”“不烫。”她很笃定地回答。“我们发热的时候，身体摸上去也会是热的。你这种情况为什么体温计测得出来，手却摸不出来？”刘正印反复发问了两遍，然而焦急于“眼看就要中考，课都耽误了”的家长似乎并没有听出他的弦外之音。

刘正印后来告诉我，感染内科的门诊经常遇到一种“伪热”。“一些孩子因为各种心理诉求制造发烧的假象。有的孩子为了逃避诊室里的体温测量，甚至会夹带准备好的体温计来调换。”感染内科曾救治过一个孩子，常年发热待查。“别的医院让他做穿刺检查，他做了，叫切除扁桃体，他切了，怀疑阑尾慢性感染，他甚至也接受了手术切除。最后在我们感染内科住院，被我们发现他在量体温的时候把热水袋藏在腋下。”然而，当医生把这个结果告诉家

长时，“家长完全无法接受，依然坚持让我们治疗感染”。这天上午的这个女孩，在来协和医院之前，也一如既往地做“消炎药输液”。

另一些时候，求医心切的人们意识不到，“万能的消炎药”本身就是问题。“一些病人在发热之后使用抗菌药物不准确，长期过量地服用药物，可能造成‘药物热’。这本质上是一种药物过敏反应，但会被误认为是抗菌药物无效的结果。病人很可能执着于换另外的同类型的抗菌药物继续服用，于是发热就会持续下去，而解决的办法不过是停药而已。”

刘正印的诊室里，表现出的不过是发生在中国各个医院里的常态——病人太希望得到抗菌药物，认为它们几乎是万能的。中国人正在大量使用抗菌药物的状况，让人吃惊。《英国医学期刊（BMJ）》2014年2月发表了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Yan Li等人对中国抗菌药物的滥用问题的综述，该研究称，平均而言，中国每人每年使用138克抗菌药物——这个数字是美国人的10倍。

不过，抗菌药物崇拜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在12个国家开展的调查显示，64%的大众受调查者都错误地认为抗菌药物可以用来治疗病毒及病毒感染所导致的流感和普通感冒。

2014年7月的《柳叶刀传染病》（*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杂志发布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对抗菌药物的消费量观察。研究发现，在2000到2010年，全世界抗菌药物的消费量增加了36%（从540亿标准单位到736亿标准单位），其中“金砖五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贡献了76%的增长。任何发展中国家似乎都无法避免走上这样一条路——更好的经济、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大的医疗健康投入、更多的抗菌药物使用。

青霉素还管用吗？

抗菌药物的丰功伟绩使人类不再那么害怕疾病，也使普通人将它推上了神坛。我特别清楚地记得，从小就频频求助于它们的我，第一次从故事书里读到青霉素的故事时内心曾涌动的钦佩。我牢牢记住了亚历山大·弗莱明的名字。这导致了我的另一个疑问：我们使用的抗菌药物种类越来越多，为什么我小时候最熟悉的一些药物却“消失”了？最直观的、赫赫有名的青霉素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古旧和遥远的名词。我多年来想当然地推测：“青霉素不好使了。”

“青霉素使用的减少很大部分原因是现在很多医院就没有青霉素了。”刘正印说。但他否定了我的猜测：“实际上，青霉素依然有很多药品不可替代的用途。现在这个季节高发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也就是双球菌感染引起的脑膜炎，首选用药就是青霉素。链球菌引起的感染，肺炎也好，心内膜炎也好，首选也是青霉素。青霉素在这些疾病上的疗效是很确切的。”他告诉我，很多时候，青霉素是被“观念”打败了。“耐药这么厉害了还能用吗？”“青霉素要做皮试，多麻烦！”“再有，病人一来就说：拿好药给我用啊。可青霉素最便宜。”

“消失”的青霉素折射出抗菌药物崇拜的另一常识性误解：到底什么才是好药？

刘正印在门诊经常遇到这样的请求：“请您给我开点更高级的药。”患者心目中更高级药品往往有这样的特征：更贵，更新，抗菌谱更广——能杀灭的细菌种类更多。以普通人最熟悉的“头孢”类药物来说，我从小就记住了一种药的名字“先锋霉素”。



（黄宇摄）



1

“先锋霉素”是上世纪60年生产的第一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别称。现在，头孢菌素类药物已经研发出了第五代。我天然地认为，第五代头孢应该会比我小时候用过的先锋霉素“好”吧。

而对于刘正印而言，抗菌药物根本没有高级、低级之分，任何抗菌药物都有它的优势和短板，衡量好药的唯一标准就是“能治好病”。

刘正印告诉我，每一类别的抗菌药物都有一个发挥灭菌作用的最基本的分子结构。人们为了满足不同需求，尝试改造这个基本分子结构之外的分支结构，以得到同一类别下的一款新药。以我们熟悉的头孢类药物来说，“好”和“差”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第一代头孢对革兰阳性菌效果好，对革兰阴性菌不好；第二代头孢解决了对革兰阴性菌作用弱的问题，但是它对革兰阳性菌的效果却弱于第一代了；

第三代头孢解决了前两代药物穿透力差的问题，能够进入大脑和关节里发挥作用，但是它对革兰阳性菌的抗菌效能甚至普遍低于第一代；第四代头孢更进了一步，它终于解决了前两代头孢对革兰阳性菌弱的难题，但是它对部分厌氧菌效力又不高了。而第五代头孢从抗菌谱来看，它能打击的细菌最多，甚至能够消灭前四代都无法对付的耐药性很强的金黄色葡萄菌。然而，它就像是田径场上的全能运动员，全而不专，针对具体的菌种，和其他药物相比，它的效率并不是特别高。正因为如此，一个优秀的医生在考虑用药时，永远是在考虑“适当”二字：“用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的8个字来解释，就是：安全、有效、方便、价廉。”

任何治疗在本质上都是医患共同对疾病发起的战斗。这场战斗是否能够赢得漂亮，同一战壕里的



2



3

1. 青霉素在“二战”战场上得到了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从而开辟了现代医学的新纪元

2. 美国分子生物学家乔舒亚·莱德伯格

3. 德国细菌学家、药学家格哈德·多马克

医患双方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医患双方很可能都在推动针对“高级”抗菌药物的盲目崇拜。

刘正印告诉我，一些医生缺乏知识和经验储备，因此在用药上习惯于用大炮打蚊子：“目前，碳青霉烯类的抗菌药物是抗菌谱最广、治疗严重细菌感染最主要的抗菌药物之一。这个类别的药物有一种叫厄他培南。一种现象是，只要来一个肺部感染的患者，医生的处方就开厄他培南。他不会使用其他药物，他就是一个厄他培南大夫。”

刘正印解释说，事实上，如果能够确认致病菌是肺炎链球菌，同时，通过病史判断出病人是在医院外而不是在医院内感染上的，病人也没有服用过特别多的抗菌药物——这些都说明细菌很可能对药物敏感，那么普通的青霉素，或者头孢二代就可以完成治疗。从医院的角度说，对感染精准用药的关键在于辨识致病菌，但国内医院普遍存在临床微生物检验建设不足的情况。还有一类关键的人物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医院里是缺位的。“我们以前是没有临床药师的。在国外，临床药师和医生一起工作，他们能够从药物本身的特点出发，为医生的处方做一个建议和把关的工作。”

对症的药就是好药

同一战壕里的患者则处于更为微妙的位置。一旦病人把抗菌药物当作灵丹妙药或者万灵药，即使无适应症时也会要求使用的时候，任何医生都无法阻止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这些药品。《柳叶刀》发表文章谈及中国临床抗生素滥用的情况时指出，许多患者和患者家属对症状减退速度有极高的要求，并且对待病程毫无耐心。在中国医患关系非常不妙的大背景下，毫无疑问会导致医生开出没有必要的抗生素。对于那些“厄他培南大夫”来说，他们有一种人之常情的担忧：病人往往不会意识到，医学的不确定性在细菌感染的治疗中同样存在，一旦廉价的、“低档次”的抗菌药物没有抑制住致病菌，导致病情恶化，他们应该如何面对？如果这样，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做法是否更加合情合理？

一种抗菌药物廉价与否、甚至副作用大小都不足以说明它的好坏，在刘正印心里，衡量好药的唯一标准就是“能治好病”。

他至今仍深刻记得15年前从协和医院感染病学专家王爱霞那里学到的这一课。病人是一个河北



1961年3月27日，在经历了与肺炎的殊死搏斗后，已康复的美国女演员伊丽莎白·泰勒抵达纽约机场

的20多岁的小伙子，大年三十酒后骑摩托车撞到树上，导致颅骨骨折、胸骨骨折，经过抢救，各方面情况都稳定了下来。“唯一的问题就是脑脊液里一直不干净，脑子感染了脑膜炎。去神经外科会诊，我们提出这种颅脑外伤引起的感染形成慢性脑膜炎，一定要考虑他有没有一个病灶没有清除。这个病灶要不就是脓肿，要不就是颅脑里面有异物，再不然就是他骨折的地方没有完全愈合，颅底和鼻窦这些相通的地方有裂隙，导致鼻子细菌可以反复进入大脑。但是神经外科做了一系列检查，都否定了。”

病人转到感染科住院，大夫们一做功课，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常用的抗菌药物，包括当时最贵的和穿透血脑屏障用药浓度最高的药，病人都用过了，但是效果都不好。大夫们觉得无药可选，忐忑不安。

“这时候，王爱霞老师就说了：他用过氯霉素没有？我们说没有。氯霉素穿透血脑屏障在大脑组织里可以达到很高的浓度，但我们的顾虑是：氯霉素最大问题是副作用会引起再生障碍性贫血，一个年轻人如果有慢性脑膜炎，可以反复来医院输液、吃药，能够控制，而如果出现再生障碍性贫血，那是他一辈子的事情。”

刘正印清晰记得王爱霞的话：“怕什么？氯霉素引起再生障碍性贫血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慢慢一点点积累到定量才会出问题；第二种，病人本身就对氯霉素特别敏感，又或者有耐药方面的因素。这种情况谁都防不了，但统计学上显示的概率非常非常低。我们现在把所有的药都用完了，在没有其他的药可用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试一下？而且病人

在我们的监控中，我们一个星期给他查2到3次血常规，一旦有血红蛋白下降，立刻停药即可。”刘正印记得，当时小伙子治病已经花费了好几万元，而那时候氯霉素仅仅1.5元一支，换药之后，每天住院的费用加到一块儿还不到100块钱。更重要的是，4周后，小伙子出院了，彻底康复。“便宜、副作用大，可你能说氯霉素是个不好的药吗？”

除了作为医者的用药之道，刘正印还有另外一层感慨。当初之所以能下决心用氯霉素，也是因为患者家属的信任。“用药前，我们和他家里人谈了。当时的医疗环境还特别的好，病人和医生关系还没有像现在似的。我们医院当时没有氯霉素，还是患者家属自己弄来了一大箱。”

而现在的医生面对一位病人，开出一张更便宜、药物更“普通”的处方，可能要比一张更贵、药物更“高级”的处方，意味着更丰富的医学知识和经验、更强大的医患关系抗压能力。而一位开出“消炎药”处方的医生则可能需要更强大的内心。就在刘正印为发热待查的男生一家解释他为什么不需要吃药的时候，不愉快的一幕发生了。男生母亲从一进诊室起就悄悄录着音的手机被刘正印发现了。“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请你关掉，并且删除录音。”刘正印对她说，“这样的关系是不是太不和谐了？”

细菌与药物的战斗，不断升级

同样到医院治疗肺炎的病人，每个人可能感染的都是不同的细菌。如果一张强效的厄他培南处方确实能够治愈几乎所有人，那么这对于医患而言，是否都是一种效率更高的解决办法？如果患者愿意承受更昂贵的药价，医生们为什么还需要花费更多的心思，考虑使用青霉素或者头孢二代的可能？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另一条医学常识：就像为结束战争而研制的原子弹并未带来永世和平一样，抗菌药物这一“神奇子弹”也从未一劳永逸地解决细菌感染。

1959年，一种新药登上了报纸头条。好莱坞大明星伊丽莎白·泰勒在扮演埃及艳后时因感染80/81型葡萄球菌而患上肺炎。为了治愈她，医生们不得不使用了刚刚研制的甲氧西林。甲氧西林是第一种半合成抗生素。英国制药巨头必成和布里斯托尔的化学家对青霉素的结构进行了修饰，在它的基本分子结构 β -内酰胺环上添加了化学基团。这

种药物的研发基于一个事实：对于这种新的80/81型葡萄球菌，曾经战无不胜的青霉素已经力不从心。这些细菌聪明地进化出一种可以将青霉素分解的酶。50年代，80/81型葡萄球菌的出现曾经使美国婴儿死亡率一度出现上升的趋势。

然而，甲氧西林类抗生素使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它也遇到了克星。1961年，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葡萄球菌（MRSA,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在英国被首次发现，它的致病机理与普通金黄葡萄球菌没什么两样，但危险的是，它对多数抗生素不起反应，体弱的人感染后会造成致命炎症。到1964年，欧洲的医院报告出现了MRSA的大爆发，而且开始蔓延到其他大陆的医疗中心。

对于许多医学微生物学家来说，细菌王国对实验室设计的抗菌药物的迅速还击，结束了他们对于“神奇子弹”的无尽期许。

细菌远比人类想象的更为强大。“从进化的角度看，细菌一直都占据优势。”诺贝尔奖获得者乔舒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说，“细菌繁殖和进化的速度是人类的百万倍。”1951年，乔舒亚·莱德伯格和妻子埃斯特·莱德伯格（Esther Lederberg）把菌落点样注入了抗生素的培养皿中，他们发现，在这些菌落里，有百万分之一二到千万分之一二的菌落能够产生特定的酶，抵抗链霉素的进攻。而当那些不能抵抗链霉素的菌落被消灭以后，菌落之间的竞争消失了，这些耐药菌便大量繁殖开来。借用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自然选择的现象。

但不同的是，自然界中的物种是通过漫长的演化来适应环境的，而细菌则直接通过基因突变来完成——这意味着，它们适应抗菌药物的速度极快。在40多亿年的演化史中，细菌不断分裂，新细胞不断产生，这个过程最快每12分钟就进行一次，无数新细菌的产生意味着无数的变异可能。

莱德伯格夫妇的研究使细菌的耐药性问题进入医学研究的视野。耐药性指病原体对药物作用的耐受性，耐药性一旦产生，药物的作用就明显下降。但当时，医学界依然心存侥幸：如果一种细菌抵制两种不同的抗菌药物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概率只有1/1014，而只有不超过千万分之一的细菌可能发生突变，那么解决办法很简单：同时给出两种不同的药物，我们就能够把它们扼杀在摇篮里。

然而细菌并不按人们的逻辑出牌，它们能够积



法国巴黎圣路易斯医院的护士准备给一名因腿部骨折而被细菌感染的病人注射抗生素

累多重的耐药性。1959年，日本的医院经历了细菌性痢疾的爆发。对于导致该病的志贺菌，过去有效的4种抗生素磺胺类药物、链霉菌、氯霉素和四环素类抗生素均不再起作用了。

多重耐药细菌的出现

更可怕的是，人们发现，面对抗菌药物，不同种类的细菌之间结成了同盟，它们不仅可以依赖自身的基因突变筛选出耐药的优胜者，还可以从彼此之间获得这种能力。1959年日本的这次志贺菌感染有一个令人感到奇怪地方：从患者身上分离出来的志贺菌，在治疗前所进行的测试中，通常对所有4个类别的抗生素完全敏感。

那么，它们的耐药性是如何迅速获得的呢？一组研究人员探究了患者治疗前采集的粪便样本。他们发现，在患者肠道内的正常菌群中，就有一种可以抵抗所有4类药物的大肠杆菌菌株。当他们将这

种大肠杆菌菌株和没有耐药性的志贺菌混合在试管里的时候，后者很快也具备了同样的能力——正是大肠杆菌将多重耐药性转移给了更为危险的志贺菌。

1961年，在《细菌学杂志》(*Journal of Bacteriology*)的5月刊上，东京庆应义塾大学的渡边勉(Tsutomu Watanabe)和俊夫深泽(Toshio Fukasawa)不仅转述了同事们的这一发现，还提出了他们自己研究的惊人结果，他们发现大肠杆菌、痢疾志贺菌、鼠伤寒沙门菌、肠炎沙门菌中有质粒在传递耐药基因。

质粒是细胞染色体外能够自主复制的很小的环状DNA分子，它们可以在细菌之间进行交换，仅通过这种交换就能够使得不耐药的细菌获得耐药基因。渡边勉和俊夫深泽注意到，细菌在试管里转移多重耐药基因的时间平均为15分钟，而被痢疾志贺菌、鼠伤寒沙门菌、肠炎沙门菌污染的食物需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才能通过人体的肠道，大肠杆菌有足够的的时间和它们分享生存技巧。

这种自由的基因交换方式，实际上将整个细菌王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超个体，由生存的根本驱动力联结在了一起。于是，在使用抗菌药物和细菌的战斗中，新的敌人不断涌现出来。

抗菌药物万古霉素开发于1956年，由于它导致肾功能损伤和听力丧失的副作用和不易被吸收的特性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广泛使用。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医院里耐甲氧西林的金色葡萄球菌差不多已可以抵抗除了万古霉素外的一切抗菌药物了。1984到1994年，美国医院的万古霉素用量已经涨了5倍以上，从2吨涨至11吨。令人始料未及的后果是，万古霉素的大量使用，催生了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的出现。

肠球菌是人和动物肠道中的正常菌群，健康人的粪便中含有大量的肠球菌。肠球菌能够发酵糖类，产生乳酸，分解蛋白质，帮助消化，参与营养代谢；它还能够产生一些抗菌的蛋白质或肽类，抑制有害细菌的生长，阻碍病原微生物接触肠黏膜细胞，保护胃肠道黏膜。不仅在消化道中，人的口腔、胆囊、女性阴道和子宫也常有肠球菌栖生。过去，肠球菌接触开放性伤口时，它们也不会造成感染。

然而，当这种大量存在的正常菌群因为万古霉素的大量使用筛选出耐药性之后，它却成为巨大的麻烦。肠球菌有两个特征：它们天然能适应人体外的生活，可以露天生存数个小时；它们可以抵抗低剂量或者中剂量的有毒化学物质，如消毒剂和抗生素。上世纪80年代，医生们发现，医院充满抗菌药物的环境在繁殖自己独特的超级肠球菌。它们搜集了几十个耐药基因，变成了一个个危险的基因库，随时准备将这种基因传递给其他细菌。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仅美国每年就有8.8万人死于医院内的感染，比死于车祸和被谋杀的人的总和还多。

你可能注意到了，如果细菌耐药性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么，只要人们使用抗菌药物，耐药性的增强就是不可避免的。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主任、国家卫生计生委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与细菌耐药评价专家委员会委员徐英春证实了这种说法，但是细菌耐药性增强的速度则与抗菌药物的使用紧密相关。“一种药物使用得越多，就更容易筛选出对它耐药的细菌，药物的生命周期就越短。因此我们在临床上提倡药物使用的多元化。”

另一方面，一些医生和患者都偏爱广谱药物，希望它们将细菌一网打尽，然而，药物打击的范围

越广，也就意味着同时在更多的不同种类细菌中筛选出耐药菌株。抗菌药物的使用方法同样也会产生不小的影响。徐英春告诉我，在欧美，多重耐药的肠球菌出现的比例很高，但在中国，它依然非常少见，造成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就是使用方法：“我们国家使用万古霉素一般都是静脉注射，但是美国多使用口服，可能会对肠道里的菌群产生影响。”

说明抗菌药物使用和耐药性相关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难以治疗的多重耐药细菌都是在医院里诞生的，而医院恰好是一个抗菌药物使用频率最高、最广泛的地方。

致命的“超级细菌”

尽管医学微生物学家在50年代就已经对细菌的耐药性进行了研究，但是人们并没有一开始就将这种危机意识投射在临床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新的抗菌药物的不断研发。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克林霉素类、氟喹诺酮类、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在“军备竞赛”中亮相，人们似乎跑在了细菌的前面。无需区分病原菌而使用的广谱抗生素允许医生跳过用来确定感染微生物类型的昂贵且耗时的步骤。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一点开始变得明确，细菌越跑越快，制药工业的步伐跟不上了。自1987年起，全世界就再也没有全新类别的抗菌药物问世了。

人们所做的只是在原有抗菌药物类别内进行有限的扩展。就像2008年问世的第五代头孢，它和60年代第一代头孢起灭菌作用的基本分子结构是一样的。照这样下去，人类还能在军备竞赛中跑多远？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后抗生素时代——人们可能死于普通感染和小伤——可能于本世纪内开始。

一个健康的普通人可能并不能意识到细菌耐药性的存在，也许只是在有些时候，你发现扁桃体感染时，你需要服用抗菌药物的时间比从前长了，或者医生不得不为你更换另一种药物。但在医院里，耐药性是徐英春和刘正印每天都在面对的真实问题。

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微生物实验室的科研助理张戈带我参观了这间实验室。针对细菌感染的临床检验工作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一是鉴别细菌种类。检验人员将痰液等送检的样本放入专门用来培养、分离细菌的培养皿中。培养皿里有一层含有细菌生长所必须的糖类、微量元素等物质的琼胶。培养皿会被放



(黄宇摄)

1

1. 协和医院临床微生物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正在调配菌液，以完成耐药趋势的监测工作

2. 培养皿上的菌株来自全国各家医院

3. 试管中是配好浊度的菌液



(黄宇摄)

2



(黄宇摄)

3

入 35 摄氏度、二氧化碳含量 0.5% 的“孵箱”里。细菌会在“孵箱”里快速生长，增殖成为布满培养皿的一个个菌群。以后，检验人员就可以通过显微镜观察、染色等方法鉴别细菌种类了。

在实验室，我还看到了另一种培养皿。它们的内部以六边形六个角的方式放置着阿司匹林药片大小的白色圆形纸片。这些培养皿在做的是药敏检测。布满细菌的培养皿内部原本都是浑浊的，纸片浸润着抗菌药物药液，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一些纸片的周围就呈现出大小不一的圆形“光晕”，这些“光晕”称作抑菌圈，就是抗菌药物杀灭细菌的结果。检验人员需要测量这些抑菌圈的直径。不同细菌对不同抗菌药敏感性的判定标准是不同的。比照这些既定的标准，实验室会向医生出具一份细菌培养报告，里面列举了所有药物的药敏测试结果。字母“S”表示细菌对该抗菌药物敏感，字母“R”

表示耐药,还有字母“I”,表示介于耐药和敏感之间。医生会将这份报告作为依据,结合病人的个体状况来选择使用哪一种抗菌药物。

协和医院检验科微生物实验室承担的科研项目也和细菌耐药紧密相关。徐英春告诉我,实验室从事中国抗生素耐药趋势的监测研究(SMART, Study For Monitoring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Trends)已经10个年头了。我恰好碰上了实验室今年启动的第一批实验。这天工作人员要检测从2016年全国20余家医院送检的分属11种属的200余株细菌,对14种临床常见抗菌药物的耐药性。

实验室的桌子上放满了各种不同颜色的细菌培养皿,里面的细菌菌群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我们在伤口感染中常常遇到的绿脓杆菌是绿色的,透着荧光;大肠杆菌看起来有种湿乎乎的感觉。我还看到两种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少知道,但在耐药领域赫赫有名的细菌:肺炎克雷伯菌被棉签触碰时会有拉丝现象,鲍曼不动杆菌放置在红色的培养皿里呈现出灰白色。它们是医院重症患者、ICU病房患者最可怕的杀手。

实验人员将细菌从培养皿中取出来,在注有生理盐水的试管里调成一定浓度的菌液,然后将菌液与俗称“肉汤”的细菌液体培养剂混合,创造细菌生长的环境。自动菌液分配器会将混合了“肉汤”的菌液注入药敏板的每一个小孔里。每一块药敏板有8行12列小孔。每个小孔含有不同种类不同浓度的冻干抗菌药物,比如第一行的1到8个小孔可能都放有第三代头孢药物头孢他啶,但每个孔的药物浓度是不同的。

注入了菌液的药敏板在“孵箱”里放置16~20个小时就可以读取结果了。通过肉眼观察每一个小孔中的菌液是否澄清就能辨别哪一种药物或是一种药物的哪种浓度已经对该菌株失去了作用:一旦如此,菌液将是浑浊的。

徐英春告诉我,向这样的回顾性药敏试验能够给临床用药、药品研发提供指导和参考。同时实验室还会进行主动性的监测。“我们会关注那些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问题,比如碳青霉烯类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的问题。比方说一个时期全国100家医疗机构将它们从血液里分离出来的肺炎克雷伯菌都留下来,指定几家实验室统一做药敏试验,看看这种细菌在中国的耐药性,用分子分型的技术来研究它在一家医院里面存不存在传播的问题。还有它的耐药基因是什么?和全世界流行的耐药基因是不是一样的?”

关于抗生素的常见误区

文 / 周缘

1 消炎药 = 抗生素

抗生素的作用是杀死细菌和其它致病微生物,消炎药则是用来对抗炎症。“炎症”并不是病,而是一种防御反应,相当于敌人攻打我们的身体时,我们就调用军队来保护自己,这个敌人即致炎因子可能是细菌、病毒、过敏、外伤等等。抗生素只攻打细菌,对于非细菌引起的炎症,抗生素找不到敌人,只会滥杀无辜,引起菌群失调。

真正对抗炎症本身的是消炎药,即医学上的解热镇痛抗炎药,它不能根除致炎因子,但能够缓解红肿热痛等炎症症状,如阿司匹林以及一些中成药。有时候人体本身就能产生激素类的“消炎药”,即使不服药,好好休息几天也能痊愈。

2 感冒了,就用抗生素

所有的抗生素都是处方药,在不确定病因的情况下,无论感冒、发烧、伤口破损,抗生素都不能作为家庭常备药自行选用。抗生素只对细菌感染有效,而感冒大多数都是病毒性感染,由细菌导致的不足10%。不过病情是在发展的,可能你本来只是单纯的病毒性感冒,吹了风着了凉以后,又出现了细菌感染。如果你流着清鼻涕,不断地打喷嚏,基本是病毒性感冒,如果你还有浓痰、浓鼻涕、高烧不退等症状,应该是合并了细菌感染,抗生素只对后面这种情况有用。

3 抗生素有高级低级之分

对抗菌药物实行分级分类管理是世界通行的做法,但从治疗作用上讲它是不分级别的。每种抗生素都有自身的特性,需要因病、因人选择。

从投入使用的先后来看,如果老的抗生素还有效,应用老药,它们通常价格便宜,不良反应明确。不过也有可能,新的抗生素所含的杂质少,产生的副作用小。

从价格来看,贵的抗生素并不一定比便宜的更好,比如老牌抗生素红霉素,抗菌效果非常好,也没什么副作用。

从抗菌谱来看,抗生素有广谱和窄谱之分,这同样与优劣无关。广谱抗生素能够抵抗大部分细菌,窄谱则是专门杀灭某一种或一类细菌,这样听起来,很多人会认为广谱抗生素打击面广,效果更好,实际上用广谱抗生素是狂轰滥炸,用窄谱抗生素才是更有效地针对性打击。如果认为广谱抗生素适用性强,在没有弄清病因时就盲目选用,危害更大。

从事检验工作 26 年，徐英春印象最深刻的变化是致病微生物种类在改变。他记得 20 年前，让全世界头疼的鲍曼不动杆菌还是致病菌界的无名小卒。“百分之七八十的正常人的皮肤毛囊是带有鲍曼不动杆菌的。过去它并不致病，很可能是因为它对药物高度敏感。但非常明显，近 10 年来，这种细菌的耐药性急剧上升。2004 年的时候，我们使用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治疗，几乎没有耐药问题，但现在，100 株鲍曼不动杆菌里，有 60 株都对这种现在可以说是最强大的抗菌药物耐药。现在所有抗菌药物里，只有替加环素一种药物例外，但效果还很局限。”

最近一些年，媒体上时不时出现关于世界某些地方发现“超级细菌”的新闻，所谓的超级细菌就是像鲍曼不动杆菌这样可能对几乎所有抗菌药物耐药的细菌。2015 年 11 月，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刘健

华和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沈建忠领导的团队在《柳叶刀感染病》杂志发表了一篇轰动性的研究论文，他们在动物和住院患者携带的细菌里发现了一种新的耐药基因 *mcr-1*，这种耐药基因能够抵御抗菌药物多粘菌素。

过去，由于多粘菌素对人体肾脏和神经系统有明显毒性而不再用于临床治疗，但近年来，随着细菌多重耐药问题越来越严重，这种药物又重出江湖，被称作是“对抗多重耐药细菌的最后一道防线”。因为此前的研究显示，细菌似乎只能通过基因突变对多粘菌素产生耐药，这意味着耐药性是不会在细菌间进行传播的。然而刘健华和沈建忠的研究却发现，新基因 *mcr-1* 由质粒所携带，可以在不同菌株间进行转移。去年，美国宣布发现了第一例对多粘菌素耐药的尿路感染患者，感染他的细菌就带有 *mcr-1* 基因。

但就像鲍曼不动杆菌的名字令我感到陌生一样，“超级细菌”似乎仍然距离普通人的生活很遥远。事实上，“超级细菌”的出现并不等同于世界末日。正像刘健华和沈建忠的研究显示，那些携带含有 *mcr-1* 基因细菌的病人并没有因为“超级细菌”而发病，细菌侵入人体后是否引起感染，与人的防御、免疫功能，细菌的致病力及数量等许多因素有关。

但毫无疑问，它们敲响了洪亮的警钟。它们在医院中如幽灵般游荡，随时准备趁虚而入孱弱的身体，以生命的代价让人类重新品尝前抗生素时代的苦涩滋味。

刘正印记得他曾经有过一个病人，10 岁的小姑娘患有肺囊性纤维化。“每年一到冬天就肺部感染。去美国治疗，美国医生说，最多有三五年可活。但是，我们每次都把她抢救过来，每次都挺好的。10 年过去了，她的肺部功能终于支撑不了了，呼吸衰竭。但是很幸运，等到了肺源做肺移植。”刘正印回忆说，“可是移植以后，高烧不退，胸水、腹水、昏迷。我去会诊，一看，坏了，痰里有鲍曼不动杆菌，血液里有鲍曼不动杆菌，神志不清，可能脑子里也有鲍曼不动杆菌。最后用了国际上推荐的最强力的三联用药，还是没救回来。”

我亲眼见证了这种无药可救的无奈。每周二下午是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住院病房的例行查房时间，查房以前，科里的所有大夫都会聚集在一起，对手头上的病例进行分析，讨论下一步的治疗方案。面对全国各地汇集而来的疑难病症，医生们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自信的。



(黄宇摄)

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主任徐英春

只有一个病例，讨论似乎很难再推得更远。病人去年底最初因为病毒性脑膜炎从外地赶来急诊。脑膜炎很快就得到了治疗，然而他住院过程中出现了肺部感染。不久，病人的痰液里出现了肺炎克雷伯菌和鲍曼不动杆菌，接着血液培养中也出现了肺炎克雷伯菌。药敏结果显示：除了替加环素显示“中介”——介于耐药与不耐药之间，其余所有药物皆显示耐药。刘正印告诉我，由于替加环素通过肝脏代谢，病人肝功能状况负担不起。病例讨论的最后，一位大夫感慨地说：“就好像多米诺骨牌倒下了一串，我们一块块地扶，可是最后一块我们扶不起来了。”

细菌不只是敌人，我们需要与之共存

无论是在检验科还是在感染内科，我在采访中都有一个有趣的感受，尽管这些科室的大夫和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和致病菌打交道，但他们似乎还不如我身边的一些普通人那般具有“洁癖”。对细菌的恐惧很可能隐藏着医学界与大众之间的另一条知识鸿沟。

忙于与致病菌作战的时候，杀灭细菌并不是刘正印考虑的全部问题，甚至，他并不总是将疾病治愈的全部希望放在抗菌药物上。“我们的皮肤或者体内都定植着很多细菌。它们和我们一起生活，但却不会让我们感染。这就像我们的社会，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好人足够多的时候，社会就不会出大问题。我们体内的菌群也是一个生态系统，追求特别的干净和特别的不卫生会产生同样的后果——一个正常的菌群平衡打破了，那就会出现健康问题。”刘正印说，“作为一个感染科医生，我给这个病人用药，就得考虑：这个药会不会引起内环境的紊乱，破坏病人微生态？如果会破坏，如何预防，如何修复？”

感染性疾病的治疗与其说是与看不见的敌人战斗，不如说是让机体恢复平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胰腺癌手术。刘正印告诉我，胰腺癌手术是大手术，病人的整体内环境很容易被破坏。而且病人术后往往无法进食，这就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环境的重建。“一旦病人出现感染、发烧，很可能是因为使用了大量抗生素，在肠道中筛选出耐药的大肠埃希菌，这种细菌还可能通过损害的肠黏膜进入血液当中，形成更严重的血流感染。”

“所以，我们预防感染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让病人能吃饭。有的时候，如果这个病人用了很强的抗生素，我们会要求他去买北京那种装在瓷瓶里的酸奶，里面有活的双歧杆菌，比吃什么都强。”

自从科赫证明细菌和疾病的关系，细菌等于有害就成为一条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常识。人们忽略了同一时期巴斯德的猜测。巴斯德曾观察到，他给实验室的动物同时注射致命的炭疽杆菌和来自土壤、排泄物的不致病的细菌，可以使它们免于患上炭疽。他揣测，人们正常的细菌摄入可能是其生存的基石，并鼓励自己

4 联合用药，频繁更换

有人认为同时使用几种抗生素，可防止细菌漏网，但多年来抗生素联合应用的临床实践证明，除了不明原因的严重感染或混合感染，联用是没有必要的。合并用药的种类越多，不良反应发生率就越高，所以一般来说，能用一种抗生素解决的问题不应使用两种。

还有人在使用发现效果不明显，就马上换用另一种药。但抗生素的使用有一个周期，用药时间不足有可能见不到疗效，频繁更换会导致用药混乱，而且使得细菌产生对多种抗生素的耐药性。一般感染患者用药72小时（重症感染48小时）后，才可以根据临床反应或微生物检查结果决定是否更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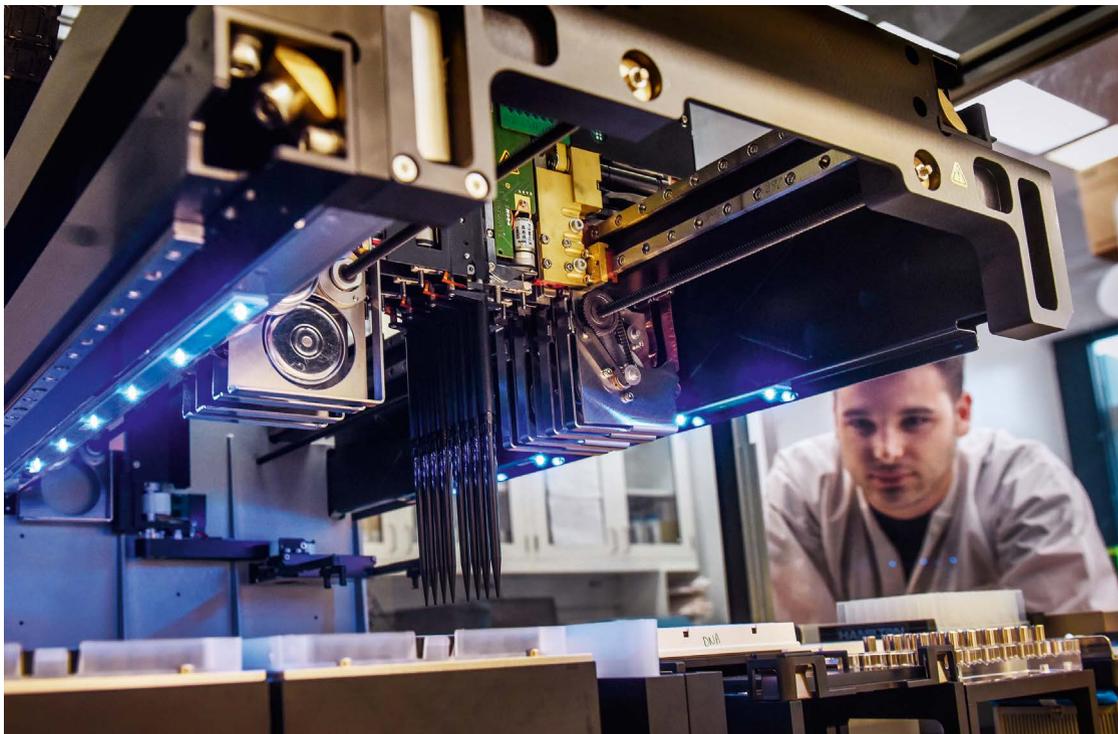
5 减药量，早停药

《世界卫生组织》列出了过三条原则：只有当医生给你开了处方，才服用抗生素；即使病情好转，也要服用完一整个疗程；不要用剩余的抗生素或把它给别人。

为了减少副作用，许多病人会自行减药量或早停药。但使用抗生素最好是“一刀毙命”，因为只有当它在体内达到一定浓度时才能起到细菌的杀灭作用，“温柔一刀”会给细菌重新生殖分裂的机会，病情反复的时候不仅需要重新用药，甚至还需要服用更强的药。

6 停用一段时间后，耐药性会消失

人只是一个培养皿，耐药性与人无关，与细菌有关。如果你停用了抗生素，并处在一个清新开放的环境中，菌群会慢慢恢复，但如果你待在医院中，很多人都在用抗生素，周围的细菌有很高的耐药性，即使自己不用抗菌药物，你也很容易感染耐药细菌，这种耐药性的消失是非常漫长的。当整个环境中绝大多数细菌都对本来有针对性的某种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这一抗生素就需要更新换代了。这样长期发展下去，会出现无药可用的局面。因此，耐药性泛滥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是社会、医院、医生、个人各个层面的共同努力。



2016年5月31日，一名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做抗生素抗性基因检测

的学生通过在无菌环境中培养实验动物来证实这一点。

然而，细菌有害论是如此地深入人心。巴斯德最优秀的学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Elie Metchnikoff）公开嘲笑他的天真。梅契尼科夫提出，他甚至反对吃生的水果和蔬菜，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防止“野生”寄生物的入侵。他预言总有一天，外科医生可以消灭人体内的全部菌群来使人们免遭其对人体的长期毒害。梅契尼科夫的妻子奥尔加（Olga）接受了巴斯德的挑战，在无菌环境里养蝌蚪失败了，这使家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但并没有令梅契尼科夫动摇。

真正动摇“细菌等于有害”常识的，要等到将近100年以后了。1962年，就在《寂静的春天》使得生态学和环境保理论变得家喻户晓的同一年，华盛顿大学的细菌学家罗斯伯里（Theodor Rosebury）发表了他关于生态系统的专著《人类固有的微生物》（*Microorganisms Indigenous to Man*），这是对人类的“微生物群落”第一次做具有科学性质的综合调查。根据罗斯伯里的“普查”，如果你将皮肤表面大约1000亿个居住的细菌滚成球，这个球差不多有一个中等大小的豌豆那么大。与之相比，罗斯伯里估计，如果将15万亿零散的内衬于消化道的细菌装在一个容量为280毫升的汤罐里，

那还会有溢出。而在这项研究发表之前，这些肠道微生物几乎没有受到关注。

罗斯伯里的调查说明，人和细菌的关系绝不可能是简单敌对的，我们也绝不可能向梅契尼科夫预言的一样将所有细菌从身体里清除。想象一下：微生物寄居于你的每一寸肌肤，你的口、鼻、耳，你的食管里、胃里，尤其是肠道里。你的身体拥有30万亿个细胞，但是它却容纳了超过100万亿个细菌与真菌细胞，也就是说，你身体内70%~90%的细胞都不是人类细胞，而是微生物细胞。而且在漫长的岁月里，它们和人类一起完成了进化。它们的存在一定具有一些更重要的意义。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新的研究不断证实了巴斯德当初的推测。一个例子是：有些肠道细菌能够帮助我们合成维生素K，它对于伤口处的血液凝结不可或缺，但人体自身的细胞却不能制造它。一种推论是：大约是因为细菌的效率更高，人体细胞干脆就依赖于细菌提供维生素K，而不必耗费能量兴师动众地亲自合成它。因此，在原始的人类身上，那些获得了合成维生素K的细菌的人便比那些需要自己合成或者从植物中获取维生素K的人多了竞争优势。我们的祖先把这项关键的生理功能“承包”给了细菌：我们为它们提供食物与住所，它们帮助我们愈合伤口。☑



1

“神奇子弹”：抗菌药物改变的医疗史

主笔 ✍ 徐菁菁

对人类而言，抗菌药物的产生就好比是获得了原子弹，从根本上改变了与细菌感染疾病的斗争。但是由此带来的“抗生素崇拜”，其负面作用越来越值得警惕。或许，一个新的科学共识正在形成：只有认清人类同细菌的长期共生关系，我们才能找到人类健康的另一条途径。



2

1. 1945年在伦敦圣玛丽医院，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教授（右）手拿青霉素与其他药物测试的标本。他在1928年发现了青霉素
2. 荷兰人列文虎克第一个观察到球形、杆状和螺旋形的细菌，并第一次描绘了细菌的运动
3. 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用复合显微镜观察植物的木栓组织，并把观察到的图像画了下来，他是细胞的发现者



3

发现细菌

抗菌药物崇拜并不完全是非理性的，相反，它基于现代医学的实践，“与细菌为敌”是现代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信条之一。

生活在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堪萨斯医生亚瑟·霍茨勒曾坦言：“我知道，某些疾病即使处于初期，我的努力也是徒劳的……我常常在接触马具之前就明白这次出诊毫无用处……”20世纪以前的漫长年代，结核、白喉、脑膜炎和产后败血症等感染性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困扰。传统医学没有战胜这些疾病的良方。从根本上来说，人只能凭自己的力量承受身体的痛苦，除此之外，能依靠的只有自然、运气、家庭和宗教。

1665年，荷兰绸缎商人列文虎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被一本书迷倒了。英国博物学家、精于显微镜制造的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出版了一本《微小图集》（*Micrographia*），描绘了他在放大镜下看到的惊人世界：一只苍蝇眼睛的平面，一只趴在人头发上的虱子，一片软木的单个“细胞”。这本书令列文虎克以无尽的热情投入到了显微镜的研制中。他一生磨制了400多个透镜，有一架简单的凸透镜，其放大率达到了270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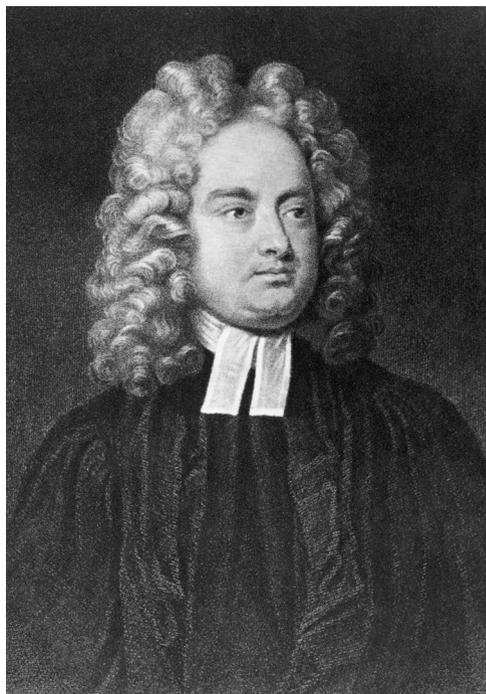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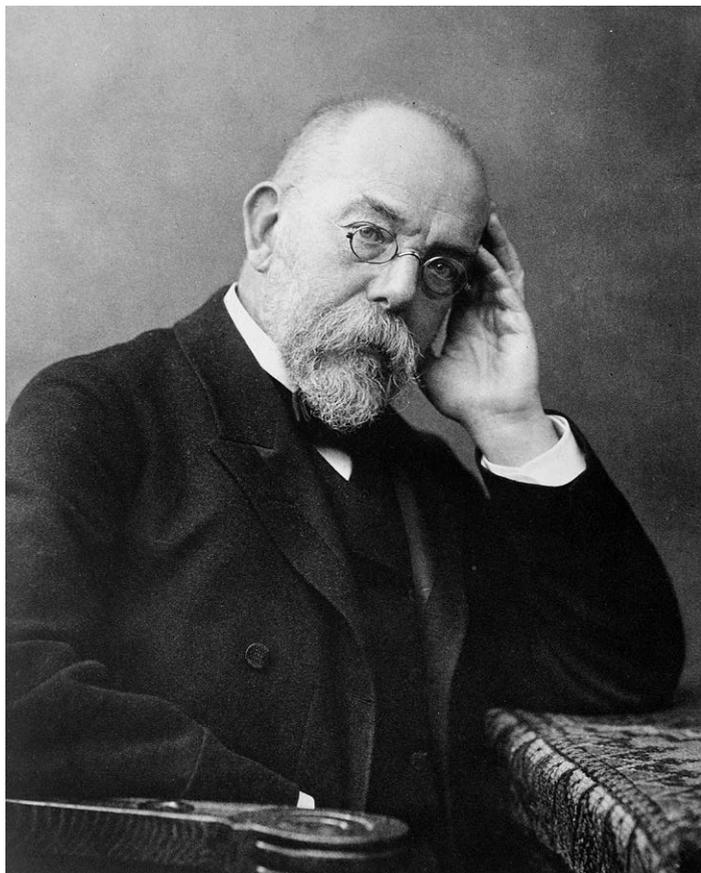
1670年，列文虎克惊讶的发现，人的口腔中居

然躲藏着许多“小动物”：“这些小家伙几乎像小蛇一样用优美的弯曲姿势运动……在人的口腔牙垢中生活的动物，比整个荷兰王国的居民还要多。”这是人类第一次观察到细菌时发出的感叹。后人从列文虎克写给英国皇家学会的上百封附有图画的信里断定，他第一个观察到球形、杆状和螺旋形的细菌，还第一次描绘了细菌的运动。英国著名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曾从列文虎克的发现中找到灵感，写出了一首著名的四行诗：博物学家告诉我们，跳蚤身上有小跳蚤叮咬；这些小跳蚤又被更小的跳蚤叮咬，如此这般，没完没了。

正如伽利略在17世纪早期用望远镜扩大了人类对天空和宇宙世界的认识那样，列文虎克用他的显微镜对准日常物质，展示了另一个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维度。然而，这些居住在人类身上的“小动物”与人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微小图集》出版的那年夏天，伦敦15%的人口（3.1万多人）死于黑死病。但在约两个世纪之后，人们才最终明白这些看似脆弱“小动物”能够置人于死地。

攻克细菌

1872年，德国医生科赫（Robert Koch）所在的沃尔斯顿地区出现了牛羊死于“狂怒病”的现象。



左图：德国医生科赫。他证实了细菌和疾病的关系

右图：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

醉心于研究的科赫用显微镜观测从病死牛羊身上抽取的血液。他发现，所有这些样本中都可以发现“小木棍”和“线条”形状的微生物，而它们绝不会出现在健康牲畜的血液里。科赫将这种疾病命名为“炭疽病”，并深信这些“小木棍”和“线条”是疾病的病原。

在科赫以前，欧美的医生在临床实践中已经产生了病菌理论的支持者。微生物学先驱巴斯德用他著名的天鹅颈烧瓶证明了细菌并不会从无菌物质中自发产生，它们一直存在于我们周围不可见的空气里。巴斯德甚至也提出：“每一种疾病，都是由一种很小的、有生命的细菌引起的。”但是并没有人能够论证他们的观点。

4年后，科赫终于寻找了一套方法。他用火焰消毒一块擦干净的薄木片，然后在小白鼠尾巴的根部切开一个小口，用木片蘸上一滴病死动物的黑色血液，涂抹在白鼠的伤口上，再把它单独关进一只

笼子里，便于观察。接下来，他解剖病死的小白鼠，提取它的血液标本，不出所料，显微镜下的视野里再次出现了熟悉的“小木棍”和“线条”。

科赫研究的第二步是将玻片加热灭菌，放上一滴用来培养细菌的牛眼分泌液，再将一只刚刚死去的白鼠的脾组织放在分泌液中，盖上磨有凹槽的载玻片，用凡士林将两块玻片密封起来。于是，他得以在显微镜下观察到了炭疽杆菌的分裂繁殖。最后，科赫将自己培育的炭疽杆菌接种到小白鼠的尾部。24小时后，小白鼠死了。

这套今天看来并不复杂的实验使得人与细菌的关系产生了第一条重要的常识：细菌可以致病。

当细菌和疾病挂钩之后，医学对于细菌感染性疾病的治疗有了全然不同于以往的明确对策。1885年，曾在科赫的细菌实验室工作过的德国病理学家埃利希，做了一个精确的比喻：现代药物需要一颗“神奇的子弹”，既可以摧毁细菌细胞，又不会伤害人体

本身。这来自他的观察——细菌的细胞从根本上和人体的细胞有很大的区别。

“神奇子弹”出现的前夜是现代医学黎明前最后的黑暗时光。在医学史上，令人唏嘘的两个“玛丽”的故事连接着黑暗和光明。

“伤寒玛丽”是黑暗年代的最后注脚之一。她的命运生动展现了，人类找出了致病菌敌人却无计可施的困境。20世纪初，纽约的东下城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这里只有极简陋的排水系统，也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纽约每年有4000名伤寒患者，他们将经历持续几周的痛苦的高烧、头痛、腹泻和精神狂乱，最后至少有10%的人无法熬过折磨。1906年夏天，银行家华伦带着全家去长岛消夏。8月底，华伦的一个女儿最先感染了伤寒。接着，华伦夫人、两个女佣、园丁和另一个女儿相继感染。有处理伤寒疫情经验的工程专家乔治·索柏将目标锁定在了已经消失的厨工、爱尔兰移民玛丽·梅伦身上。他从职业中介公司提供的材料中慢慢拼凑出10年来玛丽的生活片段。他吃惊地发现：“在过去10年里，她所工作的家庭都爆发了伤寒，而且，无一例外。”

1907年3月，乔治·索柏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玛丽。这场相遇令他猝不及防。“我尽量使用外交语言，但玛丽很快就做出了反应。她抓起一把大杈子，朝我直戳过来。我飞快地跑过又长又窄的大厅，从铁门里逃了出去。”玛丽根本无法相信是她将伤寒传染给了别人。五名警察把她抬进救护车送往医院，医院检验结果证实了索柏的怀疑。那个年代，“健康带菌者”还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概念。现在我们知道，没有生病的人或生病痊愈之后人身上也能找到病原体，他们本身不会生病，却可以把病传染给别人。在无法有效杀灭细菌的年代，公共卫生部门只能有一种选择：携带伤寒杆菌的玛丽被送入纽约北哥岛上的传染病房强制隔离。

两年后，玛丽向卫生部门提起诉讼，指控他们侵犯人权。1910年2月，当地卫生部门与玛丽达成和解，解除对她的隔离，条件是玛丽同意不再做厨师。然而1915年，纽约一家妇产医院暴发了伤寒病，25人被感染，2人死亡。卫生部门很快在这家医院的厨房里找到了已经改名为“布朗夫人”的玛丽。回到纽约北哥岛，医生对隔离中的玛丽使用了当时可以治疗伤寒病的所有药物，但伤寒杆菌仍一直顽强地存在于她的体内。玛丽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此后，她再未离开北哥岛的传染病医院，直到1938年去世。

抗生素改变医疗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痢疾与伤寒比战争本身引起的死亡更多。1918和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在全球蔓延，感染了5亿人，将近占世界总人口的1/4，死亡2000万~4000万人，其中大多数人死于细菌性肺炎引起的并发症。

“当我在1928年9月28日早晨醒来，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因为发现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而将改变整个医疗。”亚历山大·弗莱明在那个被污染的培养基发现青霉菌的抑菌作用的故事大概是医学史上最令人熟知的桥段了。但事实上，这一发现距离“神奇子弹”的出现还有漫长的距离。1929年，在《不列颠实验病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霉菌培养的杀菌作用》的研究论文时，弗莱明对青霉素能杀菌的叙述只有一小段。在后来的10年里，他发现青霉素对任何动物无害，通过研究不同酸碱度下青霉素的性质，搞清楚了怎样让这种药品变得更稳定，但他远没有能够完成最重要的一步：创造出临床能够使用的有效制剂。

1940年，弗莱明已经放弃对青霉素的研究，而且后来也没有再回到对青霉素的研究领域。幸运的是，英国牛津大学拉德克利夫医院（Radcliffe Infirmary）的病理学家弗洛里（Howard Florey）和生物化学家钱恩（Ernst Chain）沿着他的路走了下去。这一年，他们从青霉菌中分离和浓缩出了可以用于实验的青霉素，并在动物实验中取得了成功。但一个致命的瓶颈是，要提高青霉素的产量太难了。这一年的秋天，牛津的一位警官在修建花园里的玫瑰时划破了脸，感染扩散到了眼睛和头皮。在弗洛里所在的医院，德国发明的磺胺类抗菌药品效果有限，很快感染蔓延到了肺部。弗洛里建议使用青霉素。五天的治疗后，警官的病情开始好转，但全部的青霉素已经用完了，病人最后死于无药可用。两年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医院，一名31岁的女患者安妮·米勒（Anne Miller）已经因为败血症生命垂危，在科学家们的建议下，医院使用5克青霉素进行人体试验。在医生给米勒注射了青霉素后的第二天，她的病情就开始好转。此后，安妮·米勒健康地生活了60年。但那5克药剂已经是全美国所有的青霉素储量的一半。

幸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激发了人们对“神奇子弹”的渴望。政府、大学、公司和研究所纷纷投入到了这场与伤兵细菌感染较量的赛跑里。“伤寒玛丽”去世后的第四年，医学史上的“霉菌玛丽”

出现了。弗洛里让手下的实验人员去水果摊发霉的烂水果里寻找高产的菌种。玛丽·亨特看上了一只哈密瓜——黄绿色的霉菌已经长到了深层。弗洛从这只瓜的绿毛上提炼取了黄绿霉菌，这株霉菌使青霉素提炼的产量提高了200倍。后来，威斯康星大学和卡内基学院的研究人员用X光或紫外线照射它，使青霉素产量达到了过去的1000多倍。

正如埃利希对“神奇子弹”的预期一样，青霉素之所以能够在不损害人体细胞的前提下杀灭细菌，是因为其有效成分青霉烷能使病菌细胞壁的合成发生障碍，导致病菌溶解死亡。今天我们使用的抗菌药物一般会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对细菌发起冲击：它们像青霉素以及它的衍生物所表现的那样，向细菌制造细胞壁所需要的部件进攻；或者它们能够抑制细菌合成蛋白质，而细菌需要蛋白质来执行包括消化食物、构筑细胞壁、运动、繁殖、抵御入侵者与竞争者在内的一切重要活动；再或者，它们会扰乱细菌分裂繁殖的能力，破坏它们的增殖过程。在细菌无法“扩军”的情况下，人类的免疫系统就将有清除它们的机会。

“二战”战场成为青霉素的临床试验场。1943年，美国生产了210亿单位的青霉素，只能满足1万人次伤员使用。当时战时生产委员会主管青霉素生产的埃尔德（Albert Elder）给各个工厂写信：“你们要告诉每一个工人，今天每生产一支青霉素，几天后就能在战场上挽救一条生命，或者救治一个伤员。把这条标语贴到工厂里，印在工资的信封上……”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时，每一个英美联军的伤员都能够得到救治了。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药物的供应已经足够治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参战的盟军士兵。

从战场凯旋的抗菌药物在临床治疗上也大放光彩。1945年，发表在《临床探索学报》（*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上的一篇文章报道了青霉素治疗64名肺炎患者的惊人疗效。65年后，2010年，美国的医疗人员开出了2.58亿例抗菌药物，相当于每1000例处方当中就有833个含有抗菌药物。

对人类而言，抗菌药物的产生就好比是获得了原子弹，从根本上改变了与细菌感染疾病斗争的竞技场。结核、白喉、脑膜炎和产后败血症，那些人类历史上猖獗的细菌性感染疾病被迅速遏制。如果没有抗菌药物的帮助，我们也很难想象外科手术在20世纪进一步突飞猛进。一个数字足以说明一切，中国国家卫计委全国合理用药监测系统专家孙忠实曾指出：

“抗生素的使用将人们的寿命平均延长了24岁。”

学会与细菌共生

相比一个世纪以前的人，现在的我们生活在干净得多的环境里。我们饮用消过毒的水、使用杀菌洗涤用品清洗我们的食物和身体，城市的环境卫生系统也以一尘不染的街道作为追求。感染性疾病在抗菌药物的抗击下不再令我们闻之色变，但很显然，我们的时代有自己的健康问题。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科学顾问、纽约大学人类微生物组计划负责人马丁·布莱泽（Martin Blaser）在《消失的微生物》一书里提出了一个迷人的问题：为什么一些现代疾病几乎同时在发达国家里骤然增多，并蔓延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是一种你我都能感知的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过敏性疾病，你是否感到：你的人际交往圈子里，患上鼻炎、哮喘等过敏性疾病的人越来越多？世界变态反应组织（WAO）统计数据显示，全球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已达22%，我国发病率也已经超过了20%，平均五个人中就有一人过敏。根据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主任殷勇教授的数据，在上海这个中国公共卫生和生活水平位居前列的城市，0~14岁儿童的哮喘患病率已上升到7.57%，超过20万人，几乎每10年翻一番，为全国之最。

马丁·布莱泽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源于他早年对幽门螺杆菌产生的疑问。1982年，澳大利亚学者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发现了幽门螺杆菌，并证明该细菌感染胃部会导致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和胃淋巴瘤甚至胃癌。2005年，两位研究者为此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奖。如今幽门螺杆菌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最高警示级别的I类致癌物，幽门螺杆菌感染使胃癌的患病危险增加了2.7~12倍。如果你在体检中查出胃中有幽门螺杆菌，医生多半会向你提出建议：使用主流的含有两种抗生素的三联疗法将它们从你的胃里清除。

马丁·布莱泽并没有否定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的研究成果，令他好奇的是：为什么在他们之前，人们从未想过研究幽门螺杆菌与胃炎之间的关系？答案很可能是：过去的研究根本不会将这种细菌视为疑犯：遗传学研究显示，人类携带幽门螺杆菌已有十几万年，这个时间跨度是目前检测手段所能达到的极限。有理由认为，从20万年前智人刚刚出现在非洲大陆的时候，这种微生物就已经



1918年3月，美国堪萨斯州的苏斯顿军营发生流感。至1920年春季，全世界约10亿人感染，近4000万人死亡。因为西班牙有800万人感染，连国王也染上此病，故得名“西班牙流感”

和我们共同生活了。19世纪的医生在几乎每个人胃里都发现了这种弯曲螺旋的细菌——你很难认为人人都有细菌是病原体。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带菌者已经变成了少数派。而促成这变化毫无疑问是越来越干净的现代生活。

马丁·布莱泽接下来的研究发现则更为有趣：在我们清除胃里的幽门螺杆菌时，我们清除的不只是胃炎和胃癌的可能。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胃是一个彻底无菌的环境，因为我们的胃酸与汽车电池里的酸强度相当。但幽门螺杆菌如此特殊，它基本上只分布于我们的胃部。我们的消化道有一层厚厚的胶质黏液保护层，它就生活在胃部的这层黏液里。当胃的产酸细胞的成熟时，一些幽门螺杆菌便向这些细胞注入蛋白质，使酸度降低到幽门螺杆菌所能够忍受，但

又足够杀死大多数其他微生物的程度。那么，一个合理的推论是，一个没有幽门螺杆菌居住的胃势必比一个有幽门螺杆菌定居的胃分泌更多的胃酸。

马丁·布莱泽认为，幽门螺杆菌的消失已经导致古老的平衡被打破了，它的后果绝不可能全是正面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胃食管反流造成的胃食管反流疾病，从1930年开始增长，现在是发达国家里增长最迅速的疾病之一。在美国为例，10%~20%的成年人都受其困扰。如果胃食管反流疾病没能得到及时治疗，它会引起更加严重的疾病，如胃酸损伤人体组织并逐渐恶化成食管肺腺癌。在美国，食管肺腺癌曾经非常罕见，在美国所有的食管癌中仅占5%，目前却成了所有主要癌症类型中增长最为迅猛的一个。在过去的30年里，它增长了6倍，在美国所有食管癌中占的比例超过了80%，并且在发达

国家里持续攀升。马丁·布莱泽的研究显示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病人患食管反流疾病的概率更大。有的研究成果显示了8倍的巨大差异。

马丁·布莱泽对幽门螺杆菌的研究暗含了一个深刻的可能性：我们很可能需要回到我们体内的细菌身上去寻找困扰人类的现代疾病的根源。

困扰人类的免疫系统疾病也同样如此。冯·穆蒂乌斯(Erika von Mutius)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代表性的观察。1989年,过敏症专科医师冯·穆蒂乌斯开始对生活在大城市慕尼黑与生活在周边小乡镇的孩子的过敏症及哮喘的发病率进行比较,她发现乡下孩子的发病率明显更低。当时,许多人将哮喘和过敏症的原因归结为空气污染,但穆蒂乌斯的统计员却得出一个观察结论:“那些家里用煤和木头取暖的孩子似乎受到保护。”那个时候,冯·穆蒂乌斯根本不敢发表这样离经叛道的结论。

几个月后,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了。冯·穆蒂乌斯立即意识到,她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机会,让她得以比较同一种族却生活在极其不同环境下的人们的哮喘和过敏的流行率。当时,联邦德国在空气质量标准和废气排控方面的严格度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而民主德国则是受到严重污染的工业中心。接下来的两年里,冯·穆蒂乌斯和她的小组为东德、西德两个地区的7500多名儿童做了过敏和哮喘测试,并将结果与其病史及父母亲的调查问卷做比较,旨在找出过敏的证据,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她发现,民主德国儿童有较高的支气管炎发病率,这标志着气道损害,正像吸烟者受到的气道损害,这很可能是空气污染的结果。但同样是这些孩子,与西德的孩子相比,他们得花粉症的可能性只有后者的1/3,得哮喘的可能性也要低1/3。超过1/3的西德儿童被证实有过敏,而东德儿童则不足1/5。

德国统一5年后,当穆蒂乌斯重回位于东德的莱比锡的时候,她发现,当地孩子花粉症的发病率增加了1倍,湿疹的发病率增长了50%。相应的观察是,德国统一后,东德家庭迅速采用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在饮食上,进口的、加工食物代替了原来从农贸市场买来的未经高温消毒的奶制品和没洗过、新鲜采摘的农产品。当然,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洁净了。

能提供解释的可能还是我们体内的微生物群系。它们组成了免疫系统的第三纵队。第一纵队是人类先天性免疫系统,包括保护着人体表皮及黏膜的细胞或分泌蛋白。它们可以“识别”大多数细菌

共有的结构模式,从而消灭这些细菌。第二纵队是适应性免疫系统,它们依赖于特异性的抗体来识别病原体上高度特异的化学结构。而第三纵队就是微生物免疫,这些长期的住户可以以各种方式抵御外来者的入侵。

进一步的,一些研究认为,多种自身免疫病在发达国家中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也可能与我们体内的住户有关。多种自身免疫病I型糖尿病、狼疮、多发性硬化、风湿性关节炎,它们都是由于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健康组织引起的。流行病学观察显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高发病率相比,在那些人们亲近土地,喝未过滤的水,吃的食物几乎未经加工的地区,这些免疫机能紊乱病症很少见。一种推论是,人类大约5000年的文明和伴随而来的瘟疫,以极具侵略性的方式培育出了免疫系统,它是一种内在的、被大大小小的感染加强的攻击系统。公共卫生设施、抗生素和童年的疫苗大大减少了人一生中得疾病的炎症负荷,但是人体免疫系统的遗传情况却没有相应发生改变。从我们出生那一刻开始,进入我们体内的细菌就开始帮助我们调试我们的免疫,帮助免疫的发育。我们的适应性免疫系统只有经过后天的训练才能区别“我”与“非我”。微生物正是“指导”这一过程的第一任老师,“教会”免疫系统如何识别危险。而在缺乏“老师”的情况下,免疫系统的学习也就出现了问题。

在过往的研究中,抗菌药物化合物大多是从土壤中的细菌内进行采集的。现在,我们可能还需要从住在我们身体里的细菌身上去寻找新的灵感。2016年7月,《自然》(Nature)杂志刊登了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安德烈阿斯·佩舍尔(Andreas Peschel)所带领的团队完成了相关实验。研究小组发现:“金黄色葡萄球菌只存在于30%的人的鼻腔内,而70%的人的鼻腔内却没有。”研究显示,在那些不携带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人的鼻腔里,里昂葡萄球菌(S.lugdunensis)能够生成可与金黄色葡萄球菌进行“战斗”的抗生素。科学家将这种新型化合物命名为“Lugdunin”。在小鼠实验中,这种新发现的抗生素能够消灭或改善皮肤感染细菌,并且尚未发现有任何不良副作用。安德烈阿斯·佩舍尔说,人体菌落可以看作是新型抗生素的来源所在。

或许,一个新的科学共识正在形成:只有认清人类同细菌的长期共生关系,我们才能找到人类健康的另一条途径。■

(参考资料:杰西卡·斯奈德·萨克斯:《致命伴侣》;马丁·布莱泽:《消失的微生物》)



穿山甲最大的天敌是

~~人~~ ~~类~~

才能保护穿山甲



因为肉和鳞片的消费，
每年约有10万只穿山甲惨遭杀害，
中华穿山甲已极度濒危。
请拒绝消费穿山甲制品。



北医三院儿科医生韩彤妍（后左）在儿童病房查房

孩子生病，迷信还是拒绝抗生素？

记者 邱杨 吴丽玮 摄影 黄宇

在儿科诊疗中，用不用抗生素、用何种抗生素，这首先应是一个医学判断。但当屡屡面对家长的催促、焦虑与指责时，医生是坚持自己的判断，还是妥协？这或许并不是一个容易下定的决心。现实情况往往是，在医生的判断和家长的姿态之间寻求折中与妥协。“用不用抗生素”折射出的已不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掺杂了社会环境、医患关系等诸多复杂因素的权衡。

家长对待抗生素的两个极端——拒绝或迷信

夜晚，常常是儿科急诊最繁忙的时候。作为中日友好医院的儿科急诊大夫，王琨蒂最多的时候，曾一晚上接诊了260位病人。到早上交班时，她整个人已经直不起身来，只能靠护士搀扶着拖下去。她笑问：“这地板昨晚打过蜡，你能看得出来吗？”医院的地板每隔几天就有专人打蜡，光亮得能映出人影，唯有儿科急诊室的地板，经过整晚的“碾压”，第二天早上就根本没法儿看了。“小孩来看病，一来至少有两个家长跟着，四五个家长也是常事。一晚上相当于有1000多个人从儿科急诊室的地板碾过去，这地板可不就不亮了。”

“成年人的诊室几乎都是两张桌子拼在一起，两位大夫在一间诊室里看病。我们这儿看不了，太乱。”在王琨蒂的印象中，儿科急诊室往往是医院里最嘈杂的地方。“小于3岁的孩子抱进来几乎都在哭，不大声点和家长交流，根本听不见。”有时候孩子父母和祖父母意见不一致，恨不得直接就在诊室里吵开了。“有婆婆数落儿媳妇的，有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呛起来的……”王琨蒂有些自嘲地苦笑道，“我们这儿总是特热闹。”

儿科急诊室外，几乎每晚都排着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大长队，可实际上能分配给每位病人的门诊时间总是很有限。“坐在你面前的病人，总嫌你看得快，好不容易排到了，医生怎么几分钟就打发了？”事实上，按照人流量计算，平均每位病人的门诊时间只能在3分钟到5分钟。“即便如此，排在后面的家长又总是催促‘你能不能快点啊！’”这让王琨蒂也很无奈，“已经够快的了，不能再快了。”

在敏感季节，来儿科急诊的病人大多是呼吸道感染问题。“从去年10月开始病人逐渐增多，到11月份人数一下子飙升上去，整个冬三月我们都忙得快飞起来了，连急诊带门诊带病房，几乎都是呼吸道的病人。”在王琨蒂的印象中，得病的大部分都是五六岁以下的孩子。“冬季病毒细菌容易传播，孩子抵抗力弱，可能会发生呼吸道感染。”今年北京的冬天是暖冬，几乎没下过雪，天气也不好。“甚至连春节期间，我们科的楼道里还加满了床位，谁愿意在医院里过年呐，这都是没办法。”

实际上，孩子容易生病和环境的变化也有关联。“雾霾中潜伏的细菌病毒含量，比好天气时浓度要高得多。比如近期流行的病毒型甲流、轮状病毒、支原体肺炎还在持续。”在王琨蒂看来，雾霾对孩子呼吸道的伤害，往往最为明显和直接。“只要是一轮雾霾开始，每天上急诊来的呼吸道感染病例就多起来。”这似乎已经成了医院儿科急诊的常态。

自从2010年开始轮值儿科急诊以来，王琨蒂每天和抗生素打交道的频率就变得频繁起来。细菌感染是儿科常见疾病，包括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肺炎、化脓性扁桃体炎，以及具有传染性的猩红热等。如果感染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后果往往严重。

“但很多家长对抗生素的第一反应却是抗拒：抗生素有副作用，这么点小孩能用吗？”实际上，儿科大夫必定是根据孩子的实际病情来判断是否需要使用抗生素，绝不是信口开河。“如果是病毒感染，用了抗生素也无效，可如果是细菌感染，那该用就得用。”为

了消除家长对抗生素的疑虑，王琨蒂在门诊时，常常手指着化验单，一项项跟家长解释为什么要用抗生素。可即便如此，也常常有家长始终心存疑虑。王琨蒂就遇到过一位特别纠结的父亲。夜里11点半，这位父亲带着孩子来看急诊，不到1岁的孩子软软地抱在手里。王琨蒂一问，原来是孩子腹泻了，大便里有点血。“大便验出来红白细胞都挺多，又不够痢疾标准。”王琨蒂判断，孩子得的是细菌感染的肠炎，得用抗生素。但这位父亲却忧心忡忡，反复一遍遍问着：“能不能不吃抗生素？不吃能不能好？要是不好的话，会不会加重？加重了会是什么表现？会有什么后果？……”

王琨蒂其实很能理解这位父亲的矛盾心理——“他特别关心自己的孩子，希望孩子早点好，但当要用到他认为可能引起副作用的药物时，他又不想自己来承担这个后果，就想把这个选择题交给医生，可对医生的判断他又无法彻底放心。”王琨蒂解释得口干舌燥，一直磨到夜里12点多，诊室外都没人了，也没能消除这位纠结父亲的焦虑。

除了像这位父亲般犹豫纠结的家长之外，直接拒绝使用抗生素的家长也并不少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大夫韩彤妍几乎每周门诊总能遇上一两位，直接开门见山地对她说——“我们孩子不用抗生素。”“实际上，在医院儿科门诊开出来的抗生素，肯定是适用于儿童的。有时候家长的过度担心，其实是没必要的。”在韩彤妍看来，这背后的根源，归根结底是家长对医院和医生的信任缺失，以及对抗生素等药物不够了解。

“儿科的特殊性恰恰在于病人本身没有多少决定力，几乎都是家长来代为主。可家长的判断，有时候往往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不一定听得进医生的话。”即便医生跟家长使劲解释了抗生素的治疗作用，副作用并没有想象中强，即便家长勉强同意把抗生素开回家了，也可能坚决不吃。“等到来复查时，总能想出各种借口推搪。”

更有甚者，有家长固执地希望医生顺着他的思路和判断来，一旦你不赞成他，他就不信任你。来回劝说无效，双方的火都顶到嗓子眼了。这时候家长也烦了，愤愤丢下一句：“我挂专家号去，不跟你这普通号费劲。”留下韩彤妍在心里苦笑：“实际上，我也坐诊专家号。”可面对家长的抵触心理，她也常常无能为力。

与此截然相反的另一极端是，家长死活要求给孩子输液挂水。“一进门就风风火火，说孩子病了得赶紧输液，我们孩子平时抵抗力差，每次得病都要挂水挂个十天半个月才能好。”但实际上，韩彤妍一



中日友好医院儿科医生王琨蒂

检查，发现孩子得的是病毒型感染，用抗生素输液也丝毫不起作用。

如何劝说，往往让韩彤妍煞费苦心。她常常跟家长说，要衡量孩子是不是有必要受这个罪？“打点滴对小孩子来说很费劲，动来动去针口一下子就鼓了，得重新扎，孩子哭得更厉害了。家长也跟着受罪，抱着孩子一动不动地两三个小时。”苦口婆心地劝说一番，有的家长犹犹豫豫地也就放弃输液了，但也有九头牛都拉不回来非得坚持打点滴的固执家长。

在儿科急诊和门诊里，每天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医生的工作也考验着人际沟通能力。“实际上百分之六七成的医疗纠纷，说到底都是沟通问题——医生说的话病人没听懂，或没有用病人能听懂的方式说出来。”在韩彤妍看来，家长心里本来就火烧火燎的，门诊时间又极为有限，医生就更得耐心。而王琨蒂在

急诊室值班时，一年里要接诊将近两万病人，她始终认为：“你现在多说十句话把矛盾消除，则意味着你以后能少说一百句解释矛盾的话。”

医生与家长的“折中”

实际上用不用抗生素、用何种抗生素，在协和医院儿科主任宋红梅看来，首先应是一个医学判断。“什么是抗生素？”其实在医生和家长的语境里，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抗生素指的是抗生物病原体的制剂，而生物病原体就包括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真菌等等。而老百姓嘴里常说的抗生素，是特指抗细菌的抗生素，这是应该明确的。”

“常常有家长问我，这种抗生素是不是劲儿大一些？”实际上，抗生素并没有所谓强弱好坏之分，每种抗生素针对的抗菌谱不一样。“比如孩子在夏天里又吐又拉，大便里红白细胞都有，诊断为痢疾或肠道细菌感染，常用的是头孢三代。而孩子得了化脓性呼吸道感染类疾病，常用的则是头孢二代。便有家长不理解，是不是三代比二代杀菌力强？”

实际上，区别只是二者对应的抗菌谱不同——肠道细菌往往以革兰氏阴性杆菌感染较多，对应的抗生素是头孢三代；而化脓性呼吸道感染类疾病则以革兰氏阳性球菌较多，对应的抗生素是头孢二代。“抗生素的杀菌力并没有可比性。”在宋红梅看来，“选择针对感染的某一类细菌有效的抗生素进行治疗，这是大夫应该做的事，也需要家长们的理解。”

宋红梅强调，病毒感染的情况没必要用抗生素，而细菌、支原体、衣原体感染就一定要用。如若不用，可能加重病情，甚至进而造成病情迁延和其他问题。“比如说链球菌感染，如果治疗不彻底，经常会合并风湿热，引起链球菌感染肾小球肾炎，这在过去是很常见的情形。”如今这种并发症少了，恰恰是得益于抗生素使用及时，治疗彻底。

尽管用不用抗生素的判断权，看似应该牢牢握在医生手里，但现实的情况却远为复杂。“在幼儿病情的早期，鉴别是否是细菌感染有时候难度很大，有一定的复杂性。”王琨蒂告诉本刊，“儿童的各种感染性疾病早期都可能以发热作为主要表现，拿肺炎来说吧，不管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早期都可能出现发热、咳嗽、咳痰，这些症状的差异程度并不大。”

尽管现代医学有相应的检验来辅助诊断，最常用是血常规和尿便常规和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等指标。但儿科患儿在病原体方面会有一些特殊性，

加之病史获得难度更大，临床症状也与成人有所区别——这所有的一切意味着，并不是所有诊断都能依靠实验室检验完成，还有一部分也是经验性判断。

从王琨蒂的经验来看：“学龄前儿童最主要的疾病是上呼吸道感染，其中85%是病毒感染的自限性疾病，不需治疗，通过家长护理和饮食调整就可以痊愈。只有10%~15%是细菌感染引起，这些患者首先推荐口服抗生素，其次是肌肉注射，最后才使用静脉注射。”

可既然是经验性判断，就可能存在未知的风险。“孩子刚开始生病的时候，查出来的血相或许还很难立马决断，绝对是病毒还是细菌。”王琨蒂心里明白，“病情的发展有时候是很难预料的，加上门诊的随访复查无法做到很及时，坚持自己的判断有时反而会落家长的埋怨，为什么不早听他的马上输液？”

当面对家长的催促、焦虑与指责，医生是坚持自己的判断，还是妥协？或许并不是一个容易下定的决心。而现实情况往往是，在医生的判断和家长的姿态之间寻求折中与妥协。至此，“用不用抗生素”折射出的已不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掺杂了社会环境、人心考量、医患关系等诸多复杂因素的权衡。

而为了加强诊断的确定性，势必增加很多检查来辅助判断。“比如说孩子急性发烧，但其他情况都挺好，我就觉得先观察吧，不用非得立刻就做各种检查使劲去查。”可有的家长就特别纠结，基层医生为了慎重起见或顺着家长的意思，便开出各种检查单子。宋红梅却不主张过度检查：“孩子检查受到的痛苦，跟得到的检查结果之间，性价比太低。回家先观察，有情况了再查。”但并不是所有家长都能接受这样的理念，依然奔波在各大医院之间做检查。

“尤其是放射类的检查，不要随便给孩子做。如果医生听诊认为，肺里没有问题的可能性是80%，那为什么非要给孩子拍一个片子，让孩子吃一些射线呢？”用最小的药物副作用和检查风险伤害，达到最大的治疗效果，这是协和医院儿科追求的目标。

宋红梅每周出大量门诊，但一年下来也开不了几个X光片检验单子。“如果说没有拍片子，你说我能保证100%正确吗？也不一定。”在她看来，关键的问题或许是：作为医生你对自己的专业判断有没有自信？对不确定的风险敢不敢承担？

“说实话，我们做大夫，有时候真是胆战心惊。”即便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宋红梅在门诊时也很难做到时时笃定，“就像张孝骞教授所说的那样，病人以性命相托，我们怎能不诚惶诚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大夫在面对病人和病情时，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

能发生，真的不是能100%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也希望家长和病人来共同理解。”

抗生素里的效益风险比

当病人无法理解治疗中存在的风险，不愿与医生共担风险时，医生也更倾向于自我保护，这是当今国内医疗环境之下的无奈现状。“你不信任我，我就不敢给你治疗，我要治了以后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而医生束手束脚的后果，往往是更倾向于做出保守的治疗选择。

“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病人如果做手术可能有50%的死亡率，如果不做手术采取保守治疗就是100%的死亡率——这种情况下是做手术还是不做手术？”宋红梅说，“如果病人信任大夫，大夫就豁得出去，咱们共同面对共同承担风险，还有50%的希望。如果病人不信任大夫，大夫当然就不敢做了。”

实际上，在抗生素的使用上，也同样投射着类似的心态。“尤其对于慢性的疑难感染来说，真的需要病人和家属有很高的依从性。”宋红梅对一个案例印象很深。“这个孩子是中耳的慢性感染，进而造成周边骨质破坏，在山东老家治疗了很长时间也不见好，后来到了北京协和医院。”一开始宋红梅考虑是否是肿瘤，但检查发现没有肿瘤迹象，便排除了。病理检查显示就是个慢性炎症，但按照炎症性疾病治疗，效果也不佳。一时之间，医生们不知从何入手。

“最后经过细菌培养发现，可能是感染了一种非常罕见的致病菌。”但宋红梅和医生们也不能确定，这是否就是病因。她便跟家长沟通，是不是按这个思路尝试治疗？“相应的抗生素疗程要长达三个多月，但家长依然愿意配合。”尽管在用药的最初两周不见效果时，家长也会有迟疑和担忧，但他依然愿意和医生们继续尝试，共担风险。果不其然，到了用药的第四周，孩子的症状就明显好转了。宋红梅很感怀家长的信任与配合，才有了医生们放手一搏的基础。

“但有时候，要让家长信任和配合真是很困难的事。”有一位家长长期在宋红梅这里看病，但却特别不遵医嘱，让宋红梅感到头疼。“孩子是个普通感冒，我告诉家长不用吃抗生素，但家长总不听，总是自己去药店买来‘头孢’先吃上，发现不管用了再跑来哭诉，怎么不管用？”这让宋红梅有些哭笑不得，“你这种情况不需要吃抗生素，当然不管用了。”

“可等到孩子有一次真是扁桃腺化脓感染了，应该吃抗生素甚至输液时，原本应该输液5~7天的疗

程，孩子输了两三天不烧了，家长又擅自停掉输液。”实际上，孩子的体内仍然有细菌残留，并没有除尽。于是，很快孩子的病情又反复了。面对这种依从性极差的家长，宋红梅总有些恨铁不成钢：“不听医生的专业判断，家长擅自替孩子来决定停不停药，难道不觉得这是对孩子的极不负责吗？”

而有时家长对药物副作用的恐惧，甚至到了让宋红梅无法理解的地步。她遇到过一个特别可惜的病例。“一个11岁的男孩得了红斑狼疮，必须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但男孩的妈妈就是不愿意，担心糖皮质激素副作用大。”实际上红斑狼疮在临床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后，5年生存率在90%以上没问题。“最后我都跟孩子妈妈说到什么程度，不用药这孩子就没命了呀！”但家长仍然偏执得可怕，甚至自动出院宁愿不治了。“孩子特别可怜，说妈妈不让他吃药。”宋红

梅痛心疾首，“这不就是为孩子选择了一条死路吗？”

“用不用药，不要只看到药的副作用，应该首先考虑药的正作用。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我是不是得了必须要用这个药的病？如果需要，在使用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副作用，这是医生肯定要考虑的事。家长不能一来就说药的副作用大，坚决不能用。”在宋红梅看来，病人和家长应该正确理解药物的效益风险比——享受疗效的同时承担相应的风险，如果不想承担任何风险也必然无法享受疗效。如同享受阳光的同时，就必然要承受阳光背面落下的阴影，任何选择都意味着效益与风险的共担。但现实往往是，很多家长并没有跟医生共同面对、共担风险的意识。

更让宋红梅感到纠结的是，某些超适应症的情况下，到底能不能用抗生素？比如说喹诺酮类抗生素，考虑到它对儿童软骨发育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又结合我国的国情，说明书里明确限制儿科使用。“但如果这个孩子是个特别严重的耐药菌感染，只有喹诺酮抗生素有效，如果不用，孩子的感染可能就控制不住了，甚至可能因此丧命。”——这种情况下，是用抗生素还是不用？

事实上，对于超适应症用药，我国法律没有给医生的自由裁量权留下任何空间。“只要用了就是违规，一旦出了问题医生就得担责任。即便征得了家长的同意和签字，也可能存在风险。”遇到这种情况，宋红梅往往特别纠结。“有的大夫可能会说，如果用了，就属于超说明书用药，万一出了问题打官司肯定会输，那我为什么非要用？可从救死扶伤的角度来看，即便孩子可能因为用药留下某些后遗症，但在用了药就能保命的情况下，是不是也可以用？是不是也可以获得公众的谅解和法律的空间？”

抗生素用药理性

对于儿科大夫来说，在抗生素使用的问题上，最大的挑战是难以鉴别出是否为细菌感染，以及是何种细菌感染。临床上15%的细菌、真菌或支原体等感染一旦被确认，及时、合理地使用抗生素就不再是一个还要犹豫的问题。病程变化的过程实际上千变万化，单靠孩子的免疫力去战胜细菌的侵扰显得过于势单力薄，抗生素的价值就在于缩短病程，用药就是为了保证它不往更坏的方向走。

如何合理使用抗生素则是一门极大的学问。儿童使用抗生素确实比成人要更加谨慎。孩子年龄越小，各个脏器的发育越不成熟，那么对药物的代谢、排泄



协和医院儿科主任宋红梅

缓慢，解毒能力越弱。因此不仅在用药范围，在用药剂量、用药间隔时间和总疗程上都有特殊要求。用药后相对大人更容易有副作用，因此要密切观察用药反应。

“一些抗生素药物如氨基糖苷类（庆大霉素）和喹诺酮类（氧氟沙星）分别对听神经和儿童软骨发育有不良影响，在儿童使用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四环素类的抗生素对牙釉质发育有一些影响，过去我们有一些四环素牙，就是特别小的小孩大剂量应用四环素造成的，一般说来，8岁以下的孩子是不能用四环素类抗生素的。”宋红梅说。

多位儿科医生都反复强调，使用抗生素不仅要对症，也要保证足量和足够疗程。首先是细菌增殖的方式所限，抗生素使用需要一定的持续性。“细菌有一个增殖过程，有时抗生素发挥作用时，细菌还没有进入到增殖周期，此时抗生素对它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必须持续用药，使得细菌在增殖高峰时能够被消灭掉。”王琨蒂说，“有些家长觉得今天不烧了，明天就不吃了，这个是不对的，这反而是在锻炼细菌的耐药能力呢！一定要在大夫的指导下用够量、用够疗程才行。”

“小孩用抗生素的时候，用量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计算，而不能大人自行推测。”韩彤妍强调，幼儿是按照公斤体重来计算药量，儿童也要根据年龄和体重的不同来计算药量。“实际上对于年龄偏大的孩子来说用药量相对偏小，越小的小孩用药量越偏大，跟成人比也是这样的。”不同的药分别有复杂而特殊的使用剂量要求，儿科医生在开药时需要全神贯注，他们的脑子里正在进行一个严格的计算过程。

“抗生素的一般给药方式是优先口服，能口服就不选择静脉注射。”韩彤妍说，“首先口服方便，尤其是大一些的孩子，能口服的剂型会很多。小一点的孩子可能因为不会吞咽，只能选择冲剂、分散片等有限的剂型。但如果只是普通的细菌感染，口服就足够了。静脉注射直接进入血液，能够让抗生素在体内迅速达到需要的血药浓度，效果一定是比口服要快，但静脉注射有可能引起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药都配备有皮试液，在打点滴时，家长、孩子和医生都承担很大的风险。“至于如何判断口服与输液的临界点，这是医生根据经验来做的个性化选择。”

家长对抗生素的抗拒常常来自两种恐慌——耐药性和副作用。几位医生都认为，不应该过分强调个体耐药性的问题。“我们所说的耐药菌株的产生，通常不是针对某一个人，使用了大量的抗生素而在体内

产生了自己的耐药菌株。”在宋红梅看来，耐药性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抗生素广泛使用后，耐药菌越来越多，会在人际间传播，并不一定会在抗生素使用者身上发病。“所谓的耐药，实际上它是整体环境的耐药，在自然界里广泛存在的细菌是耐药的。你感染的菌是耐药菌，并不是说你机体就是耐药的。”

抗生素的副作用也并没有想象中严重。孩子服用抗生素以后，经肾脏和肝脏代谢，只要不超过正常值，都不会有特别严重的副作用。王琨蒂告诉本刊：“退一步说，如果吃药对身体有影响的话，绝大多数也都是过性的，就是说你用药期间，可能会有反应，不用了，它就逐渐修复了。人的生命力其实非常强，你觉得小婴儿非常非常脆弱，但其实他们都是有很好的自我修复能力。”

每个家长看到孩子生病，都有比对自己本身更加强烈的意愿，希望孩子能迅速好起来，于是要不要去医院，就会是一个很纠结的选项：不去，怕万一有什么闪失；去了，大夫即使为了安抚你，也会开些鸡肋的药物，吃不吃，心里都不舒服。其实在儿科大夫眼里，在孩子有些发烧和轻微上呼吸道感染初期，家长完全可以通过在家里的精心看护渡过难关。

如果发烧了，家长并不必单纯因为温度太高而紧张。“温度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关键还是要看孩子的精神状态，先用退烧药再继续观察。”王琨蒂遇到烧了10分钟就来急诊的家长，来了做检查也没意义，因为血象反应没那么快。

“每个孩子对细菌感染或者病毒感染的致热反应不一样，有可能病毒感染导致高烧40摄氏度，但这孩子活蹦乱跳啥事都没有。也有脑炎患者体温只有38摄氏度的，因此不能单纯拿体温做依据。”在韩彤妍看来，“如果吃了退烧药体温降下来，孩子能吃能喝能睡能玩，或者只是一些轻微的咳嗽、流鼻涕的症状，不存在腹泻、呕吐等问题，一般都可以再继续观察——多喝水，吃清淡，三天还不见好再就诊也不迟。但如果是三个月龄以下的新生儿发烧就不能马虎，是要立即去医院的。”

而在宋红梅看来，家中只要常备退烧药就够了。“我经常跟家长说，发烧对孩子不一定是件坏事，像发烧、咳嗽，这都是我们机体保护性的生理反应，比方说发烧38摄氏度的时候，体内感染的细菌、病毒是不生长繁殖的，同时免疫力、细胞的吞噬功能又增强了。”她强调，“只不过别让发烧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实际上这跟抗生素的道理是一样的，关键在于怎么理性用好。”

0~3岁育儿 “适度清洁，吃了不生病”的科学依据

记者 吴丽玮

自然分娩、母乳喂养与不要过于“干净”的喂养环境，全是帮助一个婴儿建立自身微生物群的最好办法。

作为一个新手妈妈，要接受的第一个现实是，你刚出生的孩子仍然只是一个“半成品”。当你自顾自地做着鬼脸想逗他们开心一笑时，在宝宝视力仍未发育好的眼睛里，一个黑白色带着重影的圆形物体在来回晃动，令他们费解；他们正在妈妈怀里狼吞虎咽地吮吸着乳汁，却毫无征兆地突然从嘴里喷出一股奶流，是因为新生儿未发育好的胃是水平的，食物有时充溢过多，就可能冲破肌肉还在松弛状态的贲门，倒回食管和口腔之内；还有令众多家长头疼直至恐慌的睡眠问题，为什么小宝宝明明很困却不睡去，到最后焦躁地难以安抚，这种成人以为天然具备的自主入睡能力其实是需要后天学习的……

小“半成品”的肠道同样单薄。在这片尚未开发的荒芜之境里，从新生儿降生的一瞬间，细菌们便开始了一场跑马圈地式的竞赛，在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无数次的占山为王、血腥杀戮、部落崛起与衰落，甚至是绥靖和姑息，这里终于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群雄并起、和平共处的微生物局面，由此开始，人进入到生命中最强大的肠道功能时期。

自然分娩与阴道细菌

时间恰好是一年前。我在产房里送走了四个婴儿和他们的妈妈，终于迎来了助产士“你来得最早，生得最晚”的责备。我的分娩阵痛来得持久而和缓，从凌晨4点走进待产室，直到下午2点仍然没有满足生产的条件，医生于是开始为我静脉注射催产素，可是效果并不理想，一个小时之后又决定人工破水。我记得羊水流到脚趾时仍是热腾腾的。如果是有洁癖的人，临产前的折磨必定会因此多增加几分，但





母亲在怀孕时，体内的微生物就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

机出现，而是涉及几十种特定的微生物的特定转变。对数十位女性的研究表明，微生物组成变化的方向也是一致的。这个模式暗示着这些微生物要完成一些重大的事情，似乎它们是身体里为了促进怀孕和保证分娩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的一部分。”

在分娩过程中，孕妇阴道内的乳酸杆菌早已列队恭候多时。研究表明，在妊娠过程中，一种激素的转变引导孕妇阴道内表面细胞开始储存糖原。饱满的腊肠形状的乳酸杆菌最喜欢的食物就是它，通过将糖发酵为乳酸，乳酸杆菌开始在阴道内大量繁殖，很快便占据统治地位，将其他入侵者全部挤了出去。乳酸杆菌的茂盛生长大大降低了阴道内的pH值，阻断了很多潜在的细菌入侵风险，比如：可以防止肛门处的肠道细菌扩散到子宫，从而引起妊娠感染；也可以对抗通过性传播的淋病奈瑟菌和沙眼衣原体，这些微生物对穿过产道的新生儿可能造成伤害，严重时甚至会造成婴儿失明。

羊水的率先破裂将阴道内的一部分乳酸杆菌冲刷到肢体的其他部位，它们将成为婴儿降临人间后所接触到的第一外在环境。阵痛虽令人难以承受，但越痛便意味着产力增强，距离摆脱痛苦更近了一步。终于，助产士宣布我可以开始用力，在相隔几十秒的阵痛每一次来临时拼命用力，那种触不到边界的感觉让人非常不安，而在阵痛退去时，则放松喘气，为之后的新一轮蓄势。

0~3岁：身体建立微生物系统的关键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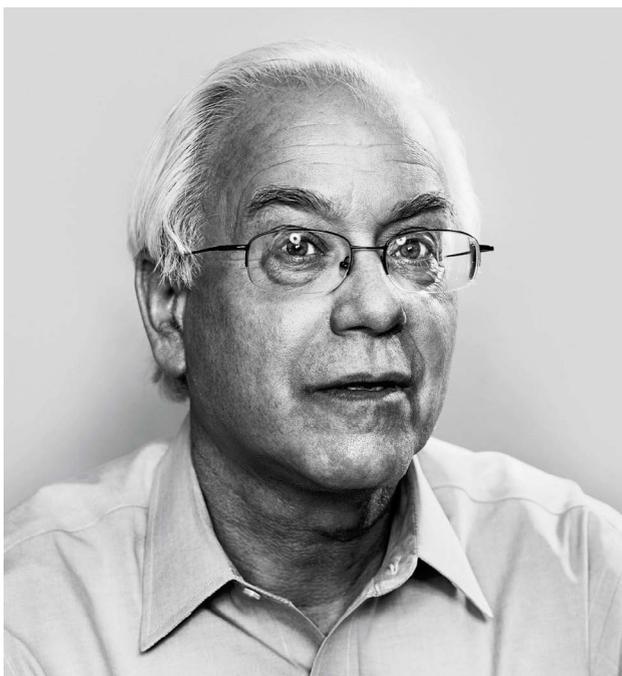
大多数宝宝都会在分娩前自动转动位置，保持头朝下的姿势，面对着妈妈的背部，这种姿势能最充分地贴合产道。助产士开始不断通报好消息：“看到头发了！”“看到肩膀了！”“马上就出来了！”从开始发力，到胎儿最后娩出，大约十几分钟时间，宝宝的胎头不断地沉降，柔软的身体在阴道内被紧紧包裹，并随着力量的起伏，每一寸肌肤都被有节奏地按摩着。在阴道内列队欢迎的乳酸杆菌，此时便随着每一次拥抱依附在婴儿的肌肤之上，他们吸入的第一口汁液中也必然包含了这些菌群。

闯进新生儿体内的微生物就像进入了天堂。没有胃酸，缺少胆汁，免疫系统尚待发育，阻挠细菌进入肠道的障碍相对成人少得可怜。乳酸杆菌顺利到达小肠曲折的迷宫内。美国作家杰西卡·斯奈德·萨克斯这样描述幽暗肠道中的繁茂：“那里有像丛林一

般的手指状延伸结构，被称为小肠绒毛……在某些部位，波状的小肠绒毛像是贫瘠的山坡，表面镶嵌着奇特的扁平并且有凹痕的细胞……这些扁平细胞表面的凹陷像口袋一样抓住经过的细菌。像旋转门一样，这些‘口袋’移动到细胞的内表面，将它们微生物乘客传递给下面的淋巴组织。”最终，经过考验的乳酸杆菌到达了大肠的沉淀池，在新生儿潮湿温暖、没有氧气又营养丰富的大肠内，率先闯入的乳酸杆菌和其他菌种占据着有利地形，开始贪婪地繁育和蔓延，很快，大肠就将成为人体内参差多态的微生物热带雨林地带。

乳酸杆菌是进入婴儿肠道内的第一批住户，它和其他稍后到来的有益细菌，在婴儿体内开启了一个动态过程，为后续微生物的到来搭建好了舞台。在未来的三年，孩子会自发形成一个可以支持生命的微生物系统，复杂性与一个成人体内的群系不相上下。而首批来自母亲身体的微生物，将奠定孩子区分不同种类微生物分子结构的“口味”，它们不但先入为主地大量繁殖，不给有害细菌兴风作浪的空间，同时将帮助肠道内免疫系统的发育，教会免疫系统如何去识别危险，从而保护孩子。

而剖宫产的过程中，孩子从子宫内被直接取出，



没有通过产道，便难以获得乳酸杆菌。马丁·布莱泽的妻子格洛丽娅曾在委内瑞拉的亚马孙纳斯州首府阿亚库乔港进行营养与微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在当地医院的妇产科对自然分娩的婴儿和剖宫产生出的婴儿进行微生物采样。共有9位年龄从21岁到33岁不等的孕妇与她们的10个新生儿参与了这项调查，其中4位是自然分娩，另外5位是剖宫产。

格洛丽娅对每位母亲的皮肤、口腔、阴道微生物在分娩前1小时进行了取样，通过DNA测序，她发现不同女性的同样身体位点上有着大体相当的主要细菌种类和组成。在婴儿出生之后的15分钟内，她也对每个婴儿的皮肤、口腔、鼻子进行了采样，24小时后她还收集了他们的第一次胎便。最后的结果确实不同，自然分娩的母亲流出的羊水会冲刷着她们的皮肤，使得孩子降生的环境里满是乳酸杆菌，自然分娩出生的婴儿，其口腔、皮肤、胎便里充满了母亲的阴道细菌，包括乳酸杆菌、普雷沃斯菌、纤毛菌属。剖宫产出生的婴儿身上的细菌群系则以葡萄球菌、白喉棒状杆菌、丙酸杆菌为主。“换句话说，后者身上的奠基微生物与母亲阴道内的微生物毫无关系。无论是在口腔、皮肤还是肠道里，他们身上的奠基微生物都更像是护士及医生皮肤上、医院床单上或者外科手术室空气里的细菌……剖宫产出生的婴儿最开始获得的并非那些在数十万年甚至更久的人类演化中选择出来的微生物。”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微生物科学系教授赵立平告诉本刊，在未来5~10年内，应该采取措施，让孕妇阴道菌群检查成为产科大夫在产检时的一项必要的任务。“瑞士的产科医生很多年前就意识到，剖宫产的孩子可能会和自然分娩的孩子在微生物的获得上有所差别。医生要拿纱布在剖宫产的产妇阴道里抹一下，再把这些分泌物抹在新生儿的嘴里。但是这种做法显然太粗放了，如果产妇有阴道炎，这么做反而是害了孩子。孕妇阴道菌群是否健康、能否借助别人的阴道菌群为自己的孩子所用，这些未来都值得妇产科医生进行探索。”

新生儿体内微生物的建立是一个随机过程，存在很大的偶然性，最初获得的菌种数量占体内总量的比例并不高，但毫无疑问，最重要的一些有益细菌是通过母亲给予的。除了自然分娩获得的阴道细菌，新生儿也吃进去母亲皮肤上寄生的大量细菌。医院出于对母乳喂养的提倡，会在分娩结束后半小时之内，让新生儿趴在母亲的胸前寻找乳头吸奶，



左图：婴儿通过母乳喂养不但获得营养，也将乳汁中的双歧杆菌等微生物吸收进自己体内

右图：一位妈妈在为自己的宝宝精心挑选辅食成品

以此促进初乳的分泌。

在经过十数小时漫长而痛苦的折磨之后，疲惫不堪的母亲拿汗湿的手掌摩挲着孩子湿漉漉的胎发和因长久泡在羊水中而颜色苍白的手指，腹部和乳房周围的细菌也在孩子本能的吮吸中被吞进了肚子。迎接宝宝们来到这个光怪陆离的新世界的不仅是妈妈温柔的怀抱，还有与他们将相伴终生的细菌君们。

认识母乳中的微生物

如果你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未能实现自然分娩，孩子体内微生物的建立也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差异巨大。大约在出生三个月后，孩子体内的微生物数量和规模就逐渐抹去了分娩方式造成的影响，这种较为类似的体内菌群主要来自母乳喂养的功劳。

自然分娩和母乳喂养是妇产科对孕妇宣导的两大任务。如果自然分娩只需让产妇坚定信心，等待时机成熟顺势发生的话，实现母乳喂养对新妈妈的



要求就要高得多。

除了尽早让孩子吮吸，促进乳汁分泌之外，医生会提醒产妇，在产后的前三天，要保持两到三个小时喂一次奶的节奏。当我在深夜极度疲倦时，甚至还有好心的护士过来将我拍醒，提醒我该给孩子喂奶了，如果觉得横抱着喂奶很累，还可以侧躺着喂，她会帮我把孩子的头摆正，以使孩子可以更有效地吮吸。

大多数产妇会在两三天后，感受到乳房充盈大量乳汁的鼓胀感。第一口母乳叫作初乳，医院会特别向孕妇强调初乳的重要性，就算你无法纯母乳喂养，至少要让孩子吃到初乳，这是底线，仿佛这一口能决定一个孩子的命运。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张玉梅告诉本刊，对于初乳的定义尽管并不完全一致，但都认为是泌乳后的前几天。有人认为是泌乳后0~4天的乳汁，也有人认为是泌乳后0~7天。“初乳从颜色上就与之后的乳汁明显不同，初乳是黄色的，之后就会变成白色，初乳的营养比之后的乳汁更为丰富，里面的蛋白质含量和脂

肪含量都特别高，所包含的抗体、免疫活性因子、多胺、溶菌酶和低聚糖更加丰富，其中所含的微生物也可以传递给婴儿。”

关于母乳中微生物成分的研究历史其实非常短暂。张玉梅告诉本刊，直到2003年，世界上才有第一个关于母乳中存在微生物的研究发现。“之前人们都认为母乳本身是没有微生物的，母乳中的微生物来自外界环境，比如哺乳母亲的皮肤、婴儿口腔内的微生物和产妇的肠道和阴道内的微生物。这一发现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对微生物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人们这才知道，原来对母乳进行加热灭菌是万万不可取的。

随着关于母乳中微生物和低聚糖的研究逐渐深入，研究者们发现这些成分是如此机巧。

张玉梅作为合作负责人在2011~2012年主持开始针对我国孕妇、乳母及婴幼儿进行一项名为“明研究”的营养健康调查，在研究母乳喂养情况时，选择了北京、苏州和广州三个城市进行样本分析。在这份



(黄宇摄)



(黄宇摄)

左图：北京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张玉梅

右图：北京崔玉涛育学园儿科诊所院长崔玉涛

研究报告中，首先研究了中国妈妈母乳中的微生物成分，除了双歧杆菌、乳酸杆菌这两种已经明确的益生菌之外，母乳中还包括链球菌、葡萄球菌、绿脓杆菌和棒状杆菌等，“但现在采用的宏基因组的一种检测方法仍不能精确到种，具体的数量还不确定”。

现已知母乳中最主要的细菌成分是双歧杆菌，它是健康婴儿体内的另外一种重要细菌。这种短粗、成叉状的微生物在怀孕第八个月后，开始神秘地聚集在孕妇膨胀乳房的乳头内部及周围。双歧杆菌是一种厌氧菌，出现在皮肤上或者随着头几滴初乳流泻出来，很快便在空气中死掉。

它匪夷所思的会聚和英勇就义其实饱含深意，因为双歧杆菌分泌着一种酸和抗菌化学物质的混合物，它能够有效抵御一些具有潜在威胁的微生物，比如能使婴儿一个微小的伤口造成感染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双歧杆菌留下的酸性物质可以在乳房和婴

儿口中保留数小时，它们将会帮助婴儿选择口腔中第一批定居者。

母乳中的其他成分，也在为双歧杆菌获得先行优势铺平道路。比如母乳中含有婴儿不能直接利用的寡糖类物质，却可以被双歧杆菌加以利用；母乳中也包含尿素，它本身是对婴儿有毒的，但是同样可以用于筛选双歧杆菌等特定细菌，这些细菌能利用尿素作为氮源合成自己的蛋白质，而不必直接与婴儿竞争氮源。

而对母乳中低聚糖的认识则因为微生物的发现成为另一个研究重点。低聚糖是由少数单糖连接而成的产物，因为聚合程度低，所以叫作低聚糖。低聚糖往往是不能被消化吸收的种类，因此可以完整地通过胃和小肠，直达大肠。大肠里的细菌很容易地分解利用低聚糖，可以说，低聚糖是细菌的食物，每一种细菌对不同的低聚糖都有各自的偏好。

“1950年代，学界已经发现了母乳中有低聚糖的成分存在，但没有人会检测其结构如何，这篇论文被搁置了半个世纪。等到人们终于认识了母乳中的微生物，这才明白低聚糖可以作为微生物的培养基，为其提供营养成分，于是人们才想到50年代的那篇论文，终于意识到母乳中的低聚糖是特别值得研究的。现在有了很好的分析化学检测技术，对低聚糖的研究就可以深入得多，包括加州大学在内的国际上的一些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对低聚糖的结构、与微生物作用的具体机制、哪种低聚糖可以促进哪种微生物的生产等问题进行解码。”张玉梅说。

“肠道中的微生物‘吃饭’很讲究，非常注重食物的多样性。母乳中低聚糖是婴儿出生后肠道微生物的‘大餐’，有200多种可供选择。‘明研究’首次报告了中国母乳中的10种低聚糖，发现有些低聚糖跟肠道中的双歧杆菌等微生物菌群建立、增长规律相同。”张玉梅说。

“但我们现在对微生物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也许今天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在未来很有可能会被推翻。现在的研究印证了母乳喂养的好处，就像是一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女，我们现在只看到了眼睛，还不知道她的脸蛋究竟长什么样。”张玉梅说，在与研究同时进步的是我国母乳喂养比例的大幅增长，“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让坏事变好事，从那之后出于安全性考虑，母乳喂养的人越来越多了。”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6个月内婴儿纯母乳喂养率仅为27.6%，而到了2013年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时，我们6个月内婴儿纯母乳喂养率就已上升至58.5%。

对母乳中微生物的研究也推动了益生菌市场的红火。北京崔玉涛育学园儿科诊所院长崔玉涛向本刊分析说，益生菌的走红正是与国家对于母乳的提倡密不可分。“既然母乳中的微生物成分好，奶粉又替代不了母乳，所以就有了针对儿童体内微生物群开发的益生菌药物。”

目前国家卫计委规定的包括奶粉在内的婴儿食品中，只有9株益生菌可以进行添加。虽然确认菌株已证实能促进婴幼儿健康，但对母乳中细菌具体成分的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婴幼儿配方奶粉在这一方面无论怎样都与母乳有巨大差距。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义益生菌为，摄入一定数量，对宿主健康产生有益作用的活的微生物制剂，很多家长都把益生菌当作日常保健

品给孩子长期服用，但赵立平强调说，儿童对益生菌的服用应该非常谨慎。他认为在选择益生菌产品时要注意两个问题：首先是如何来确定孩子体内缺乏某一种有益细菌，其次是益生菌厂商究竟做过哪些实验，证明产品中的微生物菌种对孩子身体有好处。如果盲目引入一个外来菌种，孩子肠道功能尚未建立，难保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孩子不应该生活在“无菌”环境

在“明研究”中曾经针对皮肤消毒后的母乳中微生物成分进行研究，发现拿消毒湿巾或其他消毒方式擦拭乳房之后，母乳中的微生物种类和数量均低于没有在外围进行消毒的母乳中含量。其中几种不动杆菌减少最多，在非消毒中占32%，在消毒组中锐减到1.8%，这类细菌是附着在乳房周围皮肤上的母乳喂养微生物。另外双歧杆菌、链球菌的数量也都大幅下降。

“我们认为不应该使用消毒制剂打破乳房周围的生态平衡，只要用热毛巾擦拭即可。”张玉梅说，“我自己对于人体微生物的认识，就是不要故意地采用手段去改变什么。生长环境不是越消毒越好，与1岁的伦敦孩子相比，6个月大的巴勒斯坦贫民窟里的孩子体内肠道拥有同样丰富的微生物群落，所以发达地区的孩子并不一定比落后地区的孩子在微生物获取上占有优势。”

崔玉涛也对消毒剂强烈地抵制。“曾经有一个13个月的男孩来我这里看病，除了母乳之外，这个孩子吃什么都没法消化，后来一检查，肠道内居然非常干净，没有一点细菌。后来跟他的家人聊才知道，原来他们家有一个非常爱清洁的姥姥，每天要用消毒剂把孩子的玩具、地垫全部擦一遍，爸爸妈妈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机交给姥姥拿消毒湿巾做清洁。可是这些消毒剂成分在水分挥发后会附着在物体表面，在孩子触手可及的地方全都是，很容易就吃进嘴里，这些成分对体内微生物的杀伤力是相当惊人的。”崔玉涛说。

但消毒剂在有孩子的家庭里使用得非常普遍。有的妈妈拿消毒湿巾给宝宝擦屁股，有的出门时洗手不便就拿消毒湿巾擦手替代，还有的家长为了鼓励孩子多在地上爬，每天拿清洁剂擦拭地面……我们所有做的这些初衷是为了保护孩子的行为，实际上竟然伤害了他们。

“很多人都搞错了清洁和无菌的区别。”崔玉涛说，“就拿我们的餐具来说，只要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做到无菌并无益处。一把清洁的勺子上沾有正常数量的细菌，在吃饭的时候它们被咽进了肚子。这些需氧菌进入肠道内厌氧菌的天下，却可以消耗掉人不可避免地吞进去的一些空气，反倒是给肠道的厌氧菌创造了更好的环境，无菌的勺子又有什么好处呢？”

20世纪80年代，在北美和欧洲，湿疹、食物过敏、花粉症、哮喘等已经成为儿童最常见的慢性病。1989年，对此进行研究的英国流行病学家斯特罗恩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报告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家庭人口数的减少、家庭设施的改善、个人卫生水平的提高，已经减少了年轻家庭交叉感染的机会。这可能会导致遗传性过敏症状更广泛的临床表现，并且在富有的人群中更早出现。”他的报告被记者们称为“卫生假说”，因为他在报告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对电视里那些无瑕简洁的家庭生活场景的反感，这一点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9年，挪威研究人员为“卫生假说”增加了新的论据，出生在大家庭的孩子，大部分的过敏保护是由哥哥，而不是姐姐传下来的。而人们普遍认为，兄弟之间一定比姐妹之间更容易感染细菌，可见细菌传播与过敏保护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与此同

时，免疫学家提出，幼儿在早期没有接触过感染源，他们的免疫系统就很有可能停留在婴儿早期的Th2型阶段，Th2细胞本应该在生命周期的数月后逐渐回归正常水平。但在过敏儿童中，Th2细胞及其相关细胞因子会维持在一个不正常的高水平上，直至成年。大量活跃的Th2细胞会发挥驱动炎症反应、液体释放及肌肉痉挛（过敏和哮喘时出现）的作用。而亚利桑那大学的一项也表明，在随访的1000多名20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儿童直至13岁时，早期接触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可以增强对于哮喘的预防能力，这些接触来自哥哥姐姐，或者是托儿所同学。

“不让孩子接触尽可能多的微生物，包括可能有一定危险性的微生物，就像给孩子的免疫系统少上了一门课，或者从未跟坏人交过手，让免疫系统失去了对微生物必要的识别和耐受机会。很多条件致病菌不达到一定数量是不会对人体造成威胁的，必要的暴露可以让免疫系统对细菌熟悉起来，没有达到一定的危险等级，免疫系统不会做出不必要的反应。可如果没有这样的接触机会，免疫系统很可能会过度反应，而微生物表面的抗原很可能和细胞表面的抗原类型相似，免疫系统在攻击细菌的同时，也会同样伤到自己。”赵立平说。

我们的育儿焦虑可能是在听说奶瓶消毒不彻底

《读书》2017年第三期目录

- | | |
|---|---|
| 王洪喆 阿连德的大数据乌托邦 | 乌·额·宝力格 “实际存在的”与“存 |
| 岳永逸 天眼、日常生活与街头巷尾 | 在主义的”蒙古史 |
| 张伟然 长水泽后学 | |
| 赵京华 那被遗忘的一代学人 | 品 书 录 |
| | 天真的海外来客（顾明栋）·我们生活的时代的剧场（李黎媛）·茨威格的欧洲（陈甜） |
| 短 长 书 | |
| 狮子、医生与建筑师（杨鹏）·清朝官员的“反行为”（高王凌）·学者的本分（胡成） | 白 龙 托克维尔的“杰克逊之问” |
| | 郑 戈 梦碎时分，以笔为马 |
| 张宝明 “大丈夫”：“真小人”还是“伪君子”？ | 孟 晖 托普卡比宫的摄里白 |
| 沈 洁 后五四时代一个小镇青年的阅读档案 | 李 俊 柏拉图与外星人 |
| | 吴增定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
| 徐国琦 中美“共有历史”中的蒲安臣 著译者言 | 蔡 琳 司法的救赎？ |
| | 赵 川 边境的声音，越境的身影 |
| 马华灵 伯林致雅法书信 | 读 书 短 札 |
| 施 展 大宋的幽云十六州 | 书空（刘涛） |



《读书》丰富生活，生活需要读书。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会使孩子生病时产生的。在每次使用完奶瓶后，要拿奶瓶刷彻底清洗，直至“奶瓶表面覆着一层均匀的水膜”时才算清洗干净，清洗之后要在蒸锅里进行消毒，即便是蒸锅本身有烘干功能，烘干之后也要打开盖子通风晾凉，3小时内不使用的需要重新消毒，切记不要把奶瓶捂在蒸锅闷热的蒸汽里，对于体内微生物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幼儿，这么做很可能引起鹅口疮或者腹泻。但这种极为细致的指南，带来的反而可能是负面作用。如今有多少家长都是在类似这样的科学育儿指南之下被挑动了敏感的神经，于是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在崔玉涛看来，消毒剂的概念是因“非典”而起，被国内家长不加辨识地盲目接受了。

崔玉涛说：“有些育儿方式发生了变化，的确是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比如以前孩子最早添加的辅食是蛋黄，但是现在是高铁米粉。因为以前制作辅食的工具没有现在这么先进，蛋黄是最容易制作的。但还有很多的育儿观念都是被创造的新消费绑架了的。从什么时候开始，香皂也分大人用和小孩用的了，它们在成分上会有差别吗？”

张玉梅也同样认为我们的育儿观念应该回归传统。“明研究”里有一项是对0~3岁儿童营养的调查，恰好可以和美国的FITS调查进行横向比较。在辅食添加上，中国孩子的食物丰富性和质量不如美国孩子，但中国孩子在两岁前不喝含糖的饮料，美国却很普遍。此外中国孩子吃的最多的蔬菜是大白菜和胡萝卜，美国孩子蔬菜食用排在第一名的是薯条。

张玉梅曾带着美国FITS项目的教授到北京做家访。“那个教授一开始认为中国孩子一定没有美国孩子吃得好，美国有很丰富的辅食成品，这个中国是比不了的。我带他去一个14个月大孩子的家，姥姥正在给孩子做晚饭，在白粥里加了肉泥，一起煮好，最后再撒上菜末滚开。美国教授特别惊讶，他以为中国人自己给孩子做饭质量很差，没想到中国的姥姥竟然做得这么好。这些都是很传统的东西，包括现在对母乳中微生物的研究，虽然我们还有很多尚未解答的问题，但你会越来越发现，那些经过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育儿方式既然能够历经时间的考验，绝对是比较完美的。”

（参考书目：《致命伴侣：在细菌的世界里求生》，杰西卡·斯奈德·萨克斯著；《消失的微生物：滥用抗生素引发的健康危机》，马丁·布莱泽著。实习记者周缘对本文亦有贡献）

怎么给宝宝补充益生菌

文 / 周缘

益生菌从哪里来？

新生儿的益生菌主要来自母亲的产道，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益生菌对身体健康有重要的作用。出生以后，母乳中含有大量好的、活的益生菌，消化分解食物并产生益生菌是肠道与生俱来的功能。一个足月的、顺产的、母乳喂养的健康宝宝一般不会缺乏益生菌。对剖宫产出生、奶粉喂养的孩子来说，肠道菌群建立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了。

哪些宝宝需要补充益生菌？

如果孩子出现了腹泻、便秘等菌群失去平衡的情况或长时间服用抗生素，可以适当补充益生菌，但它不能取代药物治疗，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只要孩子健康，即使是剖宫产出生或是人工喂养，额外摄入专门的益生菌制剂并不是必需的。不过也不必担心长期服用益生菌会产生依赖性副作用，这种说法目前尚无科学依据。

如何给宝宝挑选益生菌？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对益生菌的定义是：益生菌是活的微生物，当摄入足够量时，对宿主健康有益。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包括含益生菌的酸奶、酸奶酪、酸豆奶以及口服液、片剂、胶囊、粉末等。规范的益生菌保健品应在包装的配方中标明益生菌活菌数量及其属名、种名和株系名称。

2016年6月，国家卫计委发布了一个新的公告，将我国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益生菌扩展到7个菌种的9支菌株。其中嗜酸乳杆菌NCFM仅限于1岁以上幼儿的食品，其他适用于0~36个月的婴幼儿。市面上很多益生菌产品适用于成人，为婴儿挑选时需注意其中含有的菌株及其功效。

益生菌和益生元有什么区别？

益生元主要是一种低聚糖类的物质，通俗地说它们就是益生菌的食物。在通过肠道时，它们大部分不会被消化，而是被益生菌吸收，因此能够促进益生菌的增殖，以间接地改善肠道平衡。益生元不是活性物质，所以和益生菌比起来，它们不存在是否存活的问题，更易保存，且不会使人体产生免疫反应。



微生物决定你的未来

记者 曹玲

那些遍布人体不起眼的小小细菌，竟然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了我们的生活。

2005年夏天，艾伦娜·柯林（Alanna Collen）从森林里走出来，肩上的布袋里装了20只蝙蝠，各式各样的昆虫扑向她前额的探照灯，她感到脚踝附近痒痒的。当时她是一名生物系学生，报名成为英国蝙蝠科学家的野外调查助理。

回到营地后，她发现让她发痒的不是水蛭，而

是虱子。50来只虱子有些钻进了她的肌肉，有些还在腿上缓慢爬行。数月后她回到伦敦，身体感到坚硬，脚趾骨肿胀，奇怪的症状短暂发生又结束，反反复复很多年。直到后来她终于被确诊，进行了一场漫长又密集的治疗，用了“足以治愈一群牛的抗生素”。抗生素发挥了神奇的功效，她恢复了健康。

但故事远没有结束。艾伦娜饱受新的症状折磨：破皮，消化系统异常，容易感染。她怀疑抗生素疗程不仅消灭了让她生病的细菌，也消灭了那些原本就居住在她体内的细菌。治疗后，她的身体似乎成为一个不适合细菌居住的地方。

如今，她是一名演化生物学家，也是一名作家。



左图：一名妇女在悉尼 woolworths 超市选购酸奶。酸奶中富含有益菌，能调节人体内微生物的平衡

右图：在法国尼奥尔儿童和青少年肥胖护理治疗中心接受治疗的儿童。研究显示，肠道菌群失调与肥胖及肥胖相关疾病有关

为了更好地了解那些多达上百兆、以她身体为家的友善小生物，她写了一本名为《我们只有 10% 是人类》的书，介绍人和细菌的关系。

“我们只有 10% 是人类”是近些年学术界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意思是每 10 个构成人体的细胞中，就有九个是搭便车的冒充者：细菌。你的身体不仅是由血和肉、肌肉和骨头、大脑和皮肤组成，还有遍布人体的细菌。我们的肠道如同长满珊瑚礁的崎岖海床，大约有 4000 种不同品种的细菌居住在长达 1.5 米的褶皱中。在人的一生中，曾经在体内居住过的细菌加起来和 5 头非洲象一样重。

针对人体微生物，尤其是肠道菌群的研究越来越多，知识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累积，人体微生物已经成为热门话题，攻占了顶尖学术期刊《科学》《自然》《细胞》等杂志的无数版面。人们发现，这些小小的寄生者不仅是我们的好伙伴，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也和它们息息相关。科学家认为，肠道细菌能影响健康，导致肥胖、糖尿病、过敏等疾病，还会影响你的情绪和行为，就连自闭症、阿尔茨海默症也可能和细菌有关系。

《我们只有 10% 是人类》一书的扉页上印着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的一句话：“科学的中心思想就是，从两个看似相当矛盾的看法中找到不可或缺的平衡点，接纳新思维，不管它们是多么离奇古怪或者违背直觉，然后无情地怀疑、审视所有的想法，不论新旧。这就是在荒谬中找到真理的方法。”

让你胖还是让你瘦？

瑞典是一个苗条的国家，但是瑞典人贝克赫德（Fredrik Backhed）却对肥胖症研究功不可没，不少人认为他足以赢得诺贝尔医学奖。他是哥德堡大学的微生物学教授，曾经培养出完全无菌的小鼠。这些小鼠像白纸一样，不携带任何细菌，具有繁殖能力。培养这种小鼠的目的是让研究人员可以在它们身上随意植入细菌，供实验使用。

这些小鼠经由人工剖腹产的方式被取出后，直接送入无菌箱，无菌箱则放置于另一个无菌空间中。这些小鼠就像生活在一个气泡里，因此也被称为泡泡鼠。泡泡鼠只能摄入经过高温高压消毒杀菌的食

左图：瑞典哥德堡大学的微生物学教授贝克赫德对肥胖症研究功不可没

右图：罗布·奈特是《Follow Your Gut》一书的作者，也是美国肠道计划和地球微生物群计划的共同创办人



物，由于缺乏与其他细菌的互相竞争，这些小动物的免疫系统无法获得健康发展，导致它们的心跳微弱，肠壁也只有薄薄一层，不足以抵挡致病菌的攻击。

2004年，贝克赫德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杰瑞弗·戈登（Jeffrey Gordon）的实验室工作，戈登是最先投入菌群研究的先驱之一，很多人认为他日后也是诺奖的不二人选。贝克赫德不知道为什么无菌小鼠特别瘦，他们比较了无菌小鼠和正常小鼠，发现和体重正常的同类相比，无菌小鼠的皮下脂肪少了42%，尽管它们多吃了将近三分之一的无菌饲料。

贝克赫德开始思考，这是不是因为无菌小鼠体内缺乏肠道细菌造成的。因为之前还没有人做过“细菌对动物代谢的影响”这种最基本的研究，所以他的第一个问题非常简单：肠道菌群会让小鼠的体重增加吗？

为了找出答案，他先将一些无菌小鼠养大，然后将普通小鼠盲肠里的物质取出，点在无菌小鼠的毛发上，一旦它们舔舐自己的毛发，肠道就会接受一组细菌。特别的事情发生了，无菌小鼠的体重在14天内增加了60%，而且它们比之前吃得更少。

以往人们知道，肠道中的细菌会帮助分解难以消化的食物，但是没有人调查过消化对能量摄取有多大影响。如果细菌能帮小鼠从食物中摄取更多的能量，小鼠就可以依靠少量食物生存。

戈登实验室的另一位成员莱伊（Ruth Ley）怀疑，肥胖动物体内的细菌是否和苗条动物不同。她

用一种天生肥胖的小鼠做实验，这种叫“ob/ob”的小鼠体重是正常小鼠的3倍，看起来就像是一颗球，而且会不停地吃。ob/ob小鼠体内有一个DNA序列发生突变，让它们的身体停止制造瘦素。瘦素是一种能够抑制人类和小鼠食欲的激素，虽然小鼠的身体已经储存了足够的脂肪，但是缺乏瘦素，大脑不知道它已经吃饱了，最终变成了永远吃不饱的胖子。

莱伊发现，这两种不同小鼠体内有两组主要菌群：拟杆菌和厚壁菌。但是肥胖小鼠肠道的拟杆菌数量只有苗条小鼠的一半，不足的部分全部由厚壁菌补上。莱伊研究了肥胖人群和苗条人群肠道内的菌群，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只是不知道如此不同是造成肥胖的原因，还是肥胖造成的结果。

戈登实验室还有一名成员特恩伯（Peter Turnbaugh），他把肥胖小鼠和苗条小鼠身上的细菌分别移植给无菌小鼠，然后给这两组小鼠同样的食物。14天后，带有肥胖小鼠菌群的无菌小鼠变得肥胖，带有苗条小鼠菌群的无菌小鼠并没有那么胖。特恩伯和他的合作者意识到，这项实验可能会有疗效和获利潜力，于是以细菌移植治疗肥胖的概念申请了专利。

这些细菌到底在小鼠体内做了什么呢？特恩伯计算，有肥胖菌群的小鼠从食物中获取的热量比苗条小鼠多2%。这个数字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累积起来可不少。以一位身高1.62米、体重62公斤的女性为例，她每天吃2000卡路里食物，身上有肥胖菌群，每天多吸收40大卡的热量，如果没有将这些

热量消耗掉，每天多出来的40大卡热量理论上一年能转化成1.9公斤体重，10年就是19公斤。

这个实验让科学家意识到，通常的标准热量转换表计算的卡路里并不准确。酸奶对一个拥有健康体重的人来说或许是137大卡，但是对于体重过重的人，或者拥有不同肠道细菌组合的人来说或许是140大卡。“虽然差别微小，但是它会累积。你的细菌为了你的利益从食物中吸收能量，至于能从食物中吸收多少卡路里，是由你的细菌而不是标准热量转换表决定的。”贝克赫德说。

贝克赫德猜测，我们体内细菌工厂的组成可以决定我们从食物中吸收的养分。“如果一位素食者打算开荤，他体内大概也没有足够的氨基酸细菌来消化肉类。一个很少吃脂肪的人，体内专门分解脂肪的细菌就会比较少，甜甜圈经过肠道时就不会被有效地分解；而那些每天固定喝下午茶的人，体内就会有较多喜欢脂肪的细菌，等着分解下一个进入大肠的甜甜圈，并从中吸收大量的热量。”

除此之外，他们的研究还发现，除了我们的身体之外，细菌也有控制我们基因的权利。菌群的不同成员可以促使基因运作，鼓励我们的脂肪细胞储存热量。这样做对细菌有好处，因为它们寄生在人类身上，和人类一样也要过冬。“肥胖菌群让这些基因运作，强迫它们将多余的能量转化为脂肪储存下来。或许对努力维持体重的人来说，这是一件恼人的事情，但是这项基因控制对人类是有益的，良好的消化能力让人类充分利用食物、储存能量，以应付将来可能出现食物缺乏的情况，这么一来，人类就能顺利将基因传承给下一代，包括那些寄生在他们身上的细菌。”贝克赫德认为。

然而，在如今这个高热量食物取之不竭的年代，那些保障生命延续的东西反而会让人致命。长期储存在皮下的能量会导致发胖，让代谢作用彻底失去秩序，并且引发代谢疾病，比如糖尿病。

肠道菌群间接引发糖尿病的途径有两种。一种理论认为，各种微生物代谢所产生的短链脂肪酸会适时提醒身体抓紧机会储备能量。然而，当储存量累积得越多，许多人对胰岛素的反应会逐渐减缓，进而丧失身体细胞吸收糖分的能力，直到最后再也无法发挥作用时，就会出现糖尿病的症状。

另一种理论认为，富含脂肪的饮食会让肠道上细胞门户大开。肠道上皮细胞原本是负责阻挡细菌和它们的代谢产物进入人体的屏障，一旦失守，就

等于让各种化合物和细菌分泌的内毒素随意入侵。人体的免疫系统接触到陌生物质会进入警戒状态，在身体各组织引起轻微发炎，最终成为胰岛素的抗体。而且一旦身体出现糖尿病的症状，寄生在人体的细菌也会受到波及，甚至会引发难以治疗的皮肤病变。

那么，究竟能否设计出一种微生物群落，让人或者小鼠变瘦？有一些研究报告，如果用抗生素消除在高脂饮食中会增生的细菌，那么小鼠即便吃得不健康，还是能够成功地瘦下来。2011年，哈佛大学的研究者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他们发现有些食物和体重增加有关，有些食物和体重减少有关。奇怪的是，酸奶和坚果这两种食物和体重减少有关，但两者脂肪含量都颇高。这可能和微生物有关。小鼠实验得知，特定的微生物或是特定的微生物组合，和体重的增加或减少有关。那么特定的食物和微生物的关系，能否让我们更苗条呢？

贝克赫德说，暂时还没有办法，这是很多研究者的目标。现在许多流行的饮食方法的目标是要改善人类的微生物群，但是证据指出，这些方法效果有限。我们对于特定微生物影响消化吸收的方式所知甚少，尚不足以设计出准确的介入方式。

从这一点来说，目前的研究还是苍白的。很多研究人员提醒人们善待自己的微生物好友。只是这些朋友究竟是谁？又该怎样对它们友好？科学家也给不出答案。他们可以确定的只有一件事：多数过胖的人肠道里的微生物多样性都相当匮乏。“人类的生态系统需要大量而且多样的菌种来维持健康，一旦微生物消失，这个系统就会失去平衡。增加肠道内菌群多样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饮食，只要食物种类多样而且富含食物纤维，就距离专业期刊里学者专家呼吁的‘对你的微生物朋友好一点’的诉求不远了。”

如果有天晚上你打开冰箱，你或许应该想到，你不是一个人吃饭，你体内的微生物也要吃得好一点。

让你更开心？

加州理工大学药学系教授马克·莱特(mark lyte)在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委员们作报告时，台下摇头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一位差点摇断了脖子，

还有一位喝了一口水又忍不住从鼻孔喷了出来，他们实在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报告。

莱特提出的命题是，人体的肠道菌群不只有助于消化，同时也是独立运作的器官，可能会引起腹泻，甚至是心理或精神疾病。

前些年，莱特还只是少数几个支持这项命题的科学家之一。和同事交谈时，他常会陷入辞不达意的困境。当时的报社记者也很难说服编辑注意这个难以想象的议题。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了莱特的想法是对的。“肠道菌群的改变会影响大脑功能”“幸福的秘密藏在酸奶里吗？”这样的标题攻占了媒体版面，那位从鼻孔喷水的同事一定很感激莱特没有将他的名字公之于众。

如今，这样的研究越来越多。科学家把小鼠的肠道菌群移植到其他小鼠体内，观察能否改变小鼠的性格。2011年，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给小鼠使用抗生素会改变它们的肠道微生物系统，使它们在探索新环境时变得不那么焦虑。于是他们想，能否通过移植焦虑小鼠肠道内的微生物，将焦虑转移到优哉小鼠身上？

当然，小鼠无法回答关于个性分析的问卷调查，不过不同品种的小鼠有着不同的行为和个性。有一种实验鼠品种BALB，个性非常害羞且犹豫不决，与自信且合群的瑞士小鼠大相径庭，这两种小鼠非常适合于交换性格的实验。研究人员在这两种不同品种的小鼠身上注入对方的细菌，并且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他们将小鼠放在平台上，计算它们花多长时间才能鼓起勇气跳下来。勇敢的瑞士小鼠接受了焦虑小鼠的细菌后，花了比原来多三倍的时间才跳下来。同样，紧张的BALB小鼠在移植了瑞士小鼠的细菌后变得较为勇敢，跳下来所花的时间也比之前短。

同年，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微生物学家斯文·彼得森（Sven Pettersson）发现，无菌小鼠焦虑的情况比正常小鼠严重。他把正常小鼠的细菌转移到刚出生几天的无菌小鼠中，这些小鼠表现出正常小鼠的行为；但是如果小鼠长到几周大之后才对它们移植细菌，这些小鼠依然焦虑如无菌小鼠。他认为，至少微生物对年幼小鼠行为的影响是无法转变的。

自闭症也是研究的一个热点。数十年来，医生、家长和研究人员已经注意到，大约四分之三的自闭症患者同时伴有某些胃肠功能异常，如消化问题、

食物过敏或麸质过敏。这一发现促使科学家们检验肠道微生物与自闭症之间的潜在联系，一些研究指出，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和正常兄弟姐妹之间肠道微生物菌群有差异。

萨基斯·马兹曼尼亚（Sarkis Mazmanian）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微生物学教授，因其在肠道菌群方面出色的工作，于2012年获得了麦克阿瑟奖。他研究出一种微生物疗法，能改善小鼠类似自闭症的症状。

他把双链RNA注射到怀孕的小鼠体内，对于小鼠的免疫系统来说，这些RNA看起来像是病毒，因此免疫系统会过度反应，使得雌鼠的体温升高，并产生大量细胞因子。在这样的交叉火力之下，雌鼠体内许多正常的微生物都被杀死了。这些雌鼠生下的小鼠，免疫系统和菌群状况都和正常小鼠有所不同，而且这些小鼠都出现了一些类似人类自闭症的症状，它们有认知缺陷与社交缺陷，喜欢独处胜于和其他小鼠在一起。这些小鼠也出现重复刻板行为，会一直着魔似的埋弹珠，并且有消化道问题。

马兹曼尼亚发现，这些症状和一种名为4-乙基苯酚硫酸盐（4EPS）的化学物质有关，改变的微生物菌群会制造过量的4EPS。把4EPS注射到正常的小鼠体内，会让正常小鼠出现类似自闭症的症状。他还发现，如果给这些小鼠一种名为脆弱拟杆菌的益生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包括肠道问题。

这种研究让人鼓舞，但是依然有很多人认为，以此为题的研究正处于“问题比答案还多”的阶段。“在严禁的人体实验完成之前，就说服用某种益生菌可以治疗自闭症太早了，而且也不安全。”彼得森认为。

不过，依然有很多人试图弄明白菌群对精神会有什么影响。在法国一项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将55名健康的志愿者分成两组，其中一组每天吃一根水果口味的棒棒糖，里面包含活菌，另一组也吃一样的棒棒糖，里面没有细菌。一个月后，吃了活菌的受试者比接受实验前更快乐、更不容易生气和抑郁，这些改变已经超过了安慰剂效应。

其他实验也显示出类似的效果，关于焦虑和抑郁的研究特别多。例如，瑞士乳酸菌能减轻小鼠的焦虑行为，罗伊氏乳霜杆菌在小鼠身处逆境时，能够降低传染病发生的概率。还有报告指出，鼠李糖乳杆菌能够降低小鼠的强迫行为，比如埋弹珠。

为什么吃下活菌会让人感到愉快呢？这和一种

调节情绪的化学物质血清素有关。这种神经递质主要存在于肠道内，负责让一切完好运作。当我们吃下活菌，可以增加血液中色氨酸的浓度，色氨酸会转变成血清素。抑郁症患者血液中的色氨酸含量比普通入低，身体中的色氨酸如果耗尽，可能会让人感到短暂而彻底的沮丧。一个人血液中的色氨酸浓度较低，表示他的血清素也较少，有可能感到不快乐。

“因为血脑屏障的存在，过去我们总认为大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器官，不太受外界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已经发现肠道微生物可以影响血脑屏障的通透性，这说明肠道微生物对大脑的影响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重庆医科大学副校长谢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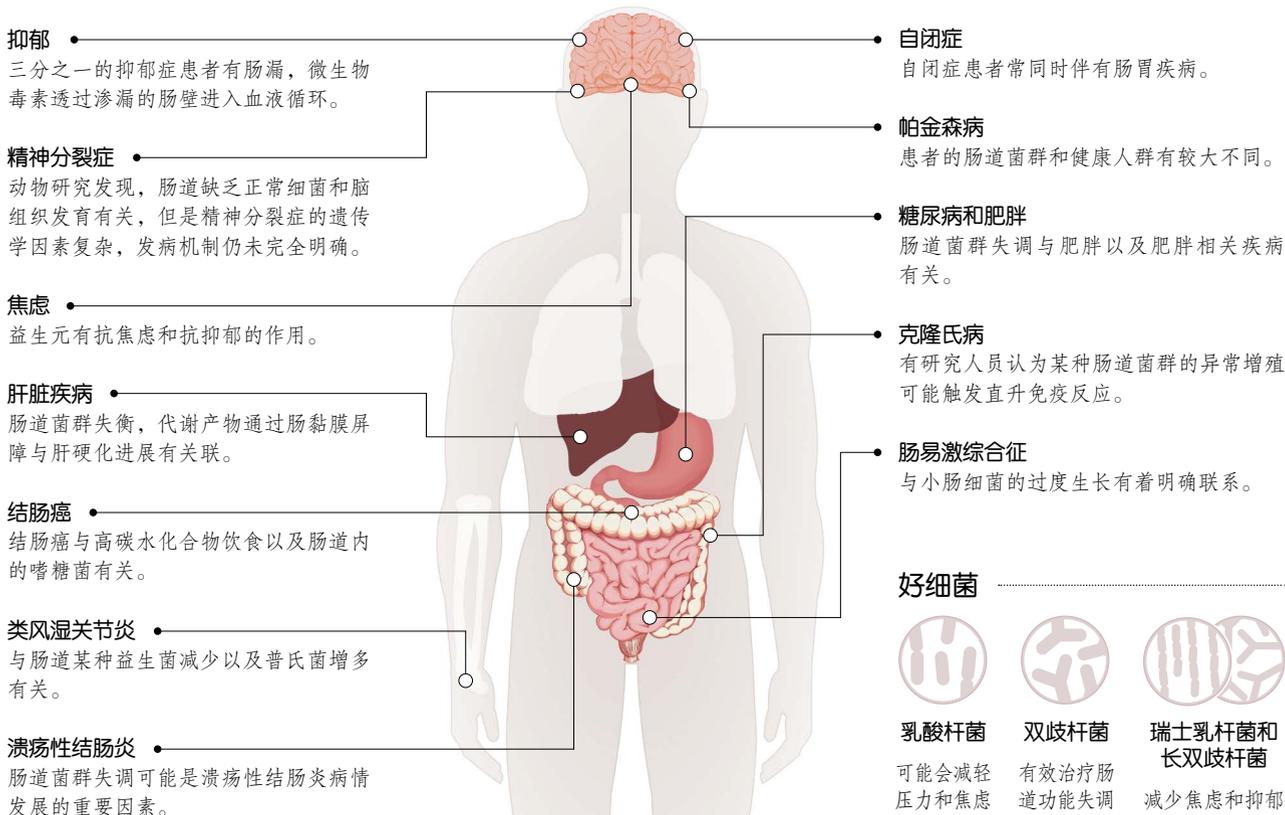
近10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抑郁症的诊断标志物及新致病机制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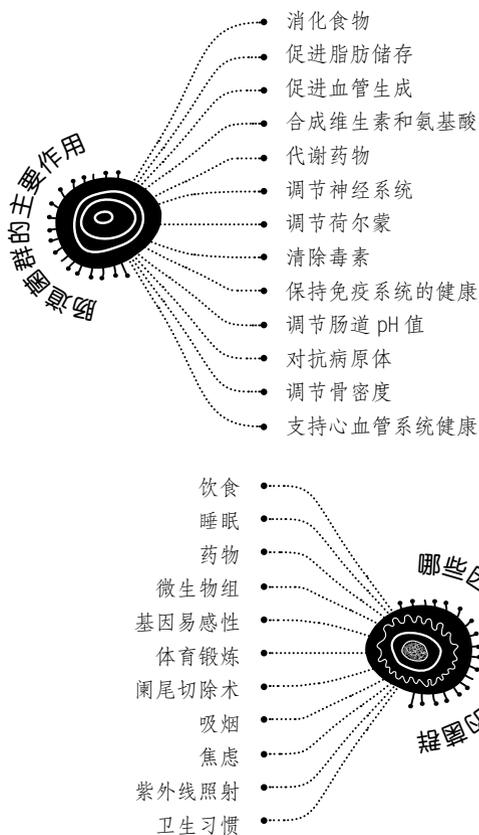
那么，肠道微生物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影响人的行为呢？“通过肠道—血液—大脑这个途径，现在还可能会通过交感神经调节。微生物产生的小的代谢分子，完全可以通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谢鹏说。

我们很多神经化学物质的供给起源于肠道，比如多巴胺、五羟色胺和 γ -氨基丁酸。这些神经递质在人的情绪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许多抗抑郁药物都是通过增加这些化合物的水平而发挥作用。最近几年，主流的精神病学开始认真研究认真考虑，微生

肠道菌群如何影响你的大脑和身体

如今，与肠道细菌有关的知识正以惊人的速度累积，这些小小的细菌以各种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着你的生活。科学家的研究让人们把人体微生物和许多疾病联系起来，比如肥胖、糖尿病和炎症肠道疾病，甚至连大脑也会受到肠道菌群的影响，包括自闭症和抑郁症等等。





物可能在制造这些化学物质中扮演重要的作用。

有趣的是，吃活菌之所以能增加色氨酸含量，并不是因为细菌制造了色氨酸，而是因为细菌阻止了免疫系统摧毁色氨酸。这个令人惊讶的想法不只是生物学上的大进展，在其他领域也是，这让我们越来越清楚一个事实：过敏、肥胖和抑郁症有可能是免疫系统失调所致。

生活更美好？

如果微生物能够影响我们的健康和心情，我们能经由改变微生物而过得更好吗？

服用益生菌是很多人觉得简单可行的办法，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罗布·奈特（Rob Knight）认为，市售的益生菌很可能对你的健康没有什么好处。虽然当初把某种菌造出来的原则听起来不错，比如能制造丁酸这种短链脂肪酸，但是绝

大部分还尚未证明能符合推想的情况。那些你在市场上买到的商品，经过运输和上架之后，是否还包含活的微生物也不清楚，因为很多微生物需要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才能存活。奈特是《Follow Your Gut》一书的作者，也是美国肠道计划和地球微生物群计划的共同创办人。

“摄取益生菌会引发微生物群落发生变化，不过这是否就是患者症状改善的原因，截至目前尚未有研究加以证实。”美国经验丰富的益生菌顾问桑德斯（Mary Ellen Sanders）在一篇评价益生菌功效的综述性论文中写道。

如今，关于菌群和疾病的新闻很多，很多内容充满混乱、矛盾或者炒作。你该相信哪些？奈特认为，一般来说，我们现在对于哪些微生物和哪些疾病有关联，通常是小鼠研究的结果，而非明确的因果证据。“如果你听到某种疗法宣称可以广泛治疗各种疾病，就得问：谁说的？为什么这样说？毕竟，无法告诉你火星有多远的火箭科学家，你不相信他能带你到火星上去。菌群的研究比研究火箭难多了。我们面临最严厉的挑战之一，就是理清研究对象。”

就算是全世界最顶尖的研究者，要将种类繁杂的细菌、各式各样的肠道环境，宿主先天的遗传基因、后天习得的特质、各种各样的饮食习惯，以及所有这些因素的交互影响一一梳理清楚，也都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一般的研究，通常是发现类似A细菌分泌了B物质，B物质和受体分子C结合，导致D物质分解成E和F，其中F拥有能够到达大脑的特质，并且在那里和神经细胞结合释放出电信号G，让突触H得以释放出通信物质I，通信物质I到达距离最近的神经细胞后会释放出信号J，刺激人类产生预期的K反应……

“根据经验，这样的生化反应实际上运作更加复杂，几乎不可能有办法采取上述线性方式加以描述。”马克·莱特认为。他走了另外一条路，避免完全理清整个连锁反应链条，现阶段“A细菌最终导致了K反应”这样的描述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对于负责药物管理的部门，光是“有个A细菌，不管怎么样都会产生K反应”这样的概念是不够的。“事实上，我们几乎不可能为肠道内部错综复杂的运作过程，后续的通讯路径和大脑反应之间的相互关系找到一套明确的作用机制，也就无法满足一些管理机构的要求，还要防止不必要的副作用。”他说。

就算我们知道某一种微生物和某一种特定的疾病有关，并不意味着答案或者治疗方式就是消灭那种微生物。事实上，这可能会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转而改变饮食或者抑制某种酶，可能要比直接攻击微生物来得有效。

微生物的发现之旅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擅长于发现在一个特定的生态系统中，哪些微生物特别多，但是大部分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些微生物的作为，也不知道它们彼此之间如何沟通，以及与我们的身体沟通。我们也还不知道如果干扰它们会发生哪些意料之外的结果，这些干扰的方式包括利用抗生素把坏细菌杀光，在饮食中加入新的微生物，和其他人以及动物一起居住，或是接触到新的环境。我们每天都在随意而且漫无目的地改变自己的微生物群西。“在我们了解需要做哪些事情，才能让体内完整的微生物系统出现需要的效果时，关于菌群的科学将会展现出巨大的力量。”奈特说。

艾伦娜·柯林参与了美国肠道计划。这个计划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只要填写一份详细的个人信息问卷（包括居住地、饮食习惯和去过的国家等），将自己的皮肤、口腔和排泄物样品打包寄出，花上最低99美元，就可以知道分享自己身体的微生物都有谁了。

她给奈特寄去自己的粪便样本，终于了解了住在她体内的微生物生态系统。看到体内细菌和其他肠道计划受试者大致相同，并非是一堆突变生物在一块荒地上苟延残喘时，她非常开心。但是她肠道菌群的多样性不如普通人，超过97%的细菌只属于两种细菌，普通人的比例是90%。她猜测也许是服用的抗生素杀死了较弱的菌种，让坚强的细菌存活下来。

在和很多研究菌群的学者交流之后，艾伦娜总结了几种改变菌群有效的办法。一、选择积极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饮食：低脂、低糖、低盐和高纤维素。二、谨慎使用抗生素，保护体内的菌群不被打乱。三、自然分娩，母乳喂养，让宝宝获得一出生就应该拥有的菌群。四、对细菌放低戒心，大多数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微生物通常没有害处，还能帮助孩子建立体内的微生物多样性，教育幼儿的免疫系统。这些话听起来都是老生常谈，很多人不想听，希望有良药能解决问题，但食物、好习惯和正确的观念才是真正的良药。

“拥抱与我们一起走过数百万年的微生物，对于去接纳真实的自我是非常重要的。最终，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百分之百的人类。”艾伦娜在她文章的末尾写道。✍



最想念的
年货

生活

生活周刊

最想念的 年货

年货、年味就是乡愁，就是亲情，而亲情永远不过时。

在新的一年里，新的一个春节即将来临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推出一个充满乡情、亲情，充满年味的文化产品

——《最想念的年货》





2017年2月16日，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抵达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接受“亲信门”案件特侦组的质询。次日，法院批捕李在镕，并将在3月9日开庭审理三星财阀向崔顺实行贿一案

财阀的冬天：少主被捕之外的“三星”危局

文 / 刘怡

少主李在镕因卷入“干政门”而被捕，或许不足以彻底斩断韩国财阀巨头与政界之间的关联，但势必对超级财团“三星”的管理层交接班构成直接冲击。从内部管理的稳定性到外部庇护，三星帝国正面临双重危机。

“三星”实际执掌者首度入狱

“入住”首尔拘留中心的第一个晚上，李在镕或许会懊恼没有早一点和韩国司法机关签下电器采购协议。因为在他那间6.6平方米的拘禁室一角，赫然摆放着一台竞争对手LG（乐金）集团生产的电视机。

尽管惹上司法纠纷早已成为三星财阀历代掌门人的宿命，但李在镕在今年2月17日的被捕，依然

开创了集团实际执掌者首度入狱的先例。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指控这位三星电子副会长涉嫌在2015年向总统朴槿惠的亲信崔顺实行贿430亿韩元（约合2.51亿元人民币），以促成政府批准其担任最大股东的第一毛织株式会社（韩国最著名的毛纺织面料和时装生产企业）与三星集团旗下的三星物产会社合并。

李在镕同时还被控挪用公款、非法向境外转移资产和隐匿不当得利，以及在2016年末关于“亲信干政门”丑闻的调查中作伪证。鉴于李在镕之父、现任三星电子会长李健熙已经在2014年因罹患心肌梗死淡出集团业务，少主李在镕的被捕，使得三星财阀自1938年创建以来第一次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集团的重大收购和投资决策也被迫暂时搁置。

在检方公布的“干政门”行贿企业名单中，列出了三星、现代、LG、SK、乐天等八大财阀的名字，涉案金额超过800亿韩元。这八大集团的总资产相



2008年4月4日，三星电子会长李健熙抵达首尔特检组办公室，接受关于非法股票转让案的质询

当于2016年韩国经济产出的2/3，其中仅雇员接近50万人的三星一家就占据了全韩国企业总市值的30%。从行贿的目的看，主要涉及资产并购许可、免税店经营权的获取、偷逃税款以及为入狱的企业家脱罪。

换言之，这是一波操作娴熟、轨迹清晰的有组织利益输送——大财阀为主政者及其亲信提供用于个人享乐或台下政治活动的资金，政治家则在异常商业活动的审批和法律诉讼方面为企业家提供庇护，实现互利共生。从威权时代的朴正熙、卢泰愚到民主化之后的金大中、卢武铉、朴槿惠，历任韩国总统无不深陷这张灰色关系网之中，造成财阀把持国民经济、社会活力却日渐丧失的停滞局面。尽管李在镕本人辩称支付献金是源自朴槿惠当局的“胁迫”，但显然无法说服首尔街头要求从速逮捕他的抗议民众。

与“二战”后经历过拆分和改造的日本大企业相比，韩国老牌财阀的所有制结构及行事方式更接近20世纪初的“原生态”面貌。尽管三星集团旗下的三大核心子公司三星电子（总资产约262万亿韩元）、三星生命保险（总资产约224.5万亿韩元）和

三星物产（总资产约23.4万亿韩元）都属于公开上市企业，但创始人李氏家族借助复杂的交叉持股结构以及不受董事会制约的“未来战略室”，在事实上拥有一言九鼎的权力。通过行贿政客实现的资产并购往往不是为了增加营收或者实现合理的产业布局，而是创始人家族完成股权结构优化和财产低成本世袭的工具。“大马不倒”的少数财阀家族，外则借利益输送和政商勾结僭取公权力，内则视合法投资者的诉求于无物，形同独立王国。这在民主原则和商业逻辑上都已经和时代精神背道而驰。

在3月9日李在镕的第一次庭审开始之前，三星集团已经宣布解散争议颇大的未来战略室，并将竭尽所能提供证据为李在镕脱罪。考虑到集团旗下各大子公司皆有成熟的经理人团队负责运营，少主的暂时缺位，或许并不会立即导致整个商业帝国的倾颓。但素来明争暗斗不断的李氏家族，却有可能因此再度发生“玄武门之变”——尽管韩国刑法并未剥夺入狱者继续运营商业机构的权利，但一度在继承权之争中处于劣势的李健熙长女李富真，却有可能利用行动完全自由、与父亲接触机会更多的便利，在公司控制权和遗产让渡问题上占得先机。从“干政门”引发的舆论反响和检方的指控力度推测，李在镕即使能卸脱一两项罪名，最终恐怕依然难逃入狱数年的惩罚；而即将举行的韩国大选是否会继续撼动庇护富豪世家多年的保护伞，可能性也在上升中。无论如何，对三星集团和以它为首的韩国财阀来说，这都是一个格外寒冷的冬天，且依旧未曾结束。

“大马不倒”

在网络搜索引擎谷歌中输入关键词Chaebol（韩语“财阀”的英文转写），于0.44秒内便可获得94.3万条检索结果；而“财阀”模式的始作俑者日本，其对应的英文关键词Zaibatsu的检索结果也不过是98.6万条。换言之，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进入极盛期，但韩国财阀在受关注热度和重要性上已经丝毫不亚于其历史超过100年的日本“老师”。

漫画家弘兼宪史在其创作的职场人物系列漫画《岛耕作》中，专门有一集题为《宿敌？韩国财阀企业的威胁》，足可窥见即使是经历过20世纪初“财阀柄国”历史的日本人，依然会为其韩国后辈的烜赫权势感到震惊。在作家山崎丰子的经典小说《不



2017年2月16日，支持李在镕的中老年示威者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大门外进行抗议。李在镕本人迄今为止仍宣称贿赂行为是在政府逼迫下的不得已之举

毛地带》中，同样出现了主人公在“光星物产李会长”（影射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引荐下面晤韩国总统，以插手首尔地铁工程投标的情节。

所谓财阀者，因其兼有“财富”与“门阀”两端，故在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上往往具有独特的性质。首先，创始人家族通过股权控制、把持管理层、在董事会中安插亲信以及设置直属于会长的秘书室（负责业务规划、融资和人事）实现对子公司的绝对控制。

以“三星”集团为例，理论上并不存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总公司”，三大核心子公司以及其余冠以“三星”头衔的企业皆属于业务独立的上市集团。但由于李健熙父子直接控制资产规模最大的三星电子，通过“未来战略室”（本质上是一个大型秘书处）干预管理层决策，同时在各子企业中扶植家族成员和亲信作为CEO或执行董事，整个“三星帝国”依然是以李氏家族为中心的紧密共同体。

其次，财阀企业的经营范围、雇用员工总数和掌握的社会资源往往相当铺张，在母国的一些行业甚至形成准垄断态势，从而使政府不得不与其构建

利益共同体。执政者或者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中以财阀作为实际执行者（例如“汉江奇迹”时代），或者通过批准违规业务、破产豁免以及给予法律特赦等庇护方式换取财阀的资金、影响力支持（民主化之后大体如此），从而形成政经一体、财阀“大而不能倒”的格局。来自执政党的隐性影响力在融资方面作用尤其重大，直接导致韩国财阀能在平均负债权益比超过400%、高于其日本同行4倍的情况下继续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进而使金融界也成为大企业的“人质”。

最后，对金字塔股权结构和交叉持股模式的放任使得创始人家族往往能以较低的股份份额撬动整只“大象”。例如李健熙、李在镕父子在三星电子的直接股份份额仅为5%左右，公司主体资产在首尔、伦敦和法兰克福分别上市，有55%的股权掌握在美国资本集团（Capital Group）、黑石顾问等海外投资者之手。但李氏父子同时又是三星电子的最大单一股东三星生命保险（持有7.43%的三星电子股份）的实际控制人，通过家族旗下的非上市企业爱宝乐园（Everland）持有三星保险19.3%的股份（李氏

父子所持的爱宝乐园股权接近 30%，李健熙尚直接持有三星保险 20.8% 的股份)，而爱宝乐园又是三星电子旗下信用卡公司的第二大单一股东，如此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环环相扣的蜘蛛网结构。

通过爱宝乐园—三星保险—三星电子的三层金字塔架构，李氏父子不仅得以在直接持股较少的情况下实现对企业的长期控制，而且大大提升了拆分集团架构的成本，迫使投资者和政府不得容忍这张含混而臃肿的巨网长期存在，甚至主动为其提供便利，以获得经济回报。

正是因为三星财阀庞大的资产规模、几乎无所不包的产业布局和难以撼动的优势地位，发展创新型乃至打造“小灵快”的轻资产互联网公司的可能性在韩国几乎不存在。2008 年中右翼大国家党（现名自由韩国党）重新执政后，曾试图通过扶植互联网产业和初创公司，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但由于中小企业在融资环境、薪酬水平和社会认可度方面远不及财阀巨头，最终的结局要么是被老财阀收购，要么在最初的冲击过后悄无声息地走向消亡。在工业化起步阶段曾经扮演过发动机角色的巨头企业，在 21 世纪初的今天却已成为阻碍创新的过时恐龙。即使是在全球电子工业版图中占据半壁江山的三星帝国，受制于臃肿的体量和陈旧的管理模式，也只能跟随在微软、谷歌、苹果等美国 IT 企业之后，满足于“制造者”而非“创造者”的定位。

不仅如此，金字塔结构和蜘蛛网式交叉持股模式的存在，还意味着财阀企业的运营成本大部分耗费在了理顺内部关系和确保创始人家族的权威不受挑战上。公司的现金盈余被大量用于支付股权让渡（通常在家族成员内部进行）造成的巨额税金或者增持旗下子公司（同样由创始人家族控制）的股份，使得真实投资收益一再被拉低，国外投资人的不满却在“保护韩国民族企业”的旗号下被视而不见。

导致李在镕锒铛入狱的第一毛织并购案，便是极好的例证——整桩交易既不是为了增加集团的收益，也不是看好传统纺织业的发展前景，而仅仅是为了完成家族交接班。因为只有将李在镕持有 23.2% 股份的第一毛织（同时也是三星保险的股东之一）与同样由他持股 4.1% 的三星物产合并，才能确保金字塔下游的三星电子的实际控制权依然被上游的持股方三星物产和三星保险所把持，进而继续完成李健熙与李在镕之间的上游股权让渡。

而由于三星物产的第一大单一股东是政府控制

的国民年金公团（利用国民养老金进行金融运作的国有投资公司），为了促成青瓦台方面批准交易案，李在镕不惜向手眼通天的崔顺实行贿，接连向其运营的 K 体育基金会和其女郑宥拉提供巨额资金“奉献”，其中仅已经到账的贿款就多达 255 亿韩元（约合 1.5 亿元人民币）。换言之，整桩交易与真正的商业投资根本无关，仅仅是为了强化“太子爷”的个人地位。而当小股东代表、美国知名对冲基金公司埃利奥特资本对合并案的必要性提出怀疑时，居然还遭到了国民年金行使委员会委员、建国大学金融 IT 系教授吴正根的道德谴责：“海外投机资本企图利用我国国内的反大企业情绪，展开对韩国民族企业的攻击！”

讽刺的是，尽管民主化之后的历届韩国政府都曾宣称要对大财阀进行改革，并曾颁布过上市公司新管理条例等勉为其难的法令，但真正采取过的实质性举措，却每每需要借助外部经济危机。

1998 年金大中政府与国内五大财阀达成《公司改革五项任务》协议，直接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造成韩国企业现金流吃紧，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压力下对老牌财阀开刀，勉强取得一定进展。而大宇集团和现代集团（不含已经剥离的现代起亚汽车和现代重工业）在本轮改革中最终解体，直接



李健熙长女李富真在李在镕被捕后有望成为三星财阀的新主事者

原因仍不是拆分措施得当，而是盲目扩张未能控制所致。朴槿惠在2013年就职之初，也曾放风称将立法限制“大马不倒”的财阀世家；但除去韩进集团旗下的海运公司在2016年末因国际航运市场整体低迷而自行申请破产外，真正遭到打击的“大马”几乎不曾出现——给崔顺实及其背后的朴槿惠“进贡”的代价虽大，但的确确实买到了一块过硬的免死金牌。

豪门宫斗 50 载

就在“亲信门”丑闻曝光之前不久，2016年7月，独立新闻网站“News Tapa”（打破新闻）一度公布了处于半隐退状态的三星电子会长李健熙在自家豪宅中召妓的偷拍录像。从2011到2013年，李健熙曾以每次500万韩元的价格私下召妓至少5次，并根据妓女的“服务质量”设定赏罚标准。这段录像被上传到视频网站YouTube之后，点击量很快超过1000万次，但与三星集团关系密切的韩国主流媒体反应却相当冷淡。

见惯大风大浪的李健熙对此早已处变不惊。早在2008年，由于涉嫌以爱宝乐园和三星SDS的部分股权为抵押发行可转换债券，再将债券低价出售给李在镕及其两个妹妹的企业（这种做法比直接赠予可以少承担1000亿韩元的税金），他一度被特检组控以逃税、非法股票交易、违反信托义务三项罪名，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并罚款1100亿韩元，甚至辞去了三星电子会长一职。但在2009年最后一天，时任总统李明博以李健熙帮助平昌申奥成功“有功”为由，对其实施特赦，此后首尔地方法院还推翻了对非法交易罪的指控。75岁的李健熙虽然病重卧床已有近3年之久，但迄今为止仍是三星帝国说一不二的話事人和最高仲裁者。

如此有恃无恐的行事风格和一言九鼎的权威，实在要拜李氏家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宫斗史所赐。出生于1942年的李健熙在青年时代并不是父亲李秉

喆最心仪的接班人，他从早稻田大学商学院毕业后，一度前往美国留学，1966年才进入三星集团旗下的非核心企业东洋放送会社（TBC），负责广播电视和媒体业务。当时的三星财阀已经发展为拥有基建、制糖、钢铁、化工、纺织等多项核心业务的综合型会社，并被朴正熙政权树立为五年经济开发计划中的明星企业，李秉喆的长子李孟熙则是内定的第一接班人。但在1966年春天，李孟熙和二弟李昌熙（负责集团旗下的第一制糖工业会社）因为贪图糖精出口的可观利润，下令将糖精制备原料伪装成建筑材料进口，却遭釜山海关查获，引发轩然大波。在朴正熙当局的压力下，李秉喆不得不将刚刚建成的蔚山化肥厂“捐献”给国家，并一度辞去集团会长之职，直接责任人李昌熙则被判入狱6个月。这是李孟熙的领导能力第一次遭到父亲的怀疑，但鉴于企业仍在发展期，李秉喆并非打算改变最初的交接班方案。

然而在糖精走私案件后不久，李孟熙再度犯下大错。当时李秉喆在其合作伙伴、日本伊藤忠商社执行董事濑岛龙三（《不毛地带》的主人公“壹岐正”的原型）的建议下，决心仿照军队总参谋部的结构，强化直属会长的秘书室作为战略企划和运营中枢的功能。而李孟熙对这一布局的意义置若罔闻，仅仅满足于向下属子公司安插自己的亲信，令集团合作企业和创业老臣大失所望。1969年前后，子公司管理层向李秉喆发起联合逼宫，要求罢黜“太子”李孟熙、扶植初出茅庐的李健熙作为新接班人。不愿就范的李孟熙在情急之下，做出了一个愚蠢顶透的决定：教唆刚刚出狱不久的二弟李昌熙向青瓦台寄举报信，指控父亲向海外转移资产。

从任何角度看，这都是一次毫无胜算的胡闹：尽管朴正熙与李秉喆在糖精走私案等具体事件中矛盾重重，但三星毕竟是政府重点扶植的龙头企业和执政党秘密政治资金的主要贡献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在儒家思想影响力极大的韩国，对父亲的悖逆之举也难以赢得大部分民众的同情。暴怒之下，李秉喆将起草举报信的李昌熙直接逐出韩国，幕后指使者李孟熙也被边缘化，仅保留第一制糖会社名誉总裁的虚职。而在2012年，已经隐居北京养老的李孟熙还曾向首尔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获得三星集团内部价值超过1万亿韩元的股票的继承权，但被直接驳回。2015年8月，李孟熙在北京病逝，其后人在三星集团内部也沦为小角色。

在夺嫡之争中侥幸胜出的李健熙，自然不愿看

某种意义上，“干政门”事件中的两位关键人物朴槿惠和李在镕，都是其家族传统和过往历史包袱的牺牲品。

到类似的闹剧在自己的后人中重演。1987年自老父手中正式接管集团所有产业之后，他做出了一系列精密布局。首先，在媒体和业界建立广泛的关系网，确保即使有丑闻出现，也不会被轻易曝光。李健熙的岳父洪珉基曾是韩国第一大报《中央日报》（原系三星集团创建，全斗焕政府时代被并入国营韩国放送公社）的早期社长，后来担任过朴正熙政权的法务部长；其子洪锡炫在上世纪90年代同样出任《中央日报》社长，卢武铉上台后被任命为驻美大使。通过岳父和妻兄的关系，李健熙逐步成为国内各大报纸、电视台甚至公检法官员的金主，并屡次高薪延聘卸任司法官员担任集团顾问；三星集团被当作“大韩民国的骄傲”加以维护和偏袒，任何违法勾当都可以被轻易洗脱。2005年，检察官发现洪锡炫曾涉嫌作为李健熙的中间人，在1997年总统大选期间向李会昌、金大中两位候选人输送秘密资金。但洪锡炫在辞去大使之职后，随即回任《中央日报》和JTBC（中央东洋放送会社）电视台社长，继续在媒体圈为妹夫张目。而李健熙的夫人洪罗喜除去身为知名艺术品收藏家的身份外，还是佛教派别“圆佛教”最大的捐款人。夫妻二人在体育界和慈善界广洒“金雨”，营造出光鲜的公众形象，使批评者根本无从置喙。

前检察官金勇澈在1995年因主导起诉前总统全斗焕而蜚声海内，1997年李健熙以高达10亿韩元的年薪聘请他担任三星电子秘书室高级顾问，专门负责与司法界的“沟通”业务。2004年金勇澈与三星集团决裂后，在企业界完全无法容身，被迫对媒体爆料称：自己的日常工作就是利用就读大学法律系和担任检察官时代建立起的人脉，邀请司法界人士打高尔夫、宴饮和出国度假，费用皆由三星方面支付；公司为重要的政治、税务、司法和媒体人士建立了总额超过2亿美元的“管理”资金，专门用于送礼和行贿，甚至还根据一名官员被提拔为部长、进入国会和担任主要政党代表的概率制作了行贿优先顺位表，恶劣程度令昔日的威权总统全斗焕相形见绌。而洪罗喜的艺术品收藏也绝非简单的雅事，其实质是洗白秘密资金和以“赠送”形式进行贿赂的伪装。无怪乎在2016年的召妓视频曝光后，News Tapa的编辑曾经愤怒地评论道：“李会长将自己视为超越法律和伦理的存在，肆意摆布与滥用有如皇帝一般的权力……这样的财阀病态现象，不只是韩国的经济，连政治、行政体系与媒体都受其腐



2016年4月24日，两位顾客在首尔一家电子产品商店选购三星Galaxy Note系列手机。当年年底，三星电子宣布召回电池存在自然风险的Galaxy Note7，造成超过170亿美元的损失

败而逐渐麻痹。如果不能果断除治此种财阀行径，我们就没有未来。”

除去向媒体和政界伸出触角外，李健熙对长子李在镕的培养，也大有异于父亲的栽培模式。尽管后者从1991年起就加入集团旗下企业，在三星电子一路擢升至二把手的位置，但老“皇帝”李健熙始终坚持多给股份、少予实权的策略，通过秘书室遥控管理层决策。同时对李在镕的两个妹妹李富真和李叙显（LG财阀创始人具仁会的三儿媳），也各自给予要职：前者负责集团旗下新罗酒店、爱宝乐园以及三星物产度假村建设部门的实际决策，后者担任与三星物产合并后的第一毛织时装部门的主管。尽管就资产规模和受关注程度而言，两个妹妹不及李在镕来得扎眼，但后者在第一毛织合并案以及三星物产的几次重大决策中，同样经历了与长妹李富真的明争暗斗，最后因为父亲意外病倒和李富真婚姻破裂，才勉强占得先机。而在李在镕极有可能被判入狱的情况下，可以自由接触父亲的李富真无形中具备了重新翻盘的可能，特别是在李健熙担任第一大股东的三星生命保险的未来前途问题上。这出延续半个多世纪、涉及三代人的宫斗戏码，仍将继续上演。

财阀世家的未来

某种意义上，“干政门”事件中的两位关键人物朴槿惠和李在镕，都是其家族传统和过往历史包袱的牺牲品。朴槿惠在2013年上任之时，一度被民

众寄望于能够削弱财阀势力、解决由来已久的贫富不均和就业率低迷问题。她本人也的确曾把抑制巨头企业、迫使其承担更多税负作为努力方向。

但第一任期尚未结束，政府的实际决策已经完全退回到由其父朴正熙开创的以财阀为中心、裙带关联纷繁的老套路。与2007年相比，韩国前五大财阀的资产总规模由全年经济产出的35%一路飙升到60%以上，GDP整体增长乏力、家庭债务总量高企、年轻人就业不足等痼疾却没有丝毫解决的征兆。而李健熙非法股票交易案的脱罪，以及“干政门”中崔顺实直接向财阀索取巨款的乱象，更是彻头彻尾的“原生态”政商勾结，完全超出了公众所能容忍的底线。

而肄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博士班、曾经修读历史系的李在镕赢得继承人之争，同样曾被视为老牌财阀轻装上阵、由传统家族企业向现代管理模式过渡的标志。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注意到，李在镕平易近人、尊重女性，乐于向乔布斯、库克等美国IT企业家请教，在管理风格和待人接物上也大大有别于“皇帝”李健熙的专断风格。

在去年12月关于“干政门”事件的听证会上，他曾侃侃而谈：“我将抛弃旧思维，斩断韩国政治和经济的传统纽带，带动企业更大程度的创新。”这未尝不是由衷之言。在政府着力推动的信息化创新事业和传统产业转型进程中，三星表现得极为活跃，包括曾出资500亿韩元筹建大邱“创新经济革新中心”。

但“干政门”事件中暴露出的幽暗细节显示：无论是西方教育背景还是个人的良好私德，都无法改变李在镕作为三星财阀唯一男性继承人的天然宿命。为了避免承担总额可能超过6万亿韩元的遗产税，他必须像祖父和父亲一样从事违法交易、贿赂总统亲信、对公众和小股东撒谎，只为将三星集团那张由复杂交叉持股构成的蜘蛛网的中心转移到他个人身上。最终，他也将步李氏家族前两代人的后尘，卷入法律纠纷，乃至最终入狱。

以财阀企业为核心规划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外向型经济模式，曾经是韩国在60年代到90年代实现“汉江奇迹”的关键；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政商一体、产业布局和银行被大企业“绑架”的现象，虽属异常，仍能够以“时代所限”作为解释。然而在信息产业成为潮流的年代，“大马不倒”的巨型财

团雇员数量已经达到规模极限，对拉动就业再无帮助，同时投资决策却被落后的管理体制人为扭曲及劣化，并将大量金钱投入到兼并中小企业以及维持政界和媒体的“朋友圈”中。这种趋势与韩国经济的整体低迷存在直接关联——作为全球第11大经济体，韩国在过去5年内的平均GDP增长率已下滑到不足3%，其中央银行已经将2017年的经济增速预期下调到2.6%。受东亚安全环境影响，在经济构成中占据最大单一份额的出口贸易总额持续下滑；而素来以“最强追赶者”自诩的三星电子，在2016年也爆出因新款手机Galaxy Note7的电池设计过于激进、导致多起自燃事件的丑闻，不得不全面终止销售并召回该款机型，损失预计超过170亿美元。从这个角度说，韩国经济的危机，恰恰是传统财阀模式已达效能阈值、无力再做突破的直接结果，且负面效应仍在延续。

同样经历过“财阀至上”年代的日本，在“二战”结束后由于经历过盟军占领当局的强制拆分，被迫探索出了一条隐性成本更低、决策流程更科学的发展路线。尽管这种拆分远称不上彻底，但的确推动了大企业部分摆脱固化的政商关系网和单一的家族继承模式，进入多样化发展阶段。媒体环境的自由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日渐透明，也使商界向政客的资金输送可以迅速被公之于众，从而使主事者不得不有所收敛。

相形之下，奉行男性继承制，关系网又更为铺张和绵密的韩国财阀仿佛还停留在丛林时代；而且由于政界通道关于“敞达”、舆论环境又被控制，反过来缺乏自我革新的动力。即使是兴师动众的“亲信门”调查也未必能撼动三星财阀的基础——在2008年的非法交易案调查中，李健熙父子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应对舆论压力的示弱策略，此番再度被“主动解散”的秘书室，在当时已经消失过一回，但随后很快改头换面重出江湖。

而韩国现行《商法典》允许入狱者继续遥控企业的规定，也决定了李在镕即使入狱，依旧能从容地完成股权转让和行使最高决策权。但沉浸在“亚洲小龙”之梦中已有30余年的韩国政府和民众的确应当认清一种事实：昔日缔造过经济奇迹的财阀“大马”，如今已成为窒息活力的毒瘤。

在世界经济形势面临动荡的2017年，倘若不主动寻求改变，韩国又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阅读之美



绘画：阿梗

生活周刊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浙江富阳造村记

主笔 / 葛维樱



浙江富阳市东梓关村迄今保留了 80 余座古民居，因为地处偏僻，这里尚未受到城市化的影响



(张雷摄)



(张雷摄)

古建筑不再能满足村民增长的物质需求

大部分“设计进乡村”还处于造梦阶段，是城乡二元对立的实证。

乡村建设隐含着发展观的推动，而发展最快的乡村往往被城市侵袭得体无完肤。钱塘江往上游突然做了个转折，把柔情的富春江给推了出来。一个持续缓慢的不断建造了几个世纪的乡村东梓关，无意中缔造了村民物质空间变幻的次序过程。在这个“年轮”的中心，出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住宅形式，在互联网上首先引发惊艳。相对于照片光速的传播方式，村庄、乡镇、邻村、学者、规划、设计都具有更强的叙述能力。最终“破题”的，还是美。

(张雷 摄)



破题，边缘的机会

春节至今，到浙江富阳东梓关参观回迁房而挂着全国各地牌照的车，挤进了这个偏僻的小村庄。“感觉置身在吴冠中的江南水墨画里”，是村里新落成的回迁农居房在网络上造成的视觉印象。盛国宏在规划局的食堂里给我推过来一个富春大包。“感谢微信微博这样的视觉时代”，他有些自嘲。东梓关半年前举办过一次设计论坛，邀请了几十所国内设计院所和乡建专家。没想到真正引起大众关注的，还是gad 设计师孟凡浩在个人微博上发出的几张照片。

1367 元是每平方米回迁房的造价，是乡村和设计单位达成的一致。在此基础上，设计为农民发挥着尽可能大的能量。我曾在 8 年前到过富阳偏僻乡村采访遗留下来的造纸池，农民在极寒天气里浸泡竹子和草。东梓关也曾是一级手工纸之乡，早已衰落的传统手工业没有改变乡村的力量。而现在农民

的生活方式也早就脱离了旧的范式。回迁房，包含着政府对传统农业文明现代转型的制度建设和预期，没有外力资本进入的情况下，靠的是农民对生活改善的内在需求。

我到东梓关时，正逢这里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本地老话讲“穷过年富过节”，不似北方的市集以商贸为主。江南趁着阳春晴朗的天气，每个村庄轮流坐庄，宴请自家尤其是外村的宾朋。大圆桌子板和大蒸笼滚来滚去在青石板路上造成了哗啦啦的声音。和郁达夫写的一样，“村子里的小路很多，有些是石砌的，有些是黄泥的，只有一条石板砌成的大道，曲折横穿在村里的人家和那池塘的中间，这大约是官道了”。

跟着圆桌子板向门牌号为 A21 的小门里滚过去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江南式样的新居气派的木门，去掉了富阳传统中最有代表性的高门槛，连同那个孙权称帝后回乡使人山人海将道路踏低的民间讲究。

(张雷摄)



左图：“同裕昌”豆腐经营了三代，如今许如元70岁了，仍然每天3点起床工作

右图：这几年古民居受到了保护，村民不能拆改老宅。政府对老房子里的村民统一迁出安置

老两口正在以七十大寿的名义宴请。方家挨着村里的老中心街道，也离公共停车场最近，是目前东梓关回迁房项目里最热闹的一栋，外挂彩旗，厨房里不断冒出香味。

46户独立小楼分为四种户型，参差相邻，互为角度，彼此照应。江南民居的曲线屋顶，尤其是吴冠中笔下抽象了的微曲而优雅的屋顶线条，与实墙成了视觉切入点。常见的对坡屋顶和单坡屋顶，被重构成了连续的不对称坡，针对单体建筑的形体塑造屋面线条轮廓。单元的独立和群体屋面形成微妙的连续感，若即若离。

窗户总共有四种尺寸，窗口大小不一，正和“建筑三明治”的另一带，80余栋建于上世纪初的古建筑，形成了呼应。老建筑白墙上也开了小窗，圆形、方形都不大，以往的生活经验是“邻家起火了，只要用湿棉被堵住窗户，就可以保住自家”。一楼的墙外都有不大的漏窗和透雕装饰。新居把这两个“神韵”的片段截取，在外仿佛觉得这画一样的屋子没几扇窗，到里面才能体会朝向院落的半虚和玻璃采光的内向感。外实内虚，具有体积感的房屋容纳了农村

房屋的基本功能。二楼阳台上晒的腊肉，只有通过二楼的栅栏才能看见，而隔壁的房屋只有一个不取景的窗户朝向自家阳台，视线的高低恰好避免了碰头的尴尬。

按照黄公望的截取角度，“山色晴阴好，林光早晚各”的《富春山居图》里最精华的一段，就是沿着东梓关的水路无论往上往下，吴思所写“从富阳至桐庐，一百余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尽管山水与笔墨之间的关系在一半“自然”对一半“自我”之间，沿着富春江岸从东梓关往富阳的方向走走，还是不禁把眼前的烟树、江水与山的曲线合到对国画的印象里。

晚冬初春的色调正如淡墨，如果在富春江边一片有沙洲蔓延的狭窄处下船，船板往石头台阶上一扔，就步上了东梓关的石阶。久病不愈的郁达夫乘船来这里住了一年，写下《东梓关》。现在问当地老人，还能用吴依软语背几段文字的描写。从水路而来，五官都不够使用了。鼻子时刻能闻到无名之香，走一段景色变化眼睛不够用，再喝每个地方的泉水味道也不同。这是晚清时沿常山顺水来的人的感受。

水陆码头为背景的旧时代，一直到2000年才正式停止。到杭州、上海的船票新中国成立后是三毛钱，到停渡时，到杭州也不过几块钱。早上6点开船，从四面山区来上路的农民，为了这唯一的一班船，要提前一个晚上来东梓关等待。70岁的许如元记得，从爷爷的时代，自家豆腐坊晚上用来发酵熬煮豆子的地上的大火灶，就一直没有熄过。做豆腐的人，深夜两点起床生火，寒冷的江南夜晚，这个豆腐大锅就成了旅人取暖夜话的地方。

千年来自文学书画审视这一段风景的“他者”角度里，几乎都在描摹，一峰一状，一树一态。加州大学的黄公望研究学者韩庄找了一个《富春山居图》里好像没有关联的极小人物做了研究，他行止无定却始终在画卷左端。在残卷之首，小人物沿一平缓的小路顺着河前行，在前景里过桥、穿林，经过浅湾到达一风景极佳的小村。郁达夫沿水路而来，我则走陆路到达，东梓关就是这样的一个“可坐、可游、可居之境”。

沿富春江的公路尚未修好，带上古人的眼光并不容易。近10年来年里乡村的汽车普及率逐年增高，开车半小时之内的路程，等一趟公交车的时间比乘车时间还要长。“离城市越近越容易被城市化影响，经济得到发展；离城市越远越容易保存个性，避免了城市对传统乡村肌理的侵袭。”这个“远近公式”，是富阳区规划局副局长盛国宏告诉我的。曾经的乡村一味把落后归因于距离，但随着时代变化，观念更新、交通物流发展和就业形式多样化，后半句是在近几年里才开始发挥了真正的价值。

被谨慎对待的农民房屋

“我以为这肯定是后面跟着房地产开发商。”村民许友纯毫不遮掩自己两年前对于“设计”这两个字的排斥。和他一样想法的村民是大多数。这种早期的模式已经不再被乡村接受。

相对城市，乡村住房资源并不紧缺，但收紧的土地政策和严格的“一户一宅”原则，让村民开始谨慎对待自己的新建住宅。

曾经的“古镇”模式采用大批征地拆迁和旅游、房地产开发之后，对于农村生活的破坏无法再修复。一直偏安一隅的东梓关，对于外来资本和关注总是保持着距离。东梓关隶属于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富阳在2015年撤市并入杭州，从杭州到富阳有专门的杭富大巴，东梓关从富阳最边缘，变成了杭州最边缘。

“我们家本来就在老房子里。”方炳霞和梁罗英夫妇没有在村里建房。方家的儿子们都在富阳工作，有经济能力在村里盖房的时候，2006年老宅已经被下了保护令，谁也不能私自拆改了，要等待村里的统一规划。谁知，这一等就是10年。

当年他们从老宅搬去了富阳城区居住。现在按照村里的政策，70岁之后，父母可以随儿女申请宅基地，大儿子以自己的名义集资购买，并抽签抽中了342平方米的新居，其实就是为了给父母回乡养老。老两口搬进新居正在赶节日里做寿宴。“拿到老房子的拆迁款交了七八成房款。”

东梓关的“回迁”有几层意味。首先是2006年禁拆，2013年开始提上保护议程的80多座明清古民居，陆续搬出了包括方家在内的50户左右人家。这些古建筑由政府统一规划，而拆迁则采取政府代建、农户集资、政策补贴的模式进行回迁安置。其次则是村里无房的村民。相对城市，乡村住房资源并不紧缺。收紧的土地政策和严格的“一户一宅”原则，让村民开始谨慎对待自己的新建住宅。

农居点的整个设计费50万元，连同每栋36万到46万元不等的价格，总费用不到2000万元。以别墅、住宅设计见长的gad是商业设计公司，以杭州附近别墅约千万元左右的售价来说，50万元是一栋别墅的设计费。gad的两位创始合伙人郭晓明和王宇虹全程参与其中，设计师孟凡浩有两年的时间把所有的周末都用在了东梓关，从杭州开车来工作完再开回。动人的建筑，单纯的造型，现代功能性的极大拓展之外，最关键的是最低的造价。即使如此，东梓关的建造，仍然需要极大的执行毅力和政治后盾。村庄的形成本来就没有明确的目标，村落体内的要素不断地协调和更新、成长，才成长出了有地域性、时代感的物质空间。

从传统民居里不断搬离的村民，又不愿意步上城乡结合部的高楼。在越来越固化的宅基地制度下，大量行列式机械布局的农居点，以满铺式层层叠加在过去的山水格局之中。从2012年开始，浙江省内

的农村建筑开始有了对新式样的方向性追求。“浙派民居”“杭派民居”等政府主导的工程引进了设计院所和公司。在“美丽乡村”设计比赛中，盛国宏看到了 gad 设计的山村“九茹村”。那是他的老家，尽管时至今日九茹村还只是一个纸上的梦，对盛国宏的触动却是直接的。建设杭派民居示范点的过程里，他请了好几家浙江设计团队在富阳的乡村里进行设计比拼。他毫不掩饰对东梓关的骄傲，告诉我：“有的设计师看了东梓关以后，偷偷给我发短信，要免费重做。”

东梓关近两三年内得到的政府经费不断在增长，场口镇负责东梓关农居点项目的指导员洪斌给我细细地算账：基础设施投资 1000 万元，“杭派民居”示范点市级和区级各补贴 500 万元，内水系治理和“三江两岸”工程修沿江公路等等项目的资金 1000 多万元，到现在新居落成，农民集资的投入，已经达到 6000 万元左右的资金。“接下来还要做一个从新农居点到长塘再到河边的建筑外立面连同道路的统一改造，这个钱已经从政府拨下来，设计交给了杭州另一家设计院所。”

原真性：用现代语言重构传统元素

2015 到 2016 年，东梓关人均年收入 2 万到 3 万元。参考数是富阳城镇居民的人均年收入 4 万元。但是，为我查找数据的场口镇政府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农村人均收入实际上是一个概数，实数可能会高于这个水平，但难以统计和估算”。村里的人口大约 2000 人左右，能够参与选举的约 800 人。10 年前东梓关常住人口锐减到过数百人，但近四五年里村民人数回升到了一个稳定的水平。因此很多年里，村里的建设用地没有过太多增加。对于村民，农业转为了副业，农田不是转租就是只种些蔬菜。村口有两处民营企业，生产软塑料管和净水器，容纳百余人工作，更多劳动力在富阳、杭州。打工收入只有一个大概数字，还包括了他们的城市生活成本。

东梓关又有其独特的封闭和独立性，未被时代改变过。许家千年以来是东梓关的第一大姓，占据了七成以上村民的姓氏。看看历任村书记的名单，除了解放初另一大姓“申屠”曾担任过一段时间，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里的书记一直姓许。许家早在清末就以子嗣繁盛出了“许十房”这样的大家族，每一房繁衍下去，彼此都论得上亲戚。叫一声表哥，

能叫出无数辈去。村书记许时新忙于接待四面八方的来客参观，他年轻不苟言笑，是江南富庶村庄里“能人当政”的典型。

有别于以往纯农业收入的计算方法，如今乡村的财富积累方式，已经完全不同。我在场口镇政府看到了关于“工匠班”之类的手工艺传承的免费课程，然而吸引力远不如去富阳城区或场口镇找个工作。“杭州挣一万不如富阳五千，再不如家门口三千”，好几个年轻人都这么跟我说。场口镇有三个已经建成的集中工业园区，政府就处于其中第一区。第一区有几家上市的制造公司，就业人数旺季达到 6000 人左右，春节前后的淡季有 2000 人。目前杭州市全市驾校的统一考试地点就设在场所，考试科目基本至少要住一晚。沿路可看到已经建好今年启用的，服务于驾考的酒店、商业中心和配套措施，农家乐更早先一步发展起来。“除掉个别的民营企业的老板，村民的收入来源多样，工作变化快。”横向比较，号称富阳最富裕的大源，能够统计的也只有民营企业的营收。

非农业生产方式给农村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需要村民首先对生活方式进行自我界定。“热水器使用太阳能还是太阳能加电能？”“平时是否习惯于在厨房餐桌用餐？是否还需要独立的餐厅？”“如果有安全巡视和底层防护，是否一定要加装防盗护栏？”“二楼是否需要公共活动空间”……看着 2014 年 11 月 8 日设计师给东梓关村民开出的一张问卷，发现答案是真实的乡村生活和观念。

江南的现代村民，对自家的房屋有着怎样的期待？随意走进一户农民家中，就能把一切浪漫情怀全部打消。孟凡浩截取的是两个最普通的片段，时刻提醒着一个问题——“在给谁设计住宅？”一个老人独自在厨房里坐在小板凳上面对着土灶台吃饭，大家庭围坐用餐的时间对于如今的农村来说，一年里屈指可数。另一个是超过了一个世纪的古民居里，人们把所有的生活用具和物品都悬挂晾晒在木构二楼和庭院，晴冬里外面是辉光四溢，一进屋子却寒天日暮，内部阴暗狭小无法承载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

邬晓明给我看他手机里觉得最漂亮的乡村照片，他觉得瑞士、法国并不稀奇，难得的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山村。gad 是商业公司，在国内做过不少别墅和商业空间的设计，第一次面对“乡村”设计的真题，就是东梓关。

传统民居的自我意识

东梓关的古建筑群以一个古典的长条形池塘作为核心，向东西两边蔓延。以供销社的食堂为最繁华的据点。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建造院落和建筑的构造都完全不同。“富的人家墙起得高一些，院落大一些，木工更华丽。”想从现状来追寻房屋的历史并不可行。新中国成立后家族私宅已经被村民们分掉了。一户大院居住七八家居民是常有的事。有些依稀的门楣上还有“九世同居”的祝福话。民国以前的式样是以走马堂楼为主，前后两进，中有天井。民国以后的则流行三间二弄，不再看中马头和雕梁，而是以一间堂屋为核心，厅屋组合院落。

富阳沿富春江至桐庐水路沿岸的古民居，从2012年开始进入乡镇一级的保护范畴。对于东梓关，一直到2014年之前，村里最大的矛盾和任务就是古民居的保护工程。事实上大部分居民并不留恋这些院子。新中国成立后的拆分和杂院式的居住，“文革”期间对于祠堂的彻底拆毁，到了80年代以后乡村开始拆掉自家旧宅建新居。很快自建房不再满足于原址的拆建，相对于沿着河岸和池塘的老宅之间按照传统几乎没有一丝空隙，自建房开始靠近公路。许友纯说，自己家8年前建房的时候，是用过去老屋的宅基地置换了一块，而老屋拆除后修建了村里的菜市场。新家面对着村里最主要的车道，另一边紧挨着防洪沟，与弟弟的家对面而居。许家大院、许六房、八房、安雅堂等深宅大院、小楼小院都因为间距过密面积有限被放弃了拆除。

“村童忽相聚，野老时一望。”人们走到长塘附近的古民居当中沉醉不已。对于外来游客，这些地方文化特色带来的冲击力是显而易见的，引起注目的水景有一外一内。古民居靠近内水长塘，江则是不宽不窄。从狭窄曲折的小巷往敞开的空间行走，是人享受其轻松的对比感。本地人的自我意识在建筑中的体现呢？簇新的村史馆位于新居和老民居的必经之路上。总有不少本地老人一遍又一遍地看。老照片里的东梓关池塘和今天的样子看起来似乎没有变化，而东梓关人的生产和生活却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鄧晓明说，有些马头墙被粉刷失去了斑驳感，到他们不断感叹之后，村里现在不再刷白马头墙。传统建筑集体呈现出来的效果，是几百年里集居起来的村民生活的结果。他们使用木匠和代代相传的

基础，在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下，按照自家财力建造出来的整体环境，在上世纪初时建造的式样依然看得出各家的巧思。有一户两侧向里收的大院，直接把门厅设在了临街的位置，两侧的细小木格档里是玻璃的大窗户，无论从街上往里还是从家里往外。有的小楼采取单面斜顶的形式面对池塘，有些在与池塘的连接处设立了自家的水上平台，这些建筑本来具备的斜线的动感和开口的随意，都构成了天然的情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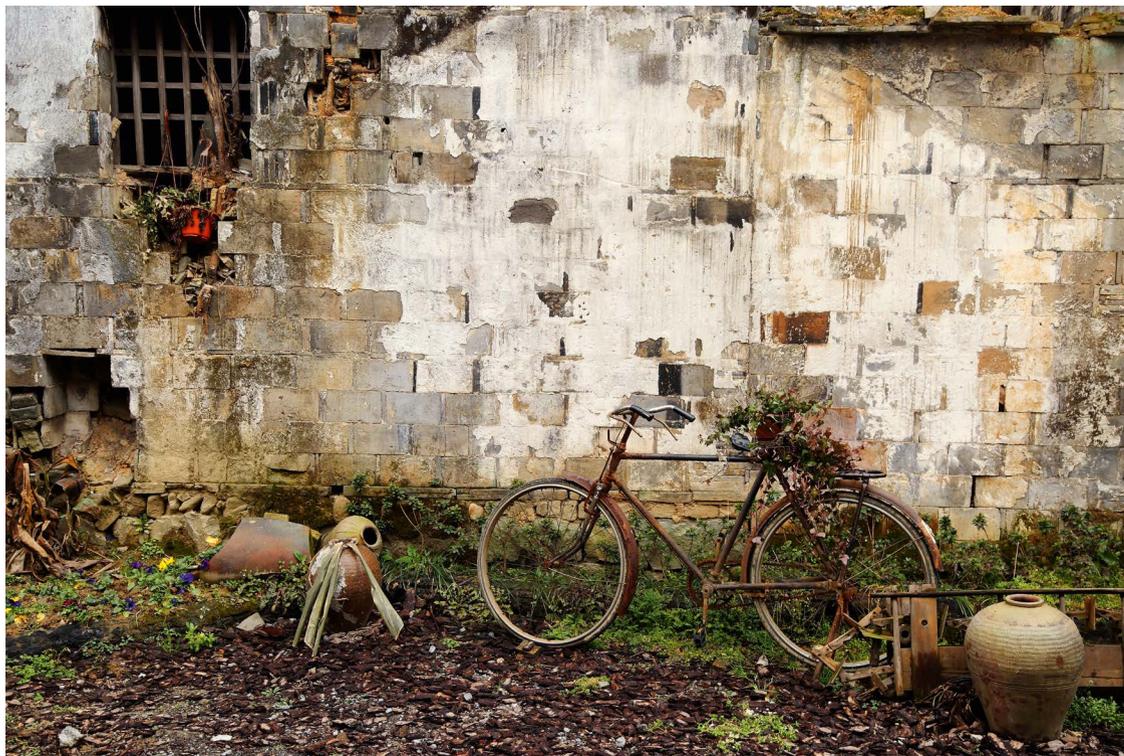
设计师却必须破除这曾经由风水、信仰和家族支撑起来的秩序，把一个时间段的建筑有机成长，集中起来一次完成。“如果由设计师来安排谁家的屋顶高，这种事情在乡村里可以闹得天翻地覆。”农居怎么转型？与以往生活方式割裂的是，在浙江乡村，房屋层数已经成了价值象征。即使四楼五楼不住人也不装修。一层到二层的旧式建筑被彻底放弃，三层是一个基本线。

在征求村民的意见时，还有一个要求得到了全票的通过，就是不和邻居共用一墙。但农居点这样的建筑难以单体为中心而造。每户120平方米宅基地，看似随意集居的建筑，彼此之间却有“小开间大进深”和“大开间小进深”两种不同方向的单元组成。以“间”为单位，由院落作为空间组织方式构成建筑群。一群有几个单元“自由”的组合。

这里的秩序是人为设计的因素。完全不规整的各种形状的道路，又按照团块的逻辑各自组合起来。每一户通过使用功能，有三个透明度完全不同的院落。由南进入的最为宽敞的前院，以花砖隔墙形成视线的穿越与交流，光照充足。内院给餐厅别开一院，扩展了堂屋和起居的空间，是家庭的内聚空间。后院保障后勤，是厨房、农用工具房、电瓶车的放置地。从开敞到静谧再到私密，形成了空间的序列。

传统问题通过技术一次性解决了。比如PVC水管成为农村标配的前提下，新居把所有的水管隐藏在立面之中，而下雨较多无组织排水的问题，在檐口设计内檐沟来组织排水。路面的开口处有从宽向窄的，也有全然被一堵白墙遮掩。原本古民居之间的关系就是偶然的，没有必然逻辑，高低交错。新居中对称和均衡被基本遵守，但偶然的 irregular 反而像现代建筑，有一点自由，予我一种畅然的快感。

防火不再是住宅的重点，大片高高低低的白壁向前推进或向后伸展成为院落，屋高院小，屋顶不仅保留了人字形，还衍生了连续的人字形。最简单



(张雷摄)

经济条件充裕的时代里，乡村却在遭遇“空间贫困”

的硬山房，也就是白壁直接支承的青瓦为顶被取消。江南一带的水乡建筑过去大多沿河而建，平行排列，不太容易显示出青白对比的美感。离开河边，站在一片田野中反而能看出白色墙壁重新焕发出基础的美感，将后面那些翠绿、赭红、棕黄色的瓷砖贴面“洋楼”遮挡住了。

“空间贫困”

到富阳农村，很难听到村民称自家楼房为“别墅”。现在零散地给某户批地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安居点”是一个针对整块村里划拨的宅基地，沿江的农村形成了普遍的建筑模式。

“排排坐”是盛国宏给这样的集中兴建住宅起的一个形象的名字。采访到后来，我大概明白了盛国宏所谓的“所有的村庄具备的条件都是不同的，而一眼望去，建筑的类型却是一模一样”这样千村一面的苦恼。

“空间贫困”并非指一个绝对值，而是相对于乡村收入而言的，亟待改善的村民居住条件。“乡村

随着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像一个隐形的缩小的城市。城市千篇一律，乡村就更是如此。”村民只有在对应地说起城市里的房子时才会用到这个词，“城里买套房给孩子上学结婚，老家建个别墅住”是许友纯满意的现状，和住郊区买学区房的城市中产阶级想法一致。

回家过节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打牌，大多数人都 在富阳城区工作，也有在杭州的。本来就有商贸传统的东梓关并不鼓励年轻人守在乡下。中午刚招待我吃了一顿丰盛午餐的李富英夫妇，午后1点多就已经走在区村口的塑料管加工厂上班。他们已经60多岁，两个女儿在富阳当老师，是村里人尊重的有文化的家庭。曾经明确的城乡边界，随着私家车的普及变得模糊。不过20多分钟车程的富阳城区房价万元以上，随着两年前并入杭州市又上涨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据说早已经没有婚姻上的隔阂了。临近城区就业机会多，政策也不再强制迁出农村户口，青壮年大多把户口留在了乡村，没有因为远走高飞，而无法享受土地红利。

当自由和社会流动不再被抑制，村民们可以绕



1



2



3

东梓关古村江南式样民居：

1. 农居点被认为还原了吴冠中的“江南”
2. 以团块结构组织的住宅错落有致
3. 新居每平方米 1367 元，与当下村民自建房成本相当
4. 三进院落，虚实相间



(本组图片：gad公司供图)



4

开惰性的纵向社会，寻求新的机会。过早的发展反而堵住了乡村建筑的空间。有意思的是，过去依靠城市化才能发展，导致离城市最近的城乡结合部最先富裕起来。富阳市区瘦长的五层左右统一乐高积木的小楼并不比农村的情况更乐观，因为全部是小产权，拆迁成本又太高，成了富阳城区特有的形式。另一个特例，是知名建筑师王澍的文村。文村没有任何古建筑，也没有城市价值体系里的自然风景，而是最普通的山乡环境。因为普通所以被有意挑选了。

许友纯和妻子在富阳骨科医院工作，他们见多识广，依然难以逃脱“空间贫困”的弊病。他们找了在建筑单位工作的同学来，设计了一个进门的户外露台，换拖鞋踩木楼梯上二楼以上都是卧室，这已经算得上东梓关村村民自建房里最有“设计感”的了。他有一个以进口石材砌成的半圆的穹顶露台，下面，停着自家蓝灰色的汽车。按照农村的生活习惯，把厨房建在了室外，一个阔大的院子包括了停车、柴火灶、鸡窝、狗屋这些基本配置，基本上生活的全部内容都是外向性的一览无余。

坐在哪里就有一堆中年人围上来的书记许时新，与农居点同时进行装修的自家，是用朱红色罗马柱，从中间起向上，把一个四层的独立楼房框了起来。近十几年里造就的东梓关建筑“三明治”的正当中的“馅儿”，就是此类以中西合璧为特点的一排自建房。基本元素包括：尖尖的锐角欧式顶，赭红和墨绿色方形大块瓷砖贴就的外墙，几乎完全一致的楼体和每层的户型，是杭州附近乡村的真实景观。沿萧山机场下来，一直往杭州的方向去，最大体量的建筑，是满目的“糖葫芦串”。每层一到两个大窗户的方形房间，笔直地向上起四五六层，层高与邻居绝对一致，顶上一个欧式对称的坡屋顶。有些挑高的专门做出的阁楼，尖的角度更加锐利。再出杭州，向富阳的方向行进，则会发现农村的房屋大多变得“矮胖”了。总体上还是以层高、欧式罗马柱和尖顶作为财富象征的。

从“浙派民居”“杭派民居”“美丽乡村”这样政府主导的项目中看，仅富阳就有上百个乡村的住宅建设被纳入进来。乡村建设一系列复杂层面中，仅就这些年统一建造的村民住宅这一点的实践如何？我探访了富阳近几年最有代表性的几个村子。从东梓关，顺着富春江水向东走。几公里以外就是两年后才落成的，场口镇第一批农居点联群村。这

些房子大多以低调和谐的，蓝色加棕灰色的外立面，用仿石材的外立面代替亮晶晶的瓷砖，统一三层的高度，屋顶是两家共用一个对称的缓坡，而不是锐利的尖顶。底层是封闭式车库和楼房入口，厨房和餐厅也在底层，楼上是起居室和卧室。格局已经大方许多。不过联群村更先进的，是它的基础设施建设。我看到的污水处理系统，已经是浙江省首屈一指的生态污水处理方法，不仅集中收集、灌溉附近的农田，也分为几个级别，就地循环使用。联群村的道路宽阔，来回错车都毫无问题。靠近江边风景最美的地方，是免费的健身器材设施和篮球场

更早的是富阳花1亿元打造的黄公望村。紧靠旅游地和富阳交通要道。因为靠近了高尔夫球场和黄公望隐居地的山林，村庄附近更大面积的是别墅区。黄公望村的政府投资花在了基础管网和公共设施等各方面，可以看到几乎与欧式别墅一模一样外观的村民自建房，不再是土洋结合的小楼。道路、路灯、管线明显标示了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严格按照临近别墅的规格建造和装修。以农家乐的经济形态为主，得天独厚。挂了一个金融小镇的牌子，在入口的地方据说有几家私募基金公司在村口设立了办公室。

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位于与富阳城区一江之隔的大源镇望仙村，号称“富春南岸第一富”。望仙村是“空间贫困”的代表。这里中国最大的卷帘门生产基地，全部是民营工厂。1978年建立了第一个电梯厂后，90年代就成为中国卷帘门之乡。烟囱不少，厂区成片，村庄里早早盖起了密密的小楼。大源更像是随处可见的县城，几乎所有的房屋都建于90年代，现在反而像简陋粗糙的向城市化发展到一半又乱了章法的过渡地带。边界由来回都是货车的马路构成，农田在这里更像是珍贵的景色点缀。

望仙村新农居点同样由gad设计，但在样式走中规中矩的路线。从山里流出的活水注入村子，祠堂也被恢复了。随意步入一家，已经看到屋主的进口轿车，和家居摆设。中年夫妻在镇里的工厂从事管理工作，穿着时尚，生活方式也完全城市化了，家里放着流行音乐，他们说：“我们村不存在困难户，但是拆迁修路和建厂的村民却有不少。”房子建好了还有6户人家放弃了，村里就每栋加价10万元，吸引从本村考出去的外地人才回乡买房。“如果不是建得好，这些人可能不会回来了。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已经买了，要回来养老。”只有门口的二分地让他

们流露出属于农民的喜悦：“现在超市的菜哪里有我们自己种的好吃。”

文化权力的地域表达

草纸早已消失，这一带最好吃的豆腐“同裕昌”的招牌还在，许如元打了应急灯，招我去自家楼梯拐角的一个细密木格子的碗柜。“向里头看！哦！”我伸长脖子，睁大眼睛，终于看到柜子的隔板上老牌匾，因着木头是上好的结实杉木板，干脆一劈两半，做了这柜子的隔板，已经承载了十来年一家人吃饭的家伙。那眼温暖了几辈旅人的土灶，至今仍在每天凌晨3点准时燃起炉火。

邬晓明告诉我，他至今仍然觉得农居点尚未完成，是因为起初的设计中就有一处关键的“文脉”要素，乡村书院。书院起的最大作用，是把“三明治”的两面新老建筑，通过一个公共配套连接起来。这个书院将用邻村整体拆除的一栋老房子搭建，可是村民分配完房子之后，专门用于这栋公共建筑的款项却没了来由。“书院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一个精神活动的中心，将会成为活力源。”乡村的公共空间被比喻成一棵老槐树，或者公用的水井。这样自然形成的公共空间，在东梓关实际是存在的。

至今三三两两总有人聚集的池塘边的凉亭，是上世纪初村里子孙最多的老人许十房子孙们捐资修建的一所给过路人休息的地方，取名“继善亭”。战乱之中为父母祝寿修建的亭子，大多是希望行旅之人受惠。水路商贸往来频繁造就了东梓关码头文化和豪爽善良的民风。郁达夫在这里养病的一年里，正逢军阀混战的间歇，老百姓少有喘歇，富户们就在自家院落基础上改建或直接兴建房屋。几代人才得造一次房。许家大院、安雅堂都是战争间歇的民间财富积聚的成果。光绪年间创立的东梓小学也借民居办学。

许如元告诉我，老讲究里，四角的木桩要绑上粽子，天亮前破土动工，还得供姜太公，民间传说是防火。梓树是当地人古已有之的最高一根中心梁的第一根椽子，必须是梓木的。梓木比杉木重，有镇宅的意思。新居的后门，没有与后面房屋的前门相对的。后半部的屋子要比前半部略宽一点，不是绝对的方正。表示后面的日子“长”。“檐水三尺”的距离仍在，两家的屋檐水不至于落在别人家里，富春江一带的古民居外墙相隔六尺是一个老习惯。

“这就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肌理。村民的房子不是一蹴而就的。”乡村的生长过程，本身就与开发、规划的思路打了颠倒。政府牵头先花1000多万元，用在看不见的地方，从路管网配置，全部电线上改下，自来水和污水系统，垃圾处理，垃圾桶按类型颜色摆放在街巷的定点位置，每天垃圾车定时清理。把久不疏通的池塘、水渠全部变活，死水成为活水。“现代化”能解决不少问题，但也得做出让步。比如所有的新居村民，都反对在自家房前屋后植树。按城市逻辑，据说现在富阳的别墅区房凭树贵，只因为临一棵大树，别墅价格能高数十万元。而东梓关的讲究是传统富春江岸农村的习俗，家门口不能有大树。因此农居点只能看到一些细小低矮的绿化。

洪斌是让村民做出让步的执行人，他更懂得村民要行使的权利，绝不是谁家墙高谁家墙低这么简单。最后居然能把调查中那么不一致的答案统一了。最大的一个矛盾点，也是现在村民对新居的要求，是要能开车到自家门口。村里正在兴建免费公共停车场，但是时至春节后，几乎家家门口都停着至少一到两辆轿车。许如元带我去看了自家的6部车，从农用车、小板车、电瓶车到三个在城区上班的儿子一家一辆轿车。尽管村庄并没发生过汽车偷盗之类的事，但把交通工具锁在眼皮底下这件事却让很多人非常执着。

许静允正抱着小女儿在路边水渠里玩水。“这是我小时候经常玩的，后来就成了臭水沟，池塘也堵了，去年死水变活水以后，我妈妈、奶奶都要来水里洗菜。”因为习惯于边洗菜洗衣服边聊天，东梓关的妇女把内水系的池塘水渠作为社交场所，现在洗衣服由机器代劳了，就只剩下洗碗是八卦的好时机。这样的人际关系和情感交流点，却正是书记许时新伤脑筋的地方，村里自循环的水系无法除油，“洗菜还好，油污是漂在水面上的怎么弄？”

一走进村里去，所有的男性都拿着烟过来了，表情不是讨好和惧怕，而是欣喜。人叫洪斌“指导员”，恍如进了什么老电影，我以为是一个外号。场口镇政府为了一个村项目的实施，都会派一个极为熟悉本地或者带有本地血统的干部作为真正的执行人。外婆家就在东梓关，虽然不姓许，却为了东梓关的项目在这里扎了三年。

“本来这一片直面农居点的农地就是下一批村里准备集中起来给大家建房的土地，现在大家一来，摄影机往这一架，这片地动不了了。”这一块土地就

“现代化”能解决不少问题，但也得做出让步。比如所有的新居村民，都反对在自家房前屋后植树。

是农居点的前景，冬天去虽然看不到什么生机，生长季节却是一片水稻。而作为“前景”，这片一看就七零八落缺乏系统耕作的土地，居然焕发了前所未有的价值。

即使不进入一般意义上被城市人定义的价值体系，乡村原有空间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仍然真实、有效又和谐。“现在上楼、旅游、民宿、古镇这些说法都不是最受欢迎的了，新农居点是造成了关注，但是热潮一退，将来怎么办，还是在摸索。”他很清楚东梓关的后发优势。近几十年里影响了东梓关人收入结构的不仅有农业和造纸，还有一个以骨伤科为核心的医疗服务业。

许十房的另一个产业是安雅堂。上世纪60年代，政府为名医张绍富在安雅堂开诊。在其他乡村凋敝的地主、乡绅、知识分子信仰中，许十房、张绍富在东梓关的名望却与日俱增。骨伤科医院，是80年代之前，整个东梓关的副业核心。另一个是“春和堂”药房。当时村里有知名的糕点铺、杂货店、烧酒作坊和饮食，许如元记得自己从小就在供销社门口帮母亲卖豆浆，医院的病人和要上船的客人们排着老长的队伍。

以骨伤科为本，再加上水陆发达，东梓关成了闻名江南的一个以治疗和休养为主体的小村庄。郁达夫来东梓关调养了一年，也是慕名一位学医救国的许大夫。解放前几乎家家都会给病人提供疗养的床位，60年代兴建的一栋四层住院楼，一栋三层宿舍楼，一个巨大的诊疗大厅的骨伤专科医院至今已是荒烟蔓草。参天大树上，只有蹦跶着的松鼠。80年代中期医院规模需要扩大，成立富阳市骨科医院，整个医疗产业连人带医院转移到富阳，至今仍是浙江乃至全国闻名的骨科。东梓关有许多家庭至今仍以在骨科医院上班为荣。

正因为个性鲜明，东梓关才不轻易被城市文化据为己有。比起有意建的土里土气，城市人将“乡村生活”作为奇景欣赏的那些精雕细琢的“朴素”，

在东梓关完全看不到。新居之所以能够造价等同于农民自建的房屋，采用的是当代工业化生产的材料，以最经济的砖混结构形式，保温刚性屋面楼板。越是乡土的材料代价越高昂，难以让农民自掏腰包。石、木、泥、竹这些传统素材尽管能唤起地方文化的情感，却难以成为价廉物美的回迁房的主材。加上传统加工手艺失传，生产成本高使人工成本不断增加，实现这样表相的“乡野”并不是一贯务实的商业设计公司的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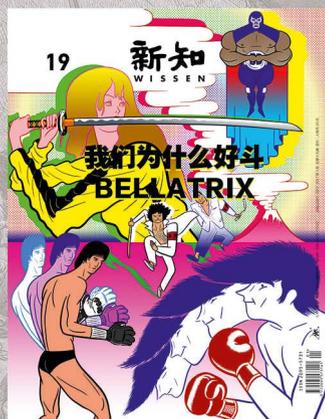
农民住宅应该可以禁得起“造”。gad 设计总监张微说，必须是最适合农民自己维护和修补房屋的材料。城市建筑代价过高，设计师们纷纷扎入乡村。乡村现代生活其实很少进入建筑和设计的视野当中。农村生活方式，不可能成为艺术家想当然的标本式的“保存”或者创造。邬晓明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农村屋顶最常见的，银光闪闪的太阳能板热水器和墙壁上的空调外挂机。“不是说古建筑不好，而是农村的现代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求他不要用，或者弄出雕梁画栋，对于老百姓一点意义也没有。”在新居中极刁钻的角度我终于发现空调掩藏在虚实的栅栏当中，而屋顶的斜坡正是放置太阳能板和水箱的位置，专门设计了一样大小的受光面。

张微觉得从北欧到日本，“式样”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日本除了和式、洋式建筑，最多的是普通平民的无差别式的实用住宅。“当然他们的栅栏、园林、花木还是有很多特色。”“设计师不是去农村说我给你创造一个房子，而是你需要什么样的房子，把所有的要求都告诉我以后，我加入设计和美观的一些把握。如果有人嘲笑这十年来乡村那些不土不洋的别墅，回头一看，城市的建筑一样在做‘法式宫廷’式的对称、‘纽约公寓’式的玻璃，建筑最容易反映出文化的自信与否。”

乡村建设是为谁而建？“城里人带着资本到乡村占有资源，另一些城里人来消费资源，和土地的主人并没有发生太多关系。”孟凡浩指出的是许多打着“乡建”旗号的实质。中国承接全球化一般性制造业的梯度转移后，产业工人在一般制造业中获得的报酬不足以市民化，原先几亿人“进城”的目标，眼下并不能立刻实现。近两年逆城市化的趋势，是指农村在生态环境、空气质量、食物安全和人际关系上越来越显出了相对城市的优势。在中国目前城市化率还不高的情况下，逆城市化趋势在很多地区却日益增强。东梓关的美，从不因乡村是一个没有改变过的地方，而是一直在时代变化中，保持了原真性。☑

《新知》2017年第1期上市

(总第19期)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新浪微博 @新知

微信公众号: 新知 WISSEN

关心一些恒久的事情——理性进步,智识生活的乐趣,美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新知 2017年第1期要目]

Entrée

大众的反叛

幼稚社会

5种改变我们世界的语言策略

噩梦世界与善良天使

Main

树欲静,风不止——如何学习面对冲突

战争与药品

昆汀电影中的“混蛋”进化史

摔角:从罗马狂欢到美国大梦

街头霸王:手指与虚拟空间中的格斗传说

中国网络仙侠与玄幻文学的异国观众

Fusion

葡桥简明邵氏武侠电影技术词典

侠客的江湖

《箭士柳白猿》中的制度、拳理与气势

九匹骏马:堂·吉诃德和他的世界

那些年,我们所不知道的(高文爵士和绿骑士)

坚甲重铠:防护与生存之道

中东三大民族的军事传统

酷刑为何是恶的?——关于酷刑的道德哲学分析

Dessert

与中国擦肩而过的认知:在早期欧洲汉

学中发现巴米扬

因父之名:电影中的菲德尔与拉丁美洲

戏中戏,镜中人——记米德国际纪录片

电影节的一次放映

“匣子”、“格子”和“框子”

影像报道:大质量恒星的挽歌

1 BOOK 140 短评

《新知》2017年订阅须知

《新知》双月刊,每期160页,全年6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120元。

2015年珍藏礼盒,合订本已上市。

2016年刊开始征订!

读者可到三联生活网订阅: www.lifeweek.com.cn, 全年订阅包邮,并可成为《新知》读者俱乐部会员。

或在卓越网、京东商城等订阅: www.amazon.cn / www.JD.com





手作

演出

艺术

亲子

美酒

旅行

松果是一个舞台，这里有：
城中最好的文化活动
最富营养的生活知识
最迷人的生活家
最有态度的生活方式

松果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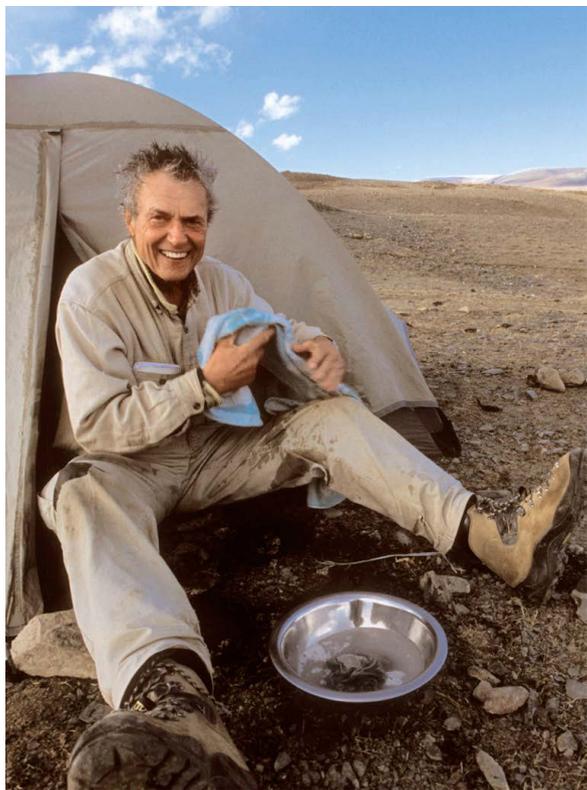
与一万个生活家，一起创造美好生活！



扫描关注松果微信



扫描下载松果 APP



拒绝“降级”的大熊猫

记者 / 刘敏

2016年9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保护名录上，大熊猫从“濒危”降级为“易危”。但这一认定并没有得到国家林业局的认同，有关负责人称：“大熊猫仍是濒危物种，将大熊猫保护等级降低还为时过早。”保护大熊猫，既出于这个种群的生存现实，同时又是一条与各方利益相关的微妙链条。

大熊猫调查的两套数据

今年2月份的卧龙自然保护区，还处在一片冬季的萧索里。去五一棚的山路处在阴坡，走到半山腰就开始出现了积雪。再往上走，前人踩过的雪已经变成了冰，坚硬湿滑，一脚踩不稳就会扑倒。整座山坡是竹子与各种针叶树种组成的密林，即便是正午，林下也是幽暗的。有些云杉至少有30米高，笔直地刺向空中。山里此刻寂静无人，一枚枯叶从雪坡上滚下来，



都能制造不小的声响。

1978年建造的五一棚，是中国最早开展大熊猫野外观察的地方。时间要再往前推，五一棚所在的卧龙保护区，是1963年成立的中国第一批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它也是国内名气最大的大熊猫自然保护区。

带着我和摄影记者上山的护林员杨帆，常年在这种陡峭的山路上做巡护。他所在的邓生保护站当下最为重要的野外任务，一是从2011年开始的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再就是2015年卧龙给野生大熊猫建



(于德众摄)

左图：乔治·夏勒是最早来中国合作熊猫野外调查的动物学家

右图：熊猫“水秀”和它未满一岁的宝宝正在四川卧龙核桃坪野化培训基地做野化训练

立“户籍”档案的科研调查。在常规巡护路线之外，护林员的野外调查走的已经不是山路了，而是要钻到竹林下面的空隙里。那里更容易找到大熊猫新鲜的粪便，捡粪便之后做技术分析，这是统计野生大熊猫数量最直接的办法。

而最近这次历时3年的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就是2016年IUCN给熊猫降级的最直接数字依据。

从1974年开始，国家林业局每隔10年就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一样的大熊猫调查，业内人士简称“猫

调”。前三次的统计结果分别是1050~1150只、1114只、1596只。第四次“猫调”历时3年，在2015年公布的最终数据是，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为1864只，圈养的大熊猫375只，比第三次调查时增长了16.8%。

但这四次大熊猫调查的数据，多年来一直有争议——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是，从第一次“猫调”开始，“官方对外”和“内部流传”就是两套数据。

我国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大熊猫调查，业内普遍认同的说法是超过了2400只，甚至更多。但因



(于堃众摄)

1

1. 生活在核桃坪野化培训基地的熊猫“淑琴”在吃早餐。食物有窝头、白夹竹和笋

2. 在卧龙自然保护区五一棚附近，巡护员发现小熊猫的粪便

3. 生长在海拔2500米以上的冷箭竹，是卧龙野生大熊猫最喜欢的食物



(于堃众摄)

2



(于堃众摄)

3

为要体现大熊猫的珍稀性，这个数字被人为砍掉了至少一半。

1980年的第二次“猫调”，正值在国有林区进行木材采运、加工的国内森工企业大规模采伐，有研究者撰文指出：“有关部门及森工企业由于担心发现有大熊猫会影响当地的采伐，于是就谎称没有大熊猫，从而成为调查的盲区和大熊猫分布的白区。”

英国动物学家约翰·马敬能（John MacKinnon）博士1986年受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派遣，来到中国参与熊猫保护，他觉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熊猫总数应该比2500只还要多。“熊猫数据最奇怪的是，各

个县都有自己的数据，但不能把他们的数据相加得到总数——每个县都想报多点，拿到更多经费，但中国想让总数看起来小一点，才能从国际社会拿到更多的钱，所以数据是不可靠的。”

前三次大熊猫普查，一直采用的是“咬节法”：一只成年大熊猫一天要排泄达十几公斤，这十几公斤大约为100~200团的粪便。用咬节法统计大熊猫数量时，如果粪便之间距离超过预估的大熊猫活动范围，就判定为两只熊猫；在同一范围内，如果粪便里遗留的竹竿、竹叶咬节的长度不同，就评估为两只大熊猫。

这个办法现在看来误差极大，即便是同一只大熊

猫，吃不同的竹子、用不同的姿势、不同的健康情况，排出来的粪便咬节都有很大差异。如果划定的参数有调整，最后统筹的数据就有大幅变化。与此同时，影响数据的政治逻辑又一直没有变化：保护区把数字报高了，外界会认为说谎；说少了，那过去10年的保护成绩到底在哪里呢？

第四次熊猫调查采用了DNA技术，对大熊猫粪便上的黏液做分析，要比“咬节法”更为精确。调查用了3年时间，但又花了1年才公布结果。有采访对象告诉我，四川有些保护区已经没有熊猫了，保护区从陕西偷偷调过来大熊猫的粪便撒在竹林里，再派人上山去采——这是个假的老办法了，只不过这次有了DNA技术，分析出这是秦岭大熊猫的遗传信息，最后闹了笑话。

所以，IUCN用作参照系的猫调数据，到底值得采信吗？

88岁的胡锦涛，恐怕是这个问题最令人信服的解答者。胡锦涛被称为“熊猫之父”，是国内资格最深的熊猫研究专家。这位一辈子坦诚、爽快的专家在业内拥有泰斗级别的名望，我的每一位采访对象提到敏感问题，都说“你最好去问问胡老先生”。

在电话里，耄耋之年的胡锦涛思路清晰，不假思索地列举出一系列数字：“第四次‘猫调’结果是1864只，这个数字没有包括年幼的熊猫，实际上加上年幼的，应该有2000只左右。”

“这个数字是一个相对数字，并不是绝对数字。”胡锦涛解释，“四调”的数字本身就是通过设置样线加DNA调查，再用统计学方法计算出来的，即便现在用分子生物学，用粪便上残留的肠道上皮细胞做DNA分析，科学上要细致些，“但这个调查历时三四年时间、涉及几十个县，怎么可能把每一只熊猫的粪便都拾到？”

胡锦涛认为现在的统计手段已经很细致了，跟第三次调查相比，相对数字是在上升的，另外大熊猫栖息的环境面积也增加了。“90年代提出退耕还林，提出保护原始森林，过去那些采伐的栖息地也恢复起来了。以前栖息地只有1万多平方公里，现在已经扩大到了2.5万平方公里，恢复得也很快。”

按照这个方法看，即便调查会受到调查强度、范围的影响，现在野外大熊猫的增长趋势也是很明显的。

过去把大熊猫归为濒危，参照的是IUCN的划分标准：成年个体小于2500只，趋势下降，且没有任何亚种群超过250只成年个体。根据2015年正式公布的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岷山种群已经拥有400只以上的成年个体。

“简单来说，大熊猫数据是稳中有升的趋势，不是衰败的趋势，根据这个才被下调了等级。”胡锦涛说。

降级与圈养大熊猫无关

大熊猫保护的降级，本质上正是说明保护的成功，因为大熊猫不像以前那样濒危了。来卧龙之前，我跟很多人一样，以为这种成功是因为圈养大熊猫的成熟：大熊猫如今正在变成互联网世界的一个“网红”形象。就在今年2月，iPanda熊猫直播刚发布了一段熊猫抱大腿的视频，视频里一只叫“奇一”的亚成体熊猫黏人地追着饲养员，反复跌跌撞撞地扑过去抱住饲养员大腿不放。这段视频在微博上被播放了5000多万次，在Facebook上有1.2亿浏览量。

这样的热门视频源源不断地出现，那些圈养环境下的大熊猫看起来柔软、温暖、健康，与上世纪那种“竹子开花”环境中大熊猫悲情的形象相去甚远。

那么培育更多的圈养大熊猫，未来再放归，是不是就能直接扩大野外大熊猫的群体了？这种想法确实是错误的。

我在核桃坪野化培训基地见到了一群圈养大熊猫。早上9点钟，基地第一次喂食开始了，笼门一开，淑琴和壮妹两只熊猫就立刻扑到各自的隔离室里，抓过递来的窝头，吃得满肚皮都是渣渣。这两只熊猫都是2008年后出生的，淑琴体形大一点，看起来格外懒惰。她抓住饲养员刚塞进去的竹子，下一秒，整个身体已经躺倒在水泥地上，最柔软的腹部不在乎地袒露着，上面堆着一堆还滴水的竹叶。

这几只大熊猫正在展示网络视频里同样的憨态，吃竹子时，两只熊猫展现出了出人意料的灵巧，淑琴用平时隐藏的第六根指头扳着竹子，像吃甘蔗一样，用白齿咬住一头，顺势一拉，竹壳就撕下来了。她突然发现了我，黝黑的眼睛开始盯着我这个陌生人看，但也没做出任何其他举动，与此同时，她的爪子和嘴一秒都没有停止，竹壳一条一条地被撕下，她大口咬断一节嫩心，嘎嘣嘎嘣地大嚼起来，动作之快，好像下一秒竹子就要被人抢走一样。淑琴发出了欣快的咀嚼声，尽管她每天都要吃掉几十公斤的竹子，在这个早上，她的表现就像是第一次吃到这么美味的食物。

与此同时，穿着熊猫连体服的饲养员们此刻正在野化场地打扫卫生，头一天的旧竹子已经发黄，每天熊猫得到的食物都超出了食量，它们不需要寻找食物，只要一屁股坐在竹子堆里吃自助餐就可以了。

圈舍打扫完，壮妹一直在隔离区不出来，饲养员

跑到园区外，“壮妹！壮妹！”连叫了几声，壮妹循声晃悠悠地走到户外，她能听懂自己的名字。跟所有圈养的熊猫一样，壮妹从小跟人在一起长大，她不怕人。

核桃坪野化中心的这些熊猫，已经是圈养的第二、三代了。从80年代开始，卧龙保护区就开始从野外抓大熊猫做圈养。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野外大熊猫抓捕时间要更早。

胡锦涛告诉我，从一开始，圈养就不是为了保护大熊猫，而是为了满足社会各界、国内外对大熊猫的需求。从1941年宋美龄、宋蔼龄向美国民间机构赠送大熊猫开始，熊猫就变成了中国最著名的外交国礼。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有9个国家获赠24只熊猫国礼，最著名的就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带走的那一对“破冰”意义的建交礼物。在1982年之后，无偿赠送停止，大量商业租借涌现。动物学家乔治·夏勒见证了1988年初，至少有30家美国动物园及其他机构在申请租借熊猫的景象。那时国内林业部控制约27只熊猫，中国境内各动物园拥有60只。

这些熊猫全都来自野外。胡锦涛举了个例子，过去全国野生熊猫最多的地方是四川宝兴县，这也是法国神父戴维第一次向世界介绍大熊猫的地方。“第一次猫调这里有300多只熊猫，现在只有100多只，为什么？因为从50年代开始，宝兴一共抓了136只熊猫，而且抓的主要是幼体，因为幼体最好抓。”宝兴县只是熊猫热中受害最大的地方，其他还有十几个县也在捕捉野生熊猫，加起来就有二三百只了。

直到1999年之前，这些被抓捕的大熊猫都很难做人工繁育。新生幼崽不断夭折，为了维系这个人工群体只能继续抓，这对野外种群的破坏比什么都直接。到了2000年之后，因为中美科研合作，卧龙解决了育幼难的问题，才开始迎来现在大家熟悉的、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的快速增长。

“圈养大熊猫的好处，就是人工繁育成功后，不抓了，再加上栖息地保护和反盗猎，野外种群就上去了。”胡锦涛这个答案让人有点瞠目结舌。

“圈养和野生的，只看它们活下来，那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但真正情况已经有很大不同了。”胡锦涛又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北京动物园过去是做大熊猫繁育最好的单位，但是短期看不出效果，长期就明显发现，圈养的环境下，大熊猫的繁殖能力一代不如一代，北京动物园现在剩下的熊猫已经不能自行繁育了，必须运到四川来换种交配。

这种交配，大多说的也是人工授精，圈养环境下

的大熊猫脱离了野外雄性争斗、获得交配权的生活习惯，单纯把一公一母两只熊猫关在一个笼子里，只能引发骇人的武力打斗。为了让圈养熊猫出现自然繁殖行为，管理者们使出了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办法：让熊猫看“爱情动作片”、服用伟哥，或者使用人类的情趣用品……近亲通婚也是个问题，2016年12月28日，一只叫“盼盼”的31岁高龄熊猫刚刚去世，这是一个繁殖能力惊人的公熊猫，现在圈养的群体里，有四分之一、超过130只熊猫都是它的后代。这必定存在近亲通婚的大问题。

人工饲养的熊猫吃得好、长得好，营养比野生熊猫丰富得多，但依旧不能阻挡它们的繁殖力逐代下降。有人毫不留情地讽刺，跟家猫一样，恐怕我们现在正在拥有的是一个“家熊猫”群体。

现在我们当然不能再随便去野外抓熊猫丰富种群，但圈养熊猫如果继续这么发展下去，迎来的会是另一种种群衰退。

真正重要的野外栖息地

如果国内把大熊猫保护级别下降，也许最直接受影响的，就是邓生保护站这样的基层组织。

杨建是卧龙保护区邓生保护站的站长，他1989年从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卧龙保护区，几乎亲历了国内对大熊猫保护的整个发展过程。三四十年来，在大熊猫保护领域，国家的投入、国际科学界的兴趣，都远远超过其他物种。

中科院动物所一名研究者告诉我，做熊猫的研究更好立项，有些物种，一年给个十几二十万元经费就不错了，熊猫项目批下来的经费会是百万级别。不过，研究者要想发论文相应也更难。“大熊猫的论文发之前，导师、发稿单位要反复审核，大家的论文都发到*Ecology*、*Science*、《美国科学院院报》这种顶级学术期刊，导师也不让我们把论文发到级别太低的杂志，‘丢不起人’。”

杨建在基层，这些年还带了不少来自美国、欧洲的外国研究生。“那年轻学生来卧龙之前，对熊猫完全一无所知，不知道怎么上山采数据。我们都是手把手带他们做野外监控，几年后这些外国学生做出来硕士博士论文，再回国去找教职，比其他同学容易多了。”

但杨建和员工们告诉我，更多的经费都投入在学术论文、圈养等看得见的产出上，对于普通保护站的投入，他们觉得还是不够。

邓生保护站是卧龙保护区海拔最高的保护站，地处2700米的半山腰，再往山上走就无人居住了。刚过完元宵节，窗外下了一夜大雪，保护站体感温度只有十几摄氏度，久坐不动就会瑟瑟发抖。卧龙本地家家都点着几个电炉子，即便屋里没人也不会关：一关上，湿冷的空气就会顺着各个缝隙涌进来，侵蚀掉一切干燥的物件。邓生保护站点着电炉子，还开了空调，这是近两年的福利——2008年地震前，邓生站的原址都还不通电，晚上点炭火取暖，靠写小纸条让过路的大巴车捎口信；地震之后，保护站员工们借住过道班房，住过外界捐赠的集装箱，上面掏出来几个窗户，冬天冷得房顶都是冰花，等到这两年终于住进了香港援建的小楼里，2015、2016两年都断断续续地停电，到了2017年，电力和网络信号才终于稳定了。

杨建在卧龙工作了快30年，一共只见过三次野生熊猫——真正的野生大熊猫是怕人的，远远闻到人的气味儿就跑走了。邓生保护站管辖的范围最大，一共19名员工，分三批轮休，管理8万公顷的范围，这相当于整个成都市建成区的面积，其中分布着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和河流深谷，很多地方都是无人区，想要在这么大的范围内与熊猫打个照面，几乎是不可能的。

像“猫调”这样的体力活，庞大的数据都是基层保护站员工带着民工们跑出来的。调查把卧龙保护区划分了网格，每个格子派人去采集粪便。做熊猫调查，冬天不合适，过河水太冷，下雪也会盖住粪便。夏天也还是令人恼火：提取DNA，用的是新鲜粪便最外的那一层黏液，如果不下雨、不被太阳暴晒，黏液可以保存15天。黏液在冬天会冻得凝固，夏天又极容易腐烂。“捡到一坨粪便，如果上面颜色加深，就采集背面做样本，如果下了雨被冲过，就采两侧的，底下的泡水已经沤了嘛。”杨建说。

粪便其实能体现出野生熊猫的许多习性。野生熊猫是一个机警、生命力旺盛、有强盛性欲和繁殖能力的群体。熊猫跟人一样，也爱在舒服的、能晒到阳光的、坡度平缓的地方生活。母熊猫的领地是固定的，公熊猫会为了交配在山区穿来穿去。队员们在很陡的山坡也发现过粪便，一般都个头大、粗一些，应该是过路的公熊猫留下来的。

每年到了春季繁殖期，各自独立生活的公熊猫会向母熊猫生活的区域聚集，公熊猫们靠打斗争夺交配权，反应在粪便上，围着火炉聊天的员工告诉我：“在餐厅这么大的地盘（20平方米左右），我们在繁殖期就采到过五六只熊猫的粪便。”

直到1999年之前，这些被抓捕的大熊猫都很难做人工繁育。新生幼崽不断夭折，为了维系这个人工群体只能继续抓，这对野外种群的破坏比什么都直接。

西氏贝蛔虫目前是导致大熊猫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生活区域的不同，大熊猫群体中的一半甚至全部个体都会被感染。杨建说，卧龙曾经在都江堰虹口救治过一只野生大熊猫，吃了打虫药后，这只大熊猫排下来近千条蛔虫，蛔虫的数量过多，就可能造成肠梗阻，进而导致更严重的疾病。员工们在牛头山上捡到一坨粪便，在里面就看到过蛔虫。杨建猜测熊猫自己有对抗意识：“我们捡到的粪便里有过石头，核桃那么大的一个，也有的粪便外面一圈黑得很，是熊猫吃了泥巴，我们觉得这都是熊猫为了打虫子，自己主动吃的。”

然而这些工作中总结的熊猫习性，并没有太多学术价值。要真正被科学界认可，需要有严谨的、长期的观察数据，经过模型计算，最后得出具有科学意义的分析结论。然而像邓生这样的保护站，有大学文凭的员工不到三分之一，普通员工能跑山，但不会处理数据，会处理数据的大学生们来工作一两年，嫌条件艰苦就考了其他公务员调走了，或者一开始就留在山下的保护局工作，从来不参加野外巡护。整个保护站能独立撰写论文的，只有一名刚刚从清华博士毕业回来的年轻人，他其实也是保护站的老员工，是杨建鼓励他去脱产读的书：“是我们集装箱里读出来的博士嘛！”

拿邓生保护站来说，“猫调”只是日常工作中被抽调的一项工作，日常的主要工作还是巡护：员工看不到大熊猫在哪里，但是为了大熊猫，要关注栖息地的一举一动，盗猎、砍树、采药、防火，都要监督。很多问题都还是老问题，现在卧龙早就没有猎杀大熊猫的犯罪行为，但是员工们开玩笑，说村民“除了熊猫不打，其他的通打”——居民们还是会偷偷猎杀羚牛、水鹿等，现实情况里，遇到偷猎者巡护员们喊一下赶走，不会去追——保护站没有执法权，万一对方用枪回击怎么办？

这些烦琐的工作看起来跟熊猫没什么直接联系，邓生保护站是香港对口援助的，经常有香港团体来参观，一进门的问题无一例外，都是“哪里能看到大熊猫？”杨建永远要讲清楚一个概念：在保护站，是看

不到大熊猫的。

但正是这些工作，是保护野生大熊猫最关键的方法——保护好栖息地，才能让野生大熊猫逐步、稳定地扩大生存空间，扩大种群。

前两年，邓生保护站在山上安了50台红外相机，从2000米的针阔混交林到近5000米的高山流石滩，拍到了大量野生动物的照片，有金丝猴、羚牛、藏酋猴、水鹿等当地常见动物，还有雪豹、豺、黑熊等极难发现的物种，这证明了大熊猫这一旗舰物种对本地生态的庇护。杨建这两年的期望，就是学成回来的博士员工能写出来几篇雪豹的论文，至于论文写好的关键，“还是经费啦”。

尚且遥远的放归

至于那些圈养的大熊猫，最终的未来，还是放归到野外栖息地。

放归的方式40多年来也有不同争议。70岁的马敬能至今在质疑，为何中国不能把大熊猫异地放归到神农架这样的地方：“现在熊猫已经没有什么天敌了，大熊猫放归最大的危险是一只熊猫杀死另一只熊猫，像神农架这样，过去有熊猫、现在区域性灭绝的地方，为什么不能放归几十只熊猫呢？人们在错误的路上走了30多年。”

胡锦涛针锋相对地告诉我，在神农架放归的想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竹子开花的时代就提起过，当时中央领导已经同意了，但是最主要的反对者就是他。“神农架在清末民初时还有熊猫，但过去环境好些，熊猫都消失了，现在的自然环境还不如消失的时期好。”胡锦涛一直认为，保护现有栖息地是最好的办法，过了30年，他的判断有了新的佐证，芦山、乐山等地多处过去没有熊猫的地方，最近频频发现熊猫，证明熊猫的栖息地扩散了。“你觉得是自然扩散好呢，还是把它们捉到一个原来没有的地方好？”

国内科学家还曾经有过克隆熊猫的想法，如果是以扩大大熊猫野外种群为目的，这看起来性价比实在过低了：正常繁殖的圈养大熊猫尚且没能大规模放归，一只克隆的大熊猫，自身还带着免疫力等问题，距离野化放归那一步就更远了。

国内现在圈养大熊猫数量最多的有两个单位：一个是成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胡锦涛是第一任中心主任，这个中心隶属于国家林业局；另一个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属于城市动物园系统，归住建部管理。两个单位平时各自运营，繁育的计划也各不相同。

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终极目标，是把所有圈养的大熊猫放归野外，壮大野生种群。核桃坪野化培训基地是中心的基地之一，现在淑琴、壮妹，以及一只叫水秀的母熊猫，正在核桃坪带着各自的幼崽做野化训练，每对母女拥有一个3000平方米的活动空间，幼崽从出生开始，不再进保温箱做人工育幼，都靠母熊猫在这片操场大小的山坡上独立带大。等到幼崽长到1岁，再运到20多公里外的天台山野化场地，那里面有3个野化场，每个有30万平方米，相当于一片山头。在那片更大的围栏里，如果熊猫幼崽能显现出独立生活的潜能，就会被放归到下一片真正的野外。这就像一条流水线一样，不断遴选健壮的熊猫妈妈，培养不与人直接接触的幼崽，再从中择优，放归到野外。

胡锦涛告诉我，另一边的成都大熊猫繁育中心，正在借鉴美洲黑熊的经验。“想培训熊猫听话、不会跑，带到野外去与野生公熊猫交配，改良圈养的基因库。但是现在还没有实施到这一步。”

放归是一个更宏大的科研课题了，大熊猫没办法完全借鉴其他物种的成功经验，国内最成功的野化放归案例应该是朱鹮，30年里种群从7只扩大到2000多只，有稳定的人工种群和野生种群，2016年四川还引进了50只朱鹮，准备野化放归。麋鹿、普氏野马放归的野外种群正在稳定上升。但是大熊猫作为一种古老的哺乳动物，从圈养到放归野外，这个适应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2003年，卧龙选中了一只叫祥祥的雄性大熊猫做放归实验，这只2岁的熊猫被放入野化训练圈，逐步扩大野化的范围，让它自行学习躲避危险、去除寄生虫的技巧。3年后，2006年4月28日，祥祥被放归在卧龙五一棚附近的山林中。然而最大的错误是，五一棚是熊猫的活跃区域，每只公熊猫都有自己的领地，一个从亚成体才开始培养的圈养雄性熊猫，一进入真正的丛林社会，立刻遭到了致命的打击。2007年2月19日，人们找到了祥祥的尸体，目击到“它蹲伏在一棵大树旁，头低着，一动不动，大雪覆盖了它的下半身，就像睡熟了一样”。

祥祥死前经历了与野生大熊猫的打斗，在慌忙逃脱时，从高处摔落，胰腺严重损伤，最终因严重内外伤痛、惊恐、衰弱导致休克、死亡。

“像黑熊的野化还好训练，它是杂食性的，国外的繁殖搞得还比较好。熊猫在野外和人工环境是两回事儿，就说饮食，野生熊猫要选竹子的老和嫩，春季吃竹笋，到了夏季吃竹竿，到了秋季专门吃竹叶……”



(照片由杨建提供)

卧龙保护区邓生保护站站长杨建（中）和员工们在二郎山岭上发现了几十只岩羊

在人工环境，每天那么一大堆竹子，爱吃的就吃，不爱吃的丢掉就是了。像这种择食行为怎么训练？野外培训难就难在这个方面。”胡锦涛说，最好是有个懂动物学、懂行为学的人，能带着熊猫上山做训练，这个想法难度太大了，现在哪里找这样的年轻人带着熊猫进山生活？

更现实的办法，也许是让圈养的母熊猫进入半封闭的野外环境，吸引雄性大熊猫来交配，把新的基因带回来。卧龙的五一棚野外观察站正在搭建一个新圈舍，3月1日，将有一只母熊猫被抬到2500米的山上，尝试在这个繁殖季能“借种”成功。然而当我跟核桃坪的工作人员询问细节时，对方表示最好不要提这件事——在整个大熊猫采访中，谨慎、小心、闭口不谈，是最常见的态度。

大熊猫永远环绕在公众的聚焦之下，但公众需要知道，圈养的“毛绒玩具”，和野外竹林里隐匿的野生群体，是大熊猫的两个世界。抱大腿的视频在网络上疯传，同时真正的巡护工作，却并不因为科技发达减轻了多少辛苦。在西河流域做猫调，巡护员从沟口走到沟尾，要反复蹚80多次水，上岸时全身从里湿到外。出野外要露营，员工们是不背帐篷的，“又沉，

住的人又少”。他们用的是彩条布，在背风处直接搭个人字形的棚子出来，外面点上柴火，里面挤成一排睡觉，用棉睡袋的本地民工睡里面，保护站员工都是鹅绒睡袋，就守在棚子的两头。

相比之下，出野外每天120元的补贴性价比越来越低，几乎每个队员都提到了工资太低的问题，如果不是家里还有牦牛等产业支持，单纯靠每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这些在高海拔行走如履平地的壮年男性员工，是肩负不起养家重任的。

而在大熊猫保护上，国家的投入几乎不计成本，这在其他物种上不可复制。卧龙自然保护区每年的经费，已经超过了四川省内其他保护区经费的总和，更多的区域没有那么多能上山的巡护员。“实际上除了卧龙、唐家河、王朗这三个保护区有不少动物保护专业员工外，大部分保护区实际上只守着几个人，巡逻的人根本不够，只是划出来一个地方，找一些人看起来就行了。”胡锦涛说。现在即使是卧龙保护区，对人才的吸引力都远远不如成都近郊的熊猫繁育基地。而大熊猫与卧龙保护区，已经是国内最受关注的动物保护物种以及条件最让人羡慕的自然保护区了。☑

（感谢实习生肖楚舟对本文的帮助）



重新“发现”巧克力，时髦新标签

主笔 / 杨璐



左图：复活节是巧克力行业一年中最忙碌的时段，一家德国巧克力店的店员正在制作巨大的复活节兔子

右图：生巧的工艺是日本创造的，用浓郁的巧克力原浆炼入生奶油和其他含水的可食用物质

就像从速溶咖啡到精品咖啡的转变，巧克力也变成了一种味蕾游戏和生活方式。

其实无论是甜腻还是苦酸，巧克力都不是中国味蕾喜欢的味道。当年国际巧克力巨头飞奔而来，认为改革开放的中国人会需要巧克力，但3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均年消费才200克，远比不上日韩人均年消费2000克和欧美人均年消费7000克（据欧瑞国际统计）。特别是在健康苗条的趋势里，即便有情人节“加持”，几个巧克力公司还是在中国出现了业绩下滑的新闻。

不过，巧克力的文化属性针对中国人在营销中派上用场。它一直都是西方的、高级的象征，跟白酒、茶叶、香烟同列礼物“四天王”行列。现在，时髦人又跟着“bean to bar”（从“豆”到“块”）的潮



巧克力的苦、酸或者甜腻完全是西方人的喜好，中国人的味蕾始终没有真心喜欢它的味道

流，吃那些从可可豆采集到制成排块，全部由厂商自己控制的巧克力，他们仔细分辨因可可原料、工艺不同而产生的不同风味和口感。

“甜”的衰落

按照现在巧克力达人的流行吃法，我买了两款获得过伦敦巧克力协会金奖的巧克力。一块的可可豆来自委内瑞拉的“porcelana”，它的产量稀少，每季只有2万块，并且在巧克力包装的背面手写上编号；另一块的可可豆来自马达加斯加的Criollo，它因为宁可减少产量也要控制品质而受到国际巧克力界的尊重。我邀请我的朋友李美玉跟我一同分享，美玉是中

国侍酒师大赛冠军和法国酒侍酒师比赛冠军，柏悦酒店的葡萄酒顾问，就像造型师会根据不同场合设计服饰搭配一样，美玉的专业是根据不同主题餐食设计酒单。我带去的两款巧克力配了两种酒，porcelana搭配的是桃红香槟，Criollo搭配的是红宝石波特。我们并不只是追求仪式感，这些世界知名巧克力得在酒的烘托下，才凸显它们的口感和风味，最重要的是抵消掉中国味蕾并不喜欢的腻、苦和酸感。

单从味道来划分，有过欧洲生活经验的人知道，越苦的巧克力越受欢迎，可在中国，即便我们杂志的读者调查里许多人说自己只吃可可含量80%以上的巧克力，但从真实销售数据上，牛奶巧克力卖得最好。巧克力品牌“驯鹿”的合伙人丁帅负责研发过“妙芙”

蛋糕，对中国味蕾很有经验。他说，那些苦而带着明显酸感的高可可含量巧克力，会被怀疑“放坏了”，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欣赏酸的层次感。巧克力完全是一种外来文化，它同普通人正式见面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可可的全球之旅已经有 500 多年的历史，可我们在巧克力面前就是一张白纸，被国外营销专家称为“chocolate virgin”（巧克力处女），没有偏爱的品牌和口感，更没有消费习惯，全凭外来人的描画。

时光倒退 30 多年，在费列罗、吉百利、好时、雀巢和玛氏这五大巧克力巨头的商业逻辑里，地球上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多出来几亿新的巧克力人口。这简直是巧克力市场的史诗，它们接踵而至，既互相争夺中国人的味蕾，又共同培养了中国人对巧克力的认识。曾经在好时中国和雀巢中国任职的营销专家劳伦斯·艾伦在《巧克力之战》一书中写道，五大公司评估商机时认为，2000 年之后中国巧克力人口会有 3 亿人，跟美国的规模差不多。

现在看来，重塑中国味蕾的战役并不成功，好时发布的 2016 年第四季度财报显示，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大幅缩水 16.6%，而英国咨询公司英敏特在 2016 年的巧克力报告中显示，中国巧克力市场从 2011 年起零售额和零售量增长都放缓，2015 年起巧克力零售量下滑，2016 年零售额也缩水。这不是高峰下滑的曲线，虽然巧克力在中国耕耘了 30 多年，中国人对巧克力的消费始终很低。

中国人对巧克力，很难出现其他商品那样的“爆买”。千年的饮食文化根深蒂固，劳伦斯·艾伦在书里写道，国际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时发现，巧克力被划进了辣椒、羊肉等“阳”性食材，而痤疮、过敏、高血压等阳火过剩的人要禁食阳性食物；天热也不能多吃阳性食物，所以巧克力在中国是季节性的，夏天是明显的淡季。英敏特的巧克力调查表里，认为吃巧克力会上火的人群比例，仅排在因为价格昂贵不多吃的后面。

更具有时代性的影响是对肥胖的担忧。五大巧克力巨头卖到中国的产品虽然各有特色，但让人们形成对巧克力的固有印象是高糖、高热量、工业化的零食，这与持续上升的追求健康、苗条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相背离。英敏特资深分析师杨晴告诉我，发胖、对牙齿不好、巧克力太甜和吃多了太油腻是人们不多吃巧克力的四大原因，甚至即便有 44% 的消费者认为黑巧克力有益健康，依旧有 47% 的人认为黑巧也属于高热量。巧克力在进入中国时被塑造为既在嘴馋时享受“丝般润滑”，又能在饥饿

关于巧克力的冷知识

热可可因为促进血液循环，是催情药的代名词，像杜巴利伯爵夫人这样的宫廷贵妇十分喜欢喝热可可。在凡尔赛宫有一幅路易十五的女儿——路易斯·德波旁·夏洛来的肖像。她穿着黑色的长袍，打扮得像个修士，但是桌子上放着一杯热可可。她在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之间难以抉择，最终她成了修女，但是也没阻止她享用热可可。



夏洛莱小姐穿着修士服装，桌上摆着热可可，在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间难以抉择





可可果生长在南北纬 20 度之间，有橄榄球大小

时补充能量的零食，可这个场景的替代性太强了。杨晴除了做巧克力、糕饼的分析，也观察其他的零食行业，她告诉我，中国酸奶和干果的消费增长非常明显，这种被认为是有益健康而且不会发胖的零食挤压了巧克力的空间。

“苦”的崛起

因为饮食观念的变化，巧克力作为零食类，未

来的趋势不乐观。英敏特的调查报告里，59% 参与研究的消费者认为吃巧克力会发胖，已经不再多吃了。但是巧克力并非没有机会，英敏特公司给出的策略是巧克力必须要强化它的健康形象，比如宣传可可对心血管疾病、抑郁症等的益处。能传递这些功效的巧克力最简单粗暴的分辨方法是——具有高可可含量，可它也是同中国味蕾喜欢的“牛奶巧克力”相反的，它是苦的。

让人愿意为“苦”买单，用来点燃消费热情的，



阿兹特克人拿着可可果的雕像

在 15 世纪之前的中美洲文明里，可可既是献给神的贡品，还是可以流通的货币。1545 年在墨西哥市场上，一颗大番茄价值一粒可可豆，一个鸡蛋价值两粒可可豆，一只野兔价值 100 粒可可豆。只有上流社会才把可可豆当作食物来吃。

路易十四时期，热可可在法国宫廷里流传。女贵族对泡热可可的壶和杯子十分讲究，有专用的热可可壶。为了将热可可搅拌出泡沫，壶上附着搅拌棒，造型独特。热可可壶一开始是银质的，后来在法国流行起有花纹的陶瓷器。



热可可专用的壶来泡制，壶上的搅拌棒可以打出丰富的泡沫



Vivi 是一个典型的把黑巧吃成生活方式的生活家

是它可以成为新生活方式的标签。Vivi 就是吃“黑巧”人群的一个典型形象，她每天早上 6 点起床运动，有 AASFP 专业体能教练证书、高级私人教练证书。她吃很多巧克力，还在美食新媒体上教做菜。但她有马甲线，穿风格鲜明的设计师品牌 SACAI。她健康、专业，并且时髦，是生活方式圈子里的名人。

Vivi 经常写文章介绍“黑巧”的健康知识，她也在做一个巧克力创业项目。她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推崇布鲁克林的 Mast Brothers 巧克力。这个牌

子是美国“bean to bar”潮流的推广者，巧克力包装采用了极简的长方形，看上去像布匹面料的包裹方式，字体、花纹排布、色彩的搭配都堪称平面设计的佳作。创始人是社交媒体上的明星，还经常与艺术家们合作，让巧克力远远超过零食的内涵，成为一种文艺的衍生品。Vivi 想在中国复制这种文艺的生活方式，因为可可生豆的进口困难重重，她选择了曲线救国，先用欧洲的巧克力原料，做生巧克力。生巧的工艺是日本创造的，用浓郁的巧克力原浆炼入生奶油和其他含水的可食用物制成，就像“最受欢迎的日本旅行纪念品”Royce 巧克力。Vivi 的巧克力外形与 Royce 一样，但因为可可含量是 70%，改掉了 Royce 最受中国人诟病的甜腻，但保持了丝滑的状态。

要成为生活方式的标签，生巧不能在可可豆风味上做文章，它能发挥的领域是口味设计，是创始人思想的表达。作为生活家，Vivi 也讲究不令不食的流行概念，做充满东方风情的“时令”系列。春天的主题是樱花，用樱花酱和梅子搭配，既有粉色的浪漫气息，又因为梅子是咸的，像海盐风味的巧克力；夏天的巧克力是甜品里的经典组合，樱桃和白兰地；秋天最重要的节日是中秋，采用的食材是桂花；冬天的灵感来自于 Vivi 在波特兰的生活，当地人喜欢在湿冷的冬天喝苹果酒，所以她做了一款苹果白葡萄酒加肉桂的巧克力。

这种承载生活态度的巧克力销售渠道不是传统商超或者淘宝店，而是找到认可这种生活观的知己。在生活方式创业的潮流里，这一点都不难。Vivi 的草莓胡椒味巧克力出现在草莓音乐节上，去音乐节的人群认可这种生巧克力；苦艾酒巧克力出现在凡高特展上，苦艾酒跟凡高的一生都相关，去看特展的年轻人立刻能理解这个巧克力的典故和趣味。Vivi 最近跟“穷游”一起做了场活动，穷游的“粉丝”是热爱自助出境游的年轻人，他们爱新鲜、活泼、国际化，也会对高可可含量的、口味多样的巧克力感兴趣。她计划今年跟健身圈和跑团做一些合作，这些整天研究健康饮食和运动的群体，不用普及就明白可可对运动和健康的作用。

70% 以上高可可含量的纯可可脂巧克力，因为跟超市里的工业化巧克力太不同，在二、三线城市也被对生活有要求的人群接受。何宁在郑州有一家两层楼的手工巧克力门店，已经做了 13 年了。无论是二、三线城市人们的消费力，还是目前实体店的疲软状况下，这个存在都很惊人。她开店的时候，郑州连费列罗都还不普及。她在店里放了可可豆、可可粉、

可可脂，还有巧克力，让进店的顾客直观地认识巧克力的生产过程。“当时流行说飘柔教会了中国人如何洗头发，我就想尽力在郑州教给人们如何分辨巧克力。”何宁说。何宁的巧克力售价是德芙的 3 倍，为了推广，她在柜台旁边放德芙的架子，进店消费的就送德芙。吃起来有什么区别让顾客自己比较。

何宁的巧克力店一度是郑州的时髦存在，当年本地媒体的生活版面都去采访报道，年轻的大学生、出过国的大学老师是她的常客，房地产公司和汽车 4S 店也会请何宁去给客户做巧克力讲座并让大家试吃。手工巧克力的知识在当地成了一种高品质的、新鲜的生活方式载体。即便国际连锁的快消品牌在郑州都落地开店，何宁的巧克力店依旧是一个有生活文化内容的场所。她在一楼放了一个书架，进巧克力店的顾客可以从书架上拿书去二楼阅读，每个月还会办读书会，给这座城市里在精神生活和生活品质上有共同趣味的人提供一个互相交流、产生共鸣的空间。

新礼物

除了作为生活方式的标签，礼品消费占据巧克力市场的半壁江山。五大巧克力巨头没有把中国味蕾改造得爱上巧克力，消费者却把巧克力纳入到送礼民俗中来。根据劳伦斯·艾伦的营销数据，全世界成熟的巧克力市场上，用做礼品赠送的巧克力在总销量中的比重不到 10%。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市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作为礼品赠送的巧克力销量占了总销量的一半还多。礼品市场的开端来自费列罗。上世纪 80 年代每逢春节，香港食品店就把它从地板堆到天花板，金灿灿的糖果山有着符合富贵吉祥的节日气氛。它又随着港商和探亲的人群来到内地，与丹麦蓝罐曲奇、Sugus 瑞士糖和乐家杏仁太妃糖一起被称为“香港四大件”。在其他品牌想办法让中国人爱吃巧克力时，费列罗因为金灿灿的包装击中了中国消费另外的穴位。

随着中国人变得富裕，费列罗的高端形象被 Godiva 代替。Godiva 不像先来者一样出现在商超，而是在商场开专柜。Godiva 在给我回复的邮件里说，他们合作的商场调性必须与品牌相符合，硬件条件也要与想传递的体验相匹配。中国区总经理黄一峰在最近一次专访里，曾经详细举例 Godiva 的策略，跟施华洛世奇、野兽派这样的品牌做邻居，这些都是白领女性喜欢的小礼物。



热可可可在路易十四时期从宫廷经由咖啡厅传入民间

18 世纪，热可可从宫廷流入咖啡厅，成了畅销品，被称为“饮料女王”或者“众神的饮料”。因为热可可可在民间流行，需求大增，工匠的世界里出现了新的行业——可可工匠

从新大陆到旧大陆，可可饮料的口味发生了变化，去掉了美洲人喜欢的辣椒，加入了胡椒、榛子、杏仁、八角、肉桂，最重要的改进是放了糖，可可从此由苦变甜了。



19 世纪末，可可行业进入到广告时代，面临着要向谁介绍产品的问题。热可可最开始定位是来自热带、具有异国情调的舶来品，后来逐渐转变为小孩的便宜饮料，强调它可以帮助小孩成长和健康。

可可从前是成人的滋补品，在 19 世纪末逐渐转变成小孩的零食

1932 年，英国一家巧克力公司进行了巧克力行业首次市场调查，发现盒装巧克力都是男性买来送给女性的礼物。根据调查结果，这家公司把盒装巧克力改得简洁优雅，让男性更加容易在店里购买。巧克力广告也从维多利亚的媚俗，改成包豪斯的摩登设计。

（资讯来自武田尚子《寻味巧克力》）



Godiva 谨慎经营它的高端形象，可不是为了卖零食。虽然像劳伦斯·艾伦这样有进取心的营销专家认为，巧克力礼品公司撑不起中国市场，可是 30 多年过去了，券商分析师给出的中国巧克力消费结构里，礼盒、礼袋装巧克力依旧占 60%。巧克力不但没有走入个人消费，还因为商业力量硬造出的“5·20”、“6·18”，多出新机会。Godiva 针对中国这些消费习俗，他们开发了 15 个特供系列。去年上市了一个城市珍藏版系列进入伴手礼市场，礼盒的外包装是精心设计的北京、上海、西安等城市地标建筑，给消费者在出差、旅行的场景里多了一个选择。在中国巧克力市场下滑的趋势里，Godiva 凭借高端形象和比商超巧克力明显好吃许多的品质，业绩十分亮眼。

Godiva 在中国已经进入了 24 个城市，在它从神秘的“巧克力中的爱马仕”变成家喻户晓的巧克力品牌时，Pierre Marcolini 进入了中国，它的江湖名号是“巧克力里的高定”。因为强调的是创始人皮埃尔·马克里尼（Pierre Marcolini）每年花 10 个月的时间在世界各地的庄园挑选和品尝可可豆，从原料上避免口味与其他巧克力雷同。Pierre Marcolini 的产区系列，每块巧克力上都由巧克力匠师手工印上可可豆来源，让你吃的每一颗巧克力都材迹可寻。

Pierre Marcolini 董事总经理沈英南告诉我，她在研究中国人的美好生活。巧克力虽然是食品，但它不能是零食，它应该是一种愉悦。“我们的巧克力做得很小，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太甜太腻，口感要爽，另一方面巧克力不是超市里买一大盒，那是糖果。真的巧克力，每个都很瘦，睡觉前吃一颗，是享受。中国因为战乱中断了 100 多年对衣食住行的享受，现在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沈英南说。这完全是奢侈品增加品牌价值的思路。

巧克力的创业团队也进入市场。驯鹿巧克力的创始人罗思琪说，他们现在正在拓展公司商务采购渠道，跟金融圈、广告圈都有合作。大品牌在满足公司客户需求时没办法灵活，但是创业团队可以给采购公司设计 Logo，或者在礼盒内加一张公司 CEO 的签名增加针对性。罗思琪认为，如果站在 HR（人力资源）的角度，这种巧克力礼品省去了设计费，又有定制的性质，是种很划算的礼物。

“bean to b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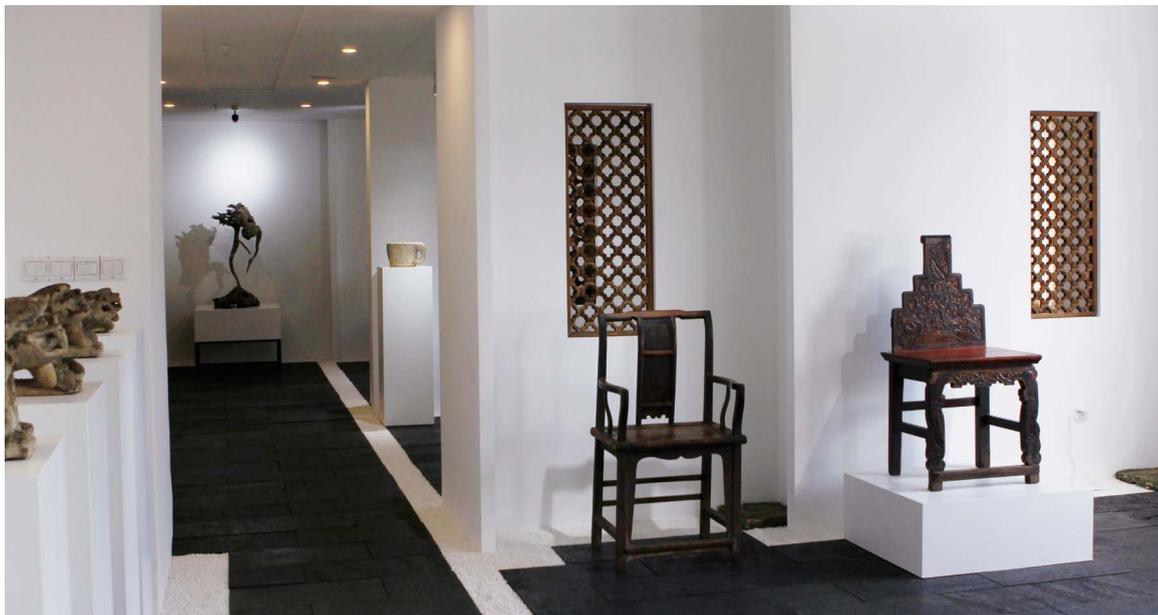
可可生长在南北纬 20 度之间的区域，味道像山竹。就像茶之于中国人，可可可在古老的中美洲文

明里也是一种用来亢奋精神和强壮身体的饮料。经过几百年，它从液体演变成固体。大工业制造巧克力，为了稳定风味，会把很多产地的可可豆研磨成膏拼配在一起，可现在流行追根溯源巧克力的历史，那么可可豆才是巧克力的核心和灵魂，这是“bean to bar”（从豆到块）的乐趣。它们因为品种和种植地气候的差异具有不同的特色，中间还要经过发酵、干燥、烘焙等工艺，其中一些因素决定巧克力的芳香，风味中酸、苦、涩的芳香。

日本甜品大师小山进说巧克力是“抑制的美学”，意思就是在方寸之间体会可可豆和工艺的复杂变化。我吃的“porcelana”味道十分浓郁，闻起来是一种木香，在嘴里化开后有一点酸，然后有烤坚果的香气。我还买了这个牌子另外一款巧克力“9”，是 9 个种植园的可可豆拼配而成。在巧克力论坛里，这两款巧克力被谈论的频率非常高。巧克力发烧友是一群有趣的存在，类似于如果有一群住在美国的青年人喝着立顿袋泡茶，然后谈论凤凰单枞的工艺、汤色、香气和口感一样。他们从小众亚文化开始影响大众对巧克力的看法。

巧克力买手林雨在意大利学设计，偶然接触到这个圈子。他用 6000 元人民币起家做代购，亲身经历这个小众趣味的壮大，他说自己第四年就挣到 100 万元。林雨跟巧克力发烧友们一起探索陌生的巧克力世界，除了代购也去结识一些更小众的巧克力品牌。“科特迪瓦有个牌子，店就像个咖啡馆差不多大。老板是个非洲白人。他年轻时在欧洲就是巧克力产品经理，老了以后回科特迪瓦继续做巧克力。他做的巧克力异常出色，但非洲人吃不起巧克力。我们就去跟他交朋友、合作。”林雨说。他还在年轻人喜欢的科学论坛上开专栏，专门介绍可可豆和巧克力的知识。在林雨看来，“90 后”、“00 后”这一代年轻人在购买前更愿意通过学习专业知识来做决策。

站在中国巧克力消费的最前沿，一方面看到工业化巧克力逐渐被抛弃，另一方面看到“bean to bar”成了时髦标签，林雨想更上一层楼。他到可可豆的产地去学习可可种植和加工的知识。“可可倒不是没有优质的概念，而是讲究稀有。可可好不好，一个是当地气候环境，另外一个为农民的用心程度。我去观察种植的环境，比如可可豆旁边种胡椒、腰果或者水果就会带上一些味道，然后会摘生长中的可可果，剖开观察纹路、了解它的风味。包括去看发酵、干燥和烘焙，中间有很多细节要去学习。”林雨说。■（实习生周缘对本文亦有贡献）



记忆里的味道

走在云南，总会与美相遇，能留在心间不忘的，便有两样决定是否还会寻觅回去。一是“记忆”，二是记忆里的“味道”。

在云南昆明有一所房，名“淮舍”，是一处文化交流空间，好友老苗所造，他与太太都是设计出身。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那些早已驾轻就熟的路子走反了，不能再继续走下去，便和太太创立“淮舍”。

淮，既是他们夫妻二人名字缩写，亦通“怀”，理解为怀旧与怀念，舍，即“屋舍”，表达舍与不舍间，那份国人的舍得观。

就这样，夫妻二人决定做一件留住记忆、守住心中的根，哪怕有时显得微不足道，也丝毫动摇不了他们决心与初衷的事，“淮舍”便诞生了。

老苗将多年来收藏的老物件重新编排组合、设计，化为元素，运用到现代空间中，古为今用，而不一味仿古。历经百年沧桑的老物件，通过设计与重新解读，让身边朋友更便于认识与理解，耳目一新，更加真切地感受历史带来的情怀，打开旧时光里的一扇扇窗，寻回人们内心那些仿佛遗失已久的共鸣。

百年前的石雕、木雕、砖雕、匾额，展现出历经千年沉淀后，人们对空间特有的那份感情和独到的艺术理解。留白的空间下，最佳地绽放每一物件的光芒，每一件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是人与人、人与物的



情爱与怨念，那是属于每个人过往的记忆。

老苗常说：“没有民族根源和文化传承的设计，再精彩也会显得苍白。”而正是在这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造成了中国传统建筑和空间毁灭性的破坏，甚至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曾经引以为傲的历史遗存开始慢慢消失，城市，千城一面，丢失了千年的记忆。如黄沙盖地，也渐渐消散了每座城的本来面貌，这是痛心的。

我们，在相对高速与紧张的社会关系中，迫切地需要那些能让我们平静和慢下来的空间，里面的一窗一格，一石一木，亲手打造，在合适的地方才能出现合适的“他”。那是我们对“味道”的追寻，对“记忆”的向往。

让物，历久弥新，让情，留年不舍。

这是“淮舍”的味道。（图：淮舍 文：敬贤）

“最年轻宝马”：锁定中国年轻人

主笔 / 李三



华晨宝马总裁兼 CEO 魏岚德

数据显示，豪华紧凑型车细分市场发展潜力大，未来 10 年，全球豪华紧凑型车细分市场预计增长将高达 45%，而同期中国豪华紧凑型车细分市场更将翻番。华晨宝马总裁兼 CEO 魏岚德（Johann Wieland）告诉记者，正是基于对中国豪华汽车市场消费趋势变化的深入调研，国产 BMW 1 系运动轿车专门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作为宝马家族新成员，目标锁定中国年轻客户。除了明确的市场指向，作为宝马第五款国产车型，这款车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国产 BMW 1 系运动轿车在华晨宝马产品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如何？

魏岚德：推出全新 BMW 1 系运动轿车是基于我们对中国市场的深刻了解和深入调查后做出的选择。中国豪华汽车消费者正在快速走向年轻化，“80 后”乃至“90 后”人群正在成为市场消费主力人群。这次推出的 1 系运动轿车，可以说是我们首次为中国市场专属开发，更是为中国年轻消费人群量身定制的一款全新车型。

中国年轻一代消费者，即“80 后”“90 后”群体迅速壮大，他们成长于互联网时代，对新技术有浓厚的兴趣。他们乐于接受创新的产品，对他们而言，互联性是必需的。对中国新生代年轻人来说，高档并非炫耀，而是代表着个性与品质。他们对车辆拥有更多样化的需求，比如设计风格、空间以及功能性等，当然还有对操控性的追求。全新 BMW 1 系运动轿车正是这样一款融聚了上述各项特性的年轻车型，被誉为最年轻的宝马，当然也是华晨宝马非常

重要的一款能够推动销量稳定增长的战略车型。谁掌握了青年，谁就拥有了未来。负责 BMW 品牌营销与市场营销的宝马集团董事伊恩·罗伯森毫不讳言年轻用户对于中国市场的意义，“年轻用户市场是中国轿车市场中增长最快的细分市场，也将推动宝马中国业务增长”。

重要的一款能够推动销量稳定增长的战略车型。

三联生活周刊：随着国产车型越来越多，华晨宝马于宝马集团在华业务中的比重也会越来越高，在这方面是如何规划的？

魏岚德：本土化是宝马对中国市场始终坚持的承诺，随着本土化的深入，我们的竞争优势也将进一步提升。关于销量占比，毫无疑问国产车型销量将继续保持增长，具体占到多大比例，我们并不看重，我们更看重的是能够引进更多适合中国用户的车型，不断深入本土化，强化我们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当务之急是不断完善供应商网络的建设，因为供应商网络关乎我们国产车的生产质量。与此同时，也要不断拓展经销商服务网络，持续提升服务质量。

三联生活周刊：1 系运动轿车拥有哪些中国市场的专属特性？

魏岚德：全新 BMW 1 系运动轿车是宝马集团针对中国消费者专属开发的车型，自然会拥有许多专属特性。首先在舒适性方面下了许多功夫。比如，针对中国路况对悬架进行了精心调校，兼具运动性和舒适性；在降噪方面，挡风玻璃经过了特别设计，轮胎、刹车系统乃至空调出风口都经过了降噪处理和优化；座椅坐垫的厚度也增加了 2 厘米，有效提升了乘坐舒适性。它在使用方面更加便利，比如储物空间的丰富多样，高效微尘滤清器也能在空气质量不好的天气有效保护车内人员的健康。这是一款针对年轻人的车型，时尚特性自然必不可少。

三联生活周刊：宝马推出 1 系运动轿车这样一款前驱车型，是否有成本上的考虑？

魏岚德：这需要进行综合考量。首先前驱车型由于采用发动机横置布局能够在紧凑的车身外形下实现更为宽敞的内部空间，同时前驱车型也不再需要纵贯车身的传动轴，能够进一步增大车内有效使用空间。有效的成本控制所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让车型更具竞争力，更贴近消费者，让更多钟爱 BMW 品牌的消费者迈入宝马大家庭。

我们为之骄傲的是，全新 BMW 1 系运动轿车在完美继承 BMW 品牌精髓的同时实现了有效的成本控制。它的 8 速手自一体变速器依然是同级最先进的；它的涡轮增压发动机代表了宝马发动机的最新技术，性能优异；它所拥有的电子辅助技术依然超越同级。它仍是一台纯正的宝马，操控灵活，底盘扎实，转向精准，刹车性能出众，拥有 BMW 赖以著称的驾驶乐趣。

有效的成本控制所带来的实际是双赢，对消费者来说，能够以相对较低的门槛迈入豪华汽车消费阵营，享受豪华品牌的卓越品质；对企业来说，能够有效增强竞争实力，并保持合理的利润空间。

三联生活周刊：一款前驱车型如何传承宝马赖以著称的驾驶乐趣？

魏岚德：随着技术不断地更新换代，现在已经有一些新的技术能够化解人们对前驱车型的许多顾虑。比如说最新的三缸发动机采用了平衡轴技术，基本消除了震动因素的负面影响；而新的悬架和底盘技术，也让前驱车型的操控性有了飞跃；而电子控制技术的持续更新换代，也让前驱车型能够有效克服许多物理因素带来的影响，实现更好的平衡性和稳定性。

宝马工程师经年累月的深厚积淀，对驾驶乐趣的完美掌控，1 系运动轿车正是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它的操控性是经得住考验的。当然最新的电子辅助系统也能为它的卓越性能保驾护航，比如全系标配的驾驶体验控制系统和动态牵引力控制系统等。

三联生活周刊：从既往来看，BMW 5 系和 3 系可以说是宝马在华主力车型和销量支柱。随着全新 BMW 1 系运动轿车的投产上市，它会否成为宝马在中国推升销量的第三大支柱？

魏岚德：的确，在不同的车型级别、不同的细分市场，我们都需要有足够竞争实力的产品，事实上，我们在国产车型方面也做了非常完善的部署。5 系和 3 系的市场相对成熟，市场占有率相对稳定，且

稳中有升；去年 5 月上市的新一代 X1，正渐入佳境，销量持续攀升；全新 BMW 1 系运动轿车所面对的是豪华紧凑型车细分市场，这一市场的未来前景非常可观，我们有信心，这款车具备足够的实力成为驱动宝马未来销量增长的重要动力。

三联生活周刊：华晨宝马自 2003 年成立至今已有 14 年历史，但是到今天为什么才只有 5 款国产车型？

魏岚德：我们在选择哪款车型进行国产的时候，更关注的是什么样的车型更适合国产。这说来容易，但是实际执行却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必须要对各种方案进行评估、比较和权衡，比如当前市场和未来市场的消费趋势，生产设施的适用性、改造或升级难度，所选车型在细分市场中是否具备足够的竞争实力等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最关键的是，所选车型能否满足中国用户当前或者未来的消费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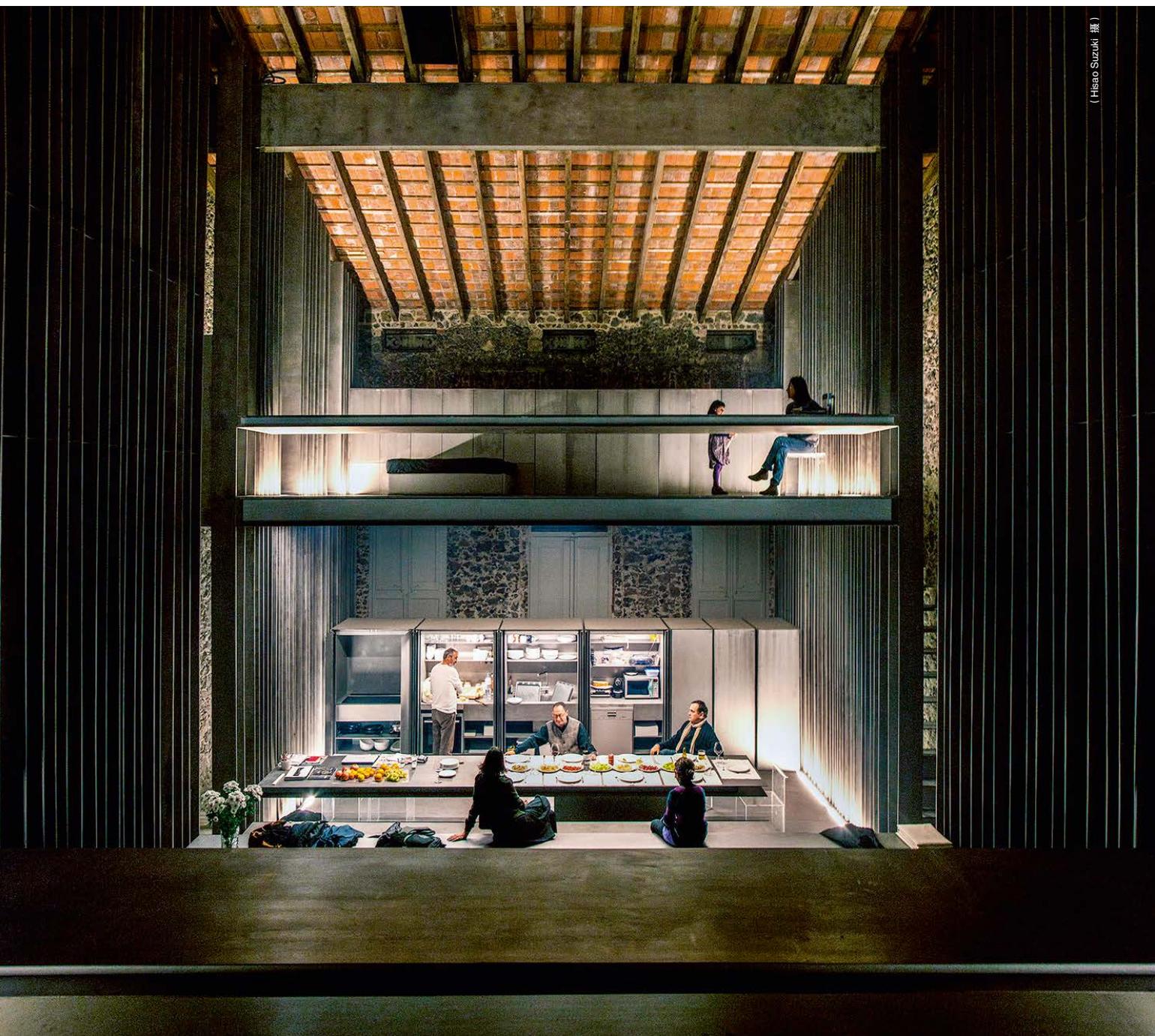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华晨宝马未来在新车型引进方面有哪些规划？

魏岚德：国产 BMW 1 系运动轿车上市是华晨宝马 2017 年的起点，在产品规划方面，今年 5 系长轴距车型将迎来换代，产品实力将再次提升。明年，新一代 BMW X3 也将实现国产。

新能源汽车领域，华晨宝马走在中国豪华汽车厂商前列，包括去年亮相的之诺 60H，以及即将上市销售的全新 BMW X1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未来，插电式混合动力技术将被拓展到更多国产车型上。可以说，未来几年，大家将会看到华晨宝马新品不断，实力飞升。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汽车行业通行的模块化生产技术，即不同车款之间的零部件共享，这种方式是否也在华晨宝马工厂应用？

魏岚德：目前的模块化技术，更多的是指发动机的模块化生产。对发动机来讲，我们以排量为 500 毫升的单体气缸作为基础单元实施组合，可以形成三缸 1.5 升、四缸 2.0 升以及六缸 3.0 升的发动机，这样，各款发动机均能采用宝马最新的缸内直喷技术、气缸内壁涂层技术，当然还有最新的电子气门技术，各款发动机都能实现出众的性能表现。由此，我们可以在确保发动机卓越质量和性能的同时，简化发动机部件采购和制造流程。对用户来说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发动机性能更为高效和可靠，同时也能降低维护保养成本。■



普利兹克建筑奖：回到本源

主笔 / 贾冬婷

继前几届被质疑走得太远，甚至异化为某种人道主义工作奖之后，今年的普利兹克奖回到了建筑学本源，加冕了三位扎根本土、专注内在的建筑师。



左图：RCR 建筑事务所在西班牙奥洛特镇的设计作品排屋（2012）。从客厅的角度看到餐厅、厨房以及上一层的卧室

右图：2017 普利兹克奖得主（左至右）：拉斐尔·阿兰达，卡莫·皮格姆和拉蒙·比拉尔塔

全球化的逆转？

“成为神话还是无名之辈？——两者是一回事。”在 14 年前的一份“建筑学测验”中，RCR 建筑事务所的三个合作伙伴自问自答。在如今他们得到普利兹克奖桂冠后再回头看，则像是一个寓言。

身处个人英雄主义的建筑业，创造力几乎等同于声名和财富，走上台前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但从最初到现在，他们的建筑实践都聚焦在一个小镇上，不为大众熟知。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们被 3 月 1 日公布的第 39 届普利兹克奖加冕——“成为神话”的原因。

自去年底开始，关于新一届普利兹克奖得主的各种竞猜就开始了，甚至还有博彩公司为此下注：是会授予传统的捍卫者，像 2015 年颁给已故的弗雷·奥托（Frei Otto）那样，还是会加冕重新定义行业的开创者，比如 2016 年的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Alejandro Aravena）？是将再次承认社会关怀的作用，还是回归到纯粹的建筑美学判断？是会将桂冠继续保留在传统优势地域，还是风水轮流转

新的疆土？

在之前的各种风向预测中，拉斐尔·阿兰达（Rafael Aranda）、卡莫·皮格姆（Carmen Pigem）和拉蒙·比拉尔塔（Ramon Vilalta）——来自西班牙 RCR 事务所的三人组都不是夺标热门，或者说，他们不属于大众视野里的“明星建筑师”。连续 7 年参评普利兹克奖、本届评审团八位评委之一的张永和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实际上普利兹克奖是完全不可预测的。“整个评审团都不会认为有某些建筑师在排着队等这个奖。它不是在给‘成功’建筑师发勋章。”

对于普利兹克奖来说，由一个明星建筑师独奏的时代结束了。这一建筑界最高奖项正将钟摆向后摆，开始青睐秉持本土精神的建筑师。而且，今年也是普利兹克奖历史上第一次颁给三个人，他们三个人 30 年来一直扎根在共同的家乡，像一支爵士乐队那样紧密协作。他们并没有建造过世人瞩目的大型标志性建筑，大多数作品是住宅和餐厅、幼儿园、图书馆等一些小型公共建筑。而令他们脱颖而出的正是一种创造兼具本土精神与国际特色的场所的能力。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展现了



1

(Eugene Pons 摄)



2



3

与地貌景观充分的融合，同时又有推广至更广阔地域的潜力。正如评审团主席格伦·马库特（Glenn Murcutt）所说：“这三位建筑师的合作对建筑设计形成了一种如诗般的效果，他们那些永恒的作品反映着对过去的尊重，同时也叙述着当下和未来。”

普利兹克奖的评审辞也部分阐释了他们的选择：“在当今这个时代，有一个全世界都在问的重要问题，不只关乎建筑，也关乎法律、政治和政府。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必须依赖国际影响、商业贸易、探讨商议、交易事务等。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甚至恐惧，由于全球化的影响，我们会

不会逐渐失去本土价值观、本土艺术和本土风俗？拉斐尔·阿兰达、卡莫·皮格姆和拉蒙·比拉尔塔告诉我们，两者或许可以和谐共生。他们以一种诗意的方式让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非此即彼，至少可以在建筑中找到两者的共存——根植本土，同时拥抱世界。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答案，尤其是设想它也适用于现代生活的其他领域时。”

普利兹克奖的这一选择，是不是受到了全球化风向逆转的影响？张永和认为，8个评委持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很难说是某种风向下的产物。而且，全球化和本土化看似矛盾，但如果有机会进入到



(Hisao Suzuki 摄)



(Hisao Suzuki 摄)



(Hisao Suzuki 摄)

RCR 设计作品：

1. 圣安东尼-琼奥利弗图书馆、老年中心与坎迪达佩雷斯花园项目（西班牙巴塞罗那，2007）。五层楼的图书馆与从街边延伸至庭院的罗望子树

2. 贝尔略克酿酒厂（西班牙帕拉莫斯，2007）。通往品酒室的酒庄内景。金属板将空气、光线和雨水引入室内，创造变化无穷的光影效果

3. 苏拉吉博物馆（法国罗德兹，2014）。入口方向显示了建筑物各部分与 Cor-Ten 耐候钢格栅之间的关系

4. Barberí 实验空间（西班牙奥洛特，2008）。藏于花园中的大厅让内部和外部的边界在这里消失

4

RCR 事务所的建筑内部去体会，这些标签就都不存在了，其实是一个建筑与环境对话的自然而然的结果。“总体上来说，今年的普利兹克奖，是一个回到建筑学领域内的选择。”

根基

“建筑（Architecture）是一个很长的词，它可以被缩写吗？——实现梦想的艺术（the Art of Materializing Dreams），路途遥远。”阿兰达、皮格姆和比拉尔塔在多年前这么自问自答。而当得知

自己赢得普利兹克奖之后，他们说，就像是长久以来的一个梦被唤醒了。

这个梦的开始是一个有关灯塔的国际竞赛。他们三人是加泰罗尼亚理工建筑学院的同学，毕业后，他们合作中标了一个全国竞赛，在加那利群岛一个陡峭山坡上建造一座灯塔。卡莫·皮格姆回忆：“但是，什么是真正的灯塔呢？最后我们终于领悟，灯塔就是信号灯，并不一定非是一座塔。尽管字典中将‘灯塔’定义为‘带有警告或者指引海上船只的信号灯的塔或其他结构’，强调了‘塔’，但我们认为它主要指的是位于特定坐标并具有一定高



Barberi 实验空间里举办的夏季国际实习活动

(Pap Ssu 摄)

度的灯。支撑信号灯的方式可以灵活处理，因此我们的解决方式是设计一个横向的灯塔，就像安装在悬崖顶上的一个手电筒。”

这个最初的设计也启发了他们追根溯源的思考方法。卡莫·皮格姆表述：“我们设计一座住宅，会思考什么是真正的住宅；设计一个餐厅，也会思考真正的餐厅是什么样子；酒店也是如此。在建造新的建筑时，我们总是会与环境对话，而不是非要表达‘我在这儿’。我们寻求的是简单朴素的想法和原初恒定的理念。我们谦卑地向自然介绍自己，表述我们是在对原有环境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建造。于是，更真实的现实出现了，它更加诗意，引领我们回到了初始状态。”

灯塔竞赛后的1988年，他们决定一起做建筑，正式成立了以三人首字母命名的RCR事务所。30年来，三人以一种对建筑严谨审慎的方式紧密合作。拉斐尔·阿兰是设计的核心，拉蒙·比拉尔塔和卡莫·皮格姆后来成为夫妻，比拉尔塔负责事务所的组织运营，皮格姆负责构建理论体系。卡莫·皮格姆说，他们三个人性格差异很大，但正是各自不同的特点碰撞在一起产生了化学作用。而且尤为可贵的是，他们毕业后就回到共同的家乡奥洛特，此后一直以此为基地。

拉蒙·比拉尔塔说，30年前，对于年轻建筑师来说，选择留在一个小城镇、而不是在大都市跟着大师做设计，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但正因我们选择了这条更加真实和独立的路，给了我们寻根的机会，才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去做我们认为有趣的事。这

是我们对根基的认知，也是对城市环境的一种认知。”

奥洛特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个小城，只有3万多人口。它位于一个火山自然保护区的中心，以区域内的40多座死火山而闻名，火山灰滋养了种类繁多的植被，熔岩塑造了奇异的地质地形。独特的自然地貌也孕育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如在绘画和雕塑领域产生了“奥洛特学派”。卡莫·皮格姆认为，奥洛特的独特性在于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荒野区域，而是一个人类活动频繁的地方。“当人们来到这里，他们会惊叹：‘多么美妙的自然景观啊！’然而事实上，这里是人类和自然共同作用的产物。这样的环境伴随着我们，内化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她形容，RCR的建筑态度不是“不存在”，也不是“消失”，而是在既有自然与人为之间找到两股力量的平衡点，最终获得新的景观。

自然再诠释

令人好奇的是，长期自我“隔绝”于一个小城镇，他们三人是否感觉到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将本土化建筑语言扩展到更大体系中去？RCR事务所通过邮件回复了本刊：“各种相辅相成的力量是生活的推动力，我们总是试图去平衡它们。”他们将这种平衡视为一种建筑信条。“我们想为人性及在人类环境中的建筑和谐寻找一种个人化的平衡，远离教条、娱乐、灯红酒绿以及低级趣味。我们的建筑理念由此开始，继而赋予其形式并最终建成。这不是现代建筑运动，不是后现代运动，不是极少主义的，也不是解构主义，不是高技派，也不追求时尚。”

三人中的理论家和发言人——卡莫·皮格姆将建筑与景观的对话视为RCR开创的独特概念：“对我们来说，天空和树木不只是绿色的背景，更像是日常交往的朋友。我们力图通过建筑，和周边景观建立更加复杂的联系。我们常常采用少量的材料，甚至探索单一材料的所有可能性，如同自然界同一物质的不同状态一样，去表达建筑空间纯粹的感觉。”

奥洛特独特的地形地貌无疑是他们的灵感来源。早期作品Tussols-Basil体育场就是这样一个因地制宜的例子。体育场建在一处森林中的空地上，看台以类似梯田的方式，勾勒出地形的自然曲线。跑道内保留了一片矮树林和土丘，打破了体育场固有的强烈领域感。跑步者在一片绿荫中环绕跑道，伴随着与自然若即若离的奇妙感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形地貌只是自然给予的创作素材，一块场地在它被选为建造场所之时，就意味着其与自然环境割裂的命运。因此，RCR的作品更多地通过对自然的“再诠释”，反映他们对建筑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再诠释”的方式之一就是“取景框”来建立人通过建筑观察自然的联系。不管是窗户还是开口，都如同绘画或摄影的边框那样，一方面向自然景观开敞，另一方面，边框的大小和比例也限制了人的视野所及。“取景框”的更深层含义是，建筑在自然环境中不再是一个障碍，而是光、空气与视线可以自由穿过的环境的一部分。比如2007年建于巴塞罗那的圣安东尼-琼奥利弗图书馆、老年中心和坎迪达佩雷斯花园项目，因为在闹市区，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是，沿建成体量的纵深方向将封闭的方块形街区打开，创造一个从建筑底部穿越的条形室外空间，将街道和内部的露天庭院连为一体。这样不但建立起双向的视觉联系，而且光和空气能够在方块形街区内外畅通无阻。

街道将公共性延续至街区中心，把原本封闭的庭院变成了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卡莫·皮格姆说，为了让人在室内可以看到天空，他们在主入口上方设计了一个桥建筑，犹如街区的大门，阅览大厅和儿童阅览室就在这里。老年中心设在庭院的尽头，以街区原有的公寓楼为背景。因为开敞又限定的“取景框”效果，城市得以延续，孩子与老人在这里互动，共同创造出有趣的社区。

在捕捉自然的同时，建筑还有增强空间的丰富性和层次感的作用。这也形成了RCR“再诠释”的另一种方式——“过滤”。如同在树林中漫步一样，RCR将自然意象进行了抽象表达，用屏蔽、隔离的效果，过滤光、空气、视线、景象，以此刻画建筑向自然开敞的种种微妙差异，以视觉上的深度代替无围合材料那种不加修饰的透明。

2011年，RCR事务所设计了Les Cols餐厅，用模仿植物的方式直接表达了这种“过滤”。整个空间被建筑师融入一处山谷环境中，以火山岩建造的坚固墙壁支撑轻质透明的聚合材质屋顶，防止日晒雨淋。一系列扁平的钢板形成一道道不同间隔的帘幕，半掩着内部就餐的空间，使人们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美食和聚会上。而在休息室中，钢板被磨砂玻璃取代，营造出暧昧与虚幻的气氛。

餐厅的中心是一张被涂成金色的超大餐桌，人

们可以和不认识的人共同用餐。卡莫·皮格姆说，这个餐厅也使他们有机会设计一个场所，人们在这里闲坐休憩、享受美食、感受空间，而不只是像游客一样评价一个地方——“我喜欢”或“我不喜欢”。“超大餐桌这个想法来自传统的乡村家庭，当地的传统住宅包括三个相连的空间，中间的空间非常暗，主人经常在那里备着饭菜，如果来客愿意，可以共同用餐。对我们来说，这个中心区域就像一个隐藏的宝藏。”

建筑融于景观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语言，让RCR事务所开始走出加泰罗尼亚地区。比如2014年建于法国罗德兹的苏拉吉博物馆，也是RCR用建筑向创作来源之一的法国艺术家皮埃尔·苏拉吉(Pierre Soulages)的一种致敬。苏拉吉致力于利用黑色颜料探索光线的亮度与画面肌理的变化关系，颜料和光的节奏中和了具象与抽象、自然与文化的对立。这座博物馆拥有强烈几何形态，几乎悬挑于场地上方，似乎在挑战着地心引力。而且整个建筑只使用了耐候钢一种材料，这种材料会随着时间缓慢变化，与这位几乎在以“光”作画的艺术家形成了某种共生关系。卡莫·皮格姆说：“博物馆和周边景观相互反馈、彼此影响，如同画家与他的作品，展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剥离。”

三位西班牙建筑师在本土的建筑实践，与2012年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长期扎根杭州形成了某种呼应。王澍回应这一届普利兹克奖的选择，认为这强化了一种建筑学在今天的发展趋势：“三位西班牙建筑师以世界性的开放眼光坚持且有自信地在一个小地方工作；把小团队坚持做小项目作为一种价值观；不强调建筑的外形而更强调建筑与环境的融合，强调人在建筑中的身体感受，强调可接触的材料与质感，因此返回建筑的内在；强调更加偏爱使用自然的材料，强调有手感有温度的工艺；强调追随过程，享受生活中的那种不确定性。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人性对现代大规模人工建筑活动的越来越自觉的抵抗。”

普利兹克奖又将如何改变他们？RCR事务所回复本刊，他们将延续之前的道路，正如从一开始就坚持的那样。“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我们感兴趣的是做得更少，但在更高强度下展开设计，以此免于被外界困扰。”

(部分资料参考自：《源于自然，回归自然——RCR建筑作品评析》，王靖，《世界建筑》2009年第一期。感谢实习记者吴扬整理录音。部分图片由普利兹克建筑奖官方供图)

“普利兹克奖不是给成功建筑师发勋章”

——专访本届普利兹克奖评委张永和



张永和

(任玉莹 摄)

三联生活周刊：从去年底开始，对新一届普利兹克奖的预测就开始了，有各种风向标。你已经连续7年担任普利兹克奖评委了，你认为结果是可以预测的吗？

张永和：实际上是完全可以预测的。有人赌这个，永远赌不准，可是大伙儿有兴趣。每年的人选讨论都可以说是从零开始：看看世界上有哪些建筑师做得好，哪些建筑师的工作对这个世界、至少对建筑领域有积极的影响。整个评审团都不会认为有某些建筑师在排队等这个奖。它不是在给“成功”建筑师发勋章。

三联生活周刊：普利兹克奖提名和评选的大致过程是怎样的？

张永和：普利兹克奖是任何人都可以来提名的，包括建筑师自己。所以有个故事，是真事儿，有一个建筑师知道这个游戏规则，就自己提名自己，虽然没被选上，但他的简历里就写他被提名为普利兹克奖。确实是被提名了，只不过是他自己提名而已。

所以每年的候选人最初都有100来人，有一半不沾边，第一轮就出局了。第二轮剩下五六十人，然后是20多人，大概是这样。但并不会有一个公开的候选人名单。最终由评审团的几位评委一人一票，

选出获奖者。

三联生活周刊：这一届普利兹克奖评审辞里强调了三位西班牙获奖者的作品反映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共生”。而去年以来，经历了如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全球化的逆转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话题。那么，今年的选择是不是受到了这种风向的影响？

张永和：这届评审团里有8个评委，一人一票，每人的政治倾向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很难说受到了某一种风向的影响。当然在讨论中肯定会涉及到政治，涉及到对今天世界的观察。但是总体上可以说，今年的普利兹克奖，更是一个建筑学领域内的选择。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年的普利兹克奖有偏重社会关怀的倾向，尤其是2014年的坂茂、2016年的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得奖，甚至被认为是建筑专业主义向人道主义的异化。今年针对这种倾向有所反思和扭转吗？

张永和：具体的我不能说。但是每年投票之前，我们都有10天的共同旅行，到处看建筑，讨论前几届的评选。经过一系列的讨论，甚至争吵，再来投票。这些前期过程其实对最终结果是有影响的。

三联生活周刊：普利兹克奖到底是选人还是选作品呢？或者二者很难割裂？

张永和：这点很明确，是选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会有平衡不同地域的考虑吗？

张永和：有一点儿，所以从来不会有一个国家连续赢好几年。但是对我们来说，并没有“轮”这个概念。

三联生活周刊：这一届的获奖者有点出人意料。或者说，他们并不是那种明星建筑师。

张永和：媒体和大众知道的建筑师真的只是冰山一角，或者说冰山的那个峰。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建筑师，我可以轻易说出一二百个来，但被大众熟知的可能不到10个。今天是一个“市场+媒体”的世界，并不是所有的建筑师都能被推上前台。一方面，常常在媒体上来回看到的都是同一个类型的，比如有一类就以扎哈·哈迪德为代表，只看媒体曝光率的话，你会感觉世界上有一半的建筑都是这样的，实际上并不是；另一方面，是来自市场的推力，比如荷兰式建筑，因为有比较强的符号性，又出了几

个大明星，就容易被模仿，再通过模仿来传播，所以现在荷兰式的房子到处都是。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这三个西班牙建筑师正相反，基本上就一直在一个小地方做建筑。

张永和：对。这三个人岁数和我差不多，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做建筑，一直就猫在西班牙一个小镇上，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经常只用一种材料。可以想象他们不是全球化的操作，他们接受的建筑教育也是当地的。但是今天媒体这么发达，他们对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肯定也有所了解，比如欧洲作为一个政治联盟面临的问题等等。只是他们不像我们之前接触到的一些建筑师，满世界飞，在全球实践，他们非常聚焦在他们自己的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共生”在建筑实践上很不容易实现吗？

张永和：看来大家常常认为“全球化”和“本土化”两者是矛盾的，但中国的公众需要认识到的一点是，在西班牙做到这一点和在中国做到这一点还挺不一样的，这就像一个好玩的百分比问题。比如王澍做建筑，本地文化的百分比是比较高的。他作为一个建筑师，同时对自己有文人的想象，对传统文化非常熟悉。但是，他也是现代学校所教的，我们俩是东南大学的校友。所以可能他在大的形式语言上，有很多中国的、江南的印记，而另外在空间上也有好多西方的东西。这种传统和现代的融合是发生在好多建筑师身上的，但是因为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有很强的西方印记，西方现代建筑的传统本来就是欧洲传统，在东方的融合就更难一些。而很多西班牙的建筑，普遍都把传统和现代结合得很好，几乎就是主流。

在我看来，评审辞里“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共生”，也是因为向大众传播而附加上的标签。如果你有机会去到这三个西班牙建筑师盖好的房子里面，实际上是会感受到这个房子以及和周围环境的关系，这种感受是很直接的，很感性的，地域融合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来说，这种地域融合是通过什么手法实现的呢？

张永和：其实他们就是在用一种相对国际化的

语言在做建筑。可是一般来说，大型建筑是不太可能用一种手工艺式的方法来对待的，但他们在有些项目中实现了。比如他们2014年在法国做的苏拉吉博物馆，主要材料是一种耐候钢，就是氧化后的锈钢板，一颗一颗螺丝钉往下拧，实际上是一个手工艺的活儿。在那个层面上，可能只有在一个小地方才能干出来。他们的建筑也没有雕塑性的形体，但是和周边环境结合得特别好。所以他们是这样一种自然的融合，不是形式的，不是一看就像高迪的房子，或者某种标签化的加泰罗尼亚风格。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他们脱颖而出，也和他们一直坚守在一个小地方有很大关系？

张永和：是的。我去过他们所在的奥洛特，是加泰罗尼亚区域一个很小的城镇，也没有太鲜明的特色，不像西班牙南部那样，有典型的摩尔人风格。他们就是在那样一个小地方盖房子，而且不是要盖多大，盖多重要的，就是用一种比较世俗的方法盖小房子。

他们的高明之处在于，在结构上的创造性，以及对材料的深入理解和运用到极致的能力。我去过他们做的小房子，是个私人住宅，非常能体现这种极致。那个住宅建在悬崖上，住着一对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妻子开了一家特别好的米其林餐厅，不到40岁的样子。整个房子大的空间关系是很经典的现代主义，也没有太突破的地方。

可是这个房子完全是钢板的，而且室内只见光洁的钢板表面，其实这些钢板里都是柜子，打开有各种功能空间。看他们的卧室，为了和钢板协调，连床单、枕头、抱枕都是黑的。一开始我没看到孩子的房间，就想这两个孩子怎么住啊。结果一进两个小女孩的卧室，看见有一个玩具熊，竟然也是黑的，真是疯狂。而且整栋房子的建造质量之好，每一颗螺丝钉都拧得那么一丝不苟，简直神了。我其实想说的是，有这样的建筑师，其实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业主。如果你看到那个业主，看她的装束、长相和气质，绝对想不到她会住在这样一个极端的房子里，但他们就在这里经营出这样一片居住的土壤，也是产生这种建筑师的土壤。☑

（感谢实习记者吴扬的帮助）



2

1
(本组图片供图：锐智九州)

3

《航拍中国》：想做航拍界的“舌尖上的中国”

文 / 驳静

“没有人能看完 50 分钟的《请您欣赏》”

有一个关于新疆的故事，是这么讲的。说有一个游客到了新疆，问一个放羊娃，“你为啥放羊？”小孩说，挣钱娶媳妇。“那你娶媳妇干吗？”小孩儿说生儿子。生完儿子呢？放羊。

人活着，乃至繁衍后代，终极使命竟是为了放羊？这听上去是个段子，《航拍中国》新疆拍摄团队成员洪雷涛，就真的在阿勒泰遇到一位放羊的大叔，一本正经地，说了类似的话。

洪雷涛跟这位大叔聊天的起因，是他的无人机团队想把羊群作为拍摄对象。

在新疆拍摄的三个多月中，洪雷涛常常遇到这种超出日常体验的时候。

而这种感受，也是很多看过《航拍中国》的观众曾经有过的。

南方观众，或许并不一定能对黑龙江漠河县北极村的零下 52.3 摄氏度感同身受，却很容易对这个村里，屋顶厚厚积雪营造出的童话世界动心。而北方观众对海南的印象，或许也只停留在笼统的“度假胜地”这个印象里，看到高空俯瞰到的浩渺七连屿，大概也会忍不住冒出一两句惊叹。

对一部以自然风光为主要画面内容的纪录片而言，10 分钟后，观众仍然兴致盎然，首先就是个胜利。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首播的《航拍中国》，计划共有 34 集，每集一个行政省。第一季共六集，除了已经播出的海南、陕西、新疆和黑龙江外，还有两集是上海和江西。头四集在今年春节期间播出后，其收视率和传播效果都佐证了这种胜利。

央视纪录国际传媒有限公司的创作总监余乐，是这部航拍纪录片的总导演。他做了十几年纪录片，拿过不少奖，他说做这部《航拍中国》，是“第一次觉得是在跟大众对话”。他和他的导演组成员，不断自我告诫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人能看完 50 分钟的《请您欣赏》。”他们要试图跟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建立某种对话。当旁白说到“巴扎里除了父母，什么都可以找到”，立刻跟上的弹幕内容是“那女朋友呢”。《航拍中国》似乎找到了那条与观众对话的高效路径。

某种程度上，他们想做航拍界的《舌尖上的中国》，后者无论在业内，还是大众中间，都引起了轰动。几年过去，这部热度跨界的现象级作品，对许多纪录片创作者而言，仍然是一个“纪录片高效传播”

的某种激励。而《请您欣赏》，则是中国观众印象中自然风光片的另一个传统传播的样本。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

全航拍镜头的纪录片，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人做成过，更何况《航拍中国》还将是一部长达 24 集的纪录片。

余乐说，这个想法一直在央视内部被反复进行论证，即便到了最后的剪辑阶段，仍然一度被否决。要知道，即便是几年前颇受好评的《鸟瞰中国》，也有大量非航拍镜头。导演组说，摄制过程中，也还有不同观点，提出“需要将片子调整为有三分之一地面镜头的作品”。

播出之前仍是忐忑的，余乐把宝压在中国观众对航拍视角下的中国的新鲜感上。也就是说，大部分人，都没有从这个视角看过中国。所以导演组最后仍然坚持在“全航拍镜头”这条线上不撤退。

最终，余乐在网友们的积极反馈里松了一口气。只不过，业内人士仍然对此反应不一。

一些人的观点是，这不是一部传统的纪录片。实际上这种自然风光类纪录片，或者有一个贯穿全片的观点，像齐柏林导演的《看见台湾》的环保主题；又或者，片子在讲一个大的情结，例如过去 30 年的变化等等。但《航拍中国》的确两者都不占。

“《航拍中国》，名字起得大，投资大，关注度高，出来的片子，理当是个震撼人心的东西，是让人正襟危坐的东西。结果，却是这样一个视角轻松、活泼的片子。”而这正是余乐想要的。而且，在画面内容上，平均每一两分钟就要换一个叙述主体，大的前提，是要将每一个事先计划的重点都剪辑在成片中，所以叙事性的人的行动线，出现得很少。在已经播出的四集当中，最明显的行动线发生在黑龙江。第八分钟开始，呈现了“封冻后的松花江切割成方块一采冰一拖上岸一卡车运输”等一系列行动镜头，终点是哈尔滨著名的冰雪大世界。但对《航拍中国》而言，这只是点缀，大部分的镜头依然是自然地理。后者也成了观众惊叹的重点。

然而，对导演而言，航拍纪录片，并不是达到“每一帧都可以当壁纸”的效果就够了的。或者说，美，还只是一个大前提。

这个大前提，实现的基础是高达 1 : 30 的片比，这意味着，平均一集 50 分钟的片子，素材有

1. 纪录片《航拍中国》展现的鄯善沙漠

2. 纪录片《航拍中国》镜头下的赛里木湖全景

3. 《航拍中国》拍摄团队在新疆



(张小冲摄)

《航拍中国》总导演余乐

1500分钟。以新疆为例，则是一集将近4个月的拍摄。在拍摄团队去实地勘景之前，余乐就已经带着团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他们的参考资料清单上，有《国家地理杂志》、美国人拍的《鸟瞰中国》，也有各类旅行攻略，还有“Google Earth”。他们罗列出每个省的100个可拍摄点，在地图上标注出来，再从中筛选出四五十个重点。之后，每个省份都按这些重点，制作出一份目标书。它有点类似分镜头脚本，甚至详细到某一个拍摄对象需要几组镜头，又分别从什么角度拍。

具体到什么程度呢？余乐举了上海汇丰大楼的例子。导演组对它的拍摄要求是不少于10组镜头。“大家对汇丰大楼的初步印象，是它在黄浦江边上。所以我们要求，将黄浦江作为前景拍一次，作为后景拍一次。其他角度还有例如仰角或俯角，外滩街景在画面中的纵深有多少等等。不同的角度、光线、景别，全在目标书里写得明白。”

新疆拍摄日记

在《航拍中国》已经播出的四集当中，新疆篇是最受观众好评的。

《西游记》里出现过的火焰山，小学课本里出现过的吐鲁番葡萄，是许多人对新疆的大体认知。所以，片中满山的粉色杏花树，鲜红的辣椒国旗，白色的棉花田，暗红色的番茄地，这些颜色就足以让人吃惊了。再加上沙漠起伏，天山皑皑，美且出乎意料。

不过，有人不解，如今无人机拍摄既普遍又花费小，为何《航拍中国》要使用成本昂贵的直升机？

实际上，无人机更偏重于低空，拍摄的也是一些体量小的目标。怕动物受到惊扰，也是另一个通常使用无人机拍摄的原因。但一旦涉及高海拔的目标，就只有直升机能完成了。所以《航拍中国》的拍摄方法，就是两者兼而有之。

一架直升机涉及飞行员、工程师等诸多工种，再加上摄影师等人，这队伍一出发，就是浩荡的大部队。相对而言，无人机分队要小得多，往往只有负责操控无人机的飞手和负责操控摄影的云台手，职业名字如此浪漫的二人，再加上一名当地雇的司机，基本就是整支队伍了。

多数时候，直升机这支队伍是行进在地面上的。

如果你看到一辆大型集装箱车，上面载着直升机，那多半是直升机航拍团队在转场。倒不是直升机坏了，而是，由于所有的飞行路线都要事先申请，再加上并不是所有的天气都适合飞行，直升机本身，从一个拍摄地点，转移至另一个，通常就是被运着走。

新疆拍摄团队的直升机机上导演王连明，最多的时候带着40人的大队伍。

位于天山西段的赛里木湖，是王连明的拍摄重点之一。他们住进当地居民自用的蒙古包，一住就是9天，其中7天，都在等。

王连明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看天。能见度好，空气通透，而且风不能太大，这是直升机能飞的前提。老天“赏飞”，还不够，接下来还要看空管部门的最后决定。

2013年之前，空域申请是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近两年空管政策有所松动，航拍逐渐有了可行性，但要求依旧很严。除了事先上报项目飞行计划外，单次飞行作业，也要在前一天下午3点前再次提交申请，而飞行作业的最终可行性，不到最后一

刻,永远可能有变化。王连明后来计算过,一般来讲,总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等。

那个跟放羊大叔对话的小伙子洪雷涛,则是位无人机拍摄的飞手。他也去了赛里木湖,片中那段环湖骑行的画面,就是他拍的。只不过他们并没有跟大队伍一起,实际上,大部分时候,无人机小分队有它自己独立的拍摄任务。

洪雷涛是“90后”,之前从未去过新疆,头一次去,就连续在那儿工作了113天,跑了3.86万公里路。拍摄火焰山金箍棒时,无人机发生了意外。当时洪雷涛和搭档站在离火焰山300米左右的公路上,这是他们能找到的最近拍摄地点。飞手和云台手这趟的任务是,对着金箍棒做一个“刷锅”的动作。在无人机拍摄的诸如直飞侧拍、浮拍等基本动作中,这是最难的一个,需要飞手和云台手配合默契,一个掌握飞行的角度,另一个掌控摄像机旋转的角度,才能拍出流畅连贯的环绕镜头。

由于站得太远,对相对距离判断不足,无人机一头撞到了金箍棒边儿上的孙悟空雕塑上。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部“全航拍”的纪录片,它的特点是什么?

余乐:即便是航拍经验比较丰富的团队,从前的拍摄也更多的是掠过式的、飞跃式的。最常见的就是顺着—个街道、河流,或顺着—条铁路平缓往前,而很少会关注途经的某个目标。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航拍成本高,在许多纪录片中,航拍镜头只是一个补充。但这次我们是全航拍,不可能全是这类掠过式镜头,所以这次,我们对单个场景和单个拍摄对象进行环绕拍摄和分解拍摄。

另外,我们有意回避了特别长的长镜头。因为其实航拍在空间上没有约束,只要镜头不停,它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而且长镜头最能还原空间。但我们讨论后觉得,这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最后我们做了选择,除非是特别好或特别贴切的长镜头我们才会保留,但最长也应该只有30秒左右。

三联生活周刊:从摄影和剪辑角度,《航拍中国》有什么想法?

余乐:航拍角度,色彩、线条、结构、规模以及变化,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色彩,从空中看到大地的色彩、海洋的色彩,是地面上看不到的。尤其是这些色彩形成的色块。再如线条,也是特别明显

的例子。山脉如何延伸,水在地面形成的湖泊轮廓,陆地海里形成的岛屿形状,都是到空中后才能看到的线条。这些都是航拍镜头要格外展现的。

剪辑方面,我们不太使用传统蒙太奇的方式,更多的,还是让对象只以静物的方式存在。只不过,这个静物往往是一个十分庞大的个体。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的解说词行文也比较新颖活泼。在吸引观众方面,它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余乐:它为观众留下记忆点,刺激他们产生联想。打个比方,新疆赛里木湖的画面内容很简单,除了湖面风光,还有一些飞鸟。但解说词中,我们讲到,投放冷水鱼,这些鱼吸引了鸟类。配合看到的飞鸟画面,观众会脑补很多情节。相反,如果我只告诉你赛里木湖多大、什么季节结冰,就完全不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人的元素在目前播出的四集中,出现得相对少,这是刻意为之吗?

余乐:其实我们倒挺希望增加人的元素。但是人作为个体,在航拍画面中显得太微观、太渺小。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拍到一些成规模的人的场面。但我们回避了那些过于商业的秀,而是选择了比较真实和真切的人类活动作为拍摄对象。黑龙江的冰雪大世界就是其中比较好的例子。因为东北到了冬天其实挺无聊,天气很冷,大家都待在屋子里,但这个活动可以让大家都走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动物的元素呢?另外,航拍动物有没有优势?

余乐:你去看很多国际和国内的动物纪录片,会发现大家都在做的一件事,是想尽各种办法接近目标动物。可以说航拍器解决了很大一部分难题,比如我们在陕西拍到羚牛在山巅的画面,这件事只有航拍器能够做到,因为这是步行达不到的地方。我们这次对动物的拍摄理念是,有代表性的、珍稀的,尽量都去拍。■

(实习记者孙大卫对本文亦有贡献)

山脉如何延伸,水在地面形成的湖泊轮廓,陆地海里形成的岛屿形状,都是到空中后才能看到的线条。这些都是航拍镜头要格外展现的。



美剧《小镇滋味》剧照

《小镇滋味》：反常规的美式中产图像

文 / 张月寒

看似荒诞的外壳下讲述了一个温暖又残酷的故事。

最近，一部口味颇为怪异的美剧《小镇滋味》上线，在丧尸类型片的外衣下以一种荒诞手法讲述了一场家庭伦理剧，不走常规的情节铺叠出中产阶级的心理和现实。

希拉 (Sheila) 和乔尔 (Joel) 是洛杉矶郊外一家小镇的房产经纪人。他们是高中时期恋人，曾经是毕业舞会上的“王后”和“国王”，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在一起，做着一份收入颇丰但又算不上十分富裕的工作。和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夫妇一样，他们的生活日渐平稳。渐渐地开始无聊、缺乏激情。希拉觉得自己应该更大胆、更无所畏惧一些，乔尔觉得自己缺少直面世界的勇气和果敢。

故事叙述到这，本该是一个最平凡不过的美式中产阶级故事，之后或许会有出轨以及和青少年女儿的

矛盾等情节。但是突然有一天，毫无征兆的，希拉在带领客户看房子的过程中突然呕吐，剧情画风一转，她自此变成了一具需要吃人肉为生的丧尸。然而这时，本该顺理成章变为恐怖片的《小镇滋味》，却又重新回到一种冷静的叙述，继续进行希拉的日常故事。周围的人——丈夫乔尔、女儿艾比和隔壁暗恋女儿的埃里克——知道了希拉的身份后不仅没有出现通常丧尸片中都会渲染的恐慌，反而一起开始帮助她，一步步解决突来变故。于是，一连串看似荒诞实则又合理的故事展开了。恐怖中透着幽默，紧张里隐含着反转，真是近来美剧风格奇葩的一部。

不按常理出牌

《小镇滋味》是 Netflix 的自制剧。而这部剧也非常适合网飞的这种一口气看完模式。如果按照传统的每周一更的模式，该剧可能引起大量的弃剧。在刚看第一集时，我曾无比确定这将是一部烂剧。然而，一

旦开始看第二集，在我没有意识到之前，已经无法停歇地看完了整个10集。这个剧有一种莫名的东西在吸引你。无论是显得过于夸张的演技还是一浪又一浪的戏剧式冲突，都在程式化的观剧体验中凸现出一股不一样的“瘙痒”。这种感觉驱动着观众，让人停不下来。

“没有套路、不按常理出牌”，是该剧的最大魅力。全剧在密集的笑点下展示了一种家庭剧的氛围，事实上凸显了丧尸片本身的一种题材变化：从以往没有脑子的胡乱咬人，到如今的更多日常解读，看得出西方影视剧领域对于这一1968年就出现的经典类型剧有了更多想法。无论是人与丧尸对战，《行尸走肉》等引领的末日绝望情怀，还是诸如《我是僵尸》《小镇滋味》等首次站在丧尸角度讲述丧尸的日常生活，美剧领域对于这一题材的迷恋带来了贴合现实的深度挖掘。以上背景，产生了《小镇滋味》的这种“奇异的吸引”。事实上，也正因两个元素——丧尸和宁静的郊外生活——的极度冲突，才引起人们对这部剧最初的兴趣。从这一角度来看，《小镇滋味》事实上具有“荒诞派戏剧”的影子，“用荒诞的手法表现荒诞的存在”，正是《小镇滋味》的核心，以一种“错位”手法，叙述着一个最耳熟能详的中产主题：家庭和亲子关系，以及对人性的探讨。

变成丧尸以后，女主希拉以及周围人反而在变故中获得了自我成长和自我突破。剧中对人类本能欲望的探讨，衍生出一个社会问题：多种现代社会的疾病的大暴发都在于人类对自身的原始欲望无法控制。“我们总那么贪婪地攫取我们想要的，而从不顾那攫取的深层后果。”主创借角色埃里克之口说出了这部剧想要面对的主题。这也使得《小镇滋味》整体看起来并不是一部空虚的荒诞喜剧：它对于现实的批判，隐含在看似戏谑语言之中的调侃。

中产价值观的隐藏

《小镇滋味》的另一层内核，是对美式中产阶级生活的一种审视。

一直以来，对于“中产阶级郊外生活”的观点是两面的。一派认为，由于其重复、规律、一成不变，它是“被囚禁的生活”，是需要挣脱和逃离的。《绝望的主妇》和妮可·基德曼2004年的翻拍片《复制娇妻》，都是对此种宁静郊外生活用一种批判性眼光去讲述，揭露甜美外表下的阴暗面。另一派则认为，郊外生活的宁静、安逸、独立院落，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美国未来学家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在他的

著作《城市：全球历史》中就认为，“郊外生活”是一个理想化概念，可以疏解都市人“过度拥挤”的心理状态。法国歌手让·费拉（Jean Ferrat）也认为摩天大楼式的公寓生活过于可怕，从而将“郊外生活”在自己作品里极度美化。

充满落叶的街道、美丽的树木、宁静的花园、百年历史的小教堂……这些元素，是人们迷恋郊外生活的一个最初原因。而当聚居形成，同一社区仅有的商店、学校、公园、运动场等场所，又会使得人们的人际交往变得更容易紧密。同时，由于生活太过安逸，使得郊外的居民有时会变得太无聊了，于是，窥探邻居隐私，成为他们生活不可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两点体现在《小镇滋味》里，表现为邻居总是能有意无意窥见希拉和乔尔试图掩盖的秘密。而这种邻居间的过于亲密对希拉和乔尔的生活状态的影响尤为明显。《小镇滋味》借僵尸事件，述出典型的中产阶级郊外生活缺乏隐私的状态，讽刺人性里过于喜欢攀比、爱管闲事的那一面。

不离不弃、保持家庭的完整性看起来是该剧推销的又一价值观。无论希拉出现怎样荒唐的变化，丈夫乔尔和女儿艾比都一直包容着她。无论是第一集里丈夫发现希拉开始吃人后的接纳，还是后来为她寻找不用谋杀也可以喂饱她的替代方法，都似乎令人感动；还有女儿艾比，从一个叛逆的青少年到慢慢开始理解、包容父母的一切。父亲和女儿两个人，就这样在这极不寻常的家庭变化之下一直竭尽全力保持着镇定，为了保全自己的妻子、自己的母亲，捍卫家庭完整性。

在这样一个不走常规的背景下，剧里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观，又没有说教感，本应该说是让人觉得温馨的。但其实也展示了美国中产者饱受诟病的另一面——自私。1911年美国曾有一本《郊外生活》（*Suburban Life*）期刊，里面有一篇文章描述了一个居住在郊外的中产阶级，每天捡起门廊前的报纸，坐在精致早餐桌上阅读新闻。这时，他看见了一个孩子被谋杀的新闻——作者指出，如果这个事件发生在自己邻近的城市，他或许会觉得些微触动；如果是在很远很远的地区，则很有可能他心上是没有什么波澜的。这篇文章于是由此探讨一种中产阶级的“自私”。这种自私，很容易在郊外生活中出现，而物质优渥、宁静富足的郊外生活，又会加重这种自私。《小镇滋味》里，为了生存，希拉需要吃人肉。然而，整个家庭却似乎对谋杀别人作为她的食物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内疚和内心挣扎。主创在渲染中产阶级式家庭温暖之外，倒不忘指出了人性中不自知的“自私”。这条暗线所隐藏的，也许才是这部剧不失为一部好剧的重要配料。■

情绪渲染师梅林茂

记者 / 黑麦

梅林茂的音乐里有一种“燃”的声音。即便是在二次元的游戏世界。



梅林茂

（刘雁菲）

梅林茂第一次出现在大银幕上，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那是森田芳光改编夏目漱石的电影《其后》，这部电影不多见地将主创人员的影像剪辑在了那个电影的片头，梅林茂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坐在钢琴旁边，他梳着分头，眼神里还没有一丝大师的神韵。

这是一部讲述 30 年代发生在东京的爱情故事片，小林薰、松田优作、藤谷美和子是片中的主演，他们也是那时最热的演员。影片与《小城之春》的故事相似，而男主人公却选择了不同的结局。这是梅林茂第一次与森田合作，在电影中，他用“再会”“情景”“回想”“对话”“模样”以及“弦乐四重奏”等段落延续了导演的情感叙述，他的“收场诗”犹如戏剧，用他擅长的钢琴演奏搭配着重复的弦乐旋律。凭借着这些创作，梅林茂获得了第 9 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电影配乐的提名，由此，由他配乐的电影，常常被评价为如诗的故事。

这是 1985 年发生的事，距离梅林茂转型不过二三年。此前，他是一名摇滚吉他手，在英国吉他手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日本巡演期间担任嘉宾。70 年代末，新浪潮音乐风靡日本，他成为 EX 乐队的成员，或许是这种标新立异的演奏风格，让梅林茂尝试在古典和流行、先锋与传统之间找到了一种带有忧郁的平衡感。

很多年以后，《其后》中的几首曲子出现在了一部名为《一代宗师》的电影中，宫二在雪中孤独习武时，那个熟悉的旋律突然响起，让人联想到这故事背后隐匿着怎样的爱情。

值得一提的是，王家卫电影中的不少叙述方式来自森田芳光的电影，如《其后》《阿修罗》《失乐园》《家族游戏》等，甚至在他找到梅林茂为自己的电影配乐后，仍沿用优雅的长、慢镜头闲笔，在必要时突出一首配乐中的插曲。他甚至愿意重复使用过去的经典电影中的主题曲，来强化故事中的情感。

在选用音乐上，50 年代末出生的华人导演有着极大的相似。1958 年出生的冯小刚、王朔、王家卫，1957 年出生的叶京等人，似乎对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以及埃尼奥·莫里康内的《黛博拉主题曲》（Deborah's Theme）格外偏爱，这两首曲子都是电

影配乐中的经典之作，前者来自科波拉的《教父3》，而后者来自赛尔乔·莱翁内的《美国往事》，两首曲子都具有意大利式的古典旋律和典型的地中海情结，姜文将其运用在《阳光灿烂的日子》，王家卫则插入《一代宗师》中，用法不相上下。而梅林茂的运用，则让王家卫看起来更高级些。这是一种东方式表达，在恢弘的交响乐渲染下，梅林茂喜欢穿插些东方的调子或是太鼓、钢琴、三味线。如果当年的《黑雨》配乐用梅林茂换上汉斯·季默（Hans Zimmer），想必那个高仓健扮演的松本正弘和松田优作出演的佐藤会少些美国式的呆板眼神。

吉他是梅林茂最熟悉的两件乐器之一，但是他对于这种现代声音的运用却极为谨慎，在日本电影《外事警察》中，为了强调动作电影的紧张感，他罕见地用起了吉他的失真效果，随着鼓点的敲击，金属击打一般的吉他声逐渐融入画面，大量间谍与隐藏在深水之下的恐怖组织成员伺机行动。

王家卫与梅林茂的第一次“合作”是2000年的电影《花样年华》，那时，导演已经钦定了黑人爵士歌手纳京高（Nat King Cole）的《也许，也许，也许》（*Quizas, Quizas, Quizas*），周璇的旧日流行曲和谭鑫培的京剧老生；他也动用了曾在1994年《重庆森林》中合作过的意大利音乐家麦可·葛拉索（Michael Galasso），仿着铃木清顺的电影《梦二》中的主题曲，创作了主题曲《吴哥窟》（*Angkor Wat*），提琴、小提琴、吉他的沉重，刻意模仿了梅林茂的配乐旋律，使得两个曲子在《花样年华》中前后呼应，并且勾勒出旧上海时期的模样和香港60年代的风情，三拍子、小提琴摇曳，张曼玉的27套旗袍在这音乐的衬托下，在擦肩而过之间，就像赶稿的周慕云手中的香烟，充满孤独。

那是一段亚热带电影时期的起点。陈英雄、王家卫、朗斯·尼美毕达等导演，曾反复拍摄和塑造着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的炎热故事，这是一种近似于让-雅克·阿诺式的奇幻时空，在那个闷热的环境中，雾气和汗水模糊了现实，让镜头变得似乎浪漫、似乎诗意，像博尔赫斯与马尔克斯的混合体。

就像《春光乍泄》里皮亚佐拉（Piazzolla）的弗拉明戈式扫弦，大调《米隆伽舞的三号》，由大小提琴、低音提琴、单簧管与手风琴合奏出凄美的声音，迷离、慵懒、暧昧、缠绵反反复复。那也曾是梅林茂的创作特点，早在1992年的电影《教师夏休物语》中，他用吹奏和凌乱的节奏营造出了一阵海风的吹拂，而

在前不久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中，那首名为《带我去上海》的英文歌曲，充满了冷漠的凝视和杀戮后的倦怠，美国歌手约翰·休斯（John Hughes）有着类似科恩的沙哑，而梅林茂手中的钢琴在这一刻变得冷静甚至堕落。他刻意地让这首歌曲变得“遥远”，那是旧世界华人逃亡的地方，是一个亦被描绘成金山的角落，它是充满诗意的亚热带，也是远离华人世界南方的南方，它是大陆，也是孤岛，藏着无尽的孤寂。

在1998年的电影《不夜城》里，梅林茂也曾尝试过例如《跳支华尔兹》（*Take this Waltz*）这样的拉丁风味小品，只不过那是另外一种情绪，表达着刘健一与佐藤下美的一种追逐。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设计师汤姆·福特（Tom Ford）的电影导演处女作《单身男子》（*A Single Man*）里同样来自梅林茂的配乐“乔治的华尔兹”（*George's Waltz*）。

梅林茂的音乐成就了王家卫的电影语言，但是在他温婉的音乐中，始终有一种近似于“燃”的走向。他的音乐是进行式的，是不断累加音轨的循环，是情绪的重复，有如呼吸，起伏时有动荡，隐藏着爆发。《2046》里，周慕云不再是那个“标准情人”，主题曲里的提琴充满了顿挫，但它仍旧悠长，也足够悠长，除了忧伤，它肩负着刻画人物内心的不安与敏感。影院喇叭中的那些波兰舞曲，用音符诠释着暧昧，仍旧是三拍，仍旧是舞步般的走路，行进的过程中按压着内心的不平，在乐曲《Long Journey》中，小提琴变成了大提琴，音乐被赋予了更多的女性思绪，张曼玉的以一种离别回归了自知的幸福。

在张艺谋的电影《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同样是中国笛和长笛的运用，编曲上却有着迥异的听觉感受，二组作品就像是对竹与沙的分别描写，一种让人置身中国南部，而另一种却远在西北，这是梅林茂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两次描写，《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大量弦乐让人浸在一股不可逆的历史洪流之中，而《十面埋伏》中的独奏，充满张力，有如破竹之势。

9个月前，梅林茂的名字也出现在二次元世界，他为一款流行的手机游戏谱了音乐。开篇音乐一以贯之，他用几支提琴奏鸣出一种烟雾感，随后用日本太鼓来营造人物的出场。打斗时的音乐则是中国笛的几组旋律切换，梅林茂巧用了音乐的循环来描写格斗时的回合制。比如一首《战斗景色曲》中，充斥着大量的日本传统乐器，三味线、尺八、太鼓、十三弦古筝等。即便游戏配乐，梅林茂最重要的标签仍是东方的古风。■



1. 彼得·贝伦斯 1909 年为 AEG 设计的电水壶

2. 马塞尔·布鲁尔的 S 35 R 悬臂椅出现在 1930 年“法国装饰艺术展”的德国展区

3. 1964 年理查德·谢普和马尔克·查努所设计的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 TS 502

4. 马克思·比尔的 367 型号挂钟是战后的“好形式”工业产品

一百年的德意志制造联盟

文 / 钟和晏 部分图片提供 ifa

作为 20 世纪德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之一，德意志制造联盟经历数次战争和思想运动，赋予世界以德国的外在形象。

与德意志制造联盟 (The Deutscher Werkbund) 早期历史有关的一幅著名海报，是弗里茨·埃姆克为 1914 年的“制造联盟科隆展”设计的：大红底色上简单的黑白字体和清晰的排版，正中间一个白色 W 字母与三个金色皇冠构成一个倒三角。那一次，皇帝威廉二世也参加了科隆展的开幕式。

1907 年 10 月 5 日，彼得·贝伦斯、约瑟夫·霍夫曼、理查德·里门施密特等 12 位艺术家、建筑师与 12 家慕尼黑企业，在慕尼黑四季酒店共同成立了德意志制造联盟，他们的目的是“通过艺术、工业和手工业的协作，通过教育、宣传及相关问题的一致立场，促进工艺制造更趋高雅”。

从 19 世纪中期起，工业化和城市化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不是手工，而是机器和批量化生产决定生活用品的形式和制作过程。按照当时联盟的精神领袖之一赫尔曼·穆特修斯的说法，联盟的工作应该是“从沙发靠垫到城市建设”无所不包，以“好形式”的物品来培养民众的“好品味”。

虽然如今的德国产品以高品质著称，但是在制



1

造联盟创立之初，德国制造的品质还远远落后于英国。穆特修斯曾在《德国形式的未来》一文中写道：“德国的当务之急在于赋予世界以外在的形象，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真正位于世界的巅峰，德国必须成为这样的民族。”

所以，工业产品“更趋高雅”，这不仅与物质利益相关，还关系到民族利益，意味着通过艺术和高品质的生产，为德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赢得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到1914年，制造联盟已经拥有1870名成员。它经历数次战争和思想运动，发展成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并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化生活。

今年是制造联盟诞辰110周年，正在深圳华·美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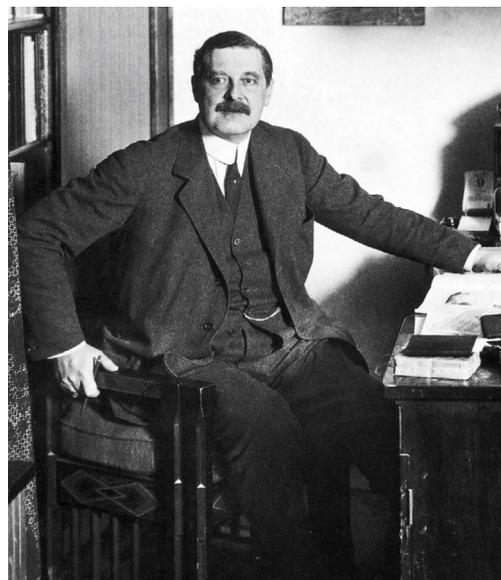
1. 1926年时的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他为1930年“法国装饰艺术展”德国展区担任艺术总监

2. 1910年卢西安·伯恩哈特为“Manoli”香烟设计的海报复制品。现藏于慕尼黑州立应用艺术博物馆

3. 1911年汉斯·鲁迪·埃尔特为欧宝汽车设计的海报复制品。现藏于克雷费尔德美术馆

4. 德意志制造联盟1914年科隆展海报复制品。现藏于慕尼黑州立应用艺术博物馆

5. 1913年时的彼得·贝伦斯。他是德国现代主义设计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5



1927年柯布西耶为德国魏森霍夫住宅区设计的半独立式住宅



术馆展出的“德意志制造联盟——100年的德国建筑与设计”就是对它百年历史的一次细致回顾。展览由德国对外关系协会与慕尼黑工业大学建筑博物馆策划，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国、民族社会主义到战后重建时期的时间顺序，呈现了数百件家具、电器、生活器皿、海报、出版物、建筑模型、影片等展品及文献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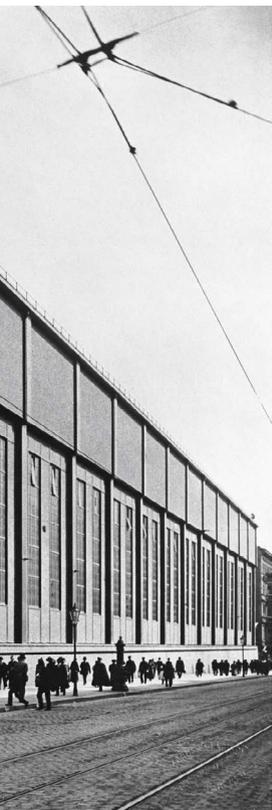
一开始的展品带有明显20世纪初的风格，“哈克”牌咖啡用具上印着浓黑的字母标志图案，“马诺丽”牌铁皮香烟罐上是穿黑色晚礼服的时髦女郎。彼得·贝伦斯的作品频繁出现，他是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的艺术顾问和建筑师。从电水壶、电风扇等工业产品，海报、企业标识到厂房建筑，贝伦斯为AEG创造了整体面貌和独特的产品识别体系。可以说，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企业设计总监。

与通用电气和贝伦斯的合作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家具工房、百乐顺（Bahlsen）饼干厂等一些企业因为与制造联盟合作，获得经济上的

成功。“现在全世界对工业产品都有一种惯例做法：在学校里传授工业设计知识，在企业研发工业设计产品，再在展馆推出此类展览。可以说，这种流程最早就是由德意志制造联盟创建的。”策展人温弗雷德·南丁格尔（Winfried Nerdinger）这样评价说。

制造联盟一开始就面向未来和技术，工业化赋予工作与生活新的秩序。他们认为产品应该按照原料、用途、使用方法和生产方式进行设计，摒弃装饰性的图案装饰，从良好的使用价值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美。直至1933年，“无装饰的造型”一直是制造联盟的口号。

用符合机器时代的简洁风格取代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事实上这也是比制造联盟更具世界影响力的包豪斯（Bauhaus）的设计准则。这所由瓦尔特·格罗皮乌斯1919年在魏玛创建的德国设计学院把简洁明了的方盒子建筑、白色的室内设计和规则几何形的家具带入人们的生活。包豪斯的教师都是实干的、有才华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作为新时代公众利益的



通用电气涡轮工厂
彼得·贝伦斯，1910年

德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涡轮工厂位于柏林西北部，彼得·贝伦斯1908年为了展示工业发展的繁荣而构思，1910年完成。工厂的中殿用于制造动力涡轮发电机等重型机械，主要空间是一个长207米、宽25米的矩形平面，22个钢柱框架以9米的间距设置。钢结构的骨架从外立面就清晰可见，透明玻璃嵌板代替了两侧的墙体，匀称的比例减弱了庞大体积产生的视觉效果。

贝伦斯用近乎古希腊寺庙的形式，建造了一个宏伟的铁和玻璃混合建筑，古希腊、埃及和现代美学在此融为一体。这座结构简洁明快的新时代工厂，强有力地表达了德意志制造联盟的理念。

代言人，可以说，他们的作品和思想构成了现代设计的基础。

从展览上看出，“二战”之前制造联盟与包豪斯之间有众多交集，联盟的几次重要展览都是由包豪斯成员主导的。格鲁皮乌斯设计的长方形办公楼及工厂出现在1914年的“制造联盟科隆展”上，全玻璃的大楼背面以及玻璃墙面的楼梯间在当时是前所未见的。

1927年，制造联盟在斯图加特举办“公寓房”展览，展出魏森霍夫(Weissenhof)住宅区中的21幢典范住宅，由17位欧洲建筑师设计。魏森霍夫住宅区的目的是从经济、功能、建筑、技术和家具的角度推广“新生活”的概念，主持这一国际性先锋项目的正是密斯·凡德罗。

在魏森霍夫区，这些住宅彼此邻近，外表用白水泥粉饰，大量使用了玻璃窗。密斯·凡德罗的四层公寓楼因为采用钢骨架构，布局可以灵活多变。格鲁皮乌斯的公寓房里，清水水泥地面上放置着马

塞尔·布劳尔设计的钢管桌椅和单人床，朴素到近乎清苦。奥特的极简主义联排房的房间里，只有费迪南德·克拉莫设计的桌椅和编织床等几件家具。

老照片上，柯布西耶的两幢半独立式房屋是纯白色的几何体，底层被抬高，从屋顶平台可以眺望斯图加特的城市风景。住宅前方的空地上，有一位身穿白裙的摩登女郎倚靠在一辆敞篷车上。这栋样板住宅具有现代的平面布局和简约的室内装置，后来被建筑史学家描述为现代建筑学的象征。去年7月份，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在今天看来，这些住宅形式也许司空见惯，但是在当时，获得新时代的新居住形式还是需要为之斗争的内容。密斯·凡德罗在制定规划时，就与恪守传统的斯图加特派建筑师发生了矛盾。柯布西耶在1927年3月写给母亲的信中说：“这一次的设计将给我们招来非议！”

另一方面，斯图加特现代住宅展又满足了建筑师们的社会理想。他们相信，设计良好的住宅环境能够让人们过上幸福的、有创造力的生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怀着“教育和影响大众，激进地改变他们的居住习惯”的教化理想，制造联盟的众多活动一直集中于居住与生活的主题。他们认为，新式居住的特点在于家具与空间之间的新型关系，简洁中性的空间中应摆放轻巧的标准化家具。在未来的流动性社会中，居住形式将会类似酒店的狭小房间，但配有宽敞的共用客厅及服务设施。

华·美术馆一层展厅正中央，有一组大幅黑白照片展示的就是类似酒店的居住理念。比如在布雷斯劳的制造联盟住宅区，1929年汉斯·夏隆为单身者或两口之家设计了一幢公寓楼，每间公寓的面积都很小，只有带炉台的厨柜，但大楼里配有餐馆和多个共用客厅，可以说是介于酒店与公寓之间的混合体。

这些大幅黑白照片没有装框，斜挂着固定在墙上，高度与观众的视线相符。这种颇具表现性的斜挂法其实是再现了制造联盟在1930年“法国装饰艺术展”上不循常规的展览方式。那是“一战”后，德国第一次在巴黎亮相，帝国政府希望展现出德国如何积极参与了现代居住和标准化工业产品的发展。

瓦尔特·格鲁皮乌斯是巴黎大皇宫里德国展区的艺术总监，他自己为展区设计了一个共用客厅，包括吧台、健身区、图书馆以及信息墙等。介于旅馆与公寓房之间的混合体，把社会乌托邦式的设想

延伸到居住平等的理念上，成为一种民主社会意识的表达。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这些针对流动性、爱运动和国际化人群的新居住理念也就烟消云散了。

1933年，德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是它带来的却是死亡和毁灭。那一年包豪斯设计学院关闭，但是制造联盟直到1938年才结束。



玻璃亭

布鲁诺·陶特，1914年

1914年的制造联盟科隆展上，德国建筑师布鲁诺·陶特专门为德国玻璃工业协会建造了一座“玻璃亭”，目的是为了展示玻璃材料的建筑潜力，这座具有表现主义风格的亭子也是建筑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玻璃砖建筑。

玻璃亭是一个多面多边形的菱形结构，十四边的基座由厚玻璃砖构成，混凝土结构的立面上像镜子一样镶嵌着彩色玻璃，色彩从底部的深蓝色开始转为青苔绿色和金黄色，上升到穹顶顶部闪闪发光的淡金色。在亭子内部，镶嵌玻璃台阶的金属楼梯向上蜿蜒，内部的棱镜效果显示出万花筒般的彩色光线。

陶特把这座玻璃亭称为“美丽的小寺庙”，他曾经说过，他是以哥特式大教堂的精神来设计它的，就像绘画和雕塑一样，用一个没有功能的建筑表达新的艺术精神。

策展人温弗雷德·南丁格尔并不讳言那段令人难堪的历史，他评价说：“与后来的刻意美化版本相反，制造联盟直到1938年还存在，有自己的主席，举办过几次展览，也出版了年鉴，但是所有的活动都受到了纳粹意识形态的影响。德意志劳工阵线下的‘工作之美’部门继续生产制造联盟的设计产品，以‘好的德国形式’服务于民族社会主义。”

有一张老照片拍摄的是纳粹“奥登斯堡”庞大的集体用餐室，几十排平行的长条餐桌上铺着白色餐布，桌面上简洁实用、没有任何装饰的白瓷餐具和带靠背的实木餐椅都是出自制造联盟的设计。1937年5月，大型帝国展览“创造着的人民”在杜塞尔多夫开幕，纳粹的旗帜飘扬在杜塞尔多夫莱茵河畔的节日广场上，在这次展览中，纳粹的政治宣传挪用了制造联盟的“新时代”理念。

“二战”之后制造联盟的影响力日益减弱，失去了之前的地位，德国设计的声望转移到了1955年成立的乌尔姆设计学院。1958年，制造联盟策划了布鲁塞尔世博会德国馆，这是西德战后第一次出现在国际性的博览会上。有别于纳粹建筑的宏大对称及石材外立面，德国馆以一个悬浮状的透明形式展现轻快舒适的设计，表明西德社会已经融入西方世界的民主发展之中。

就在布鲁塞尔世博会前后，1957年的柏林国际建筑展以及1959年的玛尔市“生态环境的破坏”会议上，制造联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话题——工业社会中的环境保护。特展“未来的城市”中，第一次记录抨击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自然风景造成的破坏，创作者瓦尔特·洛索夫写道：“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未经开发的自然景观日益消失。这一进程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在一代人的生命历程中，某些自然景观已变得面目全非。”

以批评的立场指出工业社会的症结以及纯粹以盈利为导向的经济增长导致的生态后果，这是制造联盟继20世纪30年代的新型居住理念之后，又一次表现出超越时代的先见之明。在这之后，制造联盟把注意力从制造业转向消费问题，不再仅仅关注产品的“好形式”，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地对待产品消费的后果。

如同当时联盟主席汉斯·施威普特所说，虽然我们设计出了高品质的玻璃水杯，但是如果饮用水本身已经变得浑浊的话，又有何意义？对于这个问题，也许到今天变得更加难以回答了。■



《三国志》讲义

戴燕 著 定价：39.00元

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在传统的“二十四史”中，它是历来最受重视的“前四史”之一。后人对于三国史事的了解，包括民间流传的种种三国评话和演义，也都基本来源于此。本书在对文本的具体解读中，借助政治史、文学史、思想史、医学史、东亚史等相应的视角，去复原陈寿笔下三国史绚烂恢弘的画面。

雁城谍影

上官鼎 著 定价：39.00元

上官鼎首度以抗战为背景的历史传奇，在虚构的框架中呈现出真正的战史，如对中国空军与苏联志愿航空队、美国飞虎队的联合空战，对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的描写均有史料的支撑。小说既涉猎了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更写出了战争中的家人亲情、儿女之情、同窗之谊、袍泽之谊以及道义之交。



与民国相遇

唐小兵 著 定价：42.00元

本书是从民国史料生发出的短篇随笔集，内容涉及民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政界、学界、文坛无所不包；文章多短小精悍、笔法生动，可读性强。作者从边角史料发散开去，有料亦有趣，可爱亦可信，可从细节处补充读者想象中的民国图景。

白话文运动的危机

李春阳 著 定价：68.00元

百年前兴起的白话文运动，造就了今天的白话文体制，被视作中国走向现代过程中的巨大成就。本书以百年来文言、白话的消长起伏为线索，通过对清末文字改革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民族形式论争等系列史实的清理，全面检讨书面语革新和文体建立上的成败得失。



窃听：“二战”美军审讯营秘密监听档案解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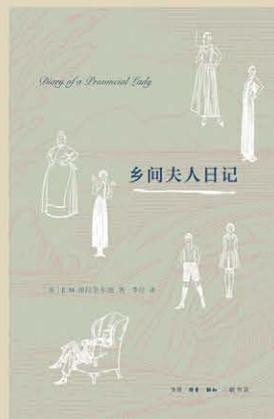
[德] 菲利克斯·略莫尔 著 强朝晖、俞悦、高玉 译 定价：58.00元

1942至1945年间，美国情报机构在华盛顿附近的亨特堡秘密营地对数千名德国战俘施行监听，并留下了厚达几十万页的记录。这些记录不久前才被公诸于世。在战友间的谈话中，士兵们讲述各自的前线经历，吹嘘自己的种种“英雄事迹”与“恶行”，袒露其内心的恐惧以及对希特勒的看法……

乡间夫人日记

E.M.德拉菲尔德 著 李涇 译 定价：32.00元

主人公是一个英国中产之家的主妇，她追求进步，希望在文化上充实自己，向往大都市生活方式和上层社会靠拢，但往往力有不逮，事多尴尬。本书自1930年问世以来一直深受读者欢迎——乡间夫人对于自己生存意义有过的焦虑，事实上从未消失，也从未过时。





英剧《唐顿庄园》中 20 世纪 20 年代的装束

以 20 年代为灵感的成衣系列

艾玛·斯通
身穿 20 年代风格纪梵希高定礼服
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

为什么总是 20 年代?

记者 杨聃

从时尚的角度来看，美国比欧洲更好地拥抱了 20 世纪 20 年代。

当时尚遇上美国青春期

霍格沃兹魔法学校的“粉丝”终于能放下对奥斯卡的执念了，经过历年来“哈利·波特”系列前 8 部电影的 12 项提名，《神奇动物在哪里》终于打破了与拿奖失之交臂的魔咒，将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收入囊中。

虽然整部电影用了 3500 多套戏服，但戏服设计师柯琳·阿特伍德 (Colleen Atwood) 对于主角的部分有点过于“吝啬”了，尤其是“小雀斑”饰演的纽特·斯卡曼德从头到尾只有一套衣服，幸好衬衣、马甲、西装、大衣够繁琐，时不时可以脱一脱。可要做一套让观众连续盯着看一个半小时都不会烦的衣服还得有点儿特点。

要知道数神奇动物多少带些隐隐的荧光色，阿特伍德的首要任务就是让斯卡曼德尽量和它们在画面上保持和谐。“当然不能让他穿得花里胡哨，违和地站在 20 年代的纽约街头，那就太过了。”阿特伍



美剧《大西洋帝国》剧照



摩登女郎的历史映像

德对《Deadline》说。为此，她在蓝色的羊毛外套里先掺了大量的绿色，又搭配了一点点褐色，这样一方面在不同的光线下衣服看起来会有些微妙的变化，另一方面即便他和神奇动物或者一群身着黑色和海军蓝的路人同框，也不会显得突兀。

据说在为斯卡曼德这个角色定妆时，小雀斑试了无数次衣服，就为了让他的外套看起来有一点点拘谨地不合身，来增强其格格不入的特质。阿特伍德在此之前获过三次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和八次提名，从早期的《剪刀手爱德华》，到《断头谷》和《爱丽丝梦游仙境》，她擅长把魔幻主义需要的想象力加

入到现实背景中。这次“部分年代正确”的衣橱也不例外。

“那是帽子的全盛时期，女士们戴钟形帽，男士们戴高顶宽檐软呢帽或者小礼帽，应该说不同阶级的人戴不同类型的帽子。”阿特伍德保持了钟形帽正面效果，在帽子的后面动了点“手脚”，他说：“我把它做了扭曲处理，就像传统的女巫的帽子那样，呈现出优雅的蜿蜒感。”她还把本应厚重的外衣改成了轻盈的版本，让它们像斗篷一般摆动。“为这类电影设计服装得稍微置身事外一点，再借用那个时代。其实这也正是电影的一个功能之一，让时间流传。”



1



2



3

1. 电影《神奇动物在哪里》剧照

2.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3. 电影《午夜巴黎》剧照

此次获奖让阿特伍德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因为“哈利·波特”系列一直延续着既定的魔法风格，她认为可能导致《神奇动物在哪里》获奖的变化是J.K. 罗琳把故事背景设置在了20世纪20年代，这让整个视觉效果都不同了。

看看近5年来的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影片：2012年的《艺术家》、2014年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2015年的《布达佩斯大饭店》，故事都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探讨时髦女郎文化的小说的作者吉娜薇芙·瓦伦丁认为我们之所以喜爱20年代，是因为那是个将时尚与政治迷人地混杂在一起的年代。

对美国来说，那是劫后余生的一代，人们追求纯粹的利益和享乐，可禁酒令又抑制了这种享乐，对立面的冲突就爆发了黑帮的崛起，就像美剧《大

西洋帝国》。这一切不仅同时催生了朋克精神和不羁的爵士乐，还有新一代的时髦女郎（flappers），她们喜爱穿着短衬衫、用帽子包起头发，听爵士乐，对性采取较为随意态度。

对英国来讲，那是英帝国和贵族的挽歌，就像《唐顿庄园》和《故园风雨后》所表达的，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代表的新贵宣告了实业对封建，通俗对古典的鲜明立场。这导致了当时的王宫名媛一方面保留着贵族式的优雅，一方面接纳着新生的时尚元素。

而法国呢，就像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黎》，或者海明威的作品《流动的盛宴》那样，会聚着咖啡公社（Café Society）的各路文化艺术的名人，包括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毕加索、达利、科尔·波特、香奈儿和约瑟芬·贝克，那时的巴黎在和平状态和工业革命高速发展中极度繁华。

“那十年标志着对旧时生活方式面临消亡的觉察，即便对富人而言亦是如此，以及与之伴随的对于传统逝去会引发全面社会混乱的恐惧。新时代曙光的降临让彷徨无措的人们反应剧烈。”研究20年代文化的查理·伯奇（Charlie Bertsch）教授曾说。也许这也是好莱坞和时尚界对20年代如此痴迷的原因。

更具现代性的格调

“摩登女郎”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Vogue》一篇名为《美国的极盛青春期》（*The Extreme Adolescence of America*）的文章里：“她是一名梦幻般的古怪女子，漂亮得很现代，将巴黎、未来主义、淳朴风还有一点点脂粉气狂野地融为一体……她热切关注的只有两件事：她自己和她的衣裳。”

正如布鲁斯·比利芬（Bruce Bliven）在《摩登女郎·简》（*Flapper Jane*）中抓住了彼时服饰风格的精髓：“这个夏天，简穿得不多。如果你想知道确切的，那就是：一件女服，一件便装女衣，一双长袜，两只鞋。”其实，这样的装扮当时早已司空见惯了。女孩们身穿H形连衣裙，留着短发，两条光腿伸出福特T形车的一边悬挂着，现在看来可以明白菲茨杰拉德的那句话：“在欧洲战争中与世隔绝的我们，开始搜寻南部与西部那些不为人知的民间风俗和娱乐，它们多得让我们应接不暇。”

在时尚评论家凯西·霍琳（Cathy Horyn）看来，摩登女郎并不属于城市，更不会是个纽约客，她更

像是女性运动、反沙文主义和汽车带来的自由的更单纯的表象。不可否认，她的格调是现代的，因为其轻松、漫不经心并与青春相连。更重要的是，她深深属于美国。即便摩登女郎在当时是一次失败的运动。由于缺乏品味，她从时尚媒体那里招来的更多是蔑视而不是关注。显然，现在情况截然不同了。

“从时尚的角度来看美国比欧洲更好地拥抱了20年代。”阿特伍德这样认为。当欧洲还在纠结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的时候，美国已经向未来敞开怀抱了。瓦莱丽·斯蒂尔（Valerie Steele）在其著作《巴黎时尚》（*Paris Fashion*）中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有着包括法罗夫人在内的大批耀眼的女性，她们统治着时尚风潮，晋身上流社会的金字塔顶端。但20年代之初，法国却可能是在阻碍着自由的进程。

当时的法国政府努力劝说时装店主不要做褶边，而应该加上各种边饰和装饰配件。因为服饰和布料生产商们向其抱怨新的简洁风格用料减少，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生意。怪不得巴黎时装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初期都一直尺寸那么长，款式那么繁琐。历史的时钟无法拨回，以装饰艺术为代表的去繁就简不久便崛起了。

对于男士的风尚也是如此，在美剧《大西洋帝国》里，“禁酒令时代”不仅筑成了大西洋的海滨帝国，也造就了文学史上“迷惘的一代”。他们梳着溜光的头发，穿着笔挺的三件套西服，抽着雪茄。西服上衣以单排扣为主，通常会有宽大的领子一直延开到胸前，里面搭配双排扣马甲，口袋里装上一块怀表。细条纹是那时候最流行的布料花纹。小圆领衬衫配上一条小几何图形花纹的领结。

而下半身裤装和现在有明显的差别，被称为“Oxford bags”的长裤有着宽大的裤脚，它们通常卷着边，轻搭在鞋面上。这给源自欧洲西装代表的温文尔雅的绅士形象增添了一丝男性的粗犷。

如此种种在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都能得到部分的印证，不过作为一种再创作的艺术形式，电影中的很多细节是经不住推敲的，比如它遗漏了像由让巴度（Patou）和香奈儿设计的、已经成为现代自由女性标识的动感针织衫；它还搞错让女士穿裤子打高尔夫，再比如说黛茜漂亮到可以上《Vogue》的封面，可当时《Vogue》封面还放着插画呢。毕竟，电影和时尚服务的是现代人消费者，无论细节怎么变，都还贴着那个黄金20年代的标签。☑

寻找生命最初的痕迹

文 / 苗千

一组古生物学家的最新发现，不仅可能拓展人们对于地球上生命起源的认知，甚至可能为人们寻找外星生命提供线索。

处于质疑和争议之中的古生物化石

生命从何时出现？基于什么条件而出现？地球是不是宇宙中的特例？在太阳系内部，乃至在其他星系中，到底还有没有生命形式存在？人类应该依赖怎样的线索，以什么样的标准去寻找生命？几位英国科学家最近在加拿大北部的新发现，在时间范围上拓展了人类对于生命现象的认识。这一发现的意义重大，研究生命最初的痕迹，或许可以帮助人们回答这些问题。

位于加拿大北部魁北克地区被称为努夫亚吉图克地表带（NSB）的区域主要由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构成，这是地球上最原始的海洋地壳的一部分。地质学家们认为在努夫亚吉图克地表带中保存着地球中最古老的沉积岩，这里因此引起了众多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兴趣。

来自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的几位科学家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最近在努夫亚吉图克地表带发现了一种微化石，它可能保存了一种生活在地球太古代的早期生物微米级的结构。这种罕见的微化石被封存在石英层之中，据分析，这种微化石可能形成于距今至少 37.7 亿年前，它所记录的可能正是在 37.7 亿年至 43 亿年前，由于地球上频繁的火山活动，在海底暖流附近所形成的地球上最早的生命系统的一部分。如果最终被证实，这个时间就会打破之前的纪录，成为人类发现的距今最为久远的生物化石。

研究者推断，这种生活在 40 多亿年前的微生物，当年可能大量生活在海底火山活动频繁的深海热泉喷口附近。这些微生物以铁为食，而最终形成的微化石保存了它们的细丝和细管结构。在太古代形成的沉积岩非常容易变形，因此科学家们对于这个时期生命形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化学痕迹的研究，尤其是含碳材料同位素成分的研究和寻找，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 35 亿年前的地球微生物化石。

不断发现的古微生物化石，让科学家们相信，在地球形成之后不久，地球上就出现了生命现象。这个化石证据表明，或许在 43 亿年之前，地球上就已经出现了早期生命形式。要知道，根据研究，地球自身也只是形成于大约 45 亿年前。发现微化石团队中的一员、伦敦大学学院的博士生马修·陶德（Matthew Dodd）说，这一发现支持了在地球形成不久之后，地球上的生命形式就起源于海底热喷流附近的观点。

几位研究者的论文《地球最古老的热流沉积物中的早期生命证据》（*Evidence for early life in Earth's oldest hydrothermal vent precipitates*）于 2017 年 3 月 2 日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迅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论文的主要作者之一、伦敦大学学院地球科学系的讲师多米尼克·巴皮诺（Dominic Papineau）博士的研究方向就是理解在 40 多亿年的时间里，地球生命出现和进化的历史，并且以此预测在其他拥有液态水和火山现象的行星上可能发现的生命形式。

研究一块距今 30 多亿年前的微小化石样本，当然会引来各种质疑。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分子进化研究所的所长威廉·马丁（William Martin）教授对于巴皮诺博士的发现表示并不信服，他认为这些微化石并没有明显的生命特征，其中包含的结构可能是自然力形成的。作为回应，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者们反复、系统性研究了微化石，包括其在形成过程中温度和压力可能带来的反应，最终排除了其他各种可能。

巴皮诺博士介绍，他们发现的微化石有着旋转的结构，有点类似酒瓶起子，还包含分支细丝结构，这与此前发现过的更为年轻的微化石有相似的结构。研究者发现的细丝和细管结构被凝固在厘米大小的球状结构中，这种结构可能来自腐败过程中形成的矿物质。从矿物成分来说，这块微化石与之前在挪威、美国的大湖区域和西澳大利亚发现的年龄更小的化石成分相同。巴皮诺博士列举了他们发现的微化石所具有的 9 个生命特征，他希望有一天整个科学界都能接受他们的发现。

在几十亿年的地质过程中，这些远古微生物细微的生命结构被完整地保持至今，研究者最终把它们从地球最古老的岩层中挖掘出来。这种能够呼吸



美国加州佩奇博物馆（Page Museum）的研究人员借助放大镜甄别微化石

和进食的厌氧生物可能生活在距今 42.8 亿年前的地球——仅仅在地球形成 2.5 亿年之后，这说明生命现象在地球发展得非常迅速。研究者声称他们发现的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痕迹，这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地球上生命产生和演化的过程。

或许意义还远不止于此。陶德认为，在这种生命形式出现的时间段，地球上的自然环境与火星非常相似，这对于寻找火星生命的痕迹也具有启示意义。或许人们可以在相似的条件发现产生于 40 亿年前的火星生命——除非地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外。巴皮诺博士也认为，如果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产生地球生命，那么在太阳系的其他地方也可以产生生命。形成生命只需要水、火山活动和一些碳之类的基本元素，因此在火星以及木星和土星的卫星上，都有可能形成生命。

在这个发现之前，地球上最古老的保存了生命痕迹的化石是在澳大利亚发现的形成于 34.6 亿年前的微化石，这块化石的真伪在当年也受到过众多专家的怀疑。当时美国欧道明大学的几位科学家在澳大利亚西部的砂岩中发现在微化石中记录了地球早期微生物生活的痕迹：这种微生物可以把阳光转化为自身能量，同时也会喷射出对于人类来说难闻的硫化物。澳大利亚西部的微化石同样保存了地球上早期生命的球状和微管结构。这个发现让科学家们普遍认为地球

上的单细胞生物在 34 亿年前就开始遍布地球，普遍存在于在人类看起来严酷的缺乏氧气的高温环境之中——而最新发现则又把把这个时间推前了 3 亿年。

实际上，因为太古代生物化石的稀少和特殊性，关于它们真实性的争论在科学界从来没有停息过。在 1993 年，美国加州大学的古生物学家詹姆斯·绍普夫（James Schopf）发现了一种形成于 34.6 亿年前、富含碳元素的细丝结构化石，他认为这表现了某种形式的微生物。尽管他的发现迅速被学术界所接受，随后还进入了教科书和博物馆，但在后来还是引起了较大争议。牛津大学的科学家马丁·布莱瑟（Martin Brasier）质疑，发现这种微化石的岩石，并不是简单的沉积岩，而是在高温的水流环境中长时间形成的岩石，因此布莱瑟教授的研究小组提出了另外一种设想：绍普夫所发现的化石并非真正由生物形成，而是由热流携带的矿物质长时间沉淀所形成。最终科学家们利用高精度透射电子显微镜研究化石的细丝结构和碳元素分布状况，证明了布莱瑟的诊断，这块“微化石”实际上是由高温水流在特殊状态下形成的，并没有记载任何生命形式。

伴随着质疑，古生物学家们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寻找记录了古老生命痕迹的化石，记录了地球早期生命现象的化石的时间纪录不断被打破。人们仍然不确定，在大约有 45 亿多年历史的地球上，生命最初是

以什么形态,出现在什么时期。毕竟在地球形成初期,频繁的陨石撞击和地质活动,都很容易破坏掉生命存在的痕迹,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形成化石保存至今。

火星也是在大约46亿年前形成,当时地球和火星的地质环境比较相似,所处的宇宙环境也相似,都会常受到小行星和彗星的撞击。最初在火星表面也存在液态水,而在形成过程中由于引力作用在内部积聚的能量,使当时的火星同样火山活动频繁,在火星表面布满岩浆,大气层中充满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在最初形成的几亿年的时间里,火星可能也存在着地磁场,在后来又逐渐消失。在大约35亿年前,火星才开始逐渐冷却,又逐渐失去表面的大气层,无法保持表面大量的液态水。

如果生命形式的出现真的是由一些极为简单的条件所决定:火山爆发带来的能量和矿物质、液态水,以及阳光的照射,那么在地球上新发现的太古代生物的微化石会为人类在火星表面寻找早期的火星生命痕迹带来更强的信心,甚至对人类寻找太阳系外的生命形式也会有所帮助。

还要去哪里寻找地外生命?

除了太阳系内部,在远离太阳系的其他星系,只要满足上述的几个基本条件,是否也有可能存在生命?行星学家们曾以为恒星周围的固态恒星极为罕见,但近年来的天文学发现已经证明很多在恒星周围都存在着岩石行星,其中很多位于可能存在液态水的星系“宜居区”。最近最令人瞩目的,就是美国航空航天局在距离地球40光年之外的一个星系内部,一次发现了7颗行星。7颗行星就是7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其中是否可能存在人类未曾想象过的生命形式?

美国航空航天局在2017年2月22日宣布,利用斯皮策空间望远镜(Spitzer Space Telescope)的观测,一次性在属于水瓶座的“TRAPPIST-1”星系中发现了7颗行星围绕着一颗恒星运转。在适当的大气条件下,这7颗行星的表面都有可能存在液态水,而且其中有3颗就处于“宜居区”,表面存在液态水的可能性更大。这个发现也刷新了人类在一个星系中发现处于宜居区行星数量的纪录。

40光年的距离,虽然人类可能永远都无法到达,但是从宇宙的尺度来看,无非是咫尺之间。在TRAPPIST-1星系中运转的7颗行星在人类的望远镜中无非是几个光斑,但是随着人类对于太阳系内部理

解的加深、探索技术的不断提升,能否在这个邻近的星系发现生命现象,也会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之一。

在2016年5月,研究者首先发现了这个星系的3颗行星,斯皮策空间望远镜随后确认了这3颗行星中的2颗,随后又发现了5颗行星。不仅是确认了行星的数量,研究者还利用斯皮策空间望远镜测量了这几颗行星的形状以及其中6颗行星的质量。根据密度计算,这些行星可能都是岩石行星,而进一步的观察则可能帮助人们判断在这些行星表面是否存在着液态水。

与太阳不同,TRAPPIST-1星系的中心恒星是一颗超冷矮星,它的体积只有太阳的八分之一左右,表面温度也远低于太阳,因此在它附近运转的行星表面也可能存在着液态水。围绕恒星运转的7颗行星的相对距离也都接近,如果在合适的条件下站在其中一颗行星上观看其他几颗行星,看到的形象可能比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还要大。这也是人类首次在这类恒星的周围发现与地球大小接近的行星。这些行星上的环境可能与地球大不相同,有的行星可能被恒星的引力潮汐锁定,没有自转,总是把固定的一面朝向恒星,这会使行星的一部分永远是白天,而另一部分永远是黑夜。在这种情况下行星表面将会因为强烈的温差而形成持久的大风。

除了斯皮策空间望远镜和哈勃空间望远镜之外,美国航空航天局计划于2018年发射的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也会加入到对TRAPPIST-1星系的观测中。如果在这些行星的表面存在大气层,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将通过超高精度的探测装置,探测这些行星大气中的水、甲烷、氧气和臭氧等成分,它还将测量这些行星表面的温度和气压,这些都是生命是否能够存在的关键因素。

对于人类来说,TRAPPIST-1星系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研究对象:足够近,足够小,足够明亮。科学家们已经确定了将TRAPPIST-1星系中的e、f、g这3颗处于宜居带内的行星作为研究重点。研究外星系,也有利于人类了解太阳系和地球,理解生命起源的真正原因。

生命究竟是什么?生命为什么能够在宇宙中留下独特的痕迹?在以光年为单位计算距离的天体之间,所产生的生命形式又会有什么异同?人类对于地球的不断探索,以及对于地外行星的不懈寻找和研究,或许终将在未来的某一天给出答案,拓展我们对生命的认识。☑

(本文写作参考了《自然》杂志和美国航空航天局网站的报道)

近视的原因

文 / 袁越

严格来说，近视眼算不上一种病，但却能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目前中国中小学生当中的近视发病率高居世界前列，不少大城市的中小学当中竟有超过一半的学生都是近视眼，不能不引起家长们的重视。

过去大家普遍认为近视是用眼过度造成的，教育部因此出台了针对这一点的预防措施，比如不要躺在床上看书，不要在摇晃的车上看书，看书时应该经常抬起头来看看远方等等。1963年，当时的北京医学院体育教研室主任刘世铭根据经络理论自创了一套眼保健操，并在政府的帮助下向全中国的中小学校强行推广。但是，中医的这套经络理论没有科学根据，也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这套眼保健操真的能够预防近视。事实上，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推行眼保健操的国家，但中国却是全世界近视发病率上升得最快的国家，仅此一点就可以宣判眼保健操的死刑了。

那么，近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曾有媒体报道说，复旦大学的科学家研究发现，遗传因素在近视眼的形成中大约起了60%的作用，还有40%取决于环境因素的影响。但是，只要稍微琢磨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说法是无稽之谈。在没有发明出眼镜的古代，近视几乎意味着死亡，如果真有近视基因，那它应该早就被淘汰了，怎么会如此流行呢？再说了，世界各国的近视眼比例差别巨大，同一个国家的城市和农村的近视率差别也不小，遗传因素是解释不通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遗传只占近视原因的很小一部分，绝大部分近视眼都是后天因素导致的。

在解释近视的发病原因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近视眼的发病机理。研究表明，近视就是晶状体和眼球本身的发育不同步造成的。除了少数因特殊疾病导致的近视外，绝大多数近视都是因为眼球的前后距离过长，导致光线聚焦不到视网膜上。一个人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眼球一定会逐渐变大变长，但与此同时晶状体也会逐渐拉长变薄，从而把光线的聚焦点逐渐往后移，始终维持在视网膜的位置上。只要这两者的发育保持同步，近视就不会发生。一旦两者的发育过程出现脱节的现象，即眼球仍然在继续变长，但晶状体却停止了生长，其结果就是近视眼。

于是，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寻找眼球和晶状体生长

的调控机制上来。

眼睛是光的探测器，已知眼睛的发育过程和光刺激的种类和强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人受此启发，研究了儿童户外活动的的时间和近视眼的发病率，发现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儿童待在屋内的时间越长，将来得近视眼的概率也就越高。这个假说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大城市儿童的近视眼发病率远比农村孩子高，但却没能解释室外光和室内光到底差别在哪儿。在缺电的年代，室内光线往往较暗，但如今正规学校的教室采光都做得不错，为什么仍然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格雷格·施瓦兹(Greg Schwartz)教授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在小鼠的视网膜中找到了一种特殊的感光细胞，能够控制眼球的生长发育。这种细胞有点像相机中的对焦探测器，能够感知图像是否对焦。如果对焦不准确，它就会发出相应的指令，让眼球继续发育或者停止生长。

这种细胞对不同颜色的光会产生不同的反应。通常情况下，室内光线的红/绿比比室外光线高，于是这种感光细胞被过度刺激了，不断发出信号命令眼球继续生长，其结果就是眼球越长越长，最终导致近视。

施瓦兹教授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17年2月出版的《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杂志上。如果这个结果在人眼中也被证明的话，将有助于科学家们找到预防或者治疗近视眼的方法。当今社会的生存压力巨大，孩子们毕竟要花很长时间读书，家长很难让自己的孩子整天在外面玩。✍



道不尽杯酒人生

文 / 张斌



乔治·贝斯特（摄于1968年）

乔治·贝斯特（George Best）的名字从来都是占便宜的，比如，其拥趸炮制的那句话几乎是无可超越的，“马拉多纳 good，贝利 better，乔治简直 best”。偶尔，人们会在老特拉福德的看台上，看到乌发如云，胡须阳刚的贝斯特形象飞扬在旗帜之上，毕竟他是传奇。辞世12年后，人生故事被搬上大银幕——《乔治·贝斯特：全靠我自己》，海报上斗大的一个 Best，努力在提示影迷，掏钱买票进场吧，纪录片大导演戈登又有不凡之作。

2005年，伦敦克伦威尔医院中，弥留之际的乔治·贝斯特留下遗言，期待后人因为足球而铭记他，而不是其他。据说，咽气之后，守在病房门外的《世界新闻报》记者拿起相机拍下了传奇僵直在病床上的最后样子，这是贝斯特生前做的最后一笔买卖，听起来令人唏嘘。

乔治·贝斯特的故事翻来覆去讲过太多了，最简洁的人生脉络便是，天才，因此闪光，后来酗酒，英年早逝。讲出最好的人生故事，对于大导演戈登也非易事，2001年他曾受邀进入神秘的朝鲜拍摄纪录片，推开铁幕，将1966年世界杯赛中那支朝鲜队从历史的深处拉到世界面前，作品名叫《他们生命中的比赛》。四年后，再次入朝，拍摄敏感话题《越境》。2012年，“药王”约翰逊成为戈登作品《9秒79》中的主角，一段惊天旧事重新泛起涟漪。

此次重新探寻贝斯特的杯酒人生，戈登居然显得

有些笨拙，毕竟往昔岁月存留的影像实在不多，纪录片的叙事脉络也只能因循，一位上帝钦赐球技的天才少年，恰逢曼联空难后的王朝重建，22岁迈上欧洲之巅，如今看来，辉煌的人生开端戏剧性地迅速逆转为悲催结局的起点，有人如此比喻：“他就像坐着雪橇一般，快速地滑向深渊。”

17岁加盟曼联时，巴斯比爵士毫不吝惜地赞誉“从贝斯特身体里找到了天才的含义”，《泰晤士报》专栏作家格林描绘贝斯特“踢球自带光环”。影片中，格林透露说，他曾经帮助贝斯特回忆起来，当年曾经在一场欧冠主场开球前20分钟，在老特拉福德的球迷酒吧里，即将出场的“天才”居然在和球迷推杯换盏。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天才最终在酒瓶中跌倒了，25岁之后的贝斯特就已经才华不再了。

戈登导演在新片中长时间地使用了贝斯特当年流连于酒吧中的镜头，努力寻找杯酒人生的宿命根源。贝斯特的妈妈便有滥用酒精的不堪岁月，因此人们很容易认定是遗传所致。当年，贝斯特浪迹美国踢球，退役后居然自己开了家海边酒吧，喝着方便。上世纪60年代，原本粗陋的职业足球开始拥抱流行文化，贝斯特不羁的长发一度被认为是联赛中最为时尚的要素，围绕其身边的也大多是名模佳丽。早年间钟情于贝斯特的一位超模日后皈依佛门，如今已是一头华发，她回忆说，贝斯特既不自负，也不会不恰当地自谦，是个很柔和的人。贝斯特的第一任妻子在电影中则说，喝酒能让贝斯特有自信，不喝酒的他是理想的丈夫，但酒后的贝斯特，则是会虐待妻子的。

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贝斯特才别离赛场，到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漂泊不定，沉迷酒精和性爱，难以自拔。后来的日子则更加简单，终日醉在酒吧，用前妻的话讲，每天恨不得有7万人想和贝斯特喝上一杯，对那7万人而言，每人一杯，但对于贝斯特来说那就是7万杯。2002年，贝斯特被迫换肝，三年后，久病医治无效，黯然辞世。

故事讲得有几分伤感，影片略显沉闷，戈登也无意凭此角逐奥斯卡。而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恰好颁给了体育纪录片《0.J 美国制造》，不知是否好看，但有个事实很多人记住了，目前57%的美国黑人和83%的美国白人认定辛普森有罪。☑

国防预算的“后真相”与真相

文 / 宋晓军

3月4日，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说到了2017年中国国防预算增幅约为7%（增加后的总额度约为1.044万亿元人民币）。由于4天前特朗普在国会演讲时强调他将向国会建议将2018财年国防预算增幅“历史性”地提高约为10%（增加后的总额度约为6030亿美元），于是就有媒体朋友问我：怎么解释这种此消彼长的差别？对此我的答案是：“后真相”与真相的差别。

先说特朗普的“后真相”国防预算。根据美国法律规定，每年2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总统要向国会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案，随后国会要经过一系列听证辩论、听证、讨价还价最终通过包括国防拨款法案在内的13份拨款法案后，再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于10月1日开始新财年的拨款。由于总统换届，特朗普只能将提交预算的时间推迟到3月中旬。但他提前宣称的6030亿美元国防预算，就是在2018年10月1日开始实行的2018财年国防预算。根据2011年国会通过的“预算控制法案”（BCA）限制，2018财年国防预算的上限为5490亿美元，这个数字加上540亿美元就是特朗普所宣称的6030亿美元。但问题是，比2017财年国防预算增长约10%达540亿美元从哪里来呢？

简单说，只有三个途径：一是在联邦预算总量不增加的情况下挤压非国防开支；二是参院以三分之二票通过提高BCA上限；三是从不受BCA限制的“海外应急开支”中挪用。从目前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信息看，

三个途径都存在着诸多障碍。事实上，2016年2月奥巴马向国会提交的2017财年国防预算至今也没有在国会最后通过，从2016年10月1日开始的2017财年的国防拨款，是国会参照2016财年国防开支平均水平按比例通过的“延续拨款决议”（CRA）维持的。也就是说，在最新一版的CRA于今年4月26日到期前，国会必须先通过3月3日众院提交的额度为5779亿美元的2017财年国防预算（基础预算为5161亿美元，“海外应急开支”为618亿美元），才能讨论特朗普提出的额度为6030亿美元的2018财年国防预算。因此，可以说特朗普宣称的“大增10%”的国防预算是“后真相”。

接着说中国国防预算的真相。从2008～2016年以来，中国国防预算年平均增长率为12.43%，低于国家财政收入14.87%的平均增长率。但随着国家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放缓，从2016年开始国防预算增长率开始降为个位数。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有从2015年开始的“史上最大”的国防与军队改革，国防预算不仅没有背离“促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平衡、兼容发展”的大原则，而且从2016～2017年的国防预算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差别上看（前者高于GDP增长率0.9个点，后者高于0.5个点），随着改革的推进，国防预算反而更靠近上述大原则了。

同时可以注意到，在“政府工作报告”和《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草案》中显示，政府在2017年将通过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推进军工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向民间资本进一步放开国防科技领域市场准入等措施，在为正在进行的、国防与军队改革“三大步骤”之一的“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创造条件。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国防预算应是越来越有真相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美、中两国国防预算的“后真相”和真相，不仅体现了两国政治家在确定国防预算上的态度差异，而且也反映了两国国防预算在本国GDP中所占比例上的差异——2017财年美国的国防预算约占本国GDP的3.3%，中国的国防预算仅占本国GDP的约1.3%。也许就是这两个百分点的差异，决定了前者的“后真相”和后者的真相。☑



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傅莹就国防预算增长等热点问题答中外记者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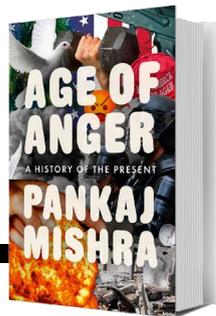
怨恨之源

主笔 / 薛巍



印度裔学者潘卡吉·米什拉和他的新作《愤怒年代》

一位年轻的印度裔学者在《愤怒年代》一书中阐述当前政治危机的根源，《纽约时报》称之为“重要的、渊博的但有缺陷的著作”。



启蒙运动的罪过

印度裔学者潘卡吉·米什拉出生于1969年，被誉为爱德华·萨义德的继承人，他在其新作《愤怒年代》中预言，在2016年政坛发生的一系列惊人事件之后，世界将变得更加分裂和混乱。所以《金融时报》的书评说：“他肯定会成为2017年被引用次数最多、受到批评最多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会被称为毁灭的预言家、悲观主义者、破坏者。”

《经济学人》杂志说：“米什拉轮流居住在伦敦和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一个静养所里。他给彭博社写专栏挣了不少钱，还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座上宾。但他认为自己是西方的继子，这给他提供了一个分析西方社会的比较超脱的立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特朗普获胜时说他和《纽约时报》的许多读者搞不懂他们的国家。对于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的原因，学者们提不出什么合理的解释。米什拉认为，这是因为西方主流的思想框架有问题，要想理解西方社会的

现状，需要调整这套思想框架。他写道：“我们无法理解当前的危机，是因为我们的主流知识概念和范畴无法处理失控力量的爆发。如今盎格鲁—美国的大部分知识假说形成于‘冷战’及之后的欣喜若狂的时代，它无法引导人们解决今天的混乱，必须把观念转向更早的动荡时期。那是弗洛伊德等思想家的时代，他在1915年警告说，人类原始、野蛮、邪恶的冲动并没有在任何人身上消失，只是在等待机会再次出现。当前的灾难也让尼采所说的怨恨浮现了出来。”

西方现有的知识框架的基本前提是，假定人类本质上是理性的，受到追求自身利益的激励；他们主要的活动是把个人的幸福最大化，而不是以恐惧、嫉妒或怨恨为基础。启蒙运动深化了这一套人类动机的概念，其主要思想家鄙视传统和宗教，寻求用理性地确定个人和集体利益的能力来代替它们。18世纪晚期的梦想是沿着世俗化、理性化的路线重建世界，到19世纪，功利主义理论家进一步阐释了这套理论，提出要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根据

这一世界观，人的行为准则是经济人，是会计算的主体，其自然的欲望和本能取决于其终极动机：追求快乐、躲避痛苦。这种简单的观念忽略了人类生活中一直存在的许多因素：如担心会丢脸、荣誉和地位、对变化的不信任、稳定和熟悉的吸引力。这套世界观中没有那些更复杂的动机的位置，如虚荣、担心显得脆弱、保全脸面的需要。理性主义者沉迷于物质进步，忽视了怨恨对被甩在后面的人的诱惑，以及受害者心态带来的快感。

伏尔泰是主流的理性主义者，拥护商业和进步。米什拉把他描绘为精英知识分子的原型，而且是最坏的，他创造了一个牺牲其他人、对他那样的思想家有利的社会。他宣扬宽容，却被独裁主义者拉拢，尤其是俄国的凯瑟琳女皇，为其暴行辩护。因为他的人脉，他通过金融投机挣了些钱，过着优越的生活。伏尔泰被描绘为达沃斯、托马斯·弗里德曼和新自由主义者的精神上的祖先。卢梭则看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文明深层的病理。他警告说，市场社会会使个人无依无靠。人们渴望在财富和地位上超过他人，为此会做出残暴的事情。现代世界削弱了宗教和家庭，从而使人们失去提供慰藉的情绪缓冲器。没有这些支持，个人开始依赖他人的意见来形成自己的自我价值感，这会引发不安全感、嫉妒和自我憎恨。嫉妒和耻辱感、无力感、对他人的存在的怨恨，随着这种情绪的徘徊和深化，会毒害市民社会、破坏政治自由，使全球转向独裁主义和本国之上主义。为了治愈怨恨而被发明出来的各种主义，如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都可以追溯到卢梭的著作。

怨恨的力量

米什拉在书中说：“人类行为的关键不在于对立的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相反，在于一种不可抗拒的模仿的欲望。它在于（对优于自己者的）怨恨。”怨恨是嫉妒、羞辱和无力感的混合，它的含义形成一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世俗的、精英管理的社会在18世纪的兴起。卢梭虽然没用过“怨恨”这个词，但他是第一个看出怨恨会出现在于现代平等主义、商业化社会的思想家。卢梭是巴黎精英圈子的外来者，跟嫉妒、迷恋、嫌恶和排斥之情做过斗争，他看到了受自我利益推动的人会为获得虚荣心

的满足而活着，他们渴求和需要他人的认可，它跟自我认可一样重要。这种虚荣往往会造成对自我的厌恶，以及煽动对他人的憎恨，这种怨恨的产生跟平等、个人主义的原则的扩展成正比。

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的国家会因为怨恨而发起报复，早期的例子是德国的浪漫主义者，米什拉称他们为“最早的年轻、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在19世纪初，德国在工业化和政治统一方面落后了几十年，没能跟上英国和法国积累力量与财富的步伐，这导致受过教育的德国年轻人感觉自己的民族迟到、次要、软弱。他们把法国视为世俗、优雅、愉悦感官的哲学家的发祥地。但当他们到了法国之后，他们跟卢梭一样觉得这个国家很浅薄。1769年，哲学家赫尔德从里加港前往巴黎，希望自己被高卢化。第二年他就失望地离开了，并认为需要构想出跟这种空洞的世界主义不同的道路。在卢梭的基础上，赫尔德、席勒等德国诗人和哲学家提出了他们对异化的诊断，感到自己跟世界，甚至跟自己的自我分离，是现代意识中最糟糕的一面。赫尔德跟费希特一起，提出了用民族主义来化解疏远感。德国人的文化概念跟法国人的文明概念截然不同。德国追求的不是他们的文化的进步和美好的未来，而是用遥远的过去来肯定他们民族的伟大，把民间故事和神话提升至高雅艺术的顶峰。文明以商业、奢侈和城市化为中心，文化则为地方性的纽带和传统注入热烈的精神性。民族主义不仅为全世界的农民的愤怒提供了一个出口，现在还在诱使那些曾经处于文明顶点的文明走向民粹主义。

至于如何消除怨恨，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莫因说：“米什拉没有做好提供解决方法的准备。虽然他考察了商业化现代性在全世界的蔓延，强调了它事与愿违的扩张，但他没有提出其他明确的替换路线。像他那样，把卢梭解释为怀念古代的自由的人并不管用。毕竟，卢梭自己也不接受复兴他曾经加以理想化的斯巴达的可行性。”

《经济学人》认为，米什拉的结论黑暗而草率。“令他感到绝望的许多冲突并不新鲜。实际上，自由主义就是源发于解决原始的资本主义和革命引发的动荡。他要求人们更多地理解灵魂及其非理性冲动，不知其他制度会如何顺应这一呼吁。政治就是冲突：它永远都不会达到米什拉渴求的稳定状态。”



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争论不休

——写在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去世五周年

文 / 陈以侃

大概两个月前，马丁·艾米斯透露正在写一本关于“人终有一死”的小说，只不过里面写的是三个真实的故人：菲利普·拉金、索尔·贝娄、克里斯托弗·希钦斯。既然是自传体，我无端揣测，小说可能盘旋在一场很精彩的饭局，是贝娄、艾米斯、希钦斯唯一一次同桌，其中更年轻的两位作者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都仔细描述过。1989年，艾米斯带着希钦斯去觐见已经七十好几的贝娄，进门前反复警告希钦斯不可造次，但尽管艾米斯在桌下猛踹好友胫骨，还是没有阻止这场致敬之旅终结在一轮90分钟关于以色列的激烈争执中。自己右脚的“伤势”让艾米斯得出如下结论：“对付希钦斯，不管是生理还是智识的对抗都同样徒劳。”

麦克尤恩也讲过一个故事，说当年在他家里聚会，艾米斯先到了，希钦斯进门之后说刚刚经过隔壁巷子看到几个混混在纠缠一个姑娘，拖着艾米斯和麦克尤恩要去救美，说对方只有七个人，我们这儿已经有三个了……等他们赶到现场，混混们已经不见了，本在冷风中犹疑得发抖的麦克尤恩大感释然。希钦斯是这样一个人“无敌不欢”的人，他喜欢说愤恨虽然只能提供一种毒品般的能量，却是让你早早起床的好办法；他喜欢说，别人都告诉你对抗只能“擦出些热量，但光芒黯淡”，但没有热量，哪来光芒。

对于我们这些曾经把追捕希钦斯的所有言论当成一项志业的人来说，他这种全身心散发的恨意从来都不是消极的，反而他给你最显著的一个冲动，是想让自己更好，从而可以更不遗余力地压榨生活。艾米斯说，希钦斯死了之后，开头一段万事无味期过去，你对生活的爱会大幅度地提升，就像希钦斯把自己对生活那股强烈的热情遗赠给了你。

另一点我和艾米斯深有同感的是，希钦斯随时随地要出来找我们聊天。他俩之间如暗号般上不了台面的笑话我是听不到了，但希钦斯似乎在所有我感兴趣的话题上（以及我不感兴趣的），都说了一些别人说不了的话，于是，不管在我笔端还是头脑中发生有意义的讨论，他都会参与。这就更让此刻没有希钦斯的美国政局像没有解说的足球赛了。众所周知，特朗普的总统生涯慢慢铺展成现实的过程中，《1984》成了超级畅销书。前两天还看到角谷美智子分析为什么奥威尔必读，写的大致也是恍如噩梦般的处处印证现实，但到最后一段氛围突然一换：“这当然是让人绝望的景象，但克里斯托弗·希钦斯曾指出，奥威尔在世时不断追求‘难以表述却能够验证的真相’，证明了人类的坚韧，也证明了人性中有一小块不可消磨的内核，总有办法抵抗欺骗和压迫。”希钦斯加入对话的时

候，和他的偶像奥威尔一样，似乎代表了理智的某种硬度，从来不会有哭哭啼啼的气质，完全是正面的。马丁·艾米斯称他是古往今来第一雄辩家，但不管这场比赛要如何开展，希钦斯不会浪费一秒钟学西塞罗的“O tempora! O mores!”（差不多就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要的是左拉的“Allons travailler”：“开始干活吧”，这也是希钦斯最喜欢的话之一。

希钦斯有一点占了便宜，那就是伯里克利、狄摩西尼，甚至丘吉尔、曼德拉，都没有机会征服YouTube。读书的时候，经常吃完晚饭看他和其他宗教人士吵架，转眼就是凌晨了，在那三四点的兴奋和不支中，有种幻觉是我似乎时常能预测他的回应，因为就像他自己强调的，“要紧的不是思考什么，而是如何思考”。虽然要在特朗普那张喷了人工日晒的大脸上仿造一记“希区掌掴”（Hitchslap），极有可能只是反刍我最近几个月摄入的大量自由派嬉笑怒骂，但这并不妨碍我自以为能感知希钦斯大致的姿态和一两件他会提到的事情。

去年12月，美国迎来新总统的时候，是希钦斯去世五周年，我正好完成了《致愤青》的一个新译本。这是我当年读到的第二本希钦斯。希式文风中有一种让我束手就擒的特质——从2009年，也是12月份，《上帝不伟大》将我摁在书桌前三四个小时没有动弹开始——就是他完全拒绝屈服那些阅读能力不足的读者。一个王尔德式的论调是为了句子动人，可以随时牺牲真理，但在希钦斯的态度中，为了不折不扣地说出自己想说意思，他并不在意丢失两三个观众。他不会怠慢自己表达的任何一个意思，即使在最鄙夷或最愤怒的时候，句子也永远保持优雅和倨傲。

在《致愤青》中，或许他唯一一次故意放松了自己的陈词滥调警报器，是他指出自己打开邮包，里面那些攻击他的读者来信往往词不达意或者满纸拼写错误。他那一章就专门写来让一个独立思考者要警惕所谓“民意”。“聚合在一起的大众，往往比构成它们的单个人智力要低。如果不是这样，‘煽动家’这个词就没有意义了。”一个把“人民”两字当成咒语念的政治力量，往往是想取人民而代之。从特朗普胜选，到他在就职演说上说出“把权力交还给人民”，近日又把批评他的所有媒体划为“人民公敌”，我仿佛听到希钦斯在我耳边念出《致愤青》里的这段话：

我们要杜绝势利，不要厌恶人类。但我们更不能害怕批评那些总在试图迎合民众最低劣的想法、有时还会得逞的人。如果没有所谓的民众正等候着回应这样的迎合，批评此类行径本该是毫不费力的。随便哪

个愚人都可以挖苦帝王、主教或亿万富翁。但要面不改色地挫败一群暴徒，甚至只是录制节目时的现场观众，都更需要一点坚毅。

希钦斯写过一本小书叫《为什么奥威尔依然重要》，他说本来书名要用的是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里的一个词，叫作“直面的力量”。要肢解特朗普的可笑，任何一个有粗浅文字功夫的左派评论员都可以做到，但看到庸众躲在政治正确背后逃脱责任，才真的让人想念希钦斯。

每次写希钦斯，我的第一反应似乎都是把他织在一张友情和文事传承的网络中，同时也把自己受益于希钦斯的历史抽象地牵连在里面。艾米斯第一次读贝娄是希钦斯把《洪堡的礼物》塞在他手里，要他好好研习；希钦斯说自己早期文章像政治演说，是朋友们让他意识到文辞精美并不会“害意”，举了在艾米斯的影响下才读了很多纳博科夫作为例子。

最近我也做了件类似的好事，把希钦斯推荐给了一位对我写作非常重要的朋友。最先给她看的是希钦斯在生命末尾跟托尼·布莱尔辩论宗教最后的一段话：“你问我，‘为什么要拒绝灵魂不灭这样美妙的事情？’‘难道你不想见到那些你最喜欢的作家吗？’对我来说，这样的说法很虚妄，要说我想见莎士比亚，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确随时可以见到他，他就永生在他的作品里。”在希钦斯看来，如果有人想提

供给你“一种不可验证的无所不知，一种没有相反证据可以穿透的坚信不疑”，如果把接受类似的假设作为对话的前提，那还不如不聊。

回想当时如酗酒般地观看各种宗教辩论，可能迷恋的是一种自虐，就像李安给《色·戒》写序，说张爱玲反复修改这个故事，“像受害者忍不住重现和变异痛苦来获得快感”。我看到一个个貌似强健的头脑可以被毒雾般的意识形态腐坏成什么样子，似乎有种别样的切肤之痛。就像最近小半年，美国政治电视的摄入量又几乎回到了上学时候，看特朗普的顾问——一个估计大学辩论赛想代表院系上场都困难的凯莉安·康维，绝望地修改、翻覆一个个谎言和可耻，a是何等难得的娱乐。看史蒂芬·米勒大义凛然地恐吓主播，宣称总统权力恢宏，不可置疑。那种荒唐感就像希钦斯说的，能推动你读书写字，而看到屏幕上美国人的瞠目结舌，不敢相信一个公务员居然能无知至此，仿佛印证了我对现实的某些反应，滋养我那颗反抗欺骗和压迫的内核。

一方面，愿意感激地、不自量力地谈论希钦斯，翻译希钦斯（和一个作家之间，没有比翻译更亲密的对谈了），正是因为他本就时时刻刻还出现在我们的对话里，对于艾米斯、角谷女士和在YouTube的评论里很多和我一样把发现希钦斯新视频当作人生大事的同志，都是如此。但说到底，我的希钦斯瘾，根源还是在那些我被剥夺的讨论中。✍

松果
一万个生活家

我是黑麦，
我为1000个人做过私厨家宴。

来松果，
和我一起吃饭。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看不见风景的房间

文 / 理亚（杭州） 图 / 陈曦



在一个什么事都没发生的周末，我的女朋友Y小姐第42次决定和我分手。她盘着细长的小腿坐在沙发上削土豆皮，坏脾气的猫在撕咬她拖鞋上的绒球，而她放下削皮刀，对什么事都没做的我叹了一口气，重复道：“我们分手吧。”

“为什么？”我习惯性地问。这些年她和我分手的理由千奇百怪，有时是因为天气不好，有时是因为排骨太咸，有时是因为我喝水的样子像哈士奇，但总归我们还在一起。

“因为我们的房间看不见风景。”Y小姐果然又换了个新理由，不过这次她看起来相当坚决。

诚如Y小姐所言，我们住在这个城市某座随处可见的公寓楼里，而这座公寓楼对面是另一座一模一样的公寓楼，诸如此类的公寓楼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足以绕地球50圈，也许这就是城市本来的风景。当然，大多数人并不关心这件事，他们只是回到房间里睡觉，第二天又赶最早的高铁去另一个城市上班，而我的女朋友是个足不出户、依赖想象力存活的人，在她心中，我们的丑猫不但穿着靴子，还能随时从高礼帽中变出彩带。

“我感觉我要死了。”Y小姐沮丧而又不无夸张地说，“每次我打开窗户，除了一模一样的楼房，我连一个烟囱都看不到——我和我的想象力正在死去，在这个看不见风景的房间里。”

作为Y小姐的男朋友，我确实很同情她，毕竟在我认识她时，她就像还没在蒂姆·波顿的电影里发病的海伦娜一样美丽，现在却好比俄罗斯大妈一样坐在小房间里勤勤恳恳地削土豆皮。我们都读过很多书，看过很多电影，喜欢文学与艺术，但也同样缺乏六便士。工作多年后，我们身上全部的六便士加起来，也只够在这个城市换来一个看不见风景的房间，推开窗

户既不会有佛罗伦萨的美景，也不会有鸽子飞过阿诺河的上空，连一个可供牧羊女爬上去的烟囱都没有。这个房间严重地限制了Y小姐的想象力，使她患上了内分泌失调和间歇性头痛以及别的什么让声音加高30分贝的疾病。

“很遗憾。”我耸了耸肩，“除了这个房间，我什么都不能给你，也许你需要一只穿靴子的猫来拯救你。”

“你觉得我是在和你开玩笑吗？”Y小姐目露凶光，握紧手中的削皮刀，“你根本不了解我！”

我当然了解，我怎么可能不了解呢？及至年长之后，我越来越了解，文艺青年们是一种像翻车鱼一样脆弱的生物，让他们致命的不仅是诗歌、梅毒、妄想症、花粉过敏、春天的晚风和头上遥不可及的月光，还有那个花光所有六便士换来的、看不见风景的房间。

“无论如何，至少我们还有窗户呢。”在Y小姐用削皮刀逼近我的鼻尖之前，我举起双手这样对她说，同时心里祈祷有一只穿靴子的猫来拯救我。

但我们的猫只是打了个饱嗝，什么也没干。

最后，我和Y小姐还是没有分手，也依然住在看不见风景的房间里。唯一不同的是，如果你到我们家来做客的话，会看到窗户用油彩画满了松树和月亮，这是一个得过失心疯的艺术家朋友为我们即兴创作的，他自称是中国版东山魁夷。

“女人总是喜欢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而对于男人来说，风景就在心里。”我决定从此对艺术嗤之以鼻。

“多美啊，我们就像住在东山魁夷的画里。”Y小姐对我的牢骚充耳不闻，哼着歌儿慢悠悠地削起了土豆皮。✍

世界，万物生息共融
我们，以公益之心
向善加力

RESPECTING DIVERSITY
OF THE WORLD, WE PROMOTE
PUBLIC WELFARE WITH OUR
HEART OF CHARITY

CCTV **生活周刊**
优秀代理公司 全媒体广告独家代理商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是集广告代理服务、影视制作、音乐版权销售、金融支付4家子公司为发展平台的文化集团公司；拥有丰富的媒体运营经验、专业的品牌服务能力以及雄厚的资本运营实力，是媒体及企业经营活动中的有力合作商。

vtpower
VITALPOWER MEDIA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月 湖 上

素語

瑜伽·轻食·高端定制

opening

Mission: To convey a healthy attitude and way of life



精致在指尖 素语絮絮说

| 期待您的预约 | 0731 8520 0776

| 期待您的到来 | 长沙·藏珑国际花园3-5栋27层